

南洋學報

JOURNAL OF THE SOUTH SEAS SOCIETY



第七十六卷 • 二零二二年十二月
Volume 76 • December 2022

本期内容包括

中国古代诗文理论与现代华文文学研究

戏曲舞台上的新加坡故事

新加坡的民间信仰研究

新加坡佛教的制度化过程

Fostering Trust through Public Communications in
Singapore's Handling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南洋学会 | South Seas Society

编辑委员会 Editorial Board

编辑顾问

王赓武 (新加坡国立大学)
颜清湟 (澳洲阿德莱德大学)
庄国土 (中国厦门大学)
梁元生 (香港中文大学)
王德威 (美国哈佛大学)
陈荣照 (新加坡国立大学)
陈思和 (中国复旦大学)
赵稀方 (中国社会科学院)
刘俊 (中国南京大学)

主编

许振义 (南洋学会)

副主编

林纬毅 (南洋学会)

编委

纪贇 (南洋学会)
金进 (中国浙江大学)
曲景毅 (南洋理工大学)
张连航 (香港教育大学)
吴小安 (华侨大学)

Editorial Advisors

Wang Gungwu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Ching-Hwang Yen (University of Adelaide, Australia)
Zhuang Guotu (Xiamen University, China)
Leung Yuen-Sang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Wang Der-Wei (Harvard University, USA)
Tan Eng Chaw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Chen Sihe (Fudan University, China)
Zhao Xifang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Liu Jun (Nanjing University, China)

Editor-in-Chief

Koh Chin Yee (South Seas Society)

Associate Editor-in-Chief

Ning Ngui Ng (South Seas Society)

Editorial Members

Ji Yun (South Seas Society)
Jin Jin (Zhejiang University, China)
Qu Jingyi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Cheung Lin Hong (The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Wu Xiao'an (Huaqiao University)

南洋学会第四十七届理事会 (2022–2025年)

South Seas Society (Singapore) 47th Executive Council (2022–2025)

顾问: 王赓武 颜清湟 陈大荣
名誉会长: 陈荣照
会长: 许振义
副会长: 蔡曙鹏
秘书: 沈斯涵
副秘书长: 欧雅丽
财政: 梁勇
副财政: 黄子明
学术主任: 林纬毅
副学术主任: 陈家俊
编辑主任: 纪贇
理事: 吕世聪 麦庆良
查账: 吉凌

Advisor: Wang Gungwu, Ching-Hwang Yen, Tan Tai Yong
Hon. President: Tan Eng Chaw
President: Koh Chin Yee
Vice President: Chua Soo Pong
Hon. Secretary: Wilson Sim Sihan
Asst. Hon. Secretary: Ou Yali
Hon. Treasurer: Liang Yong
Asst. Hon. Treasurer: Wong Chee Meng
Head, Academic: Ning Ngui Ng
Asst. Acad. Head: Tan Kar Chun
Head, Editorial: Ji Yun
Councillors: Loo Say Chong, Bay Keng Leong
Hon. Auditor: Ji Ling

目次

会长报告	许振义	vii-viii
------	-----	----------

学者论文

中国古代诗文理论与现代华文文学研究	杨松年	1-10
新加坡故事戏曲创作与传播	蔡曙鹏	11-28
管窥与思考：新加坡的民间信仰研究	林纬毅	29-34
当代诗学	陈 剑	35-39
莱佛士与新加坡学院之筹办	叶钟铃	41-51
诸蕃锦绣 ——宋、元南海布帛贸易（以爪哇为例）	吕世聪 廖筱纹	53-74
从民间祠庙到佛寺：新加坡佛教的制度化过程	纪 赞	75-89
姚紫《新加坡传奇》语言特色初探	陈家骏	91-118
从华侨、华人到华族：印度尼西亚华族的嬗变	曹云华	119-148

印尼华文小说的族群创伤叙事	马 峰	149-163
移民生意经：鸦片战争后厦门的发展（1842-1938）	王纯强	165-183
Fostering Trust through Public Communications in Singapore's Handling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i>Koh Chin Yee</i>	185-200

青年论坛

以复杂小地方写无边大历史 ——读陈政欣新作《武吉演义》	曾宇昕	201-212
--------------------------------	-----	---------

序与跋

VUCA环境下的生存法则：做时代的价值型企业 ——《用户价值变革三部曲》序	孙静若	213-224
--	-----	---------

JOURNAL OF THE SOUTH SEAS SOCIETY

Volume 76 December 2022

Contents

Foreword by President *Koh Chin Yee* vii–viii

Academic Monograph

Chinese Classical Literary Theory and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i>Yeo Song Nian</i>	1–10
Singapore Stories on Chinese Opera Stage: Review of Creative Experiences	<i>Chua Soo Pong</i>	11–28
Insights to Folk Religions in Singapore	<i>Ning Ngui Ng</i>	29–34
Contemporary Chinese Poetics	<i>C C Chin</i> (<i>Chen Jian</i>)	35–39
Stamford Raffles and the Founding of Singapore Institution	<i>Yeap Chong Leng</i>	41–51
From the Imperial Records: Maritime Textiles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Java, 10th–14th Century	<i>Loo Say Chong,</i> <i>Lew Siew Boon</i>	53–74
From Folk Religious Shrines to Buddhist Monasteries: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Buddhism in Singapore	<i>Ji Yun</i>	75–89

A Study of the Language of Yao Zi's <i>The legend of Singapore</i>	<i>Tan Kar Chun</i>	91–118
From Overseas Chinese, Chinese to Chinese Ethnic Groups: Evolution of Chinese in Indonesia	<i>Cao Yunhua</i>	119–148
The Traumatic Narratiom in Indonesian Chinese Novels	<i>Ma Feng</i>	149–163
The Business of Migr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Xiamen after the Opium War, 1842–1938	<i>Ong Soon Keong</i>	165–183
从冠病–19抗疫看新加坡如何通过公共沟通建立互信	许振义	185–200

Young Scholars' Forum

Writing Boundless History in Complex Small Places — Reading Chen Zhengxin's New Work <i>Bukit Yanyi</i>	<i>Zeng Yuxin</i>	201–212
--	-------------------	---------

Preface and Postscript

Rules of Survival under VUCA Environment	<i>Serene Sun Jingruo</i>	213–224
--	---------------------------	---------

南洋学会会务报告

过去的一年，南洋学会做出了两个方面的重要调整。
首先，今年4月30日的常年会员大会批准了理事会的提议，对学会章程进行了三个方面的调整：

一、取消每年收费的普通会员会制，保留永久会员会制；主要考虑是过去多年，入会的皆为永久会员，普通会员制名存实无。

二、理事会任期从一届两年改为一届三年；主要考虑是减少行政手续变更，有助理事会进行中长期工作规划。

三、会长任期以连续两届为限，不连任两届以上；在至少间隔一届之后，若获会员和多数理事的信任与支持，可再次担任会长；主要考虑此举一来有利百花齐放，二来避免担任会长职务的同人长期劳累，三来有利于引进新血，尤其是不同学术领域的新血，永葆我学会活力。

其次，扩大我学会的研究范围。早在初创时期，我学会即以东南亚课题为研究范围，包括文学、语言学、历史、地理、自然科学、经济、农业、法律、教育、文化、宗教等。但是，近年来，研究课题范围似乎有所收窄。

从今年开始，我学会积极把研究范围恢复至广义的东南亚课题，例如今年10月15日由苏州工业园区开发公司首任总裁曾士生主讲新加坡—中国关系，本期学报有许振义写新加坡的公共沟通和社会互信，这些属于外交与治理的题材；本期学报有孙静若写用户价值和价值型企业，则属于现代工商管理的题材。

另一方面，文史研究是我学会传统强项，理应精益求精。

3月27日，我学会主办杨松年《南山有栲》新书发布会暨学术研讨会，由杨松年主讲“中国古代诗文理论与现代华文文学研究”，蔡曙鹏主讲“戏曲舞台上的新加坡故事：创作经验回顾”，陈松沾主讲“当代诗学”，林纬毅主讲“管窥与思考：新加坡的民间信仰研究”。此四篇论文均已收入本期学报。

今年一共举办了六场南洋文史系列讲座，即关瑞发主讲“华译马来文诗歌：华人与马来文化的认知沟通”，黄子明主讲“牛车水和新加坡戏曲文化的渊源”，吉凌主讲“从华族遗脉到国家古迹：新加坡斗母宫的信仰来源与传承”，沈国明主讲“二战前台湾人在马来亚演剧考”，陈来华主讲“飘洋过海出南洋”，陈嘉琳主讲“从战前华人社团注册名单引发的思考”。

以上所有研讨会与讲座皆以线上、线下方式同时进行，推进学术研究与知识的分享。

二战时期，在陈嘉庚号召下，南侨机工从南洋回国参加运输工作，支援中国抗战。1986年，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陈共存与我学会会长魏维贤博士率领我学会学术考察团赴滇缅公路作实地调研。回到新加坡之后，崔贵强、林孝胜和叶钟铃分工撰写了三篇文章，详实记录了机工从招募、出发，在滇缅公路上出生入死，以及战后艰辛的复员返乡的史实。

我学会将把这三篇文章，以及包括陈共存、庄明理和林少彬的一些报告书、文章及文献，结集出版，一来重新整理当年的原始资源与论述，二来在史观上反映东南亚华人的视野与观点。崔、林、叶三位前辈先进皆是我国历史研究硕儒，也是我学会资深会员。我学会有机会出版此书，善莫大焉。

此书的出版，获得梁苑集团创办人梁佳吉先生、FNA集团董事长吕立岩先生、新加坡科艺公司董事长陈立发先生、新加坡佛教居士林、李氏基金，以及怡和轩俱乐部主席胡财辉先生等的鼎力支持，我谨代表我学会再次表示由衷感谢！

多年来，《南洋学报》编委会对学报的出版出力甚大。特此向本届卸任的编委——李志贤、黄贤强、容世诚、李晨阳、李盈慧诸位先进表示由衷感谢，并对曲景毅、张连航二位俯允加入编委会，表示感谢与欢迎。

南洋学会会长
《南洋学报》主编 许振义

中国古代诗文理论与现代华文文学研究

杨松年*

中国传统文学，从古至今，有千年历史，各类文体的创作，丰富多姿，特别是诗歌，常被人称为诗歌王国，诗学著作，绵延不断。一直到五四运动反对古风，才遭硬性的砍断，致当前论诗评诗，只知引进西方理论，而罔顾传统的继承，四川大学曹顺庆称这现象为传统的失语，一些人也为此痛诉。

一、精彩的诗见与多样的处理方法

古人读诗，远较今人普遍。他们展卷阅读，逐篇圈点批注。这些批注作品，另加整理出版，是为诗话，或笔记小说。也有单独成书的诗话诗说，里头精彩见解，常常可以看到。如我们现代所说的读者鉴赏论，早在明末清初十七世纪已有文人提出相关的看法。如明末清初王夫之表示诗人、诗作与读者的关系，说道：

* 杨松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前副主任，台湾佛光大学文学系所教授，台湾南洋文化学会学术顾问。

作者以一致之思，读者各以其情而自得……人情之游也无涯，而各以其情遇，斯所贵于有诗。

（诗作之所以珍贵的地方，在于诗人用他的情思写下作品，不同读者读到这作品，由于每个人有不同的情怀、际遇，鉴赏角度不同，所领会的也就有种种的不同）

因此，他论诗评诗，常常从阅读的角度切入，来审视作品，浏览作品。如评阮籍《咏怀·开秋兆凉气》一首“有一切真情在内，可兴、可观、可群、可怨，是以有取于诗”。（《古诗评选》·卷四）评高适《自蓟北归》时他提出“借和远幽微动人欣戚之性”要求作品。

现代诗论常谈到的诗歌主观性（subjectivity）与客观性（objectivity），传统诗论和这课题比较接近的是“情”与“景”或“情”与“物”有机关系的论述。杰出的诗论者更见到其间的有机关系，从而提出如是的理论。还是以王夫之的论说说明。他在《诗广传》中道：

夫物其何定哉；当吾之悲，有迎吾以悲者焉；当吾之愉，有迎吾以愉者焉！浅人以其褊衷而捷于相取也。当吾之悲，有未尝不可愉者焉；当吾之愉，有未尝不可悲者焉。目营于一方者之所不见也。

基于这认识，他提出这样精彩的诗评：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以乐景写哀，哀景写乐，一倍增其哀乐。（《姜斋诗话》。卷上）

前面提到，古人读诗，远较今人普遍。他们展卷阅读，评析作品，很多时候，比现代人更为精细。比较特出的清代专注杜甫诗集的仇兆鳌《杜少陵集详注》。本书共24卷，论析杜诗1439首，凡例计二十则，分别为杜诗会编、杜诗刊误、杜诗编年、杜诗分章、杜诗分段、内注解意、外注引古、杜诗根据、杜诗褒贬、杜诗伪注、杜诗谬评、历代注杜、近人注杜、杜赋注解、杜文注释、诗文附录、少陵大节、少陵广怀、少陵溢法、少陵逸事。诗篇依年为准排列。评注方式，先引各家注解，次列杜诗本文，并将杜诗分段，各段后有圈内

注，先提各段诗旨，次释句义，若有前人注释，必标明出处。又有圈外注，乃有关诗中字句或典故的评析，所引经史诗赋，也标明原本出处。若诗作是长篇，则于段落后总括说明各段句数。尾批采录各家羽翼杜诗言论，对于不满杜诗之说的，则予摒弃。

这是非常规范严谨的注本，其他样式的也不少，或重在抒发对杜诗的领略，如浦起龙的《读杜心解》；或坚持以己意论诗，而不满从章句训释求诗的，如王嗣奭的《杜臆》；或聚合多家论评于一处，彰显各家诗见异同的批注本，如卢坤所编《五家评注杜工部集》。编者以五种不同颜色代表五个不同论者的诗见批点套印在同一本杜甫诗集中：紫色，王世贞；蓝色，王慎中；墨色，王士禛；绿色，邵长蘅；黄色，宋荦；都是明清评杜名家。整部作品，各首杜诗字旁句末天头，圈点竖线批文杂陈。古人处理评论智慧，确实壮观。而王嗣奭《杜臆》对一题数首诗作的论析法，金圣叹对唐代律诗的分解法等等，尤引人入胜。

本文重点不在申论这些做法，只是强调，古人精彩的做法，能不能提供现代文学研究，现代作品论析一些方法论。

二、古人文学选集的处理与现代的文学选集

《四库全书》把古代典籍，分为经、史、子、集四部。集部为文学部，又分总集、别集、诗文评三类。总集为选集，别集为文人个人集子，诗文评为诗文评论作品。其中，总集类又可分为两种，一种为：“网络放佚，使零章残什，并有所归。”另一种为：“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前者为全面收集的作品集。以前印刷业不象现在，通讯联络也远不及现在发达，为保存文献，全面收集作品的总集就出现了，如《全唐诗》，全面收集唐代诗人作品，唯恐有所遗漏，就是这类选集。

今天，出版事业发达，发表管道很多，进行创作的作者大量涌现，作品阅读、收集也容易，而全面收集作品的工作量极为庞大，大概没有什么机构会进行这样的工作。当前出版的总集，多数是属于有删汰或有选择的。

现代这类选集，有些更以大系命名。大系一词原本用于日本，上个世纪初，日本出版的佛学系列著作，曾用上大系的名称，如日本明治四十三年（1911）开始刊行的禅学大系，共八卷；大正六年（1917）开始刊行的佛教大系，共六十四册。佛教大系凡六十四册。日本佛教大系刊行会刊行，至昭和十三年（1938）才完毕。

自从《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辑出现之后，深受学界的赞许，于是中外文学界纷纷出现大系的出版物。新加坡方修编的《马华新文学大系》，共10册，计为理论批评一集、理论批评二集、小说一集、小说二集、诗集、散文集、戏剧集、剧运一集、剧运二集、出版史料，收集战前时期（1919年—1942年）的作品。这部大系的出现，影响海外极大。新加坡教育出版社，在当时教育部支持下，推出《新马华文文学大系》，选取二战以后至新加坡独立前的文学作品。共八册：理论一、理论二、小说一、小说二、散文、诗集、戏剧、史料。

之后台湾先后出版了几部文学大系。台湾巨人出版社于1972年出版《中国现代文学大系》8册，计小说4辑、散文2辑、诗2辑，收入1950年至1970年的作品。台湾九歌出版社于1979年出版《中华现代文学大系（一）》，共15册，于2003年出版《中华现代文学大系》，共12册，在文学大系出版上付出巨大的努力。

马来西亚作家协会也有《马华文学大系》10册，由彩虹出版有限公司出版，2001年。

方修后来也编辑《战后马华文学大系》，但只出版其中的《小说一集》、《戏剧一集》、《散文一集》，及《诗集》。新加坡文艺协会也编辑《新加坡当代华文文学大系》，一套四册：散文、诗歌、小说上下集。

而中国，在《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基础上，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陆续有第二辑至第五辑相继的推出。第二辑选录1927—1937年的作品，1982年年底才开始编选，距离第一辑出版，已是四十多年后的事。第三辑收集1937—1949年的作品，于1991年出版。1991年也推出第四辑，收集1949—1976年的作品。第五辑收集1975—2000年的作品，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中国新文学大系》之外，还有形形色色的文学大系，有古典文学的，如《明清善本禁毁小说大系》二十余部。分艳情类禁毁小说、淫词类禁毁小说、狭邪类禁毁小说、世情类禁毁小说、才子佳人类禁毁小说和荒诞神魔类禁毁小说等六大类。近代文学的，如《中国近代文学大系》12专集30册，上海书店出版，2012年。如《中国近代小说大系》5辑80册，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1988年至1996年。有偏重文体的，如《中国文学批评大系》，苏州大学出版社出版。等等。

不过在接受传统影响的同时，由于新时代新社会新文化发展的需要，我们还看到不少新的文学大系类别的出现，如《当代公安文学大系》，群众出版社出版，1996年。《中国文学鉴赏词典大系》13种18卷，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中国留学生文学大系》，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2000年。收集近代小说、近代散文纪实文学、当代小说、当代散文纪实文学等类别的留学生作品。

在这大系层出不穷的时刻，我们面对一个问题：选集与大系有什么差别呢？可以说，选集是大系，但不等于大系。就大系的定义是把资料汇集起来的意思来说，选集符合大系的定义，选集等于大系。但如果我们对大系有更高要求的话，大系和选集是不同的。《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辑之所以获得高度赞赏，就在于主编者对大系有更高的要求。总编赵家璧曾表示他的理想大系为：

一定要物色每一方面权威人士来担任，由他择优拔萃，在由他在书
写前写一篇较长的序言，论述该一部门的发展历史，对被选入的作家和
作品进行评价。每个文艺团体有一篇历史，每个重要作家附一段小传，
再把这一部门未入选作品编一详目附于书后，说明出处，好让读者查阅。

意思是大系除了需要做到精选作品之外，更需要注意它的历史。所以有人说赵家璧借着大系中的导言和总序，已将选家之学上升为文学史家之学。

所以，大系不仅是选集，它还必须具有史学的意义。台湾作家柏杨曾有意编辑新加坡文学大系，请当时南洋商报编辑李向帮忙，收集新加坡文学作品，并在一个座谈会上与当时写作人协会会长黄孟文与新加坡文艺研究会会长杨松年一块讨论有关的问题。

柏杨把他的计划称为出版新加坡文学大系的计划。在会上，学者就表示大系和选集的不同。大系不应只是一般的选集，它要具有更高的价值，不但注意作品的文学意义，也应该注意收录作品与文学历史间的关系，大系应当要有文学史的脉络。

柏杨应该是把这意见听进去了。后来这套选集出版，书名不称为大系，而作《新加坡共和国文学选集》。这套选集共四种：小说、散文、诗歌、史料，收集新加坡独立后至八十年代初期的作品。

因此我心目中理想的东西的汜一个要求，就是它的作品的甄选，须有文学历史发展的脉络，能将选家之学，提升为文学史家之学。

在如何呈现在所选大系中呈现历史发展的脉络，赵家璧表示：他理想的大系要在某一文体集之前有篇序言，论述该文体发展的历史，对选入的作家作品进行评价，每个文学团体有一篇历史，每个作家附一段小传，等等。这看法有古代文学选集的影子。元好问的金代诗人选集《中州集》，他表示这选集不但要以诗存人，更是要以诗存史。当时的史迹，不但反映在诗篇，也反映在所选诗人的小传。钱谦益的《列朝诗集》不但选明代诗人之作，在所选诗人诗篇之前，介绍作者字号、籍贯、官阶、生平与著作等等。有时更说明他们作品的特色，文学主张、文学活动状况，他对这些诗人诗作的评价。也就是这小传太有意义了，后来学者特别选取这些小传文字，编成《列朝诗集小传》出版。

三、古代文学选集的分析与现代文学副刊的处理

古代文学选集的探究可作为现代文学副刊论析的借鉴。强调文学选集于中国文学评论史的重要性，是我中国文学评论研究的一个重点。我用统计方法分析古代的文学选集，通过选者在选集中对作者作品的选取数目，再结合有关的评语，从而了解选者的态度和文学看法。且以几部明诗选集为例说明：

明末清初钱谦益《列朝诗集》选明人诗，最多前三人：

高启 864

刘基 559

李东阳 347

钱谦益高度赞赏高启和刘基，选诗数目极多，高启、刘基是备受称赞的明初诗人。他反对前后七子，前后七子诗作不在选诗最多十名诗人之列。他甚至和其他选本不同，多选七子领袖李梦阳老师李东阳之作，借此打压七子。

朱彝尊《明诗综》选诗最多前三人：

高启 136

刘基 104

李梦阳 80

朱彝尊选作此诗选，意在纠正钱谦益。但诗评重在调和钱和七子，因此前七子领袖李梦阳在选诗最多三名之内。

王夫之《明诗评选》，选诗最多前三人：

刘基 85

高启 75

杨慎 40

王夫之论诗主独创，反模拟，前后七子之作完全不在他选诗最多的十名之内。他从文学角度特别高推明初诗人刘基和高启。

清沈德潜《明诗别裁》选诗最多前三人：

何景明 49

李梦阳 47

王世贞 40

沈德潜推崇明诗，接受前后七子的文学主张，反宋代元代的诗，所以选前后七子作品特多，前七子领袖何景明、李梦阳高居第一二位，第三位是后七子领袖王世贞。

以上显示：一、选者选诗多少，反映选者的诗观，再结合选者的论诗言论，可以清楚选者对诗人的评价，甚至他的诗观。二、时代不同，选者所提出的批评常有不同的重点研究新马文学时，感觉报纸副刊、杂志编者选取稿件刊登，实际上和文学选集编选选取作品，有共同之处，统计方法既然可以用在选集的分析，应该也可以尝试用来分析副刊、杂志，于是我采用这方法分析副刊。

兹引用我分析二战以前新加坡《新国民日报》创设的副刊《戏剧世界》的方法，供大家参考。

新加坡《新国民日报》在这上世纪二十年代创设多个以文体为主的副刊，包括《小说世界》、《戏剧世界》与《诗歌世界》，是当时文坛的盛事。

《戏剧世界》创设期间，是新加坡新剧蓬勃发展的时段，是旧剧逐渐告退的时期，因此在推进早期话剧的成长与发展上，扮演重要的角色。它的刊期又长，无形中也反映了新加坡早期各个阶段话剧发展的状况。

《戏剧世界》创设于1924年11月22日，停刊于1936年8月24日，前后出版了81期。其发刊宗旨在：1. 提倡有移风易俗能力的话剧。2. 指导人们摆脱虚伪的社会，走向光明。《戏剧世界》发展有三个阶段。我通过这副刊登载的作品，就文体分类统计，结果清楚看到这副刊与当时新加坡剧运发展的关系。

74期可以看到的《戏剧世界》，共刊登277篇作品。以性质分类，如下表：

作品发表总体情况

篇数	
剧作	104
剧论	122
剧评	47
总数	277

第一阶段 (24/11/1924–2/11/1929)

篇数	
剧作	80
剧评	16
剧论	48
总数	144

第二阶段 (11/7/1931–18/2/1933)

篇数	
剧作	21
剧评	24
剧论	17
总数	62

第三阶段 (27/7/1934–24/8/1936)

篇数	
剧作	3
剧评	7
剧论	57
总数	67

三个阶段的比较

	1 st	2 nd	3 rd	total
剧作	80	21	3	104
剧评	16	24	7	47
剧论	48	17	57	122
共计	144	62	67	273

第一阶段

戏剧在新马刚刚开始，各界以创作和登载剧本供戏剧演出为要务，所以登载剧本居多，其次是关心戏剧状况的论文，剧评特少。

第二阶段

剧作渐渐淡化，剧评特强，这阶段大家更关心外国戏剧的引进，介绍和评论外国剧作家莎士比亚、易卜生、大小仲马、萧伯纳等人的作品。易卜生、莎士比亚更是时人强调的重点。

第三阶段

在前两个阶段的努力下，剧作与剧评奠定一定基础，人们关心戏剧问题的方方面面多了，而日军对中国的侵略越来越逼近，也多出现戏剧应该如何为困难的发声，于是我们看到剧本、剧评少了，多是剧论的声音。

小结

由于时间关系，谨提出以上三点向各位讨教。古代文论诗论，内容极为丰富，希望研究现代文学的朋友，一起探究可以提供现代文学研究的方方面面。

新加坡故事戏曲创作与传播

蔡曙鹏*

摘要: 新加坡戏曲是一部中国戏班南来、移民后代、新加坡华人、新移民共同建构的戏曲历史。在近两百年的历史长河里, 华族戏曲从早期戏班与业余剧社演出戏曲传统剧目、戏班和业余剧社改编传统剧目、到创作本地题材、或在艺术样式上因社会环境与文化生态原因而产生变化的过程, 与东南亚华族戏曲的发展十分相似。其中在地化的过程除了改编传统剧目外, 书写当代当地故事, 是一个重要的转换。中国琼剧团在二战前夕南来演出的现代戏, 引起观众强烈共鸣, 本地戏班对以戏曲形式讲当代故事的可能性, 产生巨大兴趣。之后林如烈等有实验观念的编导开始把现代题材的戏曲作搬上舞台。2000年戏曲学院创作的《林谋盛》(又名《丹心谱》与《烈火真金》) 是第一个新加坡题材的大戏。之后该院又创作了小戏《黄金万两》。这两部分别的泰国的曼谷、清迈、中国湖北省的英山、台北演出, 开启了新加坡故事戏曲的海外传播。2018年, 人民协会倡议并组织了以“新加坡的故事”为主题的第二届人民协会百盛艺术华族戏曲节, 再次唤醒了戏曲界对本地题材戏曲题材的关注。新加坡题材的戏曲创作是身份认同和归属感的重要组成部分。回顾创作与演出, 总结经验, 思考未来本地现代戏发展的可能性。

关键词: 新加坡题材现代戏、身份认同、创作、传播、文化资源

* 蔡曙鹏, 南洋学会副会长。

新加坡戏曲从困境中求存的艰辛，始于都市化和现代化加速的七十年代。1978年，美国学者Arnold Perris在民族音乐学学报第22卷2号的文章中指出，1975年文化部发出的演出街戏准证有4367张¹。1976年的文化部发出的准证他估计数字会更低。街戏演出数量数十年来递减的情况，赖素春博士在她的“独立后的新加坡华语戏曲的衰落”一文中，有详细的论述。她说：“都市化过程逐渐吞噬乡村，造成职业戏班的一大致命伤……传统的村落盛会终结，直接减少了酬神戏的演出……演出机会锐减，经济陷入困顿，从业人少了，在艺术上也不可能有更高的要求。”加上娱乐形式逐渐增加，电视台电台为配合讲华语运动的推行，停止播出方言节目，接下来一代人失去方言的表述能力，教育制度的改革与社会环境的巨变，导致运用华文华语人口递减，加快了观众的流失。

尽管韭菜芭城隍过去二、三十年，年年有百日大戏上演，为福建和潮州戏班提供了生存的时空。然而，戏班面临的经济与艺术上的问题不少。除赖素春外、李忠顺、黄子明、蔡曙鹏等都有相关论述。在戏曲学院于2008年在国家博物馆召开的关于戏班的困境与挑战的座谈会上，与会者刘虎臣等人提出，方言消失、街戏演出条例趋严、收入锐减、缺乏提升艺术质量资源、无法吸引年轻人加入戏班等等问题的叠加，戏班难以为继，除非官方与民间出台相助，恐怕再过十年八年，会有更多戏班要关门。新加坡联合早报李穗婷在今年4月15日制作的“疫情下艰难求存：传统街戏的困境”的纪录片中，戏班从业者提出类似的结论。新加坡华族戏曲前景如何？戏班的薪火是否由一些负有使命感的业余戏曲剧团，或转型成为专业戏曲团传递，就像经过几乎消失的马来邦沙旺一样，再度燃起希望的火焰？新加坡华族戏曲是否能亮丽进行从内容到形式现代转换？把新加坡故事搬上戏曲舞台是否是一个选择？

¹ Perris, Arnold “Chinese Wayang: The Survival of Chinese Opera in the Streets of Singapore”. In *Ethnomusicology*, Vol. 22, No. 2 (May, 1978), pp. 297–306.

中华戏曲发展是不断变革的历史

从金院本到元杂剧（又称北杂剧），从北宋末至元末明初的南戏到明清传奇传奇，从民国初年的时装新戏到1940年代现代戏、1966年以后文革的样板戏，变革的过程错综复杂。

博大精深的戏曲，经历代戏曲家的创造与发展，推陈出新，传遍四海。求变与创新的过程，受外因如政治、社会、经济环境，和内因如剧作家、表演艺术家、音乐家创作倾向和理论主张观念、剧团的结构等因素的影响。其生存状态不同、变革的幅度和速度，也会有差异。然而，以戏曲形式反映现代生活的现代戏，是戏曲在由传统向现代的发展、跨越的过程中重要的一步。这个进程最早应该是从五四时期的戏曲改良运动开始的。1904—1905年，陈独秀发表了《论戏曲》，吹响戏剧改良、戏曲现代化的嘹亮的号角。田汉1957年《戏曲研究》创刊号上，呼吁确立“向遗产学习、向舞台学习、向艺人学习”的研究方向。之后，郭汉城发表了《现代化与戏曲化》，提出戏曲现代化“就是要使戏曲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表现时代生活，反映时代精神”。1985年在上海举行的戏曲现代戏研讨会上，经过热烈讨论，认同了张庚提出的“现代戏就要批判继承传统戏曲艺术的原则、技巧、手法的基础去创新。”总结起来，就是现代戏要戏曲化。国光剧团王安祈说的“保留京剧技法绝活，注重唱词文学性”，也是类似意思。现代戏，是戏曲现代化途径之一。

早期琼剧、潮剧、歌仔戏的现代戏

在新加坡舞台上最早出现的现代戏，是来自海南的琼剧团在40年代下南来演出《还我河山》、《鸭绿江上》、《打卢沟桥》等宣传抗战剧。朱逸辉在他刊登在1992年出版的《新加坡琼联声戏剧社庆祝成立三十五周年纪念刊》里的文章，还提起该团为育英中学和抗日筹款演出的《大义灭亲》的盛事。出生在中国潮安、战后再次南来，曾受聘于新加坡老赛桃源、三正顺香潮剧团的林如烈，编导过好几部现代戏。例如取材自无声电影时装戏的题材的《呆中福》

和《秋心泪》。虽没有史料记载这几部现代戏的状况，但可以推测他的这些现代戏，曾经出现在新加坡的舞台上。已故的本地歌仔戏班“筱麒麟”刘虎臣根据老电影改编、导演、与主演的《枪毙关瑞生》，90年代在韭菜芭城隍庙的演出，便是一个成功的现代戏范例。

新加坡故事戏曲创作与传播

1997年6月6日至8日，在新加坡报业控股华文集团的赞助下，新加坡戏曲学院召开了“传统戏曲的变革”的学术研讨会。新、中学者与戏曲工作者王安葵、蔡曙鹏、胡芝凤、宋光祖、田萍、李忠顺、王光瀚、黄仕英、魏维鑫、涂秀好、罗长浩、卢楣华、包华升、上官流云、王凡石、吴启仁、陈有才共十七人与会，发表的学术论文分四个专题——戏曲的改革、不同剧种的创作与发展实验、戏曲的表演与社会空间、京剧、潮剧与戏曲变革，其中有六篇讨论戏曲现代戏。这个新中戏剧学术盛会给与会者很启发，笔者因而萌生了写新加坡故事戏曲作品的想法。

一 《林谋盛》与新加坡现代戏的创作、传播

现代戏是与传统戏相对的概念，主要是指题材表现现代生活、穿着没有水袖的现代服装进行表演的作品。其实，现代戏不应只是从时间上来界定，而更重要的是指具有现代性的戏曲、演员型塑、曲文念白书写、舞台设计、进行新的高度综合，得到现代观众赞赏的文化产品。中国戏曲名家龚和德说：“现代戏曲就是具有鲜明的现代性的戏曲。内容上现代性的主要标志，是对人的心灵的艺术展现达到现代人赞赏的深度，并有利于现代人的心灵建设。”²

² 张伟品：《中国戏曲理论建设的守正与创新》，《人民论坛》2019年第33期，126-128页。

戏曲学院于1998年启动的现代戏《烈火真金》的创作与传播。这是一部以围绕着抗日英雄林谋盛为中心、反映新加坡日战历史的越剧。³ 创作初衷，是为戏曲进校园写一个居安思危的爱国主义题材的剧目。在戏曲学院客卿教师水小燕的协助设计唱腔的基础上，完成了这部30分钟的小戏。小戏篇幅短，因此要从林谋盛的故事中提炼、集中、概括出抗日军和日军博弈过程的精神内涵。林谋盛是中英组成的136谍报部队（华人分队）成员，负责收集情报，等待盟军反攻马来亚时作内应。主要情节是林谋盛到怡保，汉奸出卖，机警逃脱时落幕。因为是部篇幅短，避开了以往的英雄叙事策略中很容易撕开的血腥与暴力，没有写到1944年被日本宪兵逮捕，过后在怡保监狱中受尽折磨虐待、患上赤痢病，日军不予以治疗而狱中牺牲的结局，而是以人带史，以情动人，用细节打动观众。《烈火真金》完成排练后，恰好收到泰国文化部的邀约，要受邀单位以创作作品参演。这部小戏在曼谷的泰国文化中心首演后，移师北上，在清迈文化中心演出。观众反应热烈，创作团队深受鼓舞。因而有了把《烈火真金》发展成大戏的动力。

当时，新加坡越剧的普及度比不上1950年代末因《天仙配》、《女驸马》以及港台黄梅调而拥有广大观众群的黄梅戏。因此戏曲学院决定以黄梅戏样式把《烈火真金》发展成大戏。经过半年后笔者定稿后，邀请湖北省黄梅戏剧团张辉和中国艺术研究院朱飞跃编唱腔、浙江小百花越剧团导演胡奇娴执导，电视台陈鸿才设计服装、南洋艺术学院吕萍担任舞台设计。武装部队华乐团现场伴奏，郑少校指挥。杨宏明担任灯光设计，韩明俦监制。这个包括了50位老中青三代演员、19人乐队、30位后台工作人员、排演了45天的大戏，全剧共有21首黄梅调歌曲，7大剧团（余娱儒乐社、平社、冈州会馆、东安会馆、小麒麟闽剧团、潮剧联谊社、新加坡海南协会）资深演员客串演出，被选为2000年新加坡华族文化节重点节目。这次演出，《烈火真金》戏名改为

³ 蔡曙鹏：《从经典剧目演出看新加坡越剧发展潜力》，2021《戏剧评论》第一辑，268-277页。

《丹心谱》，由张辉扮演林谋盛（之后进校园巡演，则由新加坡海南协会林明峰扮演）。华族文化节围绕着“继承传统文化，发扬现代精神”主题，展现文化的华采。这部现代戏在创作，传达了新世纪新加坡华人对自己的传统文化的情感和现代精神的执着追求。

《丹心谱》于2000年3月3、4、5日连演三晚，场场爆满。上演反映本地历史题材的剧目，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提高危机忧患意识，居安思危。二是基于华族戏曲本土化的考虑与要求。这一台现代戏，得到海内外戏曲圈的高度关注。演出后由朱亮亮的点石制作公司拍摄成录影带，在第八波道播出三次。同年，湖北省第四届黄梅戏艺术节于2000年10月18日至27日在英山县举行。新加坡戏曲学院在英山的演出，由黄冈黄梅戏剧团乐队现场伴奏。有两千个座位的英山剧场，座无虚席。演出获得主办方颁发优秀剧目奖。中国戏曲音乐家、剧作家、戏曲理论家王兆乾不远百里，从安庆到英山观戏，演出期间在台前幕后陪伴，并一直送到武汉机场。短短几天，听先生接触黄梅戏的精彩过程。他也分享了参加现代戏如《柳树井》、《新事新办》宝贵经验，其中印象深刻的是听他回顾拜访艺人、勤奋记谱、博取众长的辛勤积累。编腔写曲，敢于借用相近剧种的旋律，写出符合剧中人物个性的唱段。例如为《新事新办》基调活泼，他便采用了黄梅采茶戏的四平调旋律，略加修饰，跳跃性增添了欢快的气氛。又如写《柳树井》时，大胆改动了太湖早期老黄梅调的男平词，运用六度大跳，表现了人物的悲壮控诉。先生说：“中国戏曲的板腔音乐，善于以板式的变化，刻画人物内心世界情感的起伏。板式加以扩展或压缩，可以达到各自预期的戏剧效果。”他关于现代戏的看法和写曲的经验，给笔者日后的创作很大的启发。这次的对话，也促成了与王先生的合作，为拙作《聂小倩》作曲。

《丹心谱》的英文剧名取为*Heroes*（英雄），反映了笔者通过这个戏，在表扬林谋盛烈士外，也歌颂巴士车司机、小学教员、家庭主妇、学生、店员等没有留下姓名的抗战英雄们。因此没有以林谋盛为剧名。首演后郭汉城、沈达人、王安葵、王兆乾、成汉通等多位读过剧本或观戏的海内外学者与友

人建议以林谋盛为剧名，更突出主要人物的英雄气概。因此，2000年11月24日及25日，在南安会馆支持下，戏曲学院以《林谋盛》为剧名演出。英文剧名仍旧用 *Heroes*。正如时任南安会馆主席的林金福在他的演出特刊所说：“让我们把林谋盛的爱国情操、英雄事迹、平生所为，以戏曲这种高尚艺术形式表现出来，进一步弘扬爱国精神。”

二 《林谋盛》的戏剧创作突破与艺术表现手法

《林谋盛》的创作，以史实为依据，但又不停留在历史生活的真实层面，而是要求主要演员通过对那个时代人物心灵体验后，表现出更高艺术上的真实，将历史真实性与创作艺术性融为一体，艺术展示出那个时代许多识大义的民众，把家国命运、民族苦难维系一声的精神品格和高洁情操。剧本以卖花筹款的舞蹈场面描绘出风起云涌的战争前夕，普通老百姓为抗战献出微薄力量的朴实愿望。在序幕卖花中已经露面的为避战乱南来寻亲的周素娟（庄惠煊饰演）在第一场找到姑妈（杨惠敏、朱少芬饰演）后，以下唱词：“乱世战火天烧塌，厦门沦陷家被炸。遭不幸母惨死父兄失散，随邻里漂洋过海孤单单。只知二叔周铁山，打巴市里木匠当。风狂雨暴路途长，越思越想心更伤。”说出周素娟的忧伤与不安，但很快的就被当时姑妈和表妹赶缝寒衣给抗日军的行动感动。不久后邻居小学教师陈志刚（白映文饰演）了这个消息：“林谋盛主任召开‘精神总动员’集会，传达南侨总会的指示，请你立即通知小组成员，准时到会馆门前集合。”为第二场戏林谋盛的出场铺垫。

第二场为群戏大场面。几个主要人物如周铁山、伍明发、梁玉莲及后来当背叛的汪亚青都在台上。这场戏的合唱唱出群众同仇敌忾的决心：“林谋盛（张辉饰演）：（唱）不和敌人做买卖，众合：不和敌人做买卖。林谋盛：不为敌人做宣传。众合：不为敌人做宣传。林谋盛：不看敌人书和文，众合：不看敌人书和文，林谋盛：不与敌人相往来。众合：不与敌人相往来。”林谋盛之后呼吁群众“我们要节约赈筹资金，支援前方！”得到群众的一致赞同，情绪高昂。就在群众高呼“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抗战到底”的时候，卖报童喊

道：“林主任，你们看，英国的战舰被日本炸沉了。”舞台上的三片屏幕也反映了英国军舰被炸的图片。《林谋盛》采用了历史图片和剧情发展紧密结合的方式，交替展现战火燃烧下的新加坡和马来亚大敌当前的严峻形势。这一消息，预示了日军的铁蹄，很快会踏上这片土地。此时枪炮、飞机轰鸣声、警报声、炸弹爆炸声不断。这些声音沉寂下来之后，传出了合唱曲的歌声：“气焰嚣张日本兵，东岸登陆速南行。铁甲战舰化烟云，英军败退威风尽。”

舞台屏幕上幕看到英国人在白思华中将举白旗带将士向日军投降，接着放映多张历史图片，在亚历山大医院大屠杀、大检证，杀害数万华人，强迫华侨协会交纳奉纳金，宪兵队的灌水刑等等历史图片。后台合唱的唱词是：

“这边战到底，那边举白旗。星洲变昭南，人间成鬼狱。”军鼓声中，第三场灯亮了。日军占领三宝岭日兵肃立，军官佐佐木一上场就吼叫：“抗日首领的要抓活的！放火把三宝岭烧成平地！”日兵接令下场后，天幕逐渐被红色灯光覆盖，后台传来合唱歌声：“敌军坦克占吡叻，胶园矿场血淋淋，最为凄惨三宝岭。（一位女高音接唱）：一把大火全烧平。”歌声沉寂后，舞台上出现了脚步缓慢、心情沉重、满脸悲愤的人群扶老携幼上场。低声叫爹、娘的小孩和妇女的哭声此起彼伏。日本兵将周素娟的二叔周铁山（赵柏钧饰演）押上后，佐佐木用军刀将他刺死后叫道：“将他剖腹挖心，人头高挂街前”。周父和周铁山的大哥闻讯赶来，也被开枪击毙。佐佐木警告民众：“谁再反抗，就是他的下场！”之后扬长而去。周素娟赶到后痛不欲生，被巴士工会伍明发（刘虎臣饰演）大叔劝阻。在他的两句台词“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后落幕。

《林谋盛》在构思过程，剧作者避免口号式的激烈言辞，而是以平民视角展示英雄叙事，让英雄形象走下神坛，描绘其作为常人、普通人的爱恨情仇，通过苦难岁月中的夫妻情、父子情、父女情、姑侄情、叔侄情、工友情、战友情，将历史戏剧的深度与厚度以及文学性、思想性揭示出来。如，第四场以林谋盛和妻子颜珠娘（李云饰演）为中心，用独唱、对唱唱出他们发自心灵深处

的爱。在林谋盛的家里，哀伤忧愁的乐曲声中，颜珠娘哄着孩子睡觉。这里颜珠娘的中心唱段有三十二句：

往年春节闹纷纷，
今岁冬至天地昏。
空袭警报一声声，
灌得人人冰心冷。
英政府炸长堤断水源，
百姓闹水荒受煎熬。
众侨领忙奔走怡和轩，
商大计与敌人来周旋。
义勇军洒热血保卫河山，
气浩然无反顾寸土不让。
连日来，
谋盛他深锁双眉，
仿佛是芒刺在背。
他那里心事重重，
我这里忧心忡忡。
听说是，
兵力悬殊危在旦夕，
听说是，
敌机轰炸难抵御。
听说是我军战场渐失利，
听说是英军准备升白旗。
倘若是，
英军果真败下阵，
日寇杀到我家门。
七个爱儿怎脱身？
珠娘呀！
情势虽有万分险，
莫被吓得失主见。
莫给谋盛烦恼添，

为我耽忧心挂牵。
百般忧虑藏心间，
千斤重担挑在肩。

林谋盛回家前的独唱，扮演者张辉要和珠娘告别时的沉重心情，怅然若失。也有一段与颜珠娘相应的唱词：

敌军昼夜狂轰炸，
学校货仓都炸塌。
争分夺秒调动人力，
防御工程聚沙成塔。
隔巷街坊与邻里，
扶老携幼纷纷逃离。
救护伤民清理废墟，
安定民心稳住全局。
维护治安宣传抗暴。
招募劳工任务紧急。
喜有林江石与胡铁君，
不分党派加入星华义勇军。
千名壮士洒热血，
捍卫家国可歌可泣。
民防部里有命令，
要我转移同胞去印尼。
情势骤变我心焦急，
告真相又怕珠娘更伤情。
欲进门，难举步。
进退两难徘徊犹豫。

这场戏是行内人所说的戏肉。之后两人的对唱，导演胡奇娴演员“抑制住内心无比的悲伤，带着微笑，含着眼泪，相互宽慰、相互激励”。珠娘先唱：“离别顷刻情难诉，明知战乱铁严酷。危难燃眉莫踌躇，宽心戎装上征路！上征路！”林谋盛接唱：“珠娘离别金玉言，热浪滚滚暖心间。只叹迢迢千

里路，不知重聚在何年……”就在这时，睡醒的孩子们知道爸爸回来了，孩子甲兴奋的拥抱父亲：“爸爸，你回来了。”孩子乙也紧紧抱住爸爸说：“爸爸，我害怕……”等道珠娘从屋内取了衣物给林谋盛，孩子们意识到父亲又要远行，紧紧抱住林谋盛不放。孩子甲：“爸，你要到哪里去？”颜珠娘把孩子拉开后珠娘含泪对孩子们说：“听妈的话，让爸爸走，让爸爸走……！爸爸很快就回来的……”孩子们对大步离开的父亲高声喊叫后，与母亲抱成一团，放声大哭。这段戏在李云和儿童演员的投入演绎下，得到强烈的戏剧效果，戏的高潮也推上极致，升腾起感人的悲剧力量。

如果说林谋盛与妻儿的告别是场以歌写情的“文戏”，第五场则是动作性密集、表演性强的戏。剧情的背景是1943年5月开始，被挑选为英中两国合作的“136部队”中方驻印度联络官的林谋盛，是136部队马来亚区长，领导136部队分批由英属锡兰（今斯里兰卡）的海军基地乘潜水艇偷渡进入马来半岛。周素娟和陈志刚在月淡星稀的夜晚，划小船与136部队成员对接。不料日军已经封锁了海岸线，他们正在担心潜水艇若被日军劫住，艇上的药品、武器和资金就会全军覆没时，被日军的巡逻的大灯扫射发现，只能跳入海里游走。这样的情节设置，给演员提供了以虚拟性、程式性的动作、表现周素娟和陈志刚与风浪搏斗的表演机会。戏曲程式是舞台形式和表演技术的规范，动作是建立在生活的基础上，以审美的标准提炼与夸张，具有舞蹈性和节奏感，在急锣紧鼓的配合下，这场戏的表演非常吸引观众。

剧情发展到此，如箭在弦，事态紧张。林谋盛因为体恤部下而离开安全的美罗山基地，冒着巨大危险到城里来筹措经费、协调队员和整顿谍报网。不幸因为汉奸出卖，被检查哨站上的日军识破和逮捕。林谋盛冒险到怡保，日军铺下天罗地网，

第七场戏地点设在林谋盛在霹雳州的华都牙也囚禁的监狱。戏开场时，设置了以蒙太奇手法展现在不同空间的林谋盛和颜珠娘相思的深情。夫妻对唱结束后，从梦幻情境中回到现实的林谋盛，面对日本军官的威逼利诱，嗤之以

鼻。佐佐木暴跳如雷，此后对林谋盛百般折磨，让他受尽毒刑至死。剧中最重要的中心唱段便安排在这里。笔者与唱腔设计者、也是林谋盛扮演者张辉反复研究与推敲唱腔的设置与处理，着力于发挥黄梅戏唱腔的优势，适度的扩展节奏上变化与唱腔旋律的变奏，是这段唱快慢相间、字少腔多、具有较强的旋律性，演员以字行腔、以声传情，以视死如归的从容，释放出强大的人格力量：

狂澜万里十数载，
刀山火海等闲待。
只叹报国志未酬，
一场浩劫天地哀。
想当年，
离乡背景南洋来，
太平盛世民安泰。
香港求学，
星洲创业。
邂逅珠娘，
定亲成家。
育女儿，
享天伦。
天伦乐，
乐开怀。
未料到，
东洋军国峰火起，
蹂躏神州神鬼泣。
安南半岛碧血洗，
马来亚哀鸿遍地。
星州检大肃清，
冤死刀下其数无计，
为和平，
离亲人。
出生入死无所畏惧。

奔重庆，
赴印度，
反攻计划天罗布。
破风浪进深山，
抗日岁月不虚度。
谋盛我，
虽受严刑伤处处，
无怨无悔汤火蹈赴。
皎皎丹心铮铮铁骨，
高歌一曲唱天曙。

《林谋盛》的创作与海外传播，与当时新加坡戏曲学院拥有一支包括了来自福建（李秀华）、江苏（水小燕）、浙江（胡奇娴）、安徽（李云）、湖北（张辉）、广东（曾义藩）等敬业乐业的师资队伍分不开。他们都是主创作团队的成员与主要演员，在不同岗位上做出贡献。《林谋盛》也邀请本地资深演员刘虎臣（歌仔戏）、王亚平（京剧）、潮剧（杨惠敏、林仰忠）、粤剧（朱少芬）、琼剧（冯崇胜、陈明峰）、舞蹈界出色编导白映文、赵柏钧、优秀青年演员刘惜琴、钟戌记、陈荣木（潮剧）、黄智苑、傅淑芬（越剧）、吴思卫、蔡健豪、张少怀、陈锦如（话剧）参加演出，组织这样跨界的合作，期待这样剧团、演员能在新加坡题材的创作中感受戏曲演员的以专业技能受表现现代生活的可能性，将未来为新加坡的现代戏建构和发展，贡献出自己的力量。笔者任南艺表演艺术学校校长时从中国招来的学生艾光洁、彭卡达、袁琦、吴俭伟、肖军、孙立、萨钢云等，都是《林谋盛》第三次重演的演员。通过参与，让他们认识新加坡的一页历史，在与资深演员同台演出中，学习他们的专业态度与创作精神。

历史题材戏剧是现代人对历史事件的艺术加工。《林谋盛》的演出得到海内外前辈指点、多种艺术门类的朋友的支持，创下了多次圆满舞台演出、电视播放、媒体讨论的成果，它不仅成为本地华语戏剧舞台一抹亮丽风景，

而且也为笔者于2006年编导写一所民办学校创办六十年的历史的现代戏《新民的故事》⁴ 奠下坚实的基础。

新加坡故事的戏曲现代戏盛会

人民协会的文化与艺术集群前理事长蓝锐勋担任2018年第二届人民协会百盛艺术华族戏曲节工委顾问时，他建议以“新加坡的故事”为主题，创作新剧目在9月30日的闭幕礼上演出。他的倡议，得到工委主席团成员林方华（戏曲学院主席）、卓林茂（南华潮剧社社长）以及曲界的大力支持。四个剧团百名演员粉墨登场，半数以上是年轻人。蓝顾问锐勋这个筹备了近两年的演出，要求参演剧团需搬演以新加坡故事为主题的新戏。合作伙伴都欣然接受这个富有挑战性的任务，希望演出起着抛砖引玉作用，鼓励更多戏曲团体在推广和保留经典剧目之余，继续拓展不同表演形式，打造以本土故事为题材的剧目。

晚会演出四部戏是女皇镇艺术文化俱乐部属下的粤剧兴趣小组的粤剧《狮城传》、如切潮剧团呈献的潮剧、粤剧两下锅新编戏：《烈火真情》，延戏剧团演出的歌仔戏《新加坡》和南华潮剧社的潮剧《五脚砌·相亲》。

第一出剧目是女皇镇艺术文化俱乐部属下的粤剧兴趣小组呈献的《狮城传》，由刘满钻编剧、新明星粤剧中心凌东明艺术总监导演，邱剑瑛（饰演圣尼王子）和张美莉（饰演演妃）领衔主演，合作演出团队是宋赛儿（Som Said）美丽遗产马来舞蹈团。张美莉回忆道：“我们为能够表演一个贴近我们内心的新加坡故事感到非常自豪。这位桑尼拉乌他玛王子（Sang Nila Utama）于1299年创建新加坡拉王朝，在位48年。这部小戏写他战胜风浪，意外‘发现’我们的小岛的传说。”穿上了类似筒裙的马来纱笼（sarong），演员不可能依旧把传统粤剧的动作套上，因此演员需要向合作伙伴宋赛儿学习马来音乐跳舞、马来文化与习俗，在排练中习惯穿上马来服饰表演。剧本没有马

⁴ 蔡曙鹏，《实叻坡十部戏：蔡曙鹏潮剧剧本集》，新加坡：杨启霖潮州文化中心，2021。

来演员的台词或唱段员，而更多以群舞演员配合剧情的发展，编排成增添舞台画面美感的舞蹈。这个跨文化戏剧的创作达到了让粤剧团和马来舞蹈团通过合作了解彼此的文化，增进友谊。

延戏剧团高思情编剧、黄萍导演的《新加坡》，是剧团2015年为庆祝的新加坡庆祝50岁时献上的礼物。当时在构思剧本时，收到一位台湾朋的《安童哥卖菜》的启发，因而构思了一个自唐山的青年阿财到新加坡寻找祖父的故事。阿财到了新加坡之后，在牛车水⁵遇到了小贩阿宝的故事。在异乡遇到一位年龄相仿的年青人，感觉很好。以阿财巧遇阿宝的情节，从侧面反映那个时代的人的善良与朴实。背景设置在1965年的牛车水，刚独立不久的新加坡。路边有流动小贩，贩卖各种美食。这个小戏，就把马来、印度、娘惹的美食等都写进去，展现新加坡的多元民族的那个年代的简朴社会风貌。团队为了更好的了解六十年代的生活环境和摊贩美食，在开始创作时，访问生活在那个年代的前辈们，了解小贩沿街贩卖与在固定地点贩卖美食的情况。笔调轻松幽默。2018年重演《新加坡》时，编剧更注意唱词韵脚的选择，讲究唱词压韵。例如：“四面环海新加坡，全年夏天好迢迢⁶，人情温暖大家好，四大民族拢合和。”此外重演时更熟练的载歌载舞铺排，加强了这部小戏的娱乐性。

如切潮剧团呈献的剧目是蔡曙鹏编剧、洪志庆导演兼主演的潮剧、粤剧两下锅新编戏：《烈火真情》，由马林百列社区艺术文化俱乐部粤剧剧团和如切潮剧团联合演出。所谓两下锅，是指两种剧种的剧团携手呈献一部戏。团长洪志庆对这样的选择的说明是：“我们同属马林百列区的两个剧团，演绎1961年5月25日河水山的木屋区，在一场大火中失去家园的灾民相互扶持，并在政府协助下走出困境的故事。木屋区里住着不同方言群的居民，用潮剧、粤剧表演，有其合理性。戏里有马来救火员、印族群众，是新加坡的生活现实。这部戏，写出了小人物的生存状态、情感意识、价值观念、守望相助的甘榜精神。”这部30分钟的小戏，设置了人物较多，是个群戏。有小学教师、店员、

⁵ 黄子明，《优影振天声：牛车水百年文化历程》，新加坡：八方文化创作室，2019。

⁶ 迢，闽南语，游玩、玩乐的意思。

中学生、戏迷、耳聋老婆婆、马来救火员、私会党徒、家庭主妇、小孩、村民以及没有出场的印族体育教师等，演出团体可以让更多演员参与演出。戏里的这一群在当时的居住在锌板屋、阿答屋的平民，虽然清贫，生活上相互帮助，也热爱自己的家乡戏、传统戏、民族舞蹈，在精神家园里得到慰藉。平常日子里，有事相帮，煮了薏米水红豆汤和邻居分享，大火吞噬房屋时，村民奋不顾身抢救老弱病残。灾民沮丧绝望时，校友会领导筹款相助。戏以公务员传达政府准备建屋安顿灾民，天幕放映出组屋落成的历史图片结束。导演洪志庆把历史照片投射在屏幕和四片可以移动的平板上，增强了故事的历史感。

南华潮剧社演出的剧目是中国知名剧作家沈湘渠编剧、章振宇作曲的《五脚砌·相亲》。剧名叫五角砌是指早期在新加坡店屋（闽南移民人称骑楼下的走廊）。五脚砌的五来自骑楼下在走廊，英国殖民政府法律规定为五英尺，五脚砌的“脚基”是直译自马来语“kaki”一词。五脚砌是指走廊。故事发生在六十年代初的新加坡河畔俗称柴船头的地方。河畔骑楼前街上，有小贩卖各种美食的摊子。戏里的男主角是一位卖粿条的青年阿水。为人撮合婚姻的长光婶，见阿水为人忠厚老实，有意为他做媒，和在建筑工地上俗称红头巾的劳工的阿梅结成姻亲。不料两人在长光婶安排见面前，在五脚砌前巧遇后，生性善良的阿水和热情大方的阿梅，很快就谈得十分投机。姗姗来迟的长光嫂到场后，阿水和阿梅才发现原来两人正是长光婶想为介绍给他们的相亲对象。阿梅羞答答，阿水有点尴尬……戏以喜剧收场，世间人情，温馨人性之美，尽在不言中。

这部戏，像歌仔戏《新加坡》一样，也给演绎者展现新加坡多元文化、多语言社会的风采。柴船头街边有马来沙爹、印度零食（kacang putih）、冰球、粿条等等美食，都在戏里出现。这样的人物设置，把活脱脱的历史生活环境和人物生动的展现在舞台上。剧本通过在塑造阿梅坚强刚毅的形象，依附于与阿水相遇的情节，从而两人在互动中，阿水感受到阿梅的自立自强的个性，而阿梅也在交谈中感觉到阿水的人格魅力与生命价值。两个人物形象都有鲜明的时代色彩。首演之后，南华潮剧社，多次重演《五脚砌·相亲》。

每一次演出都在舞美、灯光和表演上再三琢磨，力求有所改进，尽量做到审美风尚和艺术趣味兼顾，比上一次演出更好。例如2022年4月在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重演时，视频布景设计精良，给人印象深刻的是当阿水的描述南来艰辛历程、海上波涛汹涌、惊涛骇浪时，天幕也出现相应图景。龙头演员也配合唱词调动台位，配合不断变化的画面，以歌舞化的手段，创造出戏剧性的意境。这段戏的排演，较好的把握了戏曲艺术的本质特征，反映现代生活的新内容形式能和戏曲形态取得统一。

从演出组织者、参与演出者、观众和媒体的热烈反应看，以戏曲形式讲新加坡故事的现代戏，就是用戏曲的形式表现现代生活。南华潮剧社卓林茂的观点是“面对年轻观赏并不熟悉古典文学如四大名著、历史故事、民间传说的现实，也许创作以本地题材和他们比较熟悉的故事，更有吸引力。可以把演现代戏，当成吸引新观众、特别是年轻观众的策略之一。《五脚砌·相亲》的多次重演，也是为了吸引年轻观众是关注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新加坡已经流传了近两百年的潮剧。保住观众，培养新一代演员，是目前最迫切需要做的事。”

2018年以“新加坡的故事”为主题的戏曲现代戏盛会，四个参演剧团有三个鲜明的共同特点：一是四个剧本都有跨文化、多元文化戏曲创作的色彩。《狮城传》改取材自《桑尼拉乌他玛王子》，《新加坡》、《烈火真情》和《五脚砌·相亲》都出现马来、印族角色，试图展示不同民族和谐共处的现实。其次，戏里的主人翁具有坚韧的意志品格，在逆境中质朴的朋友、或不相识的陌生人的帮助下攻坚克难，解决困难，歌颂了质朴的老百姓互助互济的精神。此外，三部戏都以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为背景，因而有些剧中人用上马来词汇、出现不同族群的美食，都是不同文化融合反映。

余论

新加坡有故事，可以从华社先贤、企业精英、艺坛先驱，校园名人、引车卖浆等等，寻找可编为戏的题材，在戏曲舞台上展现他们曲折奋斗的人

生故事感悟思想力量。他们精进不怠的动力源泉，他们的伤心事、好事、趣事，在现代戏的创作与传播中传递智慧的火种。然而，当代华族戏曲也离不开中华戏曲悠久而精深的文化资源，优秀的经典剧目和新编古装戏，承载了中华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民族精神、人文道德。学习、演出与传播这些剧目，仍旧是发展戏曲的重要途径。现代戏创作要从戏曲传统中吸取念白的性格化、风格化，动作的舞蹈性、节奏感的艺术法则，做到既与现代化的相符和又和戏曲化的要求契合。

参考文献

- 何为：《论现代化和戏曲化》，《戏曲研究》1982年第7期，126—128页。
- 何玉人：《20世纪中国戏曲的历史回顾》，《艺术百家》2015年第3期，178—184页。
- 王安祈：《当代戏曲》，台北：三民书局，2002。
- 张庚主编：《当代中国戏曲》，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
- 朱颖辉：《当代戏曲四十年》，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3。
- Chua Soo Pong, ed. *Traditional Theatre in Southeast Asia*, Singapore: UniPress, 1995.
- Lee Tong Soon, "Chinese Theatre, Confucianism, and Nationalism: Amateur Chinese Opera Tradition in Singapore". In *Asian Theatre Journal*, Vol. 23, 397—421, Hawaii, 2017.
- Georgiou, Christakis, *Tradition and Innovation: Cyprus*: Kentpo, 1993.
- Yizhen, Liu, 'A Jia's Theory of Xiqu Performance', trans. Dongsheng, Hu et al., In *Asian Theatre Journal*, Vol. 5, 2, pp. 111—131 Hawaii, 1988.

管窥与思考：新加坡的民间信仰研究¹

林伟毅²

在新加坡这个华族人口占大多数的国家，尽管华人民间信仰丰富多彩，它在传统上不是体制内的史学家所特别重视的。然而，从民间信仰的传入、庙宇的创建和发展而言，它是新加坡历史的重要部分。民间信仰的研究应该和新加坡历史相扣，紧密结合。因此，我常常强调：要在新加坡历史中看到庙宇，也从庙宇看到新加坡的历史。

从庙宇与新加坡历史发展而言，新加坡特有的联合宫（庙）模式，尤其是乡郊地区联合宫的组成创建，是土地希贵的新加坡发展历史的写实。我在2005年10月1日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主办的“民间信仰与华人社会”国际研讨会上第一次提出有关联合宫与新加坡建国初期历史关系的论文：〈国家发展与乡区庙宇的整合：以淡滨尼联合宫为例〉³。

¹ 本文为2022年3月27日南洋学会主办之《南山有栲：杨松年教授八秩华诞祝寿论文集》发布会之专题讲座之一的讲稿，讲座以PPT呈献。题为“管窥”，必然只见一斑，并非全豹，特此致歉！

² 林伟毅，南洋大学文学硕士，新加坡国立大学哲学博士，新加坡儒学会副会长。

³ 见林伟毅主编《民间信仰与华人社会》（新加坡：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2007年）。

其后，有关新加坡联合宫的研究开始受学者重视，故友马来亚大学苏庆华副教授有〈众神的新“联邦”：以淡滨尼联合面为探讨中心〉⁴，厦门大学陈碧的博士论文〈“联”与“合”：新加坡联合庙研究〉（2013年）是以新加坡的联合宫为主题的论文；新加坡国立大学的陈英杰也有相关论文：〈宗教空间的改造：新加坡淡滨尼联合宫的“道教化”〉⁵。

重视历史的著作有2017年出版的李志贤著《新加坡潮人善堂考》⁶。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教授蔡志祥在《序》中指出：本书不仅可以和“施善教化”的历史研究和普世济民的当代社会学研究对话，更重要的是透过宗教慈善组织的个案，把本地史（新加坡）和侨乡勾连，链接不同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既有大历史宏观的论证，也有人类学微观的描述，充分展现历史人类学的方法和视野，是一部精辟严谨的著作⁷。蔡教授是从历史的视角高度评价李教授这部潮人善堂巨著。

重视庙宇是新加坡历史的一部分，对新加坡华人庙宇的研究，必然要通过新加坡历史中的华人移民，寻找庙宇起源以及与当时社会的互动，结合社区、人物、帮派、信俗、血缘、地缘、业缘等因素进行考察。庙宇面对政治、经济、社会的历史变迁的应对，它的现代意义和社会功能等，都是值得深入研究的。对于庙宇的文物与记录，如：楹联、始建和修建碑文、账簿、会议记录、通告、灵籤、钟鼓、云板、香炉、神桌、砖瓦等等，是庙宇在历史进程中的遗留，必须善加利用。

管窥新加坡华人民间信仰文化的研究，对于近二十年来所取得的成就感到欣慰。新加坡、中国大陆和港台地区以及世界其他国家的硕博研究生多以新加坡的民间信仰作为研究主题，为这个研究领域注入新的力量。九皇爷游神

⁴ 见林伟毅策划《或跃二十载，龙飞看今朝：淡滨尼联合宫晋宫二十周年纪念特刊》（新加坡：淡滨尼联合宫，2012年）。

⁵ 载台湾政治大学历史学报第43期（台北：台湾政治大学，2015年5月），页219至256。

⁶ 李志贤著《凶潮人善堂考》（新加坡：中华善堂蓝十救济总会，2017年）。

⁷ 同上注，页xi。

和韭菜芭城隍庙的城隍爷诞辰的庆典，吸引日本、中国大陆、马来西亚、香港台湾地区学者前来考察。旅居新加坡多年的中国厦门大学曾玲教授著有《新加坡华人的祖先崇拜与宗乡社群社群整合：以战后三十年广惠肇碧山亭为例》与《越洋重建家园：新加坡社会文化研究》及多篇论及新加坡民间信仰的论文。

最值得注意的是博士研究生有以新加坡民间信仰作为博士论文题目。他们以充沛的研究精力，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以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这方面的成果有：

徐李颖的博士论文〈佛道与阴阳：新加坡的城隍庙与城隍信仰研究〉，2007年；

许原泰的博士论文〈中华传统宗教在东南亚的蜕变：新加坡的道教和佛教研究〉，2011年。

李秀萍的博士论文〈族群、社会、信仰：三山国王崇拜从粤东到新马的传播〉，2014年。

2020年毕业的王坤利是新加坡土生土长的研究民间信仰的博士；他的论文：Paradox of Hell: Chinese Religiosity and the Worship of Underworld Gods in Singapore.

在大学方面，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的李焯然、苏瑞荣、容世诚、李志贤等老师多年来的研究和对硕、博士研究生的指导，是新加坡华社民间信仰研究的传统推动者。由于制度化的局限，这方面的研究仍是细水长流。近年来，著名外籍丁荷生教授入主中文系，他教导中国传统道教课程，领导学生所创立的新加坡庙宇社团网络，对新加坡庙宇与道教的研究与推广，起了重大的作用，也引起了年轻学者的研究。更可喜的是，出身建筑系的学者的加入，如杨芷善、陈煜博士等，加上中文系博士康格温，将民间信仰的研究范围扩至庙宇建筑特色，促成跨学科的交流研究。

在庙宇和民间信仰的研究上，对于庙宇、社团的碑刻的应用是绝对必要的。2017年1月间丁荷生、许原泰编《新加坡华文碑刻汇编（1819-1911）》

面世。这是饶宗颐编撰《星马华文碑刻系年》（1970年），陈荆和、陈育崧合编《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1973年）、庄钦永的《新加坡华文铭刻记录初编》（1984年）和《马六甲、新加坡华文碑文辑录》（1998年）之后新加坡华文碑刻的巨著。全书上下册共1500页，中英文对译。对庙宇研究中碑铭等文物的资料应用，贡献巨大。这些都是喜人的现象。

在庙宇本身，曾经对庙宇研究和信仰文化做出贡献。早年有包公庙举办包公信仰研讨会。最令人瞩目的是韭菜芭城隍庙在2007年配合九十周年庆典，举办第一届城隍文化学术研讨会和道家与道教专题演讲会，出版《城隍信仰》论文集。配合九十周年庆典，该庙还出版《九十春秋：新加坡韭菜芭城隍庙史记》。名为“史记”，自然以该庙从成立，经过各个发展阶段到当前的历史记载为主轴。这是新加坡唯一一本的庙宇史记。十年之后，韭菜芭城隍庙，在注重历史的传统上，于2017年9月出版《百年薪火，代代相传》。

韭菜芭城隍庙一路走来，是推广民间信仰研究的倡导者。道教学院多次与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联合主办学术活动，并通过道教学院和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合作，设立奖学金，培养道教研究的年轻学者。只可惜，设立道教奖学金这项有意义的活动，由于特殊的个别事故，无法后继。

2008年石叻学会为万山福德祠出版《投桃之报：万山港福德祠之历史溯源》，详细追溯残留在庙里的历史，通过记载保留庙里的珍稀历史文物如：碑刻、横匾、对联、古钟、古木雕神像、香炉、建筑图、文献等。这是重视历史的一本庙刊。

淡滨尼联合宫于2012年和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合作，举办《淡滨尼联合宫崇祀诸神学术研讨会》，出版论文集《淡滨尼联合宫崇祀诸神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这是新加坡庙宇第一次与大学师生联合主办的纯学术活动。主办会议的宗旨是重视宗教文化，让广大的信众对新加坡普遍祭祀的神明有一理性的了解，以弥补无知、迷信、盲从的缺陷。学术力量的加入，弥补了庙宇对所崇奉神明在学理认识上的不足；庙宇的参与，为学者提供研究上资料运用与人物访问的方便，打破了学者在田野调查上的间隔。

在会馆方面，福建会馆和天福宫，广惠肇碧山亭和金门会馆等先后出版了一些所管属庙宇的书刊。新加坡茶阳（大埔）会馆在2006年出版《百年公德被南邦》，是较早重视庙宇历史、建筑特色的庙刊。新加坡南安会馆、新加坡圣公文化传承委员会和世界华人民间信仰文化研究中心在2022年6月举办“广泽尊王文化的境内与境外传播”国际研讨会。这项研讨会的举办标志着崇奉神明（广泽尊王）的庙宇凤山寺和学术研究机构世界华人民间信仰文化中心的合作，对于神明信仰文化的深入、较全面研究和有学术基础的宗教传扬，都有重大的意义。论文集《广泽尊王文化的境内与跨境传播》在研讨会的举行同步发行，让出席者人手一卷，聆听学者发表论文。这在新加坡的研讨会，应该是首次。

成立于1940年的南洋学会，是东南亚历史最为悠久的华文学术机构。注重民间信仰的研究是南洋学会和《南洋学报》的传统，早期主编许云睺便在《南洋学报》上发表了多篇有关大伯公等民间信仰的专文。几十年后，南洋学会又再度重视民间信仰研究，在2022年2、3月连续推出大伯公和九皇爷的讲座；庙宇酬神戏于新加坡戏曲的研究也得到南洋学会学者的重视。南洋学会领导层的更替和年轻化，是南洋学会最近两三年来重振学术活动的动力。令人可喜的是南洋学会修改了章程，限制会长只能连任两届。这是从体制上阻止以往会长长期连任的陋习。

我观察到在民间信仰的研究上，有一些材料的重整与翻印，这是值得深思的问题。Leon Comber在1958年出版的 *Chinese Temples in Singapore* 在2011年增订、翻译而重印，定名为《寻庙》；南洋学会在1975出版的《石叻古迹》也正在进行增订出版。更新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为新进研究者提供参考来说，是好事。但是，从另一个侧面看，这也说明了近50年来，在这方面的研究似乎没有什么巨大的突破；这是值得深思的问题。新加坡的民间信仰研究确实还有进一步扩大的空间。

要突破这一瓶颈，学术机构（包括大学）和庙宇本身是两个重要的因素。庙宇方面如果愿意提供最基本的财务资源，与学术机构合作，联合举办有关的

神明学术研讨会，是最有效的办法。好多年前，有韭菜芭城隍庙、淡滨尼联合宫，今年（2022年）有南安会馆和水廊头凤山寺，分别与大学或机构机构的合作，都是成功的例子。相对于新加坡，我要指出台湾的例子，供我们学习。台湾的成功大学中文系，在陈益源教授的主理下，联系各地学者与庙宇合作，先后主办了神明主题的学术会议：保生大帝（2012年）、观音（2014年）、月老（2016年）、签诗文化（2021年），并出版篇幅宏大的论文集。我有幸参与2016年和2021年的会议。

当代诗学

陈剑*

新诗伊始

华文新诗历史浅短，自五四运动新文学伊始，也仅百年。它是从旧体诗解放、颇受了西方自由诗的影响而来。虽则历史为时甚短，却也因各种诗歌理论的指引和影响、众多诗人不断地尝试、创新、变革而发展出形制多样、体例相异、韵律节奏不一的新诗与产生诸多诗派。由于时日短浅、牵涉源流的关系，我们在讨论时难免要涉及属于“现代”范畴的诗歌发展态势，所以我们也常用“现当代”这样的界定。

现当代新诗的发展，由于一开始便以自由诗的形式存在，唯一与旧体诗的差别仅仅在于体例及语言的差异，自由诗没有固定的结构形制，采用的语言是白话文。史称“第一次新诗革命”，新诗是旧体诗解放的结果。

* 陈剑，1940年生于新加坡，知名历史学者、诗人。前国际诗人笔会发起人、主席团成员及与副主席。前新加坡作家协会理事长。澳洲华文作家协会顾问。著有诗集：《无律的季节》（抒情诗选）、《火凤凰》（南大记事）、《风无定处乱飞花》（情诗选）、《神州踏月觅诗踪》（写在中国的诗）、《云朵的遐思》（哲理诗选）、《异乡觅知音》（译诗集）等。

新诗的体制

正是因为现当代新诗结构自由度大，不受古诗词结构规范的限制，如五言、七言、受词谱限制的长短句式等约束，而至今尚未有固定的形制结构，也因此是在是否建立新诗体例和形制的课题上辩论了一百年，始终没有结果。

为新诗者，仍然我行我素，各行其是，也出现了许多所谓“创新”的形制式样来，比如：一行诗、三行诗、四行诗、六行诗、八行诗、以西方体例的十四行诗（但却有异于西方真正音律严格的十四行）等。更有妙想天开的形体诗，如写山，则使诗行结构形似山状等。

自由诗效法的西方现代诗，也是否如此呢？事实上，西方诗歌基本上仍然依照传统，也有一些“创新”之举，比如句式不一、形体诗等的表现。

中西诗学界、诗歌批评论者就此也不断进行探究、研讨，是否能建立起相对固定的新诗体制。这20多年来，东西方艺文研究机构、大学等都前后组织过许多这方面的研讨会，这方面的论文、专著也已经众多面市，虽然彼此都认为新诗体制的建立势所必然，但至今仍然莫衷一是，无法达至新诗形制的共识。

新诗流派

尽管没有固定的“制服”，但并不妨碍新诗的蓬勃发展。我们说，文学的生命来源于生活，由于社会变迁的种种原因，造就了新诗生命的多姿多彩，也因之形成了不下数百种的诗群、诗歌流派。诗歌内容因而五色纷呈、耀眼夺目，也有令人咂舌之作，从以下略微列举的诗派名称，大家也就能窥见一斑。

从五四运动以来，早期的“尝试派”、“人生派”、“新月派”、“七月派”、“象征派”、“现代派”、到后来的“新民歌”、“文革诗歌”、“白洋淀”、“朦胧诗”、“新边疆”、“第三代”、“莽汉主义”、“整体主义”、“英雄写作”、“撒娇派”、“丑石诗群”、“新乡土”、“知识分子”、“第三条路”。

西方自由诗（Free Verse）的出现早于中国，也就是19世纪初英国维多利亚女皇时代，当时英、法两国的知识分子与学生渴望打破传统诗歌的固定格式和韵律、步调等约束，掀起了自由诗与无韵诗的创作。美国新英格兰地区的诗人则略迟些也创立了“先验主义”自由诗。他们抵御过分拘泥的清规戒律而主张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表达（personal expression）。20世纪初，Andre Breton 发表了“First Manifesto of Surrealism”（《超现实主义宣言》），而导致产生了超现实主义诗歌（Surrealism Poetry）的无意识或幻觉书写。此时，尚有其他流派如意象派（Imagism Group）、客观主义派（Objectivism Group）、打击派（Beats Poetry）、旧金山复兴运动派（San Francisco Renaissance Group）、自白派（Confessionalists Poetry）、纽约学派（New York School）、黑山诗人诗群（Black Mountain Group）、以及自称前卫（Avant Garde）的语言诗派（L=A=N=G=U=A=G=E）等等。

21世纪的新诗

迈进21世纪，由于文化环境的相对松动，个性的解放，以及世界多元文化格局的形成，诗人们对中西诗学、美学理念、理论的汲取、趣味的取舍形成诗歌界内部分化、诗歌写作的地域化、圈子化、派性化、同仁化更甚，诗群、流派因而更多，更分化。

进入21世纪后，短短的20年，中国诗歌流派更多，有所谓“下半身”、“荒诞主义”、“智灵诗歌”、“灵性诗歌”、“垃圾派”、“边缘派”、“钝诗派”等等不一而足。西方还出现了“Digital Poetry”，姑且译作“数据诗派”。

新诗的格律

新诗发展的另一个争论不休的课题则是，新诗是否需要格律化。从五四时期开始，这个课题便已经是诗人们特别专注的课题之一，也因此成就了早期的

格律派，如闻一多等人。至于新诗应有怎样的格律，闻一多还建立了新诗格律的基本框架，提出了新诗的“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的“三美”理论。对新诗提出一系列严格的形制、体例、韵律、结构的要求。

此后跟进者也大有人在。但与诗歌的形制一样，至今仍然无法达至普遍接受的新诗格律标准。中国国内现在已经形成好几批诗人、诗学者建立了格律诗派，在实践格律新诗的创作和推广。

西方的诗歌格律早就有成熟的框框条条，以及完整的格律架构。毕竟语文的差异性，汉语新诗并不能将西洋诗歌的韵律照搬过来西为中用。

诚然，基本的新诗格律规范仍然有待建立。对新诗的韵律要求的基本共识是：诗歌必须具有内在韵律和节奏、句末相对押韵，基本顺耳，适于朗读、朗诵。

诗歌的本质

从诗学的角度来谈，万变不离其宗，就是诗歌的本质基本不变。那就是，它必须是韵律、节奏的口语还是文字的情感表述，这也是衡量诗歌优劣的美学标准。不管诗人们为了出位，取了怎样突兀、吸人眼球的称号为其命名，还是逃不出这基本准绳的制约。

新诗的第二次革命

由于百年来新诗诗体与规律的争论不休，再加中国自1980年改革开放以来，诗歌写作与流派发展几乎出现“失控”之势，引起诗学界的严重关注。认为新诗再一次走进十字路口。进入21世纪，以“呼唤新诗二次革命、推动新诗再次复兴”为理念，以“诗歌精神重建、诗体重建和诗歌传播方式重建”为内容的“新诗二次革命论”，引发了诗学界的热烈讨论和研究。在三大重建中，精神重建是新诗复兴的根本，是诗歌与社会和时代的连接以发挥诗歌的多向度功能、如何平衡与审视社会（大我）与个人（小我）的心灵抒写。诗体重

建与格律则是诗歌艺术与形式的规范问题，是自由诗在约束中达至审美规范。诗歌传播方式的重建则在于传播策略的开拓，通过公众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的多样形式，摆脱被边缘化的处境，更广泛地走向更多的受众。利用摄影、影像、声光音乐等科技媒介，重塑与提升诗歌的震撼诗歌传播效果。

新马当代诗歌

我们身处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这是中、港、澳、台，华人最多、中华语文最广泛使用的地方，自五四以来，也一直接收着中华文学和诗歌的影响。我们常说，新马华文文学原自中国文学传统。但那是指文字的使用而言，从文学和诗歌的内容来说，那确实是本土化的人民生活的展现。尽管在某个特定时段，就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新马左翼文学深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呈现出文革的深刻印记。

但从诗歌的本质而言，我们身处中、英、巫、印多元文化的环境和氛围，依然没有挣脱中国新诗的影响，主要接受来自中国大陆与台湾的影响。我们的新诗也一样“自由”得很，没有形成一套结构，也不讲求韵律，但居于语文人口、文化、外来影响等等的局限性，我们没有形成什么流派。总体来说，也就只分成“现实派”与“现代派”，也曾有过长达数月的论争。我们诗歌的传播方式，也一直仍用中、港、台的传播方式，那就是通过报章、杂志、和单行本诗集的文字传播以及通过朗读朗诵的演出、电台广播的形式。这一点，就是受英文教育的诗人，在接受西洋（主要是英国）诗歌的影响，也没有跳出这个框架。同样居于前述的局限性，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我们的华文诗歌发展仍然取决于大中华诗歌的发展，而本地的英文诗歌也一样必须承接和取决于西洋诗歌的发展。



莱佛士与新加坡学院之筹办

叶钟铃*

一、莱佛士与新加坡

新加坡古名单马锡，在十四世纪末被外敌灭亡后，便沦为荒岛。岛上只有一百数十个渔夫和海盗栖息其间。其后，这个岛隶属于柔佛苏丹王国，天猛公驻扎在新加坡，成为实际的统治者。1818年，法国拿破仑战败后，英国将代管的爪哇和马六甲，先后归还给荷兰政府。巽他海峡和马六甲海峡都被控制在荷兰人手中。当时英国所统治的槟榔屿，位于马六甲海峡太过上端，而苏门答腊西部的明古连（Bencoolen）则离开主要贸易航线太远，当时任爪哇副总督莱佛士认为，最适当是在马六甲海峡南端入口处占领一个商业据点，以维持英国在东南亚和整个远东地区的商业利益。因此，英国东印度公司便派莱佛士到亚齐（Acheh）寻找建立商站的机会，结果失败。这时荷兰势力已经重新控制廖内群岛。莱佛士率同马六甲参政司法奈尔上校（Major William Farquhar）赶赴新加坡。1819年1月28日，莱佛士一行人在新加坡登陆。

* 叶钟铃，南洋学会会员。

莱佛士登陆后，便会见柔佛天猛公阿都拉曼，双方签订临时协定，准许英国人在新加坡建立贸易站及受保护。但住在廖内的苏丹却在荷兰人控制下，无法正式批准这宗协定，莱佛士便拥立苏丹的兄长姑隆，在新加坡即位为柔佛苏丹胡辛，成为合法的统治者。双方正式签订协定，主要内容如下：（1）允许英国东印度公司在新加坡设立贸易港；（2）公司每年付给苏丹西班牙币五千元，天猛公三千元，作为酬金；（3）英国委派一名驻劄官统治新加坡。

莱佛士登陆时，新加坡只是一个小渔村，岛上只有80名马来人（Orang Laut或Proto-Malays）和40名华人。半年后人口增至5,000人。翌年8月，又增至10,000人，多数是华人。

1819年2月7日，莱佛士离开新加坡前往槟榔屿，便委任法奈尔上校为驻劄官兼指挥官。1819年3月1日，据法奈尔的报告，居民从四面八方涌来，他们到新加坡这个自由港，希望尽快赚钱，然后把钱带走。新加坡没有传统可循，对商业和工业也没有经验，法奈尔只能和居民合作而相安无事，同时听从莱佛士和孟加拉省总督的命令。

当莱佛士在1822年10月回到新加坡时，它已经从一个默默无闻的渔村演进为至少拥有一万名居民的繁华市镇。据1824年举办第一次人口调查，新加坡人口总数已达到10,683人，包括74名欧洲人，4,580名马来人，3,317名华人，16名阿美利安人，15名阿拉伯人，756名印度人和1,925名武吉人。新加坡继续发展，直到1857年，东印度公司结束为止，新加坡便脱离印度总部，改由英国殖民地直接管辖。

1819年新加坡的教育非常落后。据齐来亚（D. D. Chelliah）在《海峡殖民地教育政策简史》一书所载，“在欧洲人到来之前，除了偶然有可兰经班和华人的私塾外，并没有通常所称的学校”，“马来儿童通常寄居在宗教教师的住处，学习阿拉伯文和可兰经。华族儿童则学习书法和圣贤的教诲，以及读书和识字。教学采用方言，而非华语。莱佛士本人首先试图办理正式的学校教育。远在英国本国有公立学校之前，莱佛士便已想到官立学校。1847年

以前，英国学校并没有常年的资助，直至1870年，英国各地才有好的学校。”由此可见，莱佛士的尝试是不寻常的。

二、莱佛士的教育思想

莱佛士（1781–1826）并非出身于显贵之家族。他在青年时代便不幸辍学，正是这种遭遇使他重视属下的教育，鼓励他们努力自学向上，同时赞助科学与文学。他写信给他当牧师的堂兄弟莱佛士博士，谈到他早年失学是个不能补救的缺憾。他在合墨史密学院（Academy at Hammersmith）安德逊博士（Dr. Anderson）门下学习两年，便告停学。莱佛士在十四岁时便离开学校，到伦敦东印度公司当一名额外书记。他在闲暇时便学习法文、英国古典文学和科学著作。他喜欢接触所喜爱的各种文学和科学著作。1805年，莱佛士被东印度公司派到槟榔屿，他在旅途中学习马来文。1806年，当他出任槟城政府副秘书长时，已经能熟练地掌握马来语文。

当莱佛士于1819年到新加坡之前，曾在爪哇和明古连两地担任行政工作，对促进当地教育发展和社会进步，已有足够的经验和了解。1819年9月，他在明古连为土著儿童设立学校，并由随军传教士管理。他的计划是为每个乡村提供一名教师，然后扩展到全岛。接着成立技术学校，为学童教导有用的技能。

从两份记录中，可以看出他的教育计划：在新加坡设立一所“马来学院”（1819年记录）以及他所草拟的“新加坡学院”（1823年记录）。从一些私人函件中，可以看出他对殖民地教育的观点，兹分述如下：

（一）功利主义的教育思想

莱佛士认为，殖民地教育须为宗主国的经济利益服务。教育是殖民者带给殖民地的最大文明的恩惠。但这恩惠是有代价的。它的基本目的是培养一批效忠殖民地的上层份子，训练一批通晓当地事务的殖民地官员，以便加强英国与其势力范围的经济联系，促进英国的利益。他还指出：“马来群岛的

天然资源是无穷的，配合着土著的开化，东印度公司与各岛屿的经济联系，将会更广泛、更安全、更有利，而它的商业规模，最终要依赖‘增进居民的知识与道德’。”

（二）注重封建贵族的教育

莱佛士本身深受英国传统教育的影响，没有考虑全民教育。因为当时英国没有普遍的小学教育。莱佛士反对普通的民众教育，主张教育对象仅限于上层阶级，尤其是封建的贵族统治阶级。当时马来群岛还广泛存在着封建制度，每个土邦仍保持旧有的封建土地关系和政治组织；贵族还拥有大量土地和农奴。莱佛士和东印度公司的职员都很明瞭这种情形，但却无意改变这种制度。相反地，他们要争取这个阶级，把它们当作新社会秩序的支柱。为达到这个目的，对他们进行教育是必要的，使他们吸取欧洲的文明，改进某些陋习，协助他们巩固其统治，以取得他们的信任与合作，把他们当作殖民地社会秩序的支柱。

莱佛士认为：“这些国家的酋长的弱点，人们已经普遍接受，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改善他们的智力。他们将会感激我们所给予的恩惠，并且更好倾向投靠我们。我国（英国）将会从中巩固未来的政权，以及从一般良好的秩序中得到报酬。”

三、莱佛士创办新加坡学院的过程

1819年1月28日，莱佛士登陆新加坡，抱有两个期望：一是建设新加坡成为一个自由贸易港，其次是发展本地的教育，但当初新加坡的行政权是掌握在加尔各答的东印度公司，以及后来驻印度的大法官，他们仅热衷于经商而无志于推广教育设施。

1819年9月，莱佛士写信给一位具有影响力的慈善家威伯弗斯（W. Wilberforce），提到他有意在新加坡设立一所学院。他说：“这是一所为土著而设的学院，为土著提供高层次的教育，并加强对于东方地区的历史、文学和资源的研究。”他说：“这所学院可能影响三千万人，而这些人又可能

产生十倍的影响，以便在恒河以东的荷属东印度，超越中国和日本地区，扩展我们的势力。”

该年11月19日，莱佛士写信给他的堂兄弟莱佛士博士说：“我已开始在此散播知识和促进道德法则的发展。我把许多时间用在这方面，如果我能依照计划成立一所在新加坡的学院，此项计划便告完成。”

11月间，莱佛士从明古连到加尔各答向孟加拉总督哈斯丁司（Lord Hastings）提呈有关教育的建议书。他指出，当时在新加坡有一些马来可兰经学校，一所由伦敦传教会主办的教会学校，三间用不同方言教学的华校，以及一间有48名学生的英校。哈斯丁司了解莱佛士的意图和计划，但认为莱佛士如不能留在新加坡，他的计划是无从实现的。

据文西·阿都拉（Munshi Abdullah）回忆录：1823年2月，莱佛士在官邸为土著首领所设的招待会上，向苏丹和天猛公建议，把他们的孩子送到印度求深造，学习英语和会话，加上算术及其他科目，以便承继为明智的统治者。苏丹的反应并不积极，过后便加以拒绝。他的要求是，如果新加坡设立一所土著学院，他答应将孩子送到学院接受教育。阿都拉所得的印象是，苏丹给予拒绝的答复，导致莱佛士过后在政府山召集会议，讨论设立新加坡学院。

莱佛士创办学院的计划终于在1823年进行。4月1日，在他所召集的会议，出席者有马六甲英华书院创办人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博士，槟榔屿随军传教士哈晋斯（Hutchings）、苏丹胡辛、天猛公及其他社区领袖，莱佛士提出创办新加坡学院的原因。接着马礼逊提出马六甲英华书院与新加坡学院合并的建议。这是由于该书院首任院长米怜（William Milne）逝世后，造成行政上的混乱，以及书院在荷兰殖民统治下地区的不利环境。英华书院有意以4,000元出售其校舍，充作新加坡学院的建筑费。结果会议同意合并的建议。

为了解决新加坡学院的经济难题，莱佛士代表东印度公司提出下列办法：

- （1）每月津贴300元；
- （2）捐献一块海边的地皮，宽600呎，长1,440呎；和
- （3）位于书院山（Institution Hill）的一块土地；以及
- （4）面积1,500英亩未开发的土地（学院中各系占500英亩）。会议上亦进行募捐活动；莱佛士捐献

2,000 元，苏丹胡辛答应捐2,000 元，法奈尔 1,000 元，天猛公 1,000 元，马礼逊 200 元，莱佛士女士 400 元，其他捐献者包括欧籍富商和政府官员，总共筹到 17,500 元。

鉴于莱佛士在东印度公司的任期将告结束，因此他在离开新加坡之前，必须为新加坡学院作好交代。

4月15日，新加坡学院召开第一次正式会议，莱佛士委任18人组成学院信托人委员会，其成员包括莱佛士本人、法奈尔上校、马礼逊博士。令人注意的是，信托人全部是欧籍人士，包括东印度公司的欧籍雇员、英国军事及宗教领袖，但没有马来人和华人代表，虽然新加坡学院的创办宗旨是为照顾当地各族人士的利益。

会议上提出建筑校舍的计划，建筑费估计达 15,000 元，并且继续展开募捐工作。此外，学院将设立印刷厂，以辅助经费的收入。

1923年6月5日，莱佛士急不及待，为新加坡学院举行奠基礼。这是他最后一次在公开场合出现。出席的来宾包括苏丹胡辛和天猛公。莱佛士在致词中表示，他企望学院将为成千上万人民促进文明和生活素质。但他对学院的前景亦有所顾虑：其成长期将是漫长的，为达致成熟阶段，有赖于信托人的合作与一贯支持。

四、学院的宗旨、计划 and 目标

1823年4月1日，莱佛士在会议上提出创办新加坡学院（Singapore Institution）的动议，其主要宗旨在于：

- (1) 作为收集与编撰马来亚人民的传统与历史的中心；
- (2) 作为马来亚土地的科学研究中心；
- (3) 教导那些愿意了解东方风土人情的英国人；
- (4) 创立一种比传佈陈旧的西欧文化更有意义的机构；
- (5) 作为研究东方各种语文及生活的中心。

根据莱佛士所制订的计划，学院分成三部门：

- (1) 科学系：设有两位教授，一位负责自然史，另一位负责自然哲学；
- (2) 华文部门：係为华人而设的文学与伦理学系，马六甲英华书院迁移来新加坡后，由马礼逊博士主持；
- (3) 马来文部门：为马来人而设的文学与伦理学系，设置一位院长，以及马来语教授、泰语教授和当地教师。

学院各部门是由信托委员会所管辖，主席为驻劄官法奈尔上校。信托委员会也有权委任各部门的教授。在1823年，他们遴选T. Hamhreys领导英华学院，G.H.汤申牧师主持马来语学院，科学部门的主任则无从获悉。

综观新加坡学院具有下列特点：

- (1) 莱佛士承认当地人采用母语作为教学媒介，接受母语教育的权利，认为这将有效地教导土著的子弟，增进他们的智识，同时进行有关当地问题的学术研究。因此，学院将采取各种地方语言，配合英语作为教学媒介。
- (2) 它是一间大学学院，所要求的是大学学位水准的课程。学院采取大学学院的组织，所要求的教授是学有专长的专家，希望培养出学有所用的学生。
- (3) 它是一间汎马来西亚的学院，采用东南亚各种语言，吸收东南亚各地的学生，其研究范围包括东南亚各国问题。

莱佛士提出创办新加坡学院的计划，希望这所学院建成后，将负起下列各种功能：

- (1) 指导东印度公司的官员了解这个地区；
- (2) 教育邻近地区的统治者和酋长的儿子；
- (3) 培育亚裔教师和公务员阶层。

他预计，整个东南亚的居民，尤其是地方的贵族阶层将会蜂拥而至，前来接受教育。

莱佛士教育计划的核心内容为：“教育必须与商业同步发展，以促进其美好的成绩。”“我们不想成为带来荒芜的暴风，而想要成为化雨的春风。”他一直梦想着要复兴马来世界的文化遗产。他认为，这份文化遗产由于华人、阿拉伯人和荷兰人对这里的掠夺，再加上回教的影响逐渐衰落。他想要让印度教、佛教文化重生，与基督教和现代西方学术的精华结合在一起，从而让亚洲人和欧洲人的精神世界更加丰富充实。

新加坡的地理位置、历史渊源和商业繁荣，将使它成为“培育华文和马来文学，改善马来半岛及周边民族的道德和智识水平的理想中心。”因此，莱佛士在即将离开新加坡之前，决心要把建立新加坡学院作为“我的最后一项公共行动”。他告诉他的朋友沃里奇（Wallich）：“上帝知道，我真诚地相信，这所学院将成为教化和改善上百万民众的地方……我们想要辐射到的是印度恒河区域以外的地方，包括马来群岛、澳大利亚、中国、日本和太平洋诸岛。”

五、马六甲英华书院迁移至新加坡的拟议

马六甲英华书院自1818年创办，到1843年迁至香港，其存在达25年。在这个过程中，对书院的命运影响最大的是马礼逊（Robert Morrison）、米怜（William Milne）和理雅各（James Legge）。英华书院的第一任院长为米怜牧师，当时马礼逊远在广州，英华书院的开办和早期经营的事务均由米怜负责。米怜在1822年6月去世后，院长职务先后由伦敦传教会所委派的传教士所承继。在1834年之前，马礼逊一直是书院主席（President of College），实际上是最高决策者。马礼逊在1823年1月至7月到马六甲掌管书院事务，达半年之久。在这个困难时期，马礼逊为书院进行一项要务，就是探讨将英华书院与新加坡一所性质相同的学院——新加坡学院合并的可能性。

自1923年1月29日到2月1日，马礼逊在从广州前往马六甲的途中，在新加坡前后停留4天，受到英国行政长官莱佛士的接待。莱佛士告诉马礼逊，他有意与马礼逊合作，在新加坡兴建一所类似英华书院性质的“马来亚学院”

(Malayan College)，也将依靠传教士执教。他向马礼逊建议，将英华书院从荷兰人控制的马六甲迁往新加坡，与他计划中的学院合并。

马礼逊回到马六甲后，与院长汉佛雪 (James Humphery) 等讨论此事，并作出了迁移的决定。莱佛士也宣布将拨出500英亩的土地，供作安置英华书院的用途。他还在1823年4月正式公布要建立以研究中国、暹罗和马来群岛的语言和提高这些国家人民的道德与知识水平为目的的“新加坡学院”(Singapore College)。这个学院的课程包括马来书院、中文书院和科学书院 (College Scienc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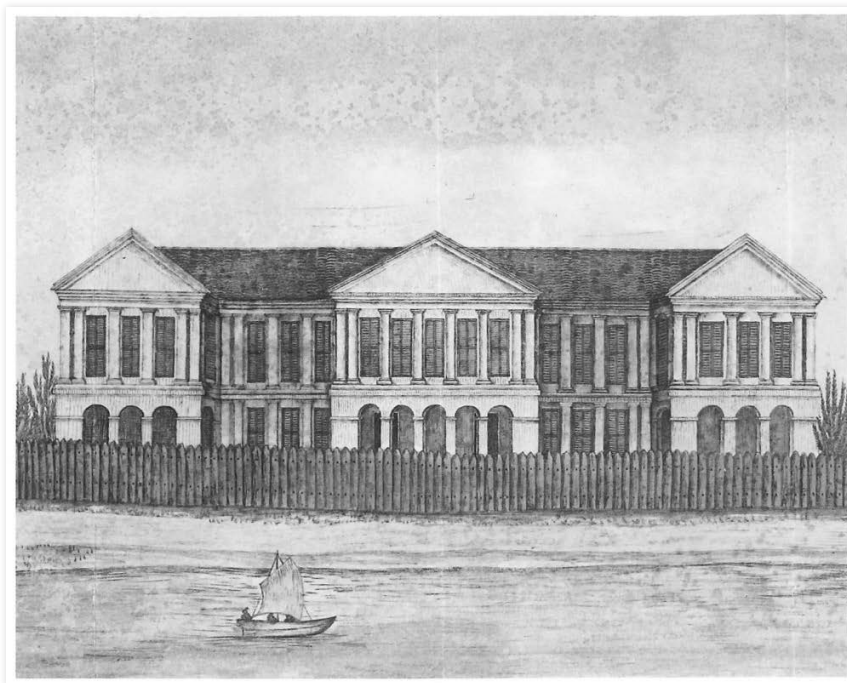
此后，马礼逊又先后两次到新加坡，与莱佛士和法奈尔等人进行深入的讨论。他们决定由法奈尔担任学院董事长，马礼逊为副董事长。马礼逊还参加于1823年6月23日新加坡学院的奠基仪式，以及出席董事会会议。惟过后，接任新加坡驻劄官的克罗福 (John Crawford) 反对此事，而莱佛士则已经返回英国，以致原来计划无从实现。

六、新加坡学院无疾而终

莱佛士在1823年6月8日离开新加坡。翌日，克罗福接任为驻劄官。学院的前途便落在他的手中，一切遵照东印度公司的指示行事。孟加拉省总督在1823年11月6日答复莱佛士5月20日的来信，表示他不赞成英国在新加坡管辖权确定之前就作出决定，而且莱佛士在应允捐助新加坡学院经费和地点之前，理应征求他的意见。

1825年5月，东印度公司董事会通知克罗福，说明他们认为学院的建立未免太草率。而且新加坡是不是会成为英国属地，还有待解决。董事部命令克罗福针对新加坡学院一事提出报告。

1826年2月7日，克罗福在报告中指出：有关学院的计划太广泛，不合当时的条件。他建议在新加坡所实施的教育应着重于小学教育，因为当时的居民对西欧的教育和教学方法并不熟悉。他提议小学教育应学习马来语和华语，



1841年设在勿拉斯巴沙路（Bras Basah Road）海滨被废弃的新加坡学院校舍。

也可教导阿拉伯语，但更应学习英语，并以英语来学习算术。他认为教育的主要目的是“使亚洲人习于做顺民。”他的建议否定了莱佛士原有的意图，使高等教育的学院概念，受到致命的打击。

孟加拉总督接受克罗福的建议，先将高等教育搁在一边，但却没有按照他的建议发展初级教育。克罗福曾请求孟加拉政府赋与他处理土地和经费的权力来开办小学。其结果是：初级和高等教育发展均告失败。莱佛士所怀抱的宏大理想，终于无疾而终。

七、改称为“莱佛士书院”

在莱佛士离开之后，新加坡学院的命运便掌握在信托人的手中。他们不愿意按照莱佛士的计划去继续进行。由于缺乏经济资助，使莱佛士的计划不能实现。从1823年到1834年，前后共达十一年，学院校舍只完成一部分。据1823年



新加坡《自由西报》（Singapore Free Press）的报导：“新加坡学院多年来在新居民眼中，一直是刺目的，而近来它未完成的建筑物竟成为盗贼的藏身所。”

1826年莱佛士在英国逝世。1836年元旦，当地热心人士为纪念莱佛士，才决意把他计划中的学院建立起来，终于在该年年底完成。1837年12月，所有在临时建筑物上课的班级，一律迁入新加坡学院。1857年改称为“新加坡书院”（Singapore Institution），包括1884年3月成立的“莱佛士女校”（Raffles Girls' School）及1863年再改称的“莱佛士书院”（Raffles Institution）。书院虽已草草落成，但所推行的已远非莱佛士理想的高等学府，只提供基本教育而已。

总而言之，莱佛士在当地教育事业上虽未获成功，但他所创立的“新加坡学院”计划，无疑地是新加坡教育史上的一项进步措施。尽管他的建校宗旨脱离不了创办人的功利主义的观点，但它的创立确是符合当地客观环境的需求。

参考资料

1. 《新加坡一百五十年来的教育》，新加坡师资训练学院出版委员会，1972年2月，页4至20。
2. 谭树林《马礼逊与中西文化交流》，杭州：中国美术学院，2003年12月，页216至222。
3. 吴振强〈莱佛士占领新加坡始末〉，原载《猎户》，南洋大学出版，日期不详。
4. E. Wijesingha, “The Eagle Breeds A Grynhon, The Story of Raffles Institution, 1832–1985”, Pioneer Book Centre, 1989.
5. Leong Sau Ming, “From Singapore Institution to Raffles Institution, 1823–1903”, B.A. Hons Thesis, NUS, History Department, 1980/81.





诸蕃锦绣

——宋、元南海布帛贸易（以爪哇为例）

吕世聪 廖筱纹*

小引

华

夏衣冠之源，《太平御览》卷第六百八十九，服章部六，《易》曰：黄帝、尧、舜、禹，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上衣下裳，乾坤之像）。¹

中国历史纵横五千年，无论是文献或考古发现，关于中华民族的古代冠服及纺织文明，皆有文可考，有迹可循，有实物可钻研。相对东南亚各地、各民族的情况，就不一定是这样。印度与中国文明在东南亚历史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各有所长。以纺织文明为例，东南亚各民族的纺织技艺，早已深受中、印两大文明的熏陶后而独具匠心。至于冠服衣着，也因受中、印文化洗礼，而各自散发出独特的异域风格。

* 吕世聪：新加坡独立研究学者；廖筱纹：任职于马来西亚新纪元大学学院。

¹ [宋] 李昉，夏剑钦等校点《太平御览》（第六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页398。

众所周知，中外海上贸易的货品，以香料、陶瓷及纺织品为大宗。由于天然条件不同，东南亚考古发掘，罕见古代纺织物遗存。因此，“文字考古”就成为研究南海纺织文明及贸易的最重要方向。中国文献，蕴藏不少南海冠服与纺织品贸易文字，是研究相关课题的珍贵依据。本文尝试以爪哇（巴达维亚）为中心，对宋、元与南海的布帛贸易作初探。

一、宋、元的两税与纺织概况

（一）夏、秋两税

男耕女织，自古已然，因此西汉时桓宽《盐铁论》曰：“夫男耕女绩，天下之大业也”。制作衣服的布帛纺织物，除了是商品，也是中国封建王朝赋税收入的主要来源。《宋史》“食货一布帛”：

宋承前代之制，调绢、绸、布、丝、绵以供军须，又就所产，折科、和市……诸州折科、和市，皆无常数，唯内裤所须，则有司下其数供足。²

上揭，宋承唐制，百姓一年需缴纳两税，³分为“夏税”与“秋税”。⁴夏天主要是以布帛缴纳，秋天则以米谷支付。除两税所赋的纺织品，宋廷还从官营纺织机构，以折科（以布帛代钱、谷纳税）、⁵榷卖、和买⁶等方式，获取布帛。北宋时“东京（汴梁）榷货务，岁入中平罗、小绫各万疋”，⁷易言之，从朝代岁赋中的布帛收入，大致能窥视全国纺织业的整体概况。作为赋税收入

² [元]脱脱等《宋史》（三），卷一百七十五，食货“布帛”中华书局，1999，页2835。

³ 唐代宰相杨炎（727-781）于780年创立“两税法”，取代原有的租庸调制。关于唐代两税制，见方勳〈唐代两税制度的探究〉，南大学生会《大学周学术研究集刊》，南洋大学，1960，页111-126。

⁴ [清]徐松《宋会要》（一〇），食货七十——赋税杂录，《续修四库全书》（784），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页215。

⁵ [清]徐松《宋会要》（九），食货六四——折帛钱，《续修四库全书》（783），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页605-607。

⁶ [清]徐松《宋会要》（九），食货六四——和买，《续修四库全书》（783），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页608-610。蔡美彪等《中国通史》，（香港）三联书店，1995，页399。

⁷ [元]脱脱等《宋史》（三），卷一百七十四，中华书局，1999，页2815。



的布帛，除了支付官员俸禄，⁸ 也用于军需、赏赐⁹ 各项，数量可观。例如春、冬两季赐宰相与枢密使各“绫二十匹、绢三十匹、冬绵百两”。¹⁰

宋代岁赋中的布帛种类，《宋史》“食货一赋”税曰：

一曰罗、二曰绫、三曰绢、四曰纱、五曰絁、六曰绸、七曰杂折、
八曰丝线、九曰绵、十曰布葛。¹¹

至于公、私织造的布帛，每疋必须宽二尺五分，而百姓上缴的绢布，每疋规定重量为十二两。这是后周显德年间之规定，宋代时沿袭不变。¹²

宋初，朝廷每年收入约一千六百余万贯，到宋神宗时增加到六千多万贯。南宋偏安之初，税收不满一千万，淳熙年间猛增至八千万。¹³ 南宋每年赋税所征收的纺织物总量超过北宋，高达一千万匹。不单说明南宋赋税增加与纺织业长进，也反映了其赋税之重。宋代从各地转运物资（地方或舶货）至京师的制度称为纲运，其中“绢帛纲运”，其运输单位“一纲”的数量介于3–6.5万匹。¹⁴

（二）经济中心南移与织染技术提高

宋代的织染技术较前代先进。纺织机械与技术革新是最大改变，其中以三

⁸ [清]徐松《宋会要》（六），职官五七——俸禄，《续修四库全书》（780），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页117–118。[元]脱脱等《宋史》（三），卷一百七十一，职官“俸禄匹帛”，中华书局，1999，页2747。

⁹ [清]徐松《宋会要》（三），仪制九——赐服，《续修四库全书》（777），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页560–564。

¹⁰ [清]徐松《宋会要》（六），职官五七——俸禄，《续修四库全书》（780），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页117–117。

¹¹ [清]徐松《宋会要》（一〇），食货七十——赋税杂录，《续修四库全书》（784），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页214。[元]脱脱等《宋史》（三），卷一百七十四，食货“赋税”中华书局，1999，页2815。

¹² [元]脱脱等《宋史》（三），卷一百七十五，食货“布帛”中华书局，1999，页2835。

¹³ 蔡美彪等《中国通史》，（香港）三联书店，1995，页397。

¹⁴ 郑有国《中国市舶制度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2004，页104。



十二锭水力来驱动纺车，提高了生产力。¹⁵ 南宋浙江与四川成为全国丝织业中心。¹⁶ 尤其是杭州，官营纺织机构如文思院、绫锦院、染院、文绣院等，¹⁷ 都从汴京南迁至临安。¹⁸ 《宋会要》“食货六四一折帛钱”：

高宗建炎三年（1129），车驾初至杭州，朱胜非为相，两浙运使副王琮言，本路上供和买絁绢，岁为一百一十七万匹。每匹折纳钱二千，计三百五十万缗省以助国用。¹⁹

上揭南宋初年两浙夏税额数，达至一百多万匹。此外，成都的纺织也极为发达，蜀锦闻名天下，北宋时朝廷便设有锦院于此。²⁰ 总的来说，由于北方的战乱，造成南宋时，全国经济中心向南移，促进南方纺织业的发展与海外贸易。1975年，福州市发现的南宋黄昇墓，出土了354件精美的丝织品，反映了福建地区的纺织业与海外贸易在宗室、贵族对物质需求的推动下，东南沿海纺织业兴盛的概况，包括其高超的织造工艺技术水平。²¹

元朝建立后，蒙古贵族对纺织品的需求，继续促使纺织业发展。与宋代不同，元朝的夏税，从征收丝织品转为征丝（原材料）。浙江每年上缴朝廷的蚕丝数量为全国之冠。至元（1264-1294）时，全国上缴的丝料达一百万斤以上。²² 元代的棉织技术也进一步发展，南方的棉织技术北传。²³ 至元二

¹⁵ [元]王祜《农书》卷二十一，转引自叶坦，蒋松岩《宋辽夏金元文化史》，东方出版中心，2007，页72。[德]迪特·库恩，李文锋译《哈佛中国史》，〈儒家统治的时代〉，中信出版集团，2016，页215。

¹⁶ 蔡美彪等《中国通史》，（香港）三联书店，1995，页367。

¹⁷ 程民生《宋代地域经济》，昭明出版社，1999，页192。

¹⁸ 袁宣萍《浙江丝绸史话》，宁波出版社，1999，页45。

¹⁹ [清]徐松《宋会要》（三），食货六四一折帛钱，《续修四库全书》（783），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页605。

²⁰ 程民生《宋代地域经济》，昭明出版社，1999，页199。

²¹ 福建省博物馆编《福州南宋黄昇墓》，文物出版社，1982，页9、143。

²² [明]宋濂《元史》（三），卷四十二，食货一——桑农，商务印书馆，1987，页1178。朱新予《中国丝绸史》（通论），纺织工业出版社，1992，页263。

²³ [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黄道婆”，《宋元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页6446。



十六年（1289）在浙东、江东、江西、湖广、福建置木棉提举司，每年征收木棉布十万匹。²⁴

二、南海贸易的重要商品：布帛

（一）宋、元时代布帛的外销

宋、元两代，海上贸易是获取海外奢侈物资的重要来源。所谓奢侈物资主要是香药，中国对香药的需求，历代从未间断。香药用途广泛，分食用（如胡椒、丁香、茴香）及熏用（如檀香、沉香、龙脑香、降真香）。²⁵就以熏衣一项而言，需耗费大量香料。早于汉代，官宦之家便有焚香熏衣的风气。²⁶所谓“熏衣令身香”，宋代文献记载，当时熏衣的香料配方多达30余种。²⁷元代《事林广记》卷之十“熏衣梅花香”：甘松一两、舶上茴香一两、木香一两、丁香半两、麝香一分、龙脑一两。捣合，粗罗使之。²⁸《事林广记》是部类似于今天的日用小百科书籍，书内罗列多种以香药熏衣法，说明无论贵族或百姓，熏衣之习在当时已经是人民日常穿着文明。

宋初先后在东南沿海的广州、杭州及明州等处设立市舶司，²⁹管理海外贸易。雍熙年间（984–988），宋廷还派遣内侍八人，分四纲往海南诸蕃“勾招进奉”。³⁰《宋会要》职官四四之一“市舶司”：

²⁴ 李干《元代社会经济史稿》，香港公开进修出版社，1996，页135。

²⁵ 关于宋代香药的用途及贸易，详见刘静敏《宋代香谱之研究》及林天蔚《宋代香药贸易史》。

²⁶ 刘静敏《宋代香谱之研究》，文史哲出版社，2007，页317。

²⁷ 《香谱》、《陈氏香谱》，转引自刘静敏《宋代香谱之研究》，文史哲出版社，2007，页319。

²⁸ [元]陈元靓《事林广记》，中华书局，1999，页540。

²⁹ 两宋分别在广州（广东）、杭州（浙江）、明州、泉州、密州（山东）、秀洲（上海）、温州、江阴军等处设立市舶司。

³⁰ [清]徐松《宋会要》，职官四四，市舶司，《续修四库全书》（779），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页504。



市舶司掌市易，南番诸国物货航舶而至者，初于³¹ 广州置司……后又于杭州置。淳化中，徙置于明州……凡大食、古逻、闾婆、占城、渤泥、麻逸、三佛齐、宾同朥、沙里亭、丹流眉，并通货易，以金银、缗钱、铅锡、杂色帛、精麤³² 瓷器，市易香药、犀象、珊瑚、琥珀、珠玑、宾铁、鼈皮、瑇瑁、玛瑙、砗磲、水晶、番布、乌槁、苏木之物。³³

上揭，北宋初年舶商运载金银、铜钱、杂色帛、陶瓷到海外贸易，除了市易香料及珍奇异宝外，“番布”也是其中一项。所谓“番布”，即南海各地生产的纺织物统称。至于外销的布帛，即便是官方记载，无论是《宋会要》或《宋史》，输出海外贸易的布帛种类，只以“杂色帛”通称。

（二）江浙丝绸织染

南宋时，泉州市舶司，赵汝适（1170–1231）在《诸蕃志》中，对出口的布帛种类则颇有记述，其中包括丝绸类的绢、锦、绫、罗。这些丝织品按南宋纺织业发展概况，及市舶司的设置地点来看，绝大多数应该是江浙地区的产品。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一项称为“荷池缣绢”的纺织品。缣绢是以蜡染工艺制作的绢料，而“荷池”则是莲池禽鸟纹饰的简称。南宋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三“夜市”记述临安夜市夏秋扑（卖）的货品中，有一“挑纱荷花满池娇背心儿”，³⁴ 说明莲池荷花为纹饰的衣物，在临安是畅销品。到了元朝，“满池娇”纹饰深受帝皇所喜好，元文宗（图帖睦尔，1328–1332）在天寿节（生日）喜爱身着绣有莲池鸳鸯纹饰的袍服，接受群臣的朝贺。由于皇室的喜好，影响了上层社会，元大都的贵胄，甚至于护膝缎子上，也绣上“满

³¹ 《宋史》注明为开宝四年，见[元]脱脱等《宋史》，卷一百八十六，中华书局，1999，页3054。

³² 麤，同粗。

³³ [清]徐松《宋会要》，《续修四库全书》（779），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页503。又《宋史》“互市舶法”，[元]脱脱等撰《宋史》，卷一百八十六，中华书局，1999，页3054。

³⁴ [宋]吴自牧，符均等校注《梦粱录》，三秦出版社，2004，页194。

池娇”纹饰。“满池娇”图案也因为上有所好，而被负责烧造瓷器的匠作院窑匠，选绘于不同的元青花器皿上。³⁵

《诸蕃志》记载中国舶商携带“荷池缣绢”贸易的国家有三处：“单马令”、“凌牙斯加”、“南毗”。学界大致认同单马令的方位介于今天泰南的洛坤（那空是贪玛叻，Nakhon Si Thammarat）地区，凌牙斯加方位介于马来半岛北部的北大年（Pattani）与吉打（Kedah），南毗则是位于印度南部的科泽科德（Calicut）。同书还有载有“五色缣绢”、“缣绢”两个布帛名称，应该为类似商品的简称。可见中国的“荷池缣绢”至少在宋代时，已经远销至东南亚、南亚等地（见表1）。

表1：南宋《诸蕃志》载宋代染缣布帛外销的地区

国家	国人衣冠服饰	本国出产布帛种类	宋代外销布帛种类
三佛齐	国王乘船出入，身缠缣布，盖以绢伞……	—	蕃商 ³⁶ 兴贩用……锦绫、缣绢……
单马令	—	—	蕃商用绢伞……荷池缣绢……
凌牙斯加	地主缠缣跣足，国人剪发。亦缠缣绢。	—	蕃商兴贩用……荷池缣绢……
阇婆	其王椎髻，戴金铃，衣锦袍，蹑革履。亦务蚕织，有杂色丝、吉贝、绫布。	—	蕃商兴贩用……五色缣绢、皂绫……
苏吉丹	其王以五色布缠头、跣足。……土人男剪发，女打髻，皆裸体跣足。妇人染甲衣帛之类，多用朱砂。	土产…… 番布……	—
南毗国、故临国	其主裸体跣足，缚头缠腰，皆用白布，或著白布窄袖衫……	—	本国运至……荷池缣绢……就博易焉。……战斗临敌以彩缣缠髻。

³⁵ 刘新园〈元文宗-图帖睦尔时代之官窑瓷器考〉，《文物》，2001年第11期（总546期），文物出版社，2001，页46-65。

³⁶ 蕃商，指中国的舶商。

胡茶辣国	—	土产……诸色蕃布	—
新罗国	—	—	商船用五色纈绢……
注辇国	—	地产……色丝布、吉贝布……	—
鹏茄啰国	—	土产兜罗绵等布……	—
南尼华 啰国	—	……土产……细 白花药布。	—
勃泥	—	—	蕃商兴贩用……假锦、建阳 锦、五色绢、五色茸……
三屿	—	—	博易用……皂绫、纈绢……

元代沿袭宋代政策，在东南沿海的泉州、上海、庆元（宁波）、澈浦（海盐）四地设立市舶司来管理海外贸易。此外，元廷也遣使招徕“朝贡”贸易。至元22年（1285）元朝进一步实施“官本船”制度。这是以官方出资，雇佣舶商，达到垄断海外贸易的方式，其利益分配则为三七分。虽然说官本船贸易由官方垄断，但经营者依然获利不少，除了吸引百姓参与，且官僚与贵族纷纷投入。据元代《岛夷志略》记载，外销南海的纺织品，除了江浙地区生产的丝织品，福建地区的纺织品也受诸蕃青睐。³⁷

（三）海南棉织

王大渊（1311-?）《岛夷志略》记载海外贸易地区与进出口货品种类，远比宋代时增加，反映元代海外交通贸易的繁盛。元代除了苏杭与福建地区的丝织品外，海南地区的布帛也是重要的外销纺织品。棉织生产主要集中在南方，尤其是海南地区，其冠服及纺织生产概况，明代海南地方志《琼台志》引旧志曰：

³⁷ [元]汪大渊，苏继庠校释《岛夷志略校释》，中华书局，1981，页70。

民皆服布，专务农工，少事商贾。妇女少事蚕桑、纹绣，专纺吉贝，绩麻，织布被、花绶、手帕，以为贸易之资。³⁸

又南宋范成大（1126–1193）《桂海虞衡志》“志器”曰：

黎幕，出海南黎峒，黎人得中国锦彩，折取色丝，间木绵，挑织而成，每以四幅联成一幕。

黎单，亦黎人所织，青红间道，木棉布也，桂林人悉买，以为卧具。³⁹

赵汝适《诸蕃志》“海南”载：

……地产吉贝、苧麻……今之上衣无异中土，惟下裳男子用布绶，女子用裙。以纺吉贝为生。……海口驿……妇人不事蚕桑，惟织吉贝、花被、绶布、黎幕……琼山县……女工纺织，得中土绮綵，折取色丝，加木棉，挑织为单幕。又纯织木棉吉贝为布。⁴⁰

“吉贝”即木棉（学名为：Ceiba pentandra），吉贝是印度或马来语的音译。⁴¹ 元代王桢（1271–1368）《农书》里对棉织更详细记载：

夫木棉产自海南，诸种艺作之法，騷騷北来，江淮川蜀，即获其利，至南北混一之后，商贩于此，服被渐广，名曰吉布，又曰绵布。其幅匹之制，特为长阔，茸密轻暖。可抵缁帛，又为毳服毯段，足代本物。

按裴渊广州记云：蛮夷不蚕，采木棉为絮，又诸番杂志云：木棉，吉贝木所生，占城、閩婆诸国皆有之，今已为中国珍货，但不自本土所产，不能足用。且比之桑蚕，无采养之劳，有必收之效，埤之泉苳，免绩缉之工，得御寒之益，可谓不麻而布，不茧而絮，虽曰南产，言其适用则北

³⁸ [明]唐胄《正德琼台志》（上册），海南出版社，2003，页139

³⁹ [宋]范成大，齐治平校释《桂海虞衡志校补》，广西民族出版社，1984，页14。

⁴⁰ [宋]赵汝适，杨博文校释《诸蕃志》，中华书局，1996，页216–221。

⁴¹ [宋]周去非，杨武泉校注《岭外代答》閩婆国，中华书局，1999，页228–229。

方多寒，或茧纡不足而裘褐之费，此最省便，夫种植之法，已载谷谱制造之具，复列於此，庶远近滋习助桑麻之用，兼蛮夷之利将自此始矣。⁴²

王楙在记载海南棉织时，对东南亚地区如占城⁴³、阇婆等国所产的吉贝（木棉）早有所闻，并比较棉织与丝织的优缺点。而江北的棉织生产，滥觞于黄道婆⁴⁴的广传。⁴⁵实际上，宋代以来，海南地区女性从事棉织需要上缴，《宋史》卷四百六“崔与之”：

崔与之，字正子，广州人……绍熙四年举进士……寻特授广西提点刑狱，遍历所部，至浮海巡朱崖……琼人以吉贝织为衣衾，工作皆妇人，役之有至期年者，弃稚违老，民尤苦之。与之皆为榜免。⁴⁶

上揭，原籍广东的崔与之（1558-1239），在出任广西的提点刑狱时，见到海南地区妇女苦于棉织的劳役超过一年，只能弃老幼不理，百姓受苦，才减除此弊。海南棉织品的外销，宋代时已见载于《宋会要》“市舶司”所列进出口贸易货品项目中，且品种亦不少（见表2）。⁴⁷元代，至正《四明续志》卷五“市舶物货”载，明州市舶司将“崖布”（即海南所产布帛）列为“细色”⁴⁸来抽解。⁴⁹《岛夷志略》更明确记载舶商将全国各地及“海南布”的运销地点（见表3）。

⁴² 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 维基：<https://ctext.org/wiki.pl?if=gb&chapter=373318&cremap=gb>。

⁴³ 占城，即占婆。越南中部的古国。

⁴⁴ 黄道婆，生卒年不详，松江府（今属上海）人。

⁴⁵ [元]陶宗仪，李梦生校点，《南村缀耕录》卷二十四“黄道婆”，《宋元笔记小说大观》（六），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页6446。

⁴⁶ [元]脱脱等《宋史》（10），卷四百六，中华书局，1999，页9629。

⁴⁷ [清]徐松《宋会要》，职官四四，市舶司，《续修四库全书》（779），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页504。

⁴⁸ 宋、元两代将海外贸易进出口货品的分为“细色”（贵重货品）与“粗色”（一般货品）来征税。

⁴⁹ [元]王元恭《至正四明续志》，《续修四库全书》（705），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页545。

表2：《宋会要》载海南布帛名称

序	布料种类	年代
1	海南碁盘 ⁵⁰ 布	绍兴三年
2	海南吉贝布	
3	海南白布	
4	海南青花碁盘被单	
5	海南白布被单	
6	海南青花布皮（被）单	绍兴十一年

表3：元代《岛夷志略》载中国外销南海的各地布帛名称与种类

序	中国外销布帛种类	外销国家地区与布帛名称	
1.	海南布	邇来勿	贸易之货……用占城海南布……红娟、五色布……
		苏洛鬲	贸易之货……用海南巫仑布……
		都督岸	贸易之货用……海南占城布、红绿绢……
		蒲奔	贸易之货用……海南布……
2.	塘头市布	吉兰丹	货用塘头市布、占城布……
3.	建宁锦	真腊	货用……龙段（缎）、建宁锦、丝布之属。
4.	苏杭五色缎	加将门里	贸易之货用苏杭五色缎，南北丝、土紬绢，巫仑布之属。
5.	苏杭色缎	甘埋里	去货……青缎……苏杭色缎……
6.	草金缎、丹山锦、山红绢……	八都马	贸易之货用南北丝……丝布、草金缎、丹山锦、山红绢……
7.	土印	八节那间	男女椎髻，披白布幔，系以土布。
8.	土印布	龙牙犀角	贸易之货用土印布、八都刺布……
		班卒	贸易之货用……丝布……土印布……
		文老古	贸易之货用……水绫、丝布、巫仑八节那涧布、土印布……
9.	土印花布	万年港	贸易之货……土印花布 ⁵¹ ……
10.	青白土印花布	龙牙菩提	贸易之货用……青白土印花布……

⁵⁰ 碁，异体字，同棋。“碁盘布”即棋盘布，应该是一种类似棋盘方格为纹饰的织染布帛。

⁵¹ 土印花布，即中国生产的印花布。

（四）外国布帛的输入

中国舶商不单将中国生产的布帛外销，亦将海外一些布帛进口到中国，其中也包括在将不同地区的纺织品，用于“诸蕃互市”。关于宋代从海外进口的布帛种类，南宋绍兴三年十二月与绍兴十一年市的舶司文书中曾列出详细品种，⁵² 其中一项称为“蕃纈布”的布料，当是南海蕃国或地区的织染布帛。其他纺织品种类只以质料分类，如吉贝布、吉贝花布、吉贝纱、苧布。还有以颜色分类，如青花布、青斑布⁵³。然而有注明产地的纺织品，唯有高丽布料（见表4）。至于元代时，只见大德《南海志》“舶货”载：布匹——白蕃布、花蕃布、草布、剪绒单、剪毛单。⁵⁴

表4：《宋会要》“市舶”载宋朝从海外进口的布帛种类名称

序	布料种类	年代
1	蕃纈布	绍兴三年（1133）
2	青基盘布 ⁵⁵	
3	高丽小布	
4	吉贝布	绍兴十一年（1141）
5	吉贝襪 ⁵⁶ 面布	
6	青橘皮（被）小布、大布	
7	青苧布	
8	蕃青斑（斑）布	
9	白苧布	
10	鞋面布	
11	生苧布	
12	青花蕃布	
13	吉贝花布	
14	吉贝纱	
15	青蕃基盘小布	

⁵² [清]徐松《宋会要》，职官四四，市舶司，《续修四库全书》（779），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页511-514。

⁵³ 青斑布，即青斑布。宋代时以石灰豆浆为染剂，染成的蓝白印花布。

⁵⁴ 广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元大德南海志残本》，广州人民出版社，1991，页44。

⁵⁵ 此青基盘布很可能是海南地区的产物。

⁵⁶ 襪，即袜。

三、爪哇地区与中国的布帛贸易

（一）中国与爪哇的交通

印度尼西亚是东南亚最大的国家，⁵⁷ 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群岛国家。位于苏门答腊西南的爪哇岛，是今天印度尼西亚的重要组成部分。爪哇在历史上曾经是印度化极深的古国，后来再接受伊斯兰文化的洗礼。爪哇地区在文化上，除了深受印度化、伊斯兰化影响，也受中国文化的熏染。爪哇与中国的交通往来甚早，唐代以前的文献称爪哇区为“诸薄”，⁵⁸ 唐代时称“诃陵”，⁵⁹ 宋代时则称为“阇婆”，至于“爪哇”之名元代时才出现于《岛夷志略》。⁶⁰ 明代随郑和下西洋的中官（太监）马欢，⁶¹ 在其《瀛涯胜览》“爪哇国”载曰：爪哇国者，古名阇婆也。⁶²

诃陵国在唐太宗贞观（627–649）年间便入贡中国。之后于大历（766–779）、元和（八年，813）、大和（827–835）、咸通（860–874）时，分别来朝。⁶³ 北宋建立后，阇婆国于淳化三年（992）遣使入贡宋廷。《宋会要》番夷：

阇婆国

太宗淳化三年八月，⁶⁴ 明州言阇婆国遣使乘大船求贡方物。其使自言，中国真主声教所被，本国航海修贡，十二月其使陀湛，副使蒲蘼里，

⁵⁷ 印度尼西亚独立于1945年，此前西方列强将东南亚的荷属、英属岛屿群通称为“东印度”（East India）。

⁵⁸ 《太平御览》卷七八七引《外国传》，见许云樵《南洋史》，星洲世界书局，1961，页102。

⁵⁹ 《唐书》卷二百二十二下：诃陵，亦曰杜婆，曰阇婆，在南海中。详见[宋]欧阳修、宋祁《唐书》（五），中华书局，1999，页4778。

⁶⁰ [元]汪大渊，苏继庠校释《岛夷志略》，中华书局，1981，页159。

⁶¹ 马欢，字宗道，生卒年不详，浙江绍兴人。

⁶² [明]马欢，冯承钧校注《瀛涯胜览》，中华书局，1955，页7。

⁶³ [宋]欧阳修、宋祁《唐书》（五），中华书局，1999，页4779。

⁶⁴ 阇婆国淳化三年入贡宋廷的记载，尚见于赵汝适：《诸蕃志》“阇婆国”：皇朝淳化三年复修朝贡之礼，以及《宋史》卷四百八十九“外国五”“阇婆国”，当皆源自于《宋会要》“蕃夷”“阇婆国”所载之文字。

判官李陀那⁶⁵假澄等至阙下。其贡物：象牙十株、真珠二斤半、杂色丝绞三十六段、吉贝织杂色绞五十六段、檀香四千四百二十三斤、玳瑁檳榔盘二面、犀牙金银装霸剑十二口，藤织花簟席四十领、白鸚鵡一、杂色绣花销金丝绞八段、七宝檀香亭子一。⁶⁶

《宋会要》记载的阁婆国，即中爪哇的马打兰王国（Mataram, 732–1006）。阁婆国于淳化三年派遣的贡使是经过六十日的航程，才航抵明州，明州市舶司张肃在安置贡使后，即上奏朝廷，谓阁婆使节的服饰穿着与波斯商贾相类。⁶⁷除了阁婆国王所贡之方物外，阁婆国的正使个人还进贡大玳瑁六十七斤、藤织花簟席二领、丁香十斤、白龙脑五斤。⁶⁸据《宋史》载，阁婆国于大观三年（1109）再遣使入贡。

除了官史，南宋淳熙年间，周去非（1135–1189）《岭外代答》阁婆国：

阁婆国，又名蒲家龙，在海东南，势下，故曰下岸。广州自十一月十二月发舶，顺风连昏旦，一月可到。⁶⁹

又宝庆元年，赵汝适《诸蕃志》阁婆国：

阁婆国又名莆家龙，于泉州为丙巳方，率以冬月发船，盖籍北风之便，顺风昼夜月余可到。⁷⁰

上揭，两宋时期中国东南沿海的明州、泉州及广州之舶商，皆有与爪哇地区交通贸易。由于始发港不同，航程稍有不同。然而舶商一般都趁年末东北风启航。赵汝适在《诸蕃志》曾有“汝适被命以来，暇日阅诸蕃图”之语。可惜

⁶⁵ 音那，原文冉字从耳。

⁶⁶ [清]徐松《宋会要》，蕃夷四，阁婆，《续修四库全书》（786），上海古籍出版社，页320。

⁶⁷ [清]徐松《宋会要》，蕃夷四，阁婆，《续修四库全书》（786），上海古籍出版社，页320。

⁶⁸ [清]徐松《宋会要》，蕃夷四，阁婆，《续修四库全书》（786），上海古籍出版社，页320。

⁶⁹ [宋]周去非，杨武泉校注《岭外代答》阁婆国，中华书局，1999，页88。

⁷⁰ [宋]赵汝适，杨博文校释《诸蕃志》，中华书局，1996，页54。

此“诸蕃图”并没流传下来。⁷¹ 只是我们依然可以在宋代地理文献《历代地理指掌图》⁷² 中的〈古今华夷域区总要图〉中，看到南海诸蕃的“阇婆”（爪哇）、“三佛齐”（苏门答腊）、“注辇”（印度）等国的标识。⁷³



图1：〈古今华夷域区总要图〉之阇婆、三佛齐、占城与注辇

⁷¹ 过去学界在谈论海外交通文献中，认为现存的海图年代不早于郑和航海图。

⁷² 关于《历代地理指掌图》的著者说法不一，有税礼安、苏轼或著者不详等说法，见曹婉如《历代地理指掌图研究》，曹婉如等《中国古代地图集》（战国—元），文物出版社，1990，页31-34。

⁷³ 《历代地理指掌图》，〈古今华夷域区总要图〉，收录于《续修四库全书》（585），上海古籍出版社，页473。

（二）爪哇冠服与纺织文明

除前述《宋会要》载北宋淳化三年时明州市舶司上奏朝廷，记述阁婆国贡使的穿着服饰与大食国相似外，南宋《诸蕃志》对于阁婆国贵族及百姓的冠服及穿着记述道：……其王椎髻，戴金铃，衣锦袍，蹑革履，坐方床……土人被发，其衣装缠胸，下至于膝。⁷⁴ 另外蕃商为躲避市舶司严查非法到非法往爪哇贸易，谎称前往苏吉丹（实际上也是爪哇地区）的情况则载：

……苏吉丹即阁婆之支国……其王以五色布缠头，跣足。路行蔽以凉伞，或皂或白，从者五百余人，各持鎗、剑、镖、刀之属。头戴帽子，其状不一，有如虎头者，如麓头者，又有如牛头、羊头、鸡头、象头、狮头、猴头者，旁插小旗，以五色绢为之。又：……土人男剪发，女打髻，皆裸体跣足，以布缠腰。⁷⁵

元《岛夷志略》爪哇：……男子椎髻，裹打布。⁷⁶明代初年时，马欢《瀛涯胜览》“爪哇”曰：

……国王之辮，髻头，或带金叶花冠，身无衣袍，下围丝嵌手巾一二条，再用锦绣或紵丝缠之，名曰压腰，插一把短刀，名不刺头。……国人之辮，男子髻头，男子椎髻，上穿衣，下围手巾。男子腰插一把不刺头。

上述记载是欧洲列强东来前，中国文献对爪哇地区贵族与百姓服饰的记录，大多皆为亲睹亲闻。今天爪哇地区人民的传统冠服，与宋、元、明文献所载，大致相似。⁷⁷ 关于爪哇的纺织技术，赵汝适《诸蕃志》“阁婆国”曰：……亦务蚕织，有杂色绣丝、吉贝、绫布……⁷⁸

⁷⁴ [宋]赵汝适，杨博文校释《诸蕃志》，中华书局，1996，页54-55。

⁷⁵ [宋]赵汝适，杨博文校释《诸蕃志》，中华书局，1996，页55，60-61。

⁷⁶ [元]王大渊，苏继庠校解《岛夷志略校释》，中华书局，1981，页159。

⁷⁷ Kraton Jogja, *The History and Cultural Heritage*, Karaton Ngayogyakarta hadiningrat tahun, 2002, pp. 156-171.

⁷⁸ [宋]赵汝适，杨博文校释《诸蕃志》，中华书局，1996，页9。

前述北宋淳熙三年时，已经向中国进贡不同质地与工艺的纺织品，其中包括以木棉纺织的“吉贝织杂色绞”，以丝绸纺织的“杂色丝绞”，以金线纺织的“杂色绣花销金丝绞”。《宋会要》亦载，阁婆初次入贡北宋之前的乾德四（966）七月，南唐李后主曾向北宋上报，⁷⁹ 占城国向其入贡的贡品种类和数量，揭露占城所入贡的布帛，除了自身所产，还包括来自（贸易）阁婆的纺织品。⁸⁰ 其中上贡的阁婆纺织品称为：阁婆马礼偃鸾国⁸¹ 古幔（一段）、阁婆沙剌⁸² 锦绣古幔（一段）。名称中的“哥幔”与“古幔”，实为相同，即更早文献中所载的“干曼”、“干漫”或“敢幔”同。《梁书》卷五十四“诸夷”：林邑⁸³ ……男女皆以横幅吉贝，绕腰以下，谓之干漫，亦曰都幔。⁸⁴

“干幔”一词当源自印度，东南亚许多民族围于下半身的衣着泛称，通称“围幔”。今天巴厘岛人民依然称其衣着为Kamben。⁸⁵ 足见宋代时爪哇地区的人们，已经掌握相当精湛的纺织技术，才能生产上述不同材质（蚕丝、木棉）与工艺（绞缬⁸⁶、织金、绣花）的布帛，并且作为贡品让使节携往宋廷。

《岛夷志略》记述，爪哇地区至少有四个重要的纺织产地，以至于中国舶商以当地地名来记述其生产的布帛名称，这四个布帛名称分别是：阁婆布、巫仑布、斯吉丹布、八节那间布。这四种布料运销的地点，涵盖东南亚及印度各地区（见表5）。

⁷⁹ 《诸蕃志》“大食国”亦载此事。[宋]赵汝适，杨博文校释《诸蕃志》，中华书局，1996，页91。

⁸⁰ 占婆和爪哇于8世纪，便有密切的文化交流，见[英]D.G.E.霍尔，中山大学东南亚研究所译《东南亚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82，页236。

⁸¹ 马礼偃鸾国，当为音译地名，应该是位于爪哇地区，然方位不详。

⁸² 沙剌，当为音译名称，究竟是指地名或材质？不详。

⁸³ 林邑，越南中部的古国。

⁸⁴ [唐]姚思廉《梁书》卷五十四，列传第四十八，“诸夷”，中华书局，1999，页545。

⁸⁵ Fred. B. Eisman, “Bali: Sekala & Niskala”, in *Essays on Religion, Ritual, and Art, vol. 2: Essays on Society, Tradition, and Craft*, Periplus Editions, 1995, pp. 220–230.

⁸⁶ 即扎染（tie-dye）。

表5：《岛夷志略》爪哇地区生产的布帛运销地点

爪哇地区布帛名称	运销地	舶商与贸易的布料种类
阁婆布	民多郎	阁婆布、红绢、青布
	彭坑	诸色绢、阁婆布
	假里马打	阁婆布、八度刺布
	麻呵斯离	刺速斯离布、阁婆布
巫仑布	戎	巫仑布
	苏洛隔	海南、巫仑布
	苏门傍	巫仑布、紬绢衣、花色宣绢
	文老古	水绫、丝布、巫仑、八节那润布
	勾栏山	巫仑布、五色绢、青布
	班达里	诸色绢
	加将门里	苏杭五色绢、南北丝、土紬绢、巫仑布
斯吉丹布	哩伽塔	五色绢、巫仑布
	苏门傍	巫仑布、紬绢衣、花色宣绢
八节那间布	文老古	水绫、丝布、巫仑、八节那润布
	高郎布	巫仑布、八丹布

（三）从中国古代染缬历史看爪哇蜡染

古代中国对先织后染的技术称为“染缬”。“染缬”又分为“绞缬”、“腊缬”、“夹缬”与“灰缬”。“腊缬”也称为“臙缬”，此种染布技法汉代已见⁸⁷，唐代时极为盛行，当时无论是贵族或寻常百姓，常以蜡染印花布料为服饰。在吐鲁番出土的文书中，即有唐代蜡染纺织品的记述文字：“缬紫红小缬袂裙（蜡染双层裙子）：一百五十文”、⁸⁸“破被五张，内二夹缬……”⁸⁹唐代孙棨⁹⁰《北里志》载，长安宣阳里有“采缬铺”，专业生产染缬。⁹¹从考古发现的唐代各种文物上，都能看到染缬织物的踪影。例如丝

⁸⁷ 武敏《织绣》，幼狮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2，页142。

⁸⁸ 李明伟等《丝绸之路贸易史》，甘肃人民出版社，页438。

⁸⁹ 唐长孺《吐鲁番出土文书》[肆]，文物出版社，1996，页240。

⁹⁰ 孙棨，字文威，唐僖宗（862–888）时人。生卒年不详。

⁹¹ 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商务印书馆，2020，页308。



织品、⁹² 绘画、三彩陶瓷。日本正仓院还藏有传世的唐代印花织物，包括以腊缬与夹缬制成的屏风。⁹³ 宋代时，开始以石灰豆浆为染剂，制成“药斑布”（即后世的蓝白印花布），由于成本较低，逐渐取代唐代时的腊缬。⁹⁴ 《古今图书集成》引苏州地方志载：“药斑布——以布抹灰药而染青，候干，去灰药，则青白相间，有人物、花鸟、诗词各色，充衾幔之用。”1987年，贵州平霸县棺材洞出土了一套精美的宋代“鹭鸟纹蜡染加绣棉布”裙子和上衣，说明中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蜡染布历史之悠久。⁹⁵

今天我们熟悉的爪哇峇迪（Batik）蜡染印花布究竟起源于何时？学界看法不一。⁹⁶ 中国文献透露爪哇地区人民很早便掌握织染技术，《太平御览》引三国《吴时外国传》曰：诸薄国女子作“白叠华布”。⁹⁷ 所谓“华布”，即花布。如果此“白叠华布”即白地印花布，则爪哇的印染花布的历史，竟有一千五百年之悠久。南宋时，爪哇地区曾从中国进口朱砂，作织染用途，《诸蕃志》“苏吉丹”：……蛮妇搽抹，及妇人染指甲衣帛之属，多用朱砂。故蕃商兴贩，率以二物为准。⁹⁸

元代汪大渊《岛夷志略》明确记录，爪哇土产“极细坚耐色印布”。⁹⁹ 同书还记载有一地区叫“八节那间”，并称此地“花印布不退色”。¹⁰⁰ 八节那间（宋代时称为莆家龙）即今天中爪哇北岸北加浪岸（Pekalongan）的地名音

⁹²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文物出版社，1991，页185–186。

⁹³ 李斌城《唐代文化》（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页368–369。张道一《夹缬》，汉声杂志108期，汉声杂志社，1997，页24–31。

⁹⁴ 张炳德等《贵族传统蜡染》，刘雍〈贵州传统蜡染散论〉，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

⁹⁵ 黄能福等《中华服饰：七千年艺术巨作》（下卷，宋—民国），枫树林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18，页33。

⁹⁶ Wanda Warming, Michael Gaworski, *The World of Indonesian Textiles*, Kodansha, 1991, pp. 143–145.

⁹⁷ [宋]李昉，夏剑钦等校点《太平御览》（第七卷），卷第八百二十，布帛部七，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页635。

⁹⁸ [宋]赵汝适，杨博文校释《诸蕃志》，中华书局，1996，页60–61。同书“阁婆”亦载进口中国朱砂，见页55。

⁹⁹ [元]王大渊，苏继庠校释《岛夷志略校释》，中华书局，1981，页159。

¹⁰⁰ [元]王大渊，苏继庠校释《岛夷志略校释》，中华书局，1981，页138。



译。¹⁰¹ 历史上北加浪岸是爪哇蜡染布的生产重镇。¹⁰² 前揭，北加浪岸的印花布在宋、元时早已远近驰名。无论是阁婆使节进贡宋廷的“杂色丝绞”，或是八节那间的“花印布”，都说明爪哇的织染技术在宋、元时代已达至一定水平。

清代前，文献未见爪哇华人投入参与织染的文字记载。直至清乾隆时，才见爪哇当地的华人文献《公案簿》中，记述当时华人参与蜡染生产，并将印制“峇迪”蜡染布，称为“印猫泽”。¹⁰³ “猫泽”即“峇迪”的音译。19世纪初，莱佛士在巨著《爪哇史》里对爪哇地区的纺织，峇迪布的生产与染色技术，有极为细腻的描绘。¹⁰⁴ 当时所见爪哇蜡染布的花式种类多达一百多种。19世纪初，爪哇峇迪蜡染的工序中有一部分必须由中国染匠完成的。¹⁰⁵

19世纪初，英国传教士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 1796–1857）在巴达维亚传教时，撰写了《咬留¹⁰⁶吧总论》，内容关于爪哇地区的风土民情及当地华人概况。其中有两段关于华人纺织与染布作业的文字记载：

【织布】且世人之工，多在为衣之事，盖若无衣，一则伤寒，一则畏耻。所以免不得用心费工，以蔽身体也。但为衣多用羊绵，狐裘、蚕丝、棉花之属，惟在吧地无甚绵羊，而其绵未成先落。又在爪哇，桑树不多生，故蚕虫不养，紬缎无成，并在彼处热地，不出皮裘，所以只剩棉花，百姓可以赖以为衣也。棉花熟挽后，则撙之在两条长圆木之中，令子核尽出，棉花洁净，则围之在木上，待已纺线，一斤棉花用工半月，则可成三把粗线，此线煮后，可用以织布，而四日可成布也。其纺车、机杼、梭子，俱如中国所用一般无异，惟吧地纺线织布，只妇女做，凡富贵贫贱，皆代父兄织布为衣也，且凡纹彩之布，有两样做法，一织布时参五色之线，成在一疋，令其纹彩。一织布后，则染之各色也。

¹⁰¹ [宋]赵汝适，杨博文校释《诸蕃志》，中华书局，1996，页56。

¹⁰² Lee Chor Lin, *Batik-Creating and Identity* (蜡染), National Museum of Singapore, 2007, p. 70.

¹⁰³ [荷]包乐史，[中]吴凤斌《18世纪末吧达维亚唐人社会》，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页58。

¹⁰⁴ Thomas Stamford Raffles, *The History of Jav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pp. 168–169.

¹⁰⁵ “Singapore”, *Singapore Chronicle and Commercial Register*, 8 May 1828, p. 1.

¹⁰⁶ 原文作异写，从口。



【染布】夫在吧地，多人作染布之事。盖爪哇百姓大小富贫，最厌白布，而喜着五色之衣服，所以染布之事常有矣。若染一色，或乌或红，其工为易，但若染各色交参，其工尤难，恐每色不明，而糊涂耳。故爪哇人欲染纹采之布，其先把白布浸在米水，用石研平，则以热蜡盛罐，而自罐嘴斟蜡在布上，画花纹彩，照其格式，在凡不要着色之处，蜡放后则染之，或赤、或蓝，染毕则浸滚水去蜡，而在放蜡在凡已染之处，以致复染之红，所以布成各色。此法名曰：吧喲法，虽漫而费劳，但其色久耐，不至易失也。且爪哇人用数样物为染布之材，即若染蓝，就用青黛，上回所述者，又若染乌，就用梦吃菜之皮，先开红赤，但既抹在物上，则变乌耳，若染红，就用一样树根，名曰梦咕啞树，此木甚红，搗后煮熟则用之也。至于黄色有一样，黄□，或波罗蜜皮，可来染黄矣。¹⁰⁷

《咬留吧总论》的内容虽然有不少来自莱佛士于1817年的《爪哇史》，但以中文书写，则弥补了中文文献的不足，为华人移民在爪哇地区的织染历史，留下了珍贵的文字资料。

小结

宋、元文献揭露爪哇的朝贡使节及中国蕃商，各携带不同种类的布帛进行海上贸易。事实上，南海贸易的布帛种类或远比文献记载多，只是文人在记述时选择重点描述。华人移民爪哇甚早，其投入当地纺织业的历史是否和流寓同步，尚无文献佐证。然而直至近代，包括爪哇在内的东南亚各地，皆进口、并仰赖中国生产的生丝及金线，用于纺织。

就冠服文明、纺织技术与贸易市场而言，爪哇地区的织染，影响马来世界（尤其是马来半岛）颇深。学界对爪哇蜡染的肇始及滥觞，大多聚焦于欧洲殖

¹⁰⁷ 尚德者纂《咬留吧总论》，第七回，页三十六-三十八。原载于麦都思1823年在巴达维亚编撰的期刊《特选撮要每月纪传》内。此两段关于19世纪爪哇华人移民的织染概况文献，虽然已经距宋元时代久远，但对于华人将织染技术传入爪哇的历史，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因此略述于文末。



民主义者东来后，尤其是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东印度地区的贸易兴盛时期。¹⁰⁸ 无可否认，阿拉伯¹⁰⁹ 及东南亚许多地区，是印度胡茶辣（今天印度西北部的古吉拉特邦，Gujarat）布料的主要销售地，尤其是爪哇地区的纺织及服饰，深受印度文化艺术的影响。贸易及文化交流是交叉的，爪哇地区历史上也接受中国及阿拉伯文明的熏染。

由于纺织物不易保存流传，西方学界尝试解读爪哇地区出土的宗教雕塑作品，从塑像的衣着雕刻，寻求爪哇布帛的艺术风格及源头，并提出由于爪哇地区长期流通中国古代铜钱，织染艺术受此影响，产生一种圆形方孔（方孔钱）的重叠图案，成为爪哇布帛常见的经典纹饰。¹¹⁰ 在中国本土，铜钱纹饰则常见于包括纺织品在内的中国历代器皿和文物。

十五世纪满刺加王朝（马六甲，Malacca）兴起前，马来半岛以南最大的古代帝国分别是以苏门答腊为中心的三佛齐和爪哇的阇婆。而自古以来，这两个地区早已形成海上丝绸之路的东南亚贸易圈，马来半岛与新加坡是其重要的一环。中外布帛贸易的重要性，不亚于香料与陶瓷，然其中文文献记载，却也是较少被关注的。

¹⁰⁸ John Guy, *Woven Cargoes- Indian textiles in the East*, Thames and Hudson, 1998, pp. 77–119.

¹⁰⁹ [宋]赵汝适，杨博文校释《诸蕃志》，中华书局，1996，页72。

¹¹⁰ Lesley S Pullen, *Patterned Splendour- Textiles Presented on Javanese Metal and Stone Sculptures Eighth to Fifteenth Century*, ISEAS, 2021, p. 5.

从民间祠庙到佛寺： 新加坡佛教的制度化过程

纪赞*

摘要：早期新加坡华人多来自华南沿海，此地域近代宗教民间祠祀繁盛，又与佛、道教合流，呈现出以制度性佛道教为上层与民间宗教为底层的多元复杂状态。再加上新加坡早期的社区族群自治，故僧侣最早多在不同方言族群的基层自治组织——坟山、义冢、祠寺中扎根。此文即从碑刻铭文的考察中来研究早期僧侣的生存与修行状态，并比较其与传统僧院僧人的重大区别。此文还同时还考察新加坡制度性寺院的建立过程，以及它对于新加坡佛教史发展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民间佛教、新加坡、佛教制度、双林寺

* 纪赞，新加坡佛学院副教授，教务主任，图书馆馆长。电邮：jiyun@bcs.edu.sg

新加坡民众具多种族、语种、族群与宗教的特点，但其治理颇为有效。¹ 由于本地人口中华人一直占据了主导，因此汉传佛教就始终是新加坡华人的主要信仰之一。² 通过本文的研究可以发现，新加坡的佛教信仰明显呈现逐步制度化、规约化，也即由早期较为普遍的功能性的求神拜佛向教义教理与制度性佛教迈进的过程。

一、新加坡汉传佛教的特点及研究方法论

（一）新加坡汉传佛教的特点

新加坡华人主来自华南沿海，尤其是闽南地区。此地之近代宗教一方面民间祠祀繁多，又与佛、道教合流，呈现出以制度性佛道教为上层与民间宗教为底层的多元耦合状态。³ 其原因，一方面固然与东南沿海地区的社会文化历史相关，另一方面则又与航海中无法预料的危险有关。故而，宗教就成为了东南亚华人离散社群，也包括新加坡华人的重要精神慰藉之一。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近现代华人社会的基层自治组织，其较为重要的构成因素就是血缘、地缘、业缘与信仰。作为海外移民离散社会的新加坡的华人宗教信仰，由于其历史文化上的遗产，再加上南方沿海地区民众信仰的特殊性，因此也就具有非常鲜明的地域性特征，即其与华人社团、基层自治与华人的底层治理皆有明显的关系；并且，也同殖民地统治下的民间治理政策有关。

¹ 王文钦：《宗教和谐与民族团结——新加坡宗教文化和宗教政策刍议》，《世界宗教文化》，1997年第1期，第30–35页；王学风：《新加坡宗教和谐的原因探析》，《东南亚纵横》，2005年第9期，第53–56页。

² 关于新加坡与马来西亚两地北传佛教徒占据总人口的比例可参白玉国：《马来西亚华人佛教信仰研究》，成都：巴蜀书社，2008年，第45页，附表1。其中提到新加坡北传佛教徒比例高于40%。而据许源泰：《沿革与模式：新加坡道教与佛教与佛教传播研究》，新加坡：八方文化创作社，2013年，总序页xii，汉传佛教信仰于2000年占总人口的42.5%，2010年则降至33.3%。

³ 彭维斌：《从百越巫鬼信仰到汉式佛道宗教——闽南民间信仰历史变迁的分析》，《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第251–256页。



首先交待东南亚汉传佛教发展的社会背景，也即南洋地区的近代华人社会。整个东南亚的华人移民，经历了几次大的移民潮。至十七世纪中叶约达十万人，并形成了数十个聚居点；至鸦片战争前，已达一百五十万人左右；此后又有数百万契约华工与移民移居东南亚，至上世纪四十年代，东南亚华人华侨人口总数已达八百万。⁴而现在，整个东南亚华人华侨人口则有约两千万，占本地区人口的百分之一，也占全世界海外华人总数的八成，⁵这实在是一个无法忽视的巨大存在，故对于本地区汉传佛教的研究，即极具重要性。

就新加坡而言，以距今整整二百年的新加坡的开埠者——英国殖民官员莱佛士（Thomas S. B. Raffles, 1781–1826）为先导，让这座小港跨入了现代化与国际化的快车道。莱佛士从一开始就制定了间接领导本地社群的行政管理模式，即将华人依照方言来进行划分，并各任命一人为头人。这也沿袭了早前荷兰殖民者的华人“甲必单”制度。⁶尤其是在1824年英国与荷兰瓜分东南亚的协议生效，英国占领马六甲（Melaka）并废除“甲必单”制度之后是如此。华人社会转而将基层领导权转到了以“恒山亭”、“青山亭”为代表的自发的坟山组织，让华人自行选举“客长”，以行使“甲必单”的治理职权，称为“亭主”。

这些以方言来区分的帮群，其头人领袖不但具雄厚财力，且愿意出钱以行公益，从而成为诸多善事的缘首，他们更成为了新加坡基础治理结构的龙头。⁷并且，在某种意义上，这也造成了整个早期新加坡私会党横行的局面。在很大意义上，如果我们翻检新加坡纵贯十九世纪前后的社会史，我们所看

⁴ 庄国土：《论东南亚的华族》，《世界民族》，2002年第3期，第42页（全文：37–48）。

⁵ 张禹东：《试论东南亚华人宗教的基本特质》，《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7年第1期，第26页（全文：26–32）。

⁶ 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的甲必单，可参吴佩珊：《英殖民政府对吉隆坡华人事务管理——从自治至法治的转变（1868–1914）》，台北：国立中央大学博士论文，2012；Lohanda, M., 1996. *The Kapitan Cina of Batavia, 1837–1942: A History of Chinese Establishment in Colonial Society*. Djambatan; 更为广泛的社会背景研究则可参Yen, C.H., 1986.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and Malaya, 1800–1911*.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⁷ 陈荆和、陈育崧编纂：《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香港：香港中文大学，1971年），第5–6页。



到的是一部以方言、血缘为纽带的各派地下社会纷争以攫取经济利益、政治地位乃至社会声望的历史，一种相当失控、蛮野而又自然有序的民间自治情况。⁸ 如果我们失去了此一社会学上的敏感性，则同样很难把握整个新加坡宗教，也包括佛教的发展史。

这些帮群组织的坟山义冢非仅传统意义的公益组织，而是具“治理权力”的民间自治机构。以福建帮的坟山组织“青云亭”与宗教组织“天福宫”为例，它们就具有支配新马地区福建帮群的权力，只有经它颁发的婚书，才是合法的婚配；天福宫大董事可以禁止福建女子为娼；他们还可以建立学校；统一丧葬与全年的祭祀。⁹ 这都使其在民间具有了若干政府才具备的管理职能。

我们还应注意，新加坡的早期宗教就主要受到了这些富商、侨领个人意志与决心的重大影响。这种情况，甚至到了1911年民国之后也依然如此，我们从太虚大师（1890–1947）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访问新加坡的全过程之中，也同样可以发现这一重要特点。即佛教的传播路线至少到了此时，主要是经由社会中上层、地方闻人（尤其是华人富商）与帮群组织（尤其是坟山、宗乡会馆、商会组织等）在推动。¹⁰ 换言之，我们在研究新加坡的佛教发展现象时，就应该注意其中操不同方言的帮群组织的“帮权”通过慈善行为、宗教设施的设立从而凭借“神权”以构建“绅权”的现实。¹¹

因此，就总体而言，本研究也将较为关注从碑刻铭文反映出来的新马本地的神权、绅权的互动，以及在此一过程之中，作为神职人员的僧尼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角色转变。

⁸ 可以参考 Song Ong Siang, *One Hundred Years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及其汉译本宋旺相著，叶书德译：《新加坡华人百年史》（新加坡：新加坡中华总商会，1993）二书之中的各处，关于私会党（地下黑社会组织）的章节是很长时间永恒的主题，而地方名流也往往具有多重社会身份，我们很难将不少社会上层与群氓之首作一个截然的区分。

⁹ 陈育崧：《石叻古迹序》，收于林孝胜等著：《石叻古迹》（新加坡：南洋学会，1975年），页ii。

¹⁰ 纪赞：《旧材料、新视角：新加坡本土报章中的太虚》，王颂主编，《北大佛学》，2018年第1辑，第60页（全文：20–60页）。

¹¹ 陈育崧：《石叻古迹序》，页i–ii。



（二）学术史回顾与研究方法论

东南亚碑刻铭文的拓荒者为饶宗颐（1917–2018），他在六十年代末开始编纂《星马华文碑刻系年》，¹² 此篇长文之成就乃是通过碑刻史料，开拓性地梳理了东南亚华人南迁过程之中重要的若干史实。此后最为重要的成果是陈荆和、陈育崧编纂的《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香港：香港中文大学，1971）。这不但是首部新加坡本地的碑刻总集，共收录了上自1830年，下迄二战的新加坡本地庙宇、会馆、公冢、宗祠、书院、医院、墓志铭附题赞、教会与纪念碑等九类碑铭共119件，而且在理论建设上有非常重大的突破。它通过实证来阐述了碑铭与新加坡华人历史研究之间的关系，认为东南亚华侨社会的特质就是帮群，各种帮群之间关系既合作又冲突，而这也正是研究碑刻的史料价值所在。¹³ 在此基础上，麦留芳等又同样利用碑铭材料继续推动星马地区帮群的研究。¹⁴

此类碑刻搜集近年最为重要的成果是丁荷生与许源泰《新加坡华文铭刻汇编：1819–1911》的结集与出版。¹⁵ 此书的重要特色在于首先它是一部中英双语的著述，便于更大的读者群参阅；其次，此书中彩图与录文并行，也便于考校；第三，其收罗也广，远超前贤，共收录了一千二百多种铭刻文物。

¹² 饶宗颐：《星马华文碑刻系年（纪略）》，新加坡：新加坡大学中文学会，1969年；又刊为饶宗颐：《星马华文碑刻系年（纪略）》，《书目季刊》，1970年卷五第二期，第3–33页；今引于饶宗颐：《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卷七《中外关系史》，第583–677页。

¹³ 特别见此书第23–25页。

¹⁴ 麦留芳：《方言群认同：早期星马华人的分类法则》，台北：中央研究民族学研究所，1985年；庄钦永：《新加坡华文铭刻集录初编》，收于庄钦永：《新加坡人史论丛》，新加坡：亚洲学会，1986年，第154–190页；林孝胜：《十九世纪新华社会的帮权政治》，收于林孝胜：《新加坡华社与华商》，新加坡：亚洲学会，1995年；张晓威：《十九世纪槟榔屿华人方言群社会与帮权政治》，《海洋文化学刊》，2007年第3期，第107–146页；张晓威：《甲必丹叶观盛时代的吉隆坡客家帮权政治发展（1889–1902）》，《全球客家研究》，2017年第9期，第159–182页。

¹⁵ 丁荷生、许源泰：《新加坡华文铭刻汇编：1819–1911》，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出版社、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两卷本。



故而，此书就就为本文，自然也包含今后新加坡的碑铭文献研究奠定了一个极其坚实的基础。

二、从坟山到双林寺：发展轨迹的考察

（一）早期南洋网络中的佛教与僧人

以新马为代表的东南亚地区，至少在十八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叶的殖民时期，香火庙还是本地宗教信仰的主流，信徒也主要是抱着求神拜佛庇佑的世俗心态，而并不特别热衷于佛教教义教理的追求。过去学界对此，已有若干研究与共识，¹⁶ 在此则利用碑铭材料作更为全面的考察。

1. 早期僧人寄居坟山、民间庙宇为新马之常例

新加坡早期民间社会的整合，最重要的科层结构就是坟山组织、宗亲会馆与各行业公会。而在这类坟山组织以及民间庙宇之中，佛教中正式出家的和尚与僧人或者在家职业居士则是常见的宗教执事人员。

早在乾隆六十年（1795）马六甲三福山义冢《建造祀坛功德碑记》中最后一行就有署名“乾隆六十年岁次己卯桐月开元寺僧昆山全募建”。¹⁷ 开元寺乃盛唐时官方所勒修官寺统一之名，¹⁸ 后各地虽迭遭易名，故并无其他辅助材料可供参考，然此开元寺最为可能者为泉州之开元寺，为漳泉福建移民之传统来源地故也。另外泉州开元寺与新加坡联系之深切，为民国佛教之一大容易为学界忽视又极其重要之现象。后文还会涉及到的与双林寺创建与早期历史甚有牵连之泉州南安僧人转道（1872–1943），此人可以真正称为新加坡现代佛教的奠基人，也曾于1923年从新加坡返回福建重建开元寺，并同时开设大量慈善机

¹⁶ 可参1850年之《建立天福宫碑记》，饶宗颐：《星马华文碑刻系年（纪略）》，第626页。又参王琛发：《马来西亚客家人的宗教信仰与实践》，吉隆坡：马来西亚客家公会联合会，2006年，第133页；许源泰：《沿革与模式：新加坡道教和佛教传播研究》，第104–105页。

¹⁷ 王琛发：《远去的菩萨身影：论清代的马来亚汉传佛教》，收于郭莲花、梁秋梅编：《回顾与前瞻：马来西亚佛教》，雪兰莪：马来西亚佛教学术研究会，第48页（全文：第47–81）。

¹⁸ 聂顺新：《开元寺兴致传说演变研究——兼论唐代佛教官寺地位的转移及其在后世的影响》，《敦煌研究》，2012年第5期，第93–99页。



构，是民国时期漳泉地区佛教兴盛的重要推手。¹⁹ 此一条材料至少可见，至迟到十八世纪末叶，中国南方的僧人已经非常积极地参加到了新加坡本土的坟山组织之中，而且从其署名的方式来看，则肯定是其中一位重要的宗教师与帮群之精神领袖。数年之后，嘉庆六年（1861）撰成的《重兴青云亭记》碑之中，也有落款“僧悦成”，这也证明福建帮的领导机构——青云亭也有僧人进驻。²⁰

接下来就是，在这种坟山机构之中，僧人具体做什么？嘉庆六年（1801）的《蔡士章建宝山亭记》中，我们可以发现佛教僧人在此一网络中所承担的是祭司的角色。²¹ 此记之中提到，每年的收入之中，会“议定二十五文，付本亭和尚为香资；二十文交逐年炉主祭冢日另设壹席于禄位之前。”²² 这笔钱并不多，且明文规定为香火钱。这在另一方半世纪后的碑文中也能获得证实。据咸丰二年（1852）的《青云亭许永占立碑》，²³ 我们可以看到作为福建人总机关的青云亭，因有人在当时从事风险大（也利润高）的锡矿开采，故在承包前在佛案前许愿，在发财之后共集大洋一千六百元来还愿。这些钱用来建造房屋，并由青云亭主用来生利，利钱用作“佛”前的香火钱，以继续寻求“佛祖之威灵”的保佑。

稍晚道光二十五年（1845）《敬修青云亭序》中记载此亭过去曾有僧房设施。²⁴ 民间祠庙中有僧人进驻的情况还有比如清道光四年（1824）撰成的马来西亚檳城的《重建广福宫记》中还提到：“重建后进一座告成后，载祀列

¹⁹ 转道的传记可见于凌波：《民国高僧传续编》，台北：昭明出版社，2000年，第175–181页；释能度：《新加坡汉传佛教发展概述》，第15–158页。转道与太虚的关系，则见纪赞：《旧材料、新视角：新加坡本土报章中的太虚》，第37–40页。

²⁰ 可参王琛发：《远去的菩萨身影：论清代的马来亚汉传佛教》，第49页。关于青云亭的领导性功能，可参宋燕鹏：《世纪上半叶马六甲青云亭主领导权的式微与再造尝试》，《华人研究国际学报》，2013年第五卷第二期，第45–61页。

²¹ 饶宗颐：《星马华文碑刻系年（纪略）》，第609页。

²² 关于炉主与香炉在民间宗教之中的重要性，见 Schipper, Kristofer, “The Cult of Pao-sheng-ta-ti and its spreading to Taiwan: a case study of fen-hsiang,” in E. B. Vermeer ed. *Development and Decline of Fukien Province in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ies* (Leiden: Brill, 1990), pp. 397–398 (全文：397–416)。

²³ 陈荆和、陈育崧编纂：《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香港：香港中文大学，1971年，第8页。

²⁴ 傅吾康、陈铁凡：《马来西亚华文铭刻萃编（第一卷）》，吉隆坡：马来亚大学出版部，1982年，第245页。



圣之像于中，旁筑舍以住僧而整顿之。”²⁵ 广福宫算是本地域第二所华人庙宇，²⁶ 它首建于嘉庆五年（1800），²⁷ 此为重修。因为乃是广东、福建两省籍人合资修建，故名为“广福”。此时所祀者为观音佛祖，至新加坡光绪六年（1880）迁建新加坡时，易名为“广福古庙”，并改祀为齐天大圣。²⁸ 我们这里要注意的则是广福宫中需要别建僧舍，可见僧人作为宗教执事已成规模。

其他有僧人和尚寄居于民间观堂之中的例证所在多有。以下再略举数证以成其说。马来西亚槟城存有咸丰四年（1854）《西滨禅师墓石》，饶宗颐引《槟城散记》载：“道光年间，有和尚法名西滨禅师，曾留海珠屿大伯公庙祀奉大伯公。咸丰初圆寂，附葬大伯公坟下。”²⁹ 另此人据王琛发，则既称沙弥，又称禅师，加上圆寂时不用茶毗而用土葬，而且庙内不能免牲礼拜祭，故认为他所供奉者也是个香火庙。³⁰ 无论如何，此人虽未受具戒，但为佛教出家人则并无多少疑问。

又光绪五年（1879）《重建北极宫序》有“住持僧圆明”者。³¹ 北极宫，后改名为麟山亭，至今犹存。此宫（亭）乃是福建金门籍的义冢，其开创者为金门巨商李仕挺（？-1911），在上列《重建北极宫序》中，他独任大董事。此一民间祠庙/坟山组织之中也明显是由一位僧人来主持日常的宗教活动。

到了二十世纪之后，也即新加坡第一座具有排他性意义的正统佛教寺院——双林寺创立之后，民间寺庙与宗亲坟山机构中由僧人主持也还是常例。据民国二年（1913）《重建凤山寺碑记》载其中有“禅房”和“寺僧”³² 凤山

²⁵ 饶宗颐：《星马华文碑刻系年（纪略）》，第612页。

²⁶ 同前书，第611页。

²⁷ 或嘉庆四年，见颜清煌：《新马华人社会史》，北京：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1年，第11页：“早期建立的第二间华人寺庙是1799年建于槟城的广福宫。”

²⁸ 可参陈荆和、陈育崧编纂：《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第132页引《新建广福古庙戏台石碑记》；另参饶宗颐：《星马华文碑刻系年（纪略）》，第612页。

²⁹ 饶宗颐：《星马华文碑刻系年（纪略）》，第629页。

³⁰ 王琛发：《远去的菩萨身影：论清代的马来亚汉传佛教》，第55页。

³¹ 陈荆和、陈育崧编纂：《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第114页。

³² 同前书，第106页。



寺为福建南安籍族属的寺庙，其供奉的是广泽尊王，而与佛教无涉。除此之外，新马地区其他以僧人身份而寄身于民间庙宇之中的例证尚有不少，如马来西亚槟城天公坛就曾有过“住持释镜明”；曾经在马来西亚霹雳凤山寺、广福岩、新加坡凤山寺，并最后住持新加坡福建人的总机关天福宫与天公坛的达明法师，更是一位戒行清净的僧人。³³ 而民国初年一些重要的僧人也都曾经有过类似的经历，如泉州承天寺转尘法师曾住持过顺天宫；³⁴ 至于新加坡制度性佛教真正意义上的开创者转道法师，也曾担任过新加坡福建帮总机关——天福宫的住持，并且他在住持天福宫的同时，也是另外两所具排他性纯佛教寺院——普陀寺与普觉寺的创办与拥有者。³⁵

从上面的碑刻材料之中，我们就可以发现一个相当确定的宗教现象。即至少到民国期间为止，新马地区僧人而住持民间庙宇、坟山机构者极为普遍。至于其原因，固然可能与福建、广东地区民间宗教中佛道不分的现象有关；其他可能存在的原因则或许还包括新加坡本土基层治理方面的独特一面，即以方言、地域为划分的帮群组织具有地方自治的管理性职能，并且刻意地引入了佛教来作为宗教活动的执事。然而即使如此，我们固然在不少碑刻资料之中发现有做道教法事的行为存在，但为什么这些道士却远不如佛教的僧人、和尚活跃，则依然是我们未能回答的难题。

2. 在坟山组织与民间宗庙中僧人的职责：以经济为中心

(1) 日常收入

我们再看这些非传统佛教的组织之中僧人所担负的职责。在前面提到的广东福建二省跨越的组织——广福宫重修二十来年之后的1851年，曾任海峡殖民地各地官职的沃格姆（J. D. Vaughan）在访问广福宫（Kong Hok Koong）时，对其所见有过这样的描述：“这些附着于庙宇的神职人员（priest），就

³³ 王琛发：《远去的菩萨身影：论清代的马来亚汉传佛教》，第61–62页。

³⁴ 前引书，第64页。

³⁵ 纪赞：《旧材料、新视角：新加坡本土报章中的太虚》，第37–40页。



如在新加坡一样是福建本地人，人们自愿注册供养他们。他们每参加一场葬礼会收取一元，也向面对庙宇唱戏酬神的戏典表演收取一元。”³⁶ 沃格姆此处所说的神职人员，到底是否一定就是僧人则并未明说。但是，联系其他资料，则可大体断定广福宫的主祀当为僧人。此份材料之重要性在于，它以旁观者的角度向我们说明了当时僧人的经济情况，即除了庙宇的常例外，还会按法事来收取费用。

关于坟山组织之中僧人的具体职责，则有另外一份重要材料，即题为道光丙申（即道光十六年，1836）的《恒山亭重议规约五条》。³⁷ 此方碑铭对于恒山亭坟山中从事宗教活动的和尚的规定作了详细的描述。从中可知，此亭的和尚除了重大节庆的佛事活动之外，仍需管理坟山的日常维护。如果执行不力，则有被裁撤之危。也即其执事，更类似于一种雇佣关系。其次，在重要节庆之时，因为人员众多，故而还须严防其趁此时节在坟山开设临时性的赌场。自然，借助坟山的人气来开设鸦片烟馆牟利的和尚也会受到严惩。而就经济而言，每月的香资除了公款、房契收入之外，此碑还规定每月初一、十五等日要前往新加坡市区去募集，而来往的船只中凡是来自漳、泉的，也需要按船交纳。否则有船员死亡者，则不允许葬入坟山，这些皆需要和尚来加以控制。简而言之，除了宗教法事之外，在坟山组织之中，僧人还需要行使若干宗教之外的职责。

因此，我们大致可以总结出，从民间坟山组织与民间庙宇的管理模式来看，佛教僧人所扮演的角色类似于庙宇司祝的角色。因此其地位并不太高，而是受雇佣的宗教服务者，这一点就与正统寺院之中的僧人有着不小的区别。故而，在不少寺庙、坟山组织中有对于司祝职责的严格限定。除了前面提到的

³⁶ Vaughan, J.D., *The Manner and Custom of the Chinese of The Strait Settlements*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 58; 另外注意可参王琛发：《远去的菩萨身影：论清代的马来亚汉传佛教》，第53页中将其译为“这些在庙中的僧人，就如在新加坡的僧人一般是来自福建，亦是由集合的自愿捐献来支付他们。他们也靠赶经杆向每一场殡葬收取一元，以及对每一棚对着庙前表演的表演班子收一块钱。”王琛发直接是将priests译为僧人，此处我并非依从其译法，以免误导。

³⁷ 以上引自陈荆和、陈育崧编纂：《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第225页。



1836年恒山亭的规约之外，还比如清光绪七年（1887）的《金兰庙条规》，也规定司祝不能犯法、聚赌聚饮、抽鸦片。对于游方僧道的投宿暂住，都有严格的规定。³⁸

(2) 节日与法会

与中国传统的佛道教寺院组织一样，每年的重大节令则是举办崇拜活动，同时也获得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在这些坟山与祠祀组织之中，除了个人丧葬的忌日之外，比较重要的就同样是一些重要的节日。以恒山亭为例，其规约之中就特别提到了清明节、中元普渡与中秋佳节为三大最为重要的纪念节点。³⁹ 另外还有碑文记录“清明、重阳二节，绅商各界妇孺，车马络绎于途，争先恐后驰赴碧山亭者何止万人。”⁴⁰ 可见重阳节也同样会聚拢人气，而冬至、过年等其他时令则也同样会吸引人潮前往坟山、宗庙等组织之中拜祭。这种人气的聚集，自然就会带来相当不菲的收入，而其中僧人就担负了非常重要的职能。

这些节令固然重要，然而，更为重要者还是每年重要的集体超度亡魂的斋醮与法会。这种法会通常规模无比巨大，一般都会设僧道尼三坛诵经礼忏，参与者达上万人，故而，会给相关社群、机构带来不小的收益。以1923年“第一届碧山亭万缘胜会”为例，⁴¹ 这次法会中的神职人员涉及到了佛道二教，规模盛大，而且时间也长达一周。而在1943年碧山亭的另外一次重阳节时的法会之中，我们依然还是可以发现同样的介绍。⁴² 在碑文之中，还详细罗列了这次法会的收支情况，即共收款九万七千九百四十九元八角，而除了各项支出之外，还剩下六万三千三百九十六元二角七分，这些完全支付给了碧山亭。我们可以

³⁸ 陈荆和、陈育崧编纂：《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第56页。又此一条规的内容，在另外一部撰于十年后的《玉皇殿碑记》中被全文照抄了下来，见同书，第143–144页。

³⁹ 同前书，第224–225页。

⁴⁰ 同前书，第261页。

⁴¹ 同前书，第261页。

⁴² 同前书，第262–3页。



想象这就是一次法会的大体收入，并且可以用来维护此亭的维护与发展。⁴³ 在这种活动之中，僧尼，就扮演了极其重要的吸引信众并增加财源的重任。

(3) 承包宝烛燭

坟山与祠庙之中宗教活动的专业性与相对独立性，因此从纯粹管理上的原则来考虑，就会出现公开招标代理权的情况，因此这些机构就会想到让僧尼来投标取得宗教上的“经营权”。这种情况在新加坡也出现颇早，早在十九世纪初就逐渐成立的绿野亭司祝就曾“招人投票承理”。投标人只要“月纳八十元香油金”就可以标得承理权。并且，还规定庙宇司祝以两年为期，“限满重新招票，价高而善祀神者得之。”⁴⁴ 这种变化在于僧人等神职人员，一旦投标成功之后，就可以不再受庙务管理的规约，只需缴足费用，就获得了较大的宗教“自营权”。这种情况在新马两地皆较常见，如著名的槟城极乐寺的创基者——妙莲法师（1844–1907）就是如此，他本人来自福建鼓山涌泉寺，曾住持前面提到的广东、福建移民共享的广福宫。但住持此庙的条件是“香烛由（妙莲法）师等售卖，每年责以缴款二千余金。名曰香烛燭，且限住僧十二人，足应侨人两家佛事之请。”⁴⁵ 这也就是缴交固定配额的香烛燭，以获得若干庙宇的经营权，而像妙莲这样的正统法师也会通过此一方式来传播佛教的正法，并以此来作为移风易俗的过渡阶段。

⁴³ 同前书，第263–5页。

⁴⁴ 曾玲：《庙宇、坟山的社群化与新加坡华人移民帮群组织之建构：兼对东南亚华人社会结构研究的新思考》，第18页。

⁴⁵ 释宝慈：《槟城鹤山极乐寺志》（槟城：极乐寺，1923年），第84页，此转引自王琛发：《远去的菩萨身影：论清代的马来亚汉传佛教》，第59页。



（二）作为模式转换意义的双林寺

一般学界与教界都公认“狮城第一丛林”⁴⁶的乃是位于惹兰大巴窑（Jalan Toa Payoh）创立于清光绪廿四年（1898）的双林寺。因此一个显明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会这么晚？我们又如何来解释在此二者之间的佛教存在？

让我们先从双林寺的创基寻找答案，此寺的创建因缘是与福建福州怡山西禅寺的南传有关。西禅寺是福建禅宗的重镇，此寺的微妙法师（卒年不详）⁴⁷为募款，曾于光绪三年（1877）至光绪十五年（1889）间多次前往南洋。而此后，微妙门下的弟子比丘尼慈妙（卒年不详）、贤慧（？-1901）、性慧（？-1902），连同全家，就得以在新加坡创立了双林寺。故双林寺至今，还尊奉西禅寺为其祖庭。其创寺因缘，则可参此寺中勒石：

余泉州惠邑人也，俗姓萧，一家团圆，颇裕田园之乐。缘吾二子觉悟浮生若梦，劝请安素从缁，于壬辰年（1892）率合家男女一十有二人，航海到高浪雾（即斯里兰卡首都科隆坡，Columbo），在楞伽山岩栖六载。至戊戌（1898）年春节下山，遍游佛国后，因游檳（檳城，Penang）过叻（新加坡），拟返故国。从刘姓施主（刘金榜，1838-1909）⁴⁸喜舍此山，故吾长子贤慧在此创建双林禅寺，并拟于大殿之后结构珠琳庵一区，以为余并吾长女尼禅慧及吾甥女孙尼月光三人栖身之所。诿意吾子贤慧于辛丑（1901）季夏顿幻化之躯，径入涅槃之藏，致此工程未能告竣。浮生若梦，果如是乎！但吾母子在此数年，满望大功克竣，上报佛恩，今既如此，复何言哉。今吾子贤慧既已归真，吾三女尼未便居此，故将后事嘱咐吾次子性慧之徒明光大师（？-1904）管理，惟冀克承先

⁴⁶ 此寺中留有一块由著名本地书法家潘受（1911-1999）的横幅“狮城第一丛林”。此横幅照片可参许源泰，《沿革与模式：新加坡道教和佛教传播研究》（新加坡：世界科技出版公司，2013），第106页，图29。另外，另可参丘（邱）菽园（Khoo Seok Wan），《募建莲山双林寺碑记》，收于丁荷生、许源泰：《新加坡华文铭刻汇编：1819-1911》，第1131页：“星洲在昔本无丛林之建筑物，有之则自莲山双林禅寺始也。”

⁴⁷ 此僧的基本情况可参释能度：《新加坡汉传佛教发展概述》（新加坡：药师行愿会，2010），第144页，注5。

⁴⁸ 此人事迹可参释能度：《新加坡汉传佛教发展概述》，第32页，注72以及其他记录，具体见后§3.1. 详叙。



志，不堕宗风，是余所厚望焉。兹因将次附航返国，未免感慨系之，特叙数言，勒之贞石，庶游览诸君知其缘起，兹知此珠琳庵即法堂，法堂即珠琳庵也。光绪壬寅（1902）年孟秋吉旦比丘尼慈妙立。

此为双林寺兴建缘由之简略过程描述，在此后，又衍生出了若干神奇的传说与可能的附会，学界已有论及，此姑不论。⁴⁹ 在此，我所关注的是如下几个要素，慈妙合家的禅宗正统出家人地位；福建人（确切地说是漳泉）身份；刘金榜绅士集团及其家族在建寺与重建之中的作用；所产生的结果（中国南方沿海寺院的移植与寺中非佛教因素的排除）。所有这些要素的迭加，就使双林寺成为了一个新加坡佛教发展史上的转折点，即由松散的非制度性佛教慢慢过渡到了制度性的宗教建构。

（三）小结：双林寺的模式转换性意义

双林寺之前，整个新马地区并无严格意义上成规模的建制式佛教寺院。虽然南下的汉传佛教的僧人已然在此地存在有至少一个世纪以上，但是这些为数可能并不算少的僧尼，却一般只是依附于坟山、会馆、民间宗教的祠庙。双林寺则明显与此不同，它是完全独立、正统的佛教寺院；祠庙中的零星僧人，其主要的功能是为这些组织提供宗教服务，我们可能无法完全否定他们也会从事佛教传播的工作，但至少我们没有从目前所遗存的碑刻铭文材料中发现他们有着目的性很强的讲经、弘法或者其他传教性行为。而双林寺，虽然也同样向各色人等提供宗教服务，但却并非是雇佣性的、具有期限的服务，并且总是与佛教更为宏大的传教行为相联。而且，祠庙中僧人的僧团组织活动与其他制度性活动的材料也付之阙如。而双林寺则具非常完整系统的僧团组织，并且与其远在大陆的祖庭具有紧密的联系；同样道理，祠庙中大多数僧人是零星的个人

⁴⁹ 隆根：《无声话集》（新加坡：南洋佛学书局，1984），第106-7页中记载刘金榜曾梦见金人，故留萧氏族人在星建寺，并将之比拟为起精舍的须达与金人感梦的汉明帝。又参许源泰：《刘金榜创立双林寺的社会因素》，收于氏著：《沿革与模式：新加坡道教和佛教传播研究》，第105-111页。



南下行为，也不属于很强的系统性网络中的一部份。这明显也与双林寺的构建过程不同，除了刘金榜这个新加坡地方性的助缘，双林寺的创建则是福建寺院不断南下化缘、宏传佛法过程之中的一个副产品。因此双林寺，从建筑形式等方面都是依照其在大陆的原型来充当蓝本。故而，这是一个具有完整形式的大陆汉传佛教丛林的向南的转移。以建筑形式而言，双林寺作为福州西禅寺的下院，其布局与建筑风格上也深受其影响。故早期布局，体现的就是明清福建临济宗丛林的特色。坐北朝南，背山面海，并以大殿与法堂为核心，左寮堂右僧堂，左钟楼右鼓楼，并因地治宜，顺坡而上，在细节装饰等各方面，也都呈现出传统南方沿海寺院的特色。所以，我们可以说，它的创立，标志着新加坡汉传佛教的发展进入到了一个正统汉传佛教整体推进而来的新时代。

三、结论

拙文主要通过社会学与文献学方法的考察，并且以利用新马本地的各种碑刻铭文材料为主，并辅助以其他材料，来尝试分析新加坡本地佛教的若干特点，并希望能够以之为基础来观照其他地区的外来宗教适应、发展过程。

拙文首先简单介绍了新加坡华人宗教信仰汉传佛教的若干特殊之处，这些特点往往与新加坡这个移民社会治理的特点有关。并且，也介绍了相关学术史的展开，尤其是华南学派通过访碑寻墓来构建民间宗教的若干成果。

以此为基础，拙文着重强调双林寺在新加坡汉传佛教发展之中的所具有的特殊地位。即前此佛教僧侣往往是处于寄居于其他坟山、宗亲会馆、行业公会等组织之中，而从事相当被动雇佣的宗教服务工作。其宗教自主性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并且在人身上往往也处在较于附庸的地位。这些僧人，在坟山等组织之中或者通过提供宗教服务来获取生存的基础，或者通过缴纳一定数量的钱财来获得相对自由的传教与修行自由，但却依然无法获得自己完全独立的宗教寺院。这种情况直到双林寺的建立方才得以改变，因此它就具有了模式转换的重要意义。





姚紫《新加坡传奇》语言特色初探

陈家骏*

姚紫，著名的马华作家，1920年生于中国，1982年因病逝世。姚紫的一生，与文字工作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他曾担任报馆编辑多年，提拔不少对创作有兴趣的新人，是当时著名的编辑。在新加坡作家中，姚紫还是一位传奇人物。刚到新加坡不久，姚紫即凭借长篇小说——《秀子姑娘》，名声鹊起。《秀子姑娘》这部小说，一经出版，便在极短的时间重刊三次。这在战后不久，本地出版业正在复苏的阶段，姚紫便能创下这样的佳绩，自然深受瞩目。自此，姚紫辛勤笔耕，硕果累累。他的作品语言，一向给誉为“清新俊逸而又绮丽畅达”，或是表达“形象性强”，这应归功于姚紫对语言运用的独到之处。本文以姚紫作品——《新加坡传奇》作为研究对象，从词语到标点符号的运用，一一加以梳理，窥探姚紫语言的特色。

一、

姚紫（1920-1982年2月）原名郑梦周，出生于中国福建泉州，未来新加坡之前，曾任厦门《江生日报》编辑。1947年来新加坡后，到道南小学及晋

* 陈家骏，文学博士，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国立教育学院亚洲语言文化学部讲师。

江学校执教，后来才转到报社工作，重操旧业。在报馆的这段时间，他初始担任的是《南洋商报》资料室主任兼编辑，先后或是同期主编《家庭妇女》版、《星期六》周刊和《文艺行列》周刊。他后来还办过一份周刊——《海报》。离职后，他创办“文艺报出版社”，出版《文艺报》月刊。过后，因客观因素，再加上政治原因，《文艺报》给勒令终止；紧接着，他又陆续创办了《大地》十日刊、《华报》周刊等刊物，同时还建立了“天马图书公司”。间中有一段时间，他到吉隆坡任《钟声报》总编辑。不幸的是，该刊物也是在出版第十期即被令停刊。1969年，他应聘到《新明日报》，主编副刊《新风》，一直工作到1977年5月31日离职，前后共8年。在姚紫任职期间，他培养了许多本地热爱写作的年轻人¹。1981年，他罹患癌症，仅隔了一年便逝世了。姚紫的一生，一直与文字为伍，前新加坡文艺协会的会长骆明即曾感性地说：“姚紫的一生，是文学的一生²”。虽然姚紫也教过书，但他最喜欢的还是与出版有关的工作。吴蒙根据姚紫的口述，谓他自己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便是在《南洋商报》任职的时候³。黄孟文更直接赞他是著名的副刊编

¹ 姚紫逝世后，由新加坡文艺协会出版的《姚紫研究专集》，里头收集的几篇文章，提及这事。如新加坡知名作家蓉子在悼念姚紫的文章中，就这么写道：“姚紫之于我，有如恩施，……”蓉子还给其他受姚紫赏识，并加以提拔的写作者，取了一个新名词，谓他们是姚紫的“文徒”。“文徒”指的是姚紫培育的文学徒弟。当年受姚紫提拔的年轻人，常常投稿，蔚然成一股“新风”，其中有许多更成为当代著名作家，目前仍活跃地本地文坛。有关蓉子的回忆，可参蓉子《忆新风 话姚紫》，见刘笔农主编《姚紫研究专集》（新加坡：新加坡文艺协会出版，1997），页117-119。此外，姚紫给韦晕的私函件中，对于自己常提拔年轻作家一事，直认不讳。姚紫说：“近两年中，我努力培养一些‘新人’，……”。姚紫任编辑期间，努力栽培新一代的创作者，是肯定的。可参韦晕《狂侠与向禅》，见刘笔农编《姚紫研究专集》（新加坡：新加坡文艺协会），1997，页88-89。

² 骆明《一个孤寂的身影——谈姚紫》，见黄惠龄、王焯主编《姚紫文学历程》（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管理局，2011），页171。

³ 姚紫的一生，横跨新加坡建国前后。姚紫认识的朋友很多，有关姚紫的生平记录及轶事，记载得相当详细。可参吴蒙《姚紫生平简介》，见刘笔农编《姚紫研究专集》（新加坡：新加坡文艺协会），1997，页26-29。

辑⁴。此外，姚紫一生，孜孜创作，创作了许多好作品。姚紫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秀子姑娘》，曾因拍成电影，传为佳话⁵。当然，姚紫的许多小说，是当时的畅销书，也是事实。

总的来说，在马华文学的发展史上，姚紫的贡献，不容忽视。林师万菁教授在《中国作家在新加坡及其影响（1927-1948）》特别指出，新马华作家中一些南来的作家，为新马文坛做出许多贡献，应予以重视；而一些只来了一阵子，便离开了的，不应与那些落地生根，在马华文坛上做出许多贡献的作家等同视之。⁶ 他的这一观点，虽有学者认为稍嫌过于严苛，但事实也确实如此⁷。这些到新加坡安家落户的作家，不仅自身的成就非凡，还推动了马华文学的发展，起着承先启后的作用。苗秀在研究马华白话文学发展的时候，即指出马华的白话文学创作，虽然仅晚于中国的五四文学几个月⁸，但早期南来的作家，却让白话文学在新马生根、发芽；而后来的南来作家，更是让本地的文

⁴ 黄孟文评论了当时杰出的作家，包括姚紫、苗秀、李汝琳等人。他在文中指出姚紫是名出色的编辑；而这也早已是不争之事。姚紫去世后，好些新加坡作家在悼念他时，除了感谢他任副刊编辑时的提拔和栽培，还描绘他在当编辑时，对稿件的排版、印刷等方面认真之程度，简直是到了一丝不苟的地步。这些轶事，可参刘笔农主编的《姚紫研究专集》。此外，有关黄孟文的评论，可参黄孟文《新加坡独立以来的华文短篇小说（1965-1990）》，见黄孟文《新华文学评论集》（新加坡：云南园雅舍，1996），页30-31。

⁵ 姚紫小说拍成电影，自然增加其知名度。不过，更为重要的是，姚紫的写作手法，无论是对人物性格的渲染或刻画，套句黄万华的话，即为“南来作家创作模式提供演变的一种思路”。易言之，姚紫的写作手法，令人耳目一新，对后人有所启发。参黄万华《新马百年华文小说史》（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9），页71-72。

⁶ 见林师万菁教授《中国作家在新加坡及其影响（1927-1948）》（修订本）（新加坡：万里书局，1994），页6。

⁷ 郭惠芬在《中国南来作者与新马华文文学》中指出：“由于林万菁博士对‘中国作家’概念的严格界定，另有一批为数不少的南来作者无法列入研究范围，因此本文作者拟以宽泛的‘中国南来作家’概念，对中国南来作者在新马期间的文学活动进行总体研究。”郭氏的研究是整理建国前出现过的作家及文学活动，而林万菁研究的是南来作家的影响，研究的角度有别，有不同的取舍，是可以理解的。

⁸ 苗秀在《早期的马华小说》里描述他在翻查旧报纸，逐篇逐段爬梳资料时发现：“一九一九年十月在新加坡创刊的新国民日报，它的副刊《新国民日报杂志》上便出现白话文的作品，……”可参苗秀《早期的马华小说》，见苗秀《马华文学史话》（新加坡：青年书局，2005），页52-84。

艺创作开枝散叶⁹。本地著名文学评论家赵戎明确地指出，“马华文学运动，完全得力于中国南来的作家们的大力推动，才有今日的成就。”赵戎的话，深中肯綮。今日新华文坛能有此胜景，似姚紫这样的先驱作家，功不可没。

姚紫去世后，新加坡文艺协会为他出版的一本纪念文集——《姚紫研究专集》，里面收集了许多朋友的悼念文字；还有若干篇有关他作品的研究。这些研究，多是谈论其作品内容，对其作品在语言文字上的如何巧妙运用，讨论的不多，让人扼腕。

本文拟以姚紫去世之后，由他的朋友为他出版的《新加坡传奇》作为研究的对象。《新加坡传奇》是一本在撰写上，较为奇特的小说集，全书共分二辑。第一辑由十二篇短篇小说凑合成一个完整的故事。故事男主人公小吉，外号“武吉巴兄”，因仗义帮助了一女孩抢回她在巴士车上被偷的钢笔而认识，最后成为情侣。两人的情感发展稳定，本应结婚，却因男主人公没有自己的房子而引发连串问题，最终因未婚妻有钱表哥的介入，导致两人分手。这小说既反映当时的住屋问题，还正面披露当时政府官僚的状况，十分写实。第二辑由九篇短篇小说凑成，故事之间并没关系。总的来说，小说故事，精采生动，语言成熟，读来惬意十分。这本书的写成年代较晚，文字也趋于成熟，应可一窥姚紫的写作特点。

二、

批阅姚紫小说，不难发现他在词语的驾驭上，灵活十分，矫若游龙，变化多端。这也难怪研究姚紫作品的学者，对其作品做了这样的评价：“文字流畅，富有形象性”¹⁰、“姚紫小说的语言，清新俊逸而又绮丽畅达。”¹¹姚紫在词语的运用上，确实有独特之处。最常见的，有这几类：词义的改变，词语的

⁹ 赵戎《论马华作家与作品》（新加坡：青年书局，1967），页82。

¹⁰ 参杨越《追求和追求中的懊恼——姚紫小说简论》，见刘笔农编《姚紫研究专集》（新加坡：新加坡文艺协会），1997，页159。

¹¹ 参陈贤茂《论姚紫的小说创作》，见同上，页175。

超常搭配，自创新词，转类。这些词语的用法，一如郑远汉所言，因违背词语的正常用法，属“非语言”，在“修辞活动中制造并利用这样的‘非语言’因素，可以使言语表达平添异彩，收到特殊的表达效果。”¹² 郑氏所言，一言中的。且看以下的分析：

（一）词义的转变

词义的转变，可以是词语的扩大、缩小，或是转变。在姚紫作品中常见的，则是“词义的“缩小”或是词义的转变。请看：

例一、……象一颗破绽了的石榴，美得带艳……同过去学生装束的她，简直判若两人。

《他有一个‘好’爸爸》，页48

例二、但是，我的局势一天一天恶化了。

《学店辱命记》，页85

例三、接着，又一个男子，踏着漂亮的步伐过来，参加我们的座子。

《我做了小姐的“跟从”》，页29

例四、——在这人世间，偶尔看到一个美好的异性，每个年轻人都会生起爱慕之心。

《扒手拳下开传奇》，页5

例五、起初，我像花丛里采花的蜜蜂，东打转，西绕圈，每碰着一个女人，就注目一下；……

《我做了小姐的“跟从”》，页34

例一的“破绽”，据《全球华语大词典》的解释是：“比喻言行上的漏洞”，是引申的词义。但姚紫用的却是词语的字面意思，指石榴裂开了；词义有了明显的缩小。例二的“局势”，《全球华语大词典》指：“某一时期内

¹² 参郑远汉《修辞风格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页121。

的政治、军事等呈现的形式”，多用在世界政局上。这里的“局势”，指的却是个人的处境。故事中的主人公“我”到一所学校执教，因忍不住而教训了几名上课不专心的学生，校长于是“劝导”他，“看不惯的就干脆别吃这行饭”。自此，老师的威严全无，其他学生看到他，也不加理睬。这里的“局势”，词义不但缩小了，更让人觉得“大词小用”。例三的“参加”，原本是指加入某个组织或活动，但这里只是指换到另一桌，词义也是明显的缩小了。例四的“美好”，一般指事物，这里却是指“人物外貌”，与“美丽”同义。例五的“注目”，《全球华语大词典》的解释是“目光集中在一点上”，给出的搭配是“惹人注目”，或是受到“四海注目”。不过，例句中的“注目”，却已缩小到只有“看”的意思。除了词义缩小，姚紫似乎也常改变词义，突显陌生化效果，修辞色彩顿生。兹举例子若干，加以说明：

例六、 于是，公馆便发达起来，……

《公馆与菜头》，页53

例七、 那家伙反而安闲起来，从桌上拿了一根香烟，含口里……

《扒手拳下开传奇》，页6

例八、 老太太的做人很和蔼。

《住屋的喜剧》，页14

例九、 可是，那座大厦的装置不调和——外壳是西式的，却用中国古式雕花的圆窗，……

《我有十万元的希望》，页43

例十、 ……惹出日本宪兵的势头，那可能砍头的！

《戴绿头巾的英雄》，页68

例十一、 ……索性把自己的感想，忠实地对她说……

《住屋的喜剧》，页20

例十二、 我已走到街中了。心理紊乱地！脑中只存着一个意识。

《他有一个好“爸爸”》，页52

例六的“发达”，本指“事物得到充分的发展”（《全球华语大词典》），多指“交通”、“商业”，或是说“发迹”、“显达”。这里的“发达”，姚紫另添一义，指“普及”或是“兴盛”。正如小说中所描述的：“苦闷的时候，一般人就上‘公馆’去；两个人碰头可以谈天说地；三个人碰头可以发噜吨，谈女人，讲生意；四个人碰头是一场麻将；五个以上的人碰头，则麻将桌边，至少有一个热心的观战者……”这类公馆或许是生活苦闷的人多了，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甚至是越来越普及；而这类公馆一般是有会员制的。会员多了，公馆的发起人或许会因此“发达”也说不定。若是如此，姚紫说公关的普及，是公关“发达”了，就甚值得玩味。例七的“安闲”，本指安适、恬静，多指生活，这里却只是用来形容一个人很安静，话不多。例八的“做人”也用得有趣。一般来说，“做人”多做形容词，指待人处事。反观这里的“做人”，却变成了名词，词义也有了变化，特指一个人的品性。例九的“装置”，据《全球华语大词典》的解释，“指构造比较复杂并具有某种独立功用的机器或部件”，这里却是指“装潢”或“家具设计”。例十的“势头”，《全球华语大词典》的解释，是指“形势”或“势力”。不过，这里显然无法如此解释。这里应是指“惊动了日本军方的”或是“引起日本军方的注意”。例十一的“忠实”，本指个性或品性，这里却摇身一变，变成“实话实说”。例十二的“意识”，《全球华语大词典》的解释是“感觉、思维等心理过程”，这里却只是指“念头”。这些词语的词义一经改变，乍读时，即引起注意；一些更在我们读后，细加思考，方能体会其中奥妙，十分有趣。

（二）自创新词

王希杰指出，文学家在语言运用方面是最有特色的，也是最富有创造性的。他进一步指出，文学家就能把一种语言潜在的可能性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¹³。姚紫在自创新词这一方面的特点，应是王希杰提及的，文学语言的其中一种“创造性”。且看：

¹³ 参王希杰《修辞学导论》（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页87-88。

例十三、 于是，她引着我，挤向椅缝去。

《我讨“政府”的房子》，页36

例十四、 闲暄中，我只是唯唯诺诺地，让老朱去应付。

《我有十万元的希望》，页43

例十五、 她气急地指着前面那个身穿白衣奔跑着的男子叫：

“他！就是他！”

《扒手拳下开传奇》，页6

姚紫自创新词的方法有三：一类为自行创造；一类为仿拟；一类为缩略。

例十三的“椅缝”，应是他自创的。“椅缝”指摆放的椅子很多，人们唯有在椅子间小心地穿过。姚紫还用这方法创出“人缝”这一新词语。请看：

例十三之一、 好容易挤了上去，手攀着杠，站在人缝中。

《扒手拳下开传奇》，页5

例十三之二、 我明白这是什么一回事，竟然兴起傻劲，排开人缝，跟着追下去，……

《扒手拳下开传奇》，页6

例十三之一和例十三之二的“人缝”，十分突兀。

例十四的“闲暄”，应是仿自“寒暄”。“闲暄”除了指聊天，在这里还加入了“说一些无关紧要的闲话”，借以打破相对无言的尴尬场面。似这样仿造的新词语，还有以下这些：

例十四之一、 有一夜，几个醉颠颠的家伙，带了一辆新式的开蓬汽车来，在她窗下又叫又嚷，至少按了十五分钟的喇叭，把整条街都闹醒了。

《住屋的喜剧》，页18

例十四之二、 只得再回到原来的地方，咽声吞气地等那些大人们高兴了，我才敢开口。

《我讨“政府”的屋子》，页25

例十四之三、 她一见我来，妖声妖气地噫着；……

《学店辱命记》，页87

例十四之四、 他讲得兴奋起来，手指足划，唾沫纷飞

《我有十万元的希望》，页42

例十四之五、 她们仿佛向我量头量尾，时而发出嗤嗤的笑声。

《我有十万元的希望》，页44

例十四之六、 我的身子一粟，瞪目哑口，手里的酒杯，几乎吓得掉下去——

《我有十万元的希望》，页45

例十四之一的“闹醒”，应是脱胎自“吵醒”。作者在这里刻画一群纨绔子弟，于夜深人静时，开着车子叫嚣，扰人清梦。例十四之二的“咽声吞气”、例十四之三的“妖声妖气”、例十四之四的“手指足划”、例十四之五的“量头量尾”、例十四之六的“瞪目哑口”，仿自何处，有迹可循。

“咽声吞气”应是仿自“忍气吞声”；“妖声妖气”仿自“妖里妖气”；“手指足划”仿自“手舞足蹈”；“量头量尾”则是仿自“彻头彻尾”；“瞪目哑口”是仿自“目瞪口呆”。姚紫仿照之后，有些词语的意思，也有了些变化，有时更是赋予新义。“咽声吞气”的意思，同“忍气吞声”，但“我”为何要把声音也咽下，只因为了申请房子，能早日同未婚妻结婚，面对政府人员自大的工作态度，让原本想发作的“我”，也只能硬生生地把“不满情绪”吞下。无奈之情，溢于言表。“妖声妖气”，强调的是说话声音的妖娆，而非行为举止上的“妖里妖气”。姚紫在小说中还造出“娇声妖气”¹⁴，相较之下，可看出“娇声妖气”，虽也是在形容说起话来，矫揉造作；不同的是，“娇声妖气”着重的是突显语调带有“撒娇”的成分。

¹⁴ 例子：“她一进门，就娇声妖气地叫：……（《娼妓·钱·姨太太》，页76。）

“手指足划”，与“手舞足蹈”的意思相近。“彻头彻尾”，经姚紫巧手一改，变为“量头量尾”，指把人从头到脚，评头论足。例十四之六的“瞪目哑口”，刻意描绘出“我”瞠目的模样，而非哑口无言，突显“我”无话可应对时的窘态。

例十五的“气急”，根据故事的发展，女主人公发现自己的钢笔被偷，一下巴士立即大声喊叫。“气急败坏”指的是她当时慌张，甚至是恼怒的神态。而“气急”正是缩略自“气急败坏”。姚紫常用这方法，缩略短语或句子，创出新词。兹举若干例子，加以说明：

例十五之一、……和一群新闻记者坐在那猩红色的法国式的大沙发里，恭听他发表庞大的经济发展计划
《亚历山大与一块羊肉》，页135

例十五之二、一个头发梳得很光贴的公子，……
《我做了小姐的“跟从”》，页29

例十五之三、开始的序幕，总是做妻子的先发嘈嗦，咒诅家费不敷。
《住屋的喜剧》，页19

例十五之四、……回到了那门房般的宿舍休息，愿想入睡一下，……
《学店辱命记》，页85

例十五之五、……，电筒射出的光把阴影向前推开了，可是背后的阴影又拥合起来。
《红墨水池底的风波》，页124

例十五之六、虽然只是中姿的相貌，颧骨太高，鼻的四周有些雀斑，但是她有一种“骚”的风情，……
《戴绿头巾的英雄》，也67

例十五之七、她的躁急再也忍按不下了！……
《第十三支卷烟》，页99

例十五之八、火烟氤熏得她得眼睛滴出泪水，……

《体贴》，页93

例十五之一的“恭听”，应是缩略自“洗耳恭听”，或多或少影射了众人只是“假装”地专心地听。例十五之二的“光贴”，应是缩略自“光亮而且伏贴”，描写头发涂上发蜡后，梳得很伏贴的样子。“光贴”一词的使用，可省下许多描写词语，节省篇幅。例十五之三的“家费”，乍读时，让人深感突兀。“家费”应是缩略自“家庭的费用”。例十五之四的“愿想”一词，待细读之后，才明白姚紫描写男主人公上了一个上午七节课，倍感体力透支，此时的他，“唯一的愿望便是小睡片刻”。“愿想”一词，正好形容男主人公当时的心理状态，形象性十足。例十五之五的“拥合”，应是“拥挤并合并”的缩略，作为描写光影的变化，十分传神。例十五之六的“中姿”，应是“中等姿色”或“中等之姿”的缩略；总之，这是指老板娘姿色一般。例十五之八的“忍按”，也十分特别，应是“忍住及按捺”这短语的缩略。例十五之九的“氤熏”，也应是姚紫自创的新词，缩略自“氤氲”及“烟熏”这两个词。

（三）转类的生动用法

转类这一辞格，郑远汉在《艺术语言辞典》做了详细的解说。他说：“依靠语言环境，临时转变词性，把甲类词用作乙类词，叫词性的异化。又叫‘转类’……”¹⁵ 这里不妨补充一点，这样的用法，古文虽时可见及，只不过在词性相对固定的现代汉语里，这样的用法，很多时候是文人特意为之，有其目的。以下摘录例子若干，加以说明：

¹⁵ 见郑远汉《艺术语言辞典》（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页75。

- 例十六、 “我说早上来，你偏要下午来！你这人真是！偏拣下雨才出门！你瞧，地上多难走的！跌坏了怎办？……”她扁着嗓子嚷。
《体贴》，页95
- 例十七、 ……她就忙着替我脱鞋，宽下外衣，端点心，弄咖啡，……
《体贴》，页93
- 例十八、 对着着幽静的景物，一腔心事反而象江水滔滔涌起，我默住了，她也不说话。
《扒手拳下开传奇》，页11
- 例十九、 於是，阿李匆匆把那篇快要完毕的稿子，添上几笔，结了一个尾，交给编辑，拿了外衣出去。
《红墨水池底风波》，页124
- 例二十 这时，整条街的窗口都出现了人影，大家都在激动地愤怒着。
《住屋的喜剧》，页19
- 例二十一、 武吉巴嫂的房子卖掉，朋友们嘲笑地，绰号我为“武吉巴兄”。
《扒手拳下开传奇》，页4
- 例二十二、 每次见到她，内心总有惭愧。……
《他有一个“好”爸爸》，页47
- 例二十三、 哗啦的雨声把一大群观众阻塞在门口。
《戴绿头巾的英雄》，页66
- 例二十四、 反而使我觉得拘束，反悔不该同他来。
《我有十万元的希望》，页43
- 例二十五、 到底是她报复了我，还是我报复了她？
《娼妓·钱·姨太太》，页79
- 例二十六、 ……我连忙过去帮忙她，……
《体贴》，页93

例十六的“扁”，例十七的“宽”，还有例十八的“默”，原本是形容词，这时全变成动词。尤其是似“宽”这样的用法，古文已有。在姚紫的作品中，这样的手法，并不乏见。兹举三例补充：

例十八之一、身子斜向我。

《我遇到了霸王妖姬》，页36

例十八之二、他瞥见我床上歪着的书本，嘻嘻道：……

《我有十万元的希望》，页40

例十八之三、“那怎样行？”她母亲尖着嗓子说：……

《他有一个“好”爸爸》，页51

例十八之一的“斜”及例十八之二的“歪”，都是形容词转换成动词的生动例子。“歪”这新奇的用法，其来有自，在《红楼梦》中，常可见及¹⁶。姚紫偶借用这方法，读来特别，引人注目。例十八之三的“尖”也是转类的用法，把形容词变动词，形容嗓子拔高，声音尖锐，表现出母亲的不悦。

例十九的“完毕”、例二十的“愤怒”、例二十一“绰号”，前二者是形容词，后者是名词，现在都变成了动词。例二十二“惭愧”，本是形容词，这里却成为“名词”。例二十三的“阻塞”，例二十四的“反悔”，还有例二十五的“报复”，今日用法，后边多不带“宾语”。如我们今日会说“交通阻塞”，不说“阻塞在公路上”。“反悔”亦是如此，我们今日说：“我开始反悔了”，而不说“反悔同他来”，例二十五的“报复”，若作为形容词，我们会说“报复行动”，但作为动词，我们会说：“他开始报复了”，却不说“报复他”。例二十六的“帮忙”是离合词，我们今日用法是“帮了忙”，或“帮他的忙”，却不说“帮忙他”。

¹⁶ 有关《红楼梦》中有关“歪”的用法，可参陈家骏《〈红楼梦〉词语活用现象探微》，见陈家骏《文学语言论集》（台北：万卷楼，2017），页121-131。

有时，有些词语经转换词性后，读来固然新鲜有趣，却不免有叠床架屋之嫌。兹举二例说明：

例二十七、 眼看自己带来的女朋友在与别人玩在一起，而自己却冷落地落在一边。
《我做了小姐的“跟从”》，页30

例二十八、 ……我闲着无事，又从袋口里摸出玲写给我的信，重温地读了一遍。
《我遇到了霸王妖姬》，页33

例二十七的“冷落”，多不带宾语，今日会说“遭到或是受到冷落”。例二十八的“重温”，则是把动词改成形容词。上举二例，虽然特别，却不如直接说“自己遭到冷落”，“……重温玲写给我的信”，来得直截了当。这里要重申的是，我们其实是从汉语发展，较为成熟的今日看姚紫当年的用语，会发现了好些词语不同于今日用法，实不足为奇。

（四）词语的超常搭配

词语的运用，有其规律。冯广义指出，词语与词语之间的搭配。超出了逻辑范畴的常规，用的好，确实是一种有效的修辞手段¹⁷。词语的超常搭配，也是姚紫小说语言常见的手法之一。有时用法大胆，确实惊人耳目。且看：

例二十九、 做妻子的一把鼻涕，两行眼泪扔了出来，……
《住屋的喜剧》，页19

例三十、 一股出乎意外的兴奋，滚过我的脉搏；……
《她走入猪圈里去了》页61

例三十一、 有时，喝醉了的日本宪兵就从她们的楼窗口，曳来肉麻的笑声和伊伊唔唔的歌声，直到半夜，……
《戴绿头巾的英雄》，页68

¹⁷ 参冯广义《变异修辞学》（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2），页103-104。

- 例三十二、 ……，他的店子很蹩脚，货物很少，顾客又不多；……
《戴绿头巾的英雄》，页67
- 例三十三、 这是一个新鲜有趣的地方，就像游艺场那样的吸引着孩子们的心。
《亚历山大帝与一块羊肉》，页142
- 例三十四、 因此，我想：我原本是渺小的人物，人家绝不会瞧得起我，……
《扒手拳下开传奇》，页5
- 例三十五、 黄国清搁下电话筒，心里充满愉快和轻松。
《咸瓜子》，页103
- 例三十六、 学生的大的小的，充满各屋楼的走廊。
《学店辱命记》，页83
- 例三十七、 ……双颊已经枯悴了，砌着厚厚的白粉，……
《我有十万元的希望》，页45
- 例三十八、 到了游泳池，满是游客，楼上楼下洋溢着嘻哄的声音，……
《我做了小姐的“跟从”》，页25
- 例三十九、 ……，那笨重的皮鞋就响了进去。
《戴绿头巾的英雄》，页69
- 例四十、 ……却有许多无家可归孩子、乞丐、苦力，蜷缩在人家的屋檐下，
睡过漫漫的长夜。
《扒手拳下开传奇》，页13

例二十九的“扔出眼泪”，不但用法新颖，更把大滴大滴的眼泪往外流的样子，描绘得十分生动。例三十的“滚”过脉搏，也是另一词语超常搭配的用法。这里把无形的感觉——“兴奋”，化为有形的东西，如湍急的流水般“滚了过去”，形象性十足。例三十一的“曳”，除了作为形容词的“摇曳”，其实还可作为动词，可解释为“拖、拉、牵引”；不过，“曳”却不

与无形的声音搭配。“曳”在这里是形容笑声从低处或远处传来，这一用法，姚紫频频使用，几成习惯。兹举数例证明：

例三十一之一、 我刚要推开出去，忽有一阵咯咯的皮鞋声从巷的一端曳来。
《戴绿头巾的英雄》，页69

例三十一之二、 ……直到咯咯的革履声，从楼梯下曳了上来，我才喘过一口闷气。
《他有一个“好”爸爸》，页50

例三十一之三、 “你们吵什么？”——楼上曳来她爸爸苍老的声音。
《他有一个“好”爸爸》，页52

上举数例，都是在刻画声音的“传播”，不说声音传来，而特意用“曳”，自然可看出是作者的有意为之。

例三十二的“蹩脚”，《全球华语大词典》给出的解释是：东西的质量差，或是人的本事不大。这里用蹩脚来形容店铺，也是超常搭配的一种。说这家店很蹩脚，暗指这家店，商品不全，顾客不多，却能长期维持下去，甚值得怀疑。随着故事的发展，我们终于知道这家店的老板，与日本人勾结，店铺这才能长期“屹立不倒”。例三十三和三十四，同属偏正词组的超常搭配。我们今日不说这个地方很新鲜，而会说陌生；同样，我们不说渺小的人物，却会说“小人物”。这样的搭配，除了不同于一般，有时也有特别的含义。如例三十四，是故事主人公的内心独白。他自怨自艾，说自己“渺小”，虽有夸张的成分，却又能很好地描绘出主人公对自己的缺乏自信。

例三十五与三十六，是动宾短语的超常搭配。例三十五其实可以说很“愉快”，或是很“轻松”，可是作者故意说内心“充满”愉快和轻松，增添了强调的意味。例三十六不说到处都是学生，却偏说“学生”“充满”各处走廊，突兀启端，引人注目。例三十七故意不说“搽”粉，却说“砌白粉”，特别之余，更兼具讽刺性。例三十八的“洋溢+声音”，也用得奇特，突显到处是一片喧哗的声浪。

例三十九、例四十，是动补关系的超常配搭。一般来说，我们会说“响起”，而不说“响进去”。这奇特的用法，除了强调脚步声重，在夜晚听来清晰，更暗示了“我”从脚步声中知道了店主与日本人有不可告人的勾当。例四十也是如此，不说这些乞丐、苦力、无家可归的小孩，在外餐风饮露，却说他们在天桥下“睡过漫漫的长夜”。这样的表达，既抒情，又带出感伤，感人之余，更易触动人们的心弦。总的来说，姚紫的这些用语特点，因有别于一般，读来常让人感到耳目一新。

三、

当时的文坛讲求新加坡文学要有本地色彩，集小说创作及文学理论于一身的著名作家苗秀，曾撰文提出看法。他说：“我以为一个作家除了创造活生生的艺术形象外，还有提炼和创造新语言。使原有语言更加丰富的责任。作家应该懂得怎样从广大的复杂的群众口语中，选择最明确的最生动的语言，提炼加工，使成为艺术的语言。¹⁸”也因此，苗秀刻意在小说中频频使用方言词语，以致有研究者提出质疑，认为这样可能会削弱人们对文本的阅读理解¹⁹。相较于苗秀，姚紫使用方言词、马来语，甚或是英语词语，十分节制。这些词语，很多时候仅出现在人物的对话之中，借以增强人物的形象色彩。以下摘录一些例子，兹做证明：

¹⁸ 苗秀《写个一位青年的信》，见苗秀《文学与生活》（新加坡：星洲东方文化企业有限公司，1967），页193。

¹⁹ 陈世俊在《苗秀小说的艺术特色》一文中曾指出：“对不明了粤语的读者来说，简直犹如天书。”可见方言词语的使用，并不是人人都接受的了。这其实涉及了方言词取舍的问题。可参陈世俊《苗秀小说的艺术世界》，见新加坡文艺协会编《苗秀研究专集》（新加坡：新加坡文艺协会出版，1991），页201。

(一) 方言词

	方言词语	解释
(1)	财副 ²⁰	闽南话：指会计师
(2)	契兄 ²¹	闽南话：本指干哥哥，但在闽南话里，还可以指奸夫、姘头 ²² 。
(3)	红毛 ²³	音译词，指洋人
(4)	孟咖喱 ²⁴	音译词：指印度人
(5)	头家 ²⁵	闽南话，指老板
(6)	缠手缠脚 ²⁶	闽南话：指拖累或是妨碍
(7)	峇峇 ²⁷	闽南话：土生华人。这里是讽刺男主人公不懂该所学校文化。
(8)	大只 ²⁸	粤语：指大块头

(二) 还有少数的马来文及英语，摘录于下：

	马来文	解释
(1)	多隆 ²⁹	指请求
(2)	沙拉 ³⁰	错误或是犯错
(3)	马打 ³¹	警察

²⁰ 例：“我的父亲比我祖父幸运点，他念过几年书，在槟城当了十年‘财副’，转到新加坡做点小生意，可是后来，生意失败了，……”（《扒手拳下开传奇》，页4）

²¹ “狗娘养的！谁拿了你的钢笔，别认错了契兄！”

²² 参李荣主编《厦门方言词典》（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

²³ 例：“大你妈的，你就抬出红毛来，老子可不怕你……”（《扒手拳下开传奇》，页8）

²⁴ 例：“……和一个看门的‘孟咖喱’外，只剩我一人了”（《我做了小姐的跟班》，页34）

²⁵ 例：“有个头家的大女儿还没出嫁，吓，你还没结婚，大有希望！……”（《我有十万元的希望》，页42）

²⁶ 例：“缠手缠脚的！你来我更麻烦！”（《体贴》，页93）

²⁷ 例：“小吉！你实在是峇峇！……”（《学店辱命记》，页84）

²⁸ 例：“新加坡是禁止吃狗的城市，但是大只李总有办法……”（《亚历山大帝与一块羊肉》，页130）

²⁹ 例：“阿英病了，多隆你们明天来吧！”（《住屋的喜剧》，页18）

³⁰ 例：郑妈正经地说：“……怎么犯‘沙拉’呢？”（《娼妓·钱·姨太太》，页77）

³¹ 例：“……你拿马打寮来吓人！……”（《扒手拳下开传奇》，页8）

	英语	解释
(4)	派对 ³²	英语的 party
(5)	山峇 ³³	英语的 shamba
(6)	密司 ³⁴	英语的称谓: miss
(7)	密司脱 ³⁵	英语的称谓: mr
(8)	万兰池 ³⁶	英语的 brandy, 今日多译作白兰地

姚紫在处理上述词语时, 态度明显。若没必要, 他是不用的。如上举方言词及马来文, 多来自小偷与故事主人公口中, 强调人物所处地域。这些因是新加坡人日常口语中经常使用的词语, 读来易让人感同身受。刘抗分析马华作品中的口语问题, 提出: “口语不但必须适切人物的阶级, 并且必须能够表现出人物生长地或其长久居留地的言语特征, 与其社会生活的特点。”³⁷ 当时大家似乎一致认为, 小说要反映新加坡的风土民情, 小说作品中的语言, 是极为重要的。例如夏霖在1940年即提出他对这问题的看法。他说: “我以为对于加强作品的地方色彩, 与人物的典型性格, 方言在现阶段的情势下, 总比较白话文来得生动, 深刻, 便利点。”³⁸ 小说要反映这个多元种族杂居的新加坡, 作品中要夹杂多少方言词、马来语, 英语, 或是淡米尔语, 并没

³² 例: 一个头发梳得光贴的工资, 走了过来, 他微一向我点头, 面便发亮地转向她, 大谈前天他(她)们俱乐部所开的“派对”(party)的趣事, ……舞步是“山峇来得有味”(《我做了小姐的“跟从”》, 页29)

³³ 同上。

³⁴ 例: “哈罗, 密司陈, 今夜你也来呀? ……”(《我做了小姐的“跟从”》, 页29)

³⁵ 例: “哈罗, 密司脱李!”(《我做了小姐的“跟从”》, 页29)

³⁶ 例: 然后到中华餐室吃了一顿丰富的晚餐, 并且叫了一小杯“万兰池”酒助兴。(《我遇到了霸王妖姬》, 页33)

³⁷ 转引自金进《南洋抗战题材, 小人物与方言问题——马华资深老作家苗秀的小说特色研究》, 见骆明主编《新华文学评论集(二)》(新加坡: 新加坡文艺协会, 2012), 页308。

³⁸ 夏霖《方言文艺的普及与提高》, 见新马华文文学大系编辑委员会编《新马文学大系·第一集》, (新加坡: 教育部出版社, 19_ (出版年份不详)), 页53。

有定论³⁹。严格来说，姚紫没有相关的论著证明他对这问题的观点，但我们却能通过他的作品，间接看出作者对这问题的看法。总的来说，姚紫这方面的用语特点，值得一提。

四、

姚紫在小说中，偶尔会用一些较为少见的书面语，其中一些是古语词，或是文言表达，很多可在古籍中找到踪迹。例如：

例一、……问他，他_{戾然}答：“在新房子那边。”便掉头和别人说话了。
《我讨“政府”的房子》，页23

例二、“唉呀！我的老兄！我已同人家约定了。你不去不是害我失约？”他_{艾怨}起来……
《我有十万元的希望》，页42

例三、女孩子都喜欢_{捻酸吃醋}的——那不好呢！
《我做了小姐的“跟从”》，页28

例四、我不禁_{欣幸}自己运气不错，伴着一朵“解语花”，度过一个寂寞的星期六晚，……
《我做了小姐的“跟从”》，页28

例五、于是，我们_{计议}着怎样把现在的这间小房子改作“新洞房”，——
《住屋的喜剧》，页14

例六、接着，闲谈起来，我倒拜聆了这个未来上司的一套怪论——
《学店辱命记》，页81

³⁹ 当时马华作家在作品中夹杂方言，几乎蔚然成风。刘笔农直言：“当时的作家，喜欢运用各自的方言，如广东话：苗秀、赵戎、于沫我。写福建话多的，要算关新艺、白寒等”。刘笔农《再写苗秀》，见新加坡文艺协会编《苗秀研究专集》（新加坡：新加坡文艺协会出版，1991），页49。即便是当时著名的文艺评论家赵戎，也认为只要是新华小说，要突显本地色彩，应不避方言词语。赵戎：“我们南方人，应用南方话写作，也是理所当然的。”见新加坡文艺协会编《苗秀研究专集》（新加坡：新加坡文艺协会出版，1991），页245。

例一的“厌然”，与讨厌无关，是指安然的样子，如：宋 司马光《上体要疏》：“其议者固不能一，必有参差不齐者矣，於是天子称制决之，曰丞相议是，或曰廷尉当是，而群下厌然，无有不服者矣。”。这里是形容政府官员回答时的态度安然，其实是在摆官架子。例二的“艾怨”，指埋怨或悔恨。例三的捻酸，指的是吃醋或嫉妒。汤显祖的《牡丹亭》便有这用法：“便许他在那里，你却也忒捻酸”。例四的“欣幸”，指欣喜和庆幸，《汉书·桓玄传》：“百姓观者莫不欣幸”。例五的“计议”，指谋划或是考虑，可见于《管子·经重甲》：“计议因权，事之圆大也。”例六的“拜聆”，指恭敬地聆听着，是书面语。上举书面语，有些从上下文可推测其意思，有些却不易理解，例如“捻酸”便是很好的例子。

汉语逐渐走向双音节的过程中，新加坡建国前仍有好些作家，喜用单音节词语。⁴⁰ 不过，姚紫小说中单音节词语的使用，除了读来文言味道十足，还有好一些，用法特别。以下列举例子若干，加以说明：

例七、 “医生来了！”那年轻人低声说。

雷克从迷惘中一省，……

《亚历山大帝与一块羊肉》，页140

例八、 “呸！”那一个颌子凶凶地朝我吐了一口唾。

《扒手拳下开传奇》，页8

例九、 ……足上拖着履，……

《我有十万元的希望》，页43

例十、 我有点赧，一肚子话不知从何说起。

《他有一个“好”爸爸》，页49

⁴⁰ 如另一同时期的新加坡作家李汝琳，其小说也出现许多单音节词使用的例子；不同的是，姚紫的单音节词，用法有许多变化，应予以分析。参陈家骏《李汝琳〈漩涡〉语言研究》，见《南洋学报》，第63期，页68-70。

例十一、“谁要你管！”他愠着。

《他有一个“好”爸爸》，页49

例十二、他匆匆转身，走下楼，坐上那辆大型汽车，吩咐司机驶到加东路那“秘密的小巢”。

《红墨水池底风波》，页103

例十三、默了片刻，她的足尖忽动一动我的脚，笑吃吃地低声说：……

《我遇到了霸王妖姬》，页37

例十四、“你拉粪吃饭都在公馆，连家都不要了！”爸爸嘻着脸皮说……

《“公馆”与“菜头”》，页54

例十五、“所以，你就出来！”我诘道。

《娼妓·钱·姨太太》，页78

上举例子都让人感到奇特十分，这是因为其中好些单音节词语，今日多是以双音节词语的形式出现。如例七的“省”，今日常说“苏醒”。例八的“唾”，今日可说“唾液”，或说得白话些，可说“口水”。例九的“履”，即古文的鞋子。例十的“赧”，今日常说的是“羞赧”；而例十一的“愠”，今日也可改成“怒道”或“生气”。例十二的“驶”，今日以“驾驶”代之。姚紫有时还故意转换词性，以提升效果。如例十三的“默”，今日多是说“沉默”。这里显然是把多作为形容词的“默”，当作动词使用。例十四的“嘻”多与笑构成“笑嘻嘻”三音节词语，但在这里却变为动词，用法也是借用文言文的表达方式。例十五的“诘”，今日多写成“追问”或是“反问”。无论如何，姚紫单音节词，使用得相当多，夹杂在白话文中，读来甚是奇特，特此辟出一节说明。

五、

潘继成《标点修辞赏析》一书，提供好些例证，证明标点符号的恰当运用，不只是用于表示停顿、语气而已，还有助于提升语言的表达效果，甚至

能进一步展现修辞艺术⁴¹。这与陈望道先生在《修辞学发凡》所言，修辞是为了“传情达意”的这一概念吻合。潘氏梳理了不同标点符号的各种运用特色，值得借鉴⁴²。爬梳姚紫作品，不难发现小说中破折号的使用频率高，有好些早已超脱基本用法，值得一探。

（一）补充说明

这一类破折号的使用，是为了对上文进行补充。请看：

例一、 我本来租住在武吉知马的一间平屋里，房东是个老太太，只有一个儿子——在军港做工，由于工作关系，儿子住在军港的宿舍去，剩下唯一的一个房间就租给我，还包了一顿晚餐。

《住屋的喜剧》，页13

例二、 这一霎间，我觉得她很美！——鹅蛋型的面上，一双微弯的秀目，……

《扒手拳下开传奇》，页5

例三、 他今天的衣服穿得很整齐，——一副灰色秋绒西装，结着一条大红领带，十足公子哥儿的派头，……

《我有十万元的希望》，页40

例四、 使你的理想感到幻灭，使你觉得夫妇生活的可怕，——好像站在万丈深渊的边缘，虽然没有跌落下去，但是已经够你觉得怵目心惊，意志动摇，一股热情和勇气，象冰块似的在阳光中消溶了……

《住屋的喜剧》，页21

上举四例的特点一样，破折号都是作为上文的补充及说明的标志。如例一是进一步介绍房东太太的儿子；例二是补充说明人物的容颜；例三则是进

⁴¹ 参潘继成《标点修辞赏析》（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页1-2。

⁴² 标点符号的功能不应只是断句，不同用法，所呈现的功能及作用也自有不同。郭敏娜在《语言视觉修辞产生的基础及途径研究》一文中，指出标点符号还可制造“视觉”效果。关于标点符号的这一特点，本文正好可以用姚紫的小说对破折号的使用，加以证明。有关标点符号相关方面的更多论述，可参郭敏娜《语言视觉修辞产生的基础及途径研究》，长春理工大学（中国），硕士论文，2008年，页34-35。

一步说明主人公的朋友“老朱”的穿戴是如何的整齐；例四补充说明男主人公心中的担忧和惊怵。潘继成指出，这类用法，具有补正的作用，以弥补上文内容的不足⁴³。

（二）置于句子开头，作为自我独白的标志

一般来说，破折号不必置于句首，可姚紫却故意这么做，目的是把破折号当做自我独白的标志。请看：

例五、 ——黑暗的远方，在我们的面前展现开光彩的憧憬，使我的心坎又燃起理想的光艳，射穿远方的黑云，看到明天的太阳已经在缓缓的上升！
《住屋的喜剧》，页21

例六、 ——衬着那湛蓝色的天，海上的月亮象木梳般地已经升高起来，
——这夜，真美啊！
《我做了小姐的“跟从”》，页29

例七、 ——那天，说到这里为止，我以为他是开玩笑的，不料他倒认真起来，使我怪不好意思的。
《我有十万元的希望》，页42

例八、 “表嫂送给我的。”
——又是表嫂！我的头皮胀大了！……
《他有一个“好”爸爸》，页49

例九、 当时，我不明白爸爸为什么喜欢上“公馆”。而现在，我了解爸爸当日的苦闷。——这苦闷的都市，单调的气候，单调的地理，单调的生活，是多么威胁着每一个人呵！
《“公馆”与“菜头”》，页54

例十、 黯然合下书，把烟尾丢向窗外。他走到书橱边，抽出一本照片集——
他又一次怀念着她。
《秋恋》，页111

⁴³ 参同41，页36-38。

上举例五的前一段，是男主人公与爱人的对话。一对小情侣开心地说着对未来的憧憬，而这让男主人公心里兴奋不已，于是才出现这一段内心独白。例六说的是“小姐”带男主人公到泳池，二人对话的同时，男主人公看着“小姐”美丽的容颜，不禁春心动荡，最后才会如此赞叹道：“这夜，真美啊！”。这应该是一种移情的作用。例七说的是男主人公的朋友老朱说要带他相亲，谓若能当上有钱人的女婿，即可夫凭妻贵，摇身一变，成为上流社会的人。可男主人公一开始还以为老朱在开玩笑，没想到对方说的竟是真话，这才出现这一段内心独白。例八事情的缘起是这样的：男主人公女友的表哥用自己的老婆，也即是男主人公口中的“表嫂”来试探他，结果惹出好些事端。今日男主人公又听到“表嫂”一词，心中百味，既有感慨，也有惧怕。例九的内心独白，明显十分，无需赘言。例十说男主人公抽出照片集，紧接着，便道出内心仍对未婚妻的恋恋不忘。

（三）作为故事的过度，或是场景的转换

还有一类破折号的用法，是为了转换场景，或是作为故事的发展过渡。且看：

例十一、 真奇怪的今夜的“艳遇”！我连她的姓名都不知道，她却同我混得这么肉麻，……

——直到电影映完了，奏起英国国歌，我的灵魂始被诱入一个充满花草柳茵的脂粉地狱里，……

《我遇到了霸王妖姬》，页38

例十二、 楼上都是西式的陈列，中间沙发，茶几，两边挂着油画和英皇的照片。——我们一踏出梯口，就看见楼上的人们东一团，西一团的。

《“公馆”与“菜头”》，页55

例十三、 ……可是我们连一个谈话的地方也没有——最后，我们只好找上一家比较幽静的旅馆去。

《她走入猪圈里去了》，页62

例十四、 他皱着眉离开座子——抓起听筒。

《红墨水池底风波》，页123

上举数例的破折号，或转换场景，或突显心理变化，或是发展故事，作用各异。例十一说的是作者描写男主人公在遇到美女之后，所发生的事。例十二的破折号，目的相同。在叙述完眼前所见的事，作者紧接着在破折号之后，描绘踏出电梯门口所看到的环境。例十三在写完二人的对话，借用破折号一改场景，延续故事的发展。例十四，特地描写男主人公离开座位后做了些什么。除了这些作用，破折号在人物对话中，也可制造语气效果。且看以下的分析。

（四）制造语气效果

潘继成指出破折号在对话中，有调音蓄情的作用。在姚紫小说中，也确实出现了这样的用法。

例十五、 “你好噜嗦什么！小朱他们在公馆里等我打麻将呢！糟！快四点了，快走——”

《学店辱命记》，页83

例十六、 “找谁？”
“找你的——”她黠笑地，顿住不说。

《扒手拳下开传奇》，页11

例十七、 主人又指那位“姨太太”说。
“这位是小姐！秋芳——”

《我有十万元的希望》，页45

上举例子，旨在强调说话时的情感色彩。例十五的“快走——”，突显语气的急促；例十六是故意拉长“的——”，暗示说话者的意有所指；例十七的破折号，是特意利用破折号的视觉效果，拉长“芳”字，显示说话者强调“秋芳”这个名字。我们若把上举破折号换成省略号，会呈现不一样的效果。且看以下这一例子：

例十八、“先生，我是申请房子的，请问……”

《我讨“政府”的房子！》，页24

上举例子刻画主人公有求于人，说话不免小心翼翼，用省略号“……”来显示他卑躬屈膝的神态便十分传神。李火森指出这类特点，是一种“从视觉所能感知的非语言要素⁴⁴”。这是李氏在读了曹石珠《形貌修辞学》一书后，深有体会，这才提出这样的观点。破折号确实予人“视觉”效果，而这也是标点符号一种特别的功能，值得重视。

（五）蓄势酿情

潘继成指出标点符号还有蓄势酿情，表示还有“下文”。如以下例十九中的破折号，是为了表示自己心中的不认同，带出情绪色彩。例二十说的是男人主公第一次被朋友怂恿，到妓院嫖妓，没想到却碰上女友表哥的姨太太，这一惊吓，当真非同小可！姚紫在这里借用破折号带出主人公震惊的情绪。例二十一说的是故事主人公小吉为了生活，到一所学校当老师。他本以为老师的工作不忙，没想到接过功课表一看，看到教学时间这么长，不禁惊呆了。例二十二描绘男主人公黄国清发现了自己的姨太太同别人有私情。这两人不但能在不同时间和地点指出朋友出示的同一幅图的奥妙，连解谜题时所说的话也是如出一辙的。姚紫故意在“一张大床、一张小床”安置破折号，正表示这是破案的关键。

例十九、……大约不久就可升做“副经理”……——真是天晓得！我在大学念了一年就被开除了，英文是“半土白”的，在公司里做个小职员，薪水不过一百多块，……

《我有十万元的希望》，页43-44

⁴⁴ 参李火森《形貌修辞学》，《益阳师专学报》，1997年，第18卷，页120-121。

例二十、 是你呀！——天！我也怔住了！……

《娼妓·钱·姨太太》，页77

例二十一、 看看功课表——哎呀！一星期三十五节，每节三十分钟，共一千零五十分钟，……

《学店辱命记》，页83

例二十二、 “这个，你猜猜看，好笑在那儿？”
——一张大床，一张小床！

《咸瓜子》，页106

谢克在悼念姚紫的文章中，提及一件轶事。他说姚紫在报馆工作时，对文字、甚至是标点符号的使用，谨慎小心，要是排版工人排错了，他会因此大发雷霆，与排字工人吵架⁴⁵。姚紫重视语言的表达，从文字到标点符号，处处用心，由此可见一斑。姚紫标点符号的用法，有其独到之处，实不足为奇。

（六）小结

郑远汉指出，要认识言语个人风格，必须具体深入到言语中、作品中去分析⁴⁶。郑氏所言，一言中的。姚紫的文字给赞为“文字流畅、清丽”，主要是姚紫深谙文字该如何巧妙运用，方能突显效果。除了词语，有关姚紫作品的语言艺术，其实还可从句子的层面，深入探讨。黎运汉、张维耿在《现代汉语修辞学》中，指出如何组句成段，有所讲究⁴⁷。如姚紫就喜在行文中加入警句。警句指的是一些说理性文字，引人深思。此外，对于一些句子类的辞格的运用，姚紫也有其独特之处，应可加以探讨。本文因篇幅所囿，仅从文字、标点符号的使用这两方面加以探析，希冀能为这位马华作家的语言特点研究，稍尽绵力。

⁴⁵ 见同2，页161。

⁴⁶ 见同12，页362。

⁴⁷ 黎运汉、张维耿《现代汉语修辞学》（香港：商务印书馆，2000），页176-178。

从华侨、华人到华族： 印度尼西亚华族的嬗变

曹云华*

内容提要：印度尼西亚是海外华人人数最多的一个国家，该国华族是海外华人中历史最为悠久、最为多元化的一个族群。一部印度尼西亚华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就是海外华人在世界各地拼搏和奋斗历史的缩影。几百年前，印度尼西亚华侨带着梦想来到这块地方，然后在这块地方生根、开花和结果，经历了从落叶归根到落地生根的曲折历程，从华侨演变成华人最后成为住在国的一个少数民族群——华族。印度尼西亚华族是该国民族大家庭的一个重要成员，他们的前途与命运和住在国所有民族的前途与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关键词：印度尼西亚、华侨、华人、华族、同化、融合

* 曹云华，博士、华侨大学华侨华人与区域国别研究院特聘教授。厦门，邮政编码：361021

在大部分东南亚国家，当华人放弃中国国籍，成为住在国公民之后，其身份认同就发生了质的变化，即从华侨过渡成为华人和华族，¹ 这个过渡时期，大部分东南亚国家从上世纪50年代初期开始到上世纪70年代之前，只用了10年左右的时间。与大部分东南亚国家不同，印度尼西亚（以下一律简称“印尼”）华人真正成为一个被承认的少数民族——华族的时间要晚一些时候，直到1998年实行民主改革之后，才最终完成了这一转变，期间花了约半个世纪，这个过渡时期既漫长曲折，且充满辛酸和血泪，这是由印尼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特殊性所决定的。

一、学术回顾

印尼是全球海外华人聚居最集中、人数最多的一个国家，印尼华族是海外华人中历史最悠久，最为多元化的一个族群，印尼华族也是海外华人中饱经沧桑，曾经遭受过最多苦难的一个族群。长期以来，印尼华族一直是海内外华人研究学者高度关注的对象，国内外学者研究印尼华人（华族，下同）的成果非常丰硕，涌现出现许多研究印尼华人的著名学者。

¹ 在许多时候和场合，华人和华族是同时使用的，都是指同一类人，但在区别其他族群时，大部分都使用华族一词。在东南亚学者和英文书写的文件和学术著作中，一般都会称华族（Ethnic Chinese），唯有在中国大陆和港澳台地区才继续使用华人（Overseas-Chinese）一词。本文所引用的许多文献资料，按照中文原有的表述习惯，仍然称“华侨华人”。本文在大多数场合，使用的“华人”是中文表述的习惯，实际上是指“华族”。有时候，“华人”和“华族”是通用的，指同一类人。笔者认为，在东南亚，尤其是在印尼，区别“华人”与“华族”有重要的意义：首先，“华族”是作为一个少数民族的独立存在，表示一种族群认同，而“华人”却没有这个涵义，只是指一般意义上的人或公民；其次，苏哈托以前的执政当局一直不承认华族作为印尼一个少数民族的身份和地位，强调“华族”的族群认同，有利于印尼华族今后在印尼的生存与发展；再次，中国的研究工作者应该跳出中国本位，从海外华人的视角看待问题和分析问题，笔者非常赞同廖建裕教授如下观点，“其实，海外华人（相当于英语中的Overseas Chinese 或 Chinese Overseas）是从中国人的观点看事物，是以中国为本位。对于绝大部分的东南亚华人，这种称呼是不正确的。我们已落地生根，且拥有所在国的国籍，这是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家乡。我们不是在海外，反之，当我们去中国探亲访友时，才是‘身在海外’”。载廖建裕著《现阶段的印尼华人族群》，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八方文化企业公司联合出版，2002年，第125页。



我们可以把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印尼华人（华族，下同）研究学者分成三个世代：第一世代，1949年以前出生和成长起来的老一代学人，以周南京（已去世）、黄昆章（已去世）为代表，还有李学民、梁英明、梁立基、许友年、温北炎、蔡仁龙、温广益等人。这个世代的印尼华人研究学人以印尼归侨居多，他们在年轻时从印尼回国深造，在国内著名大学学习和工作，他们的研究重点多为印尼华人历史和文化，研究成果也主要聚焦在印尼民主改革以前的华侨华人。第二世代，出生于1950-1960时代（又叫50后、60后），这个世代的印尼华人研究学者多在国内接受教育，年龄在60岁上下，主要代表人物有曹云华、郑一省、吴崇伯、林梅等人。第三世代，出生于1970-1980时代（又叫70后、80后），我们可以把这个世代的学者叫做中青年学者，主要代表人物有韦红、李皖南等人。

北方印尼华人研究学者的著名代表是周南京教授（1933-2016年），为新中国印尼华人研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青年时期从印尼回国，在北京大学就读，毕业后留校工作，一直从事华侨华人研究，曾经担任北京大学海外华人研究中心主任。他主编的《华侨华人百科全书》是中国华侨华人研究的一个里程碑。周南京教授著有《印度尼西亚华侨华人研究》一书，还和其他人合作编著了《印度尼西亚华人同化问题资料汇编》和《印度尼西亚排华问题资料汇编》两书，这些著作作为后来的学者研究印尼华人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史料和文献。

厦门大学、中山大学和暨南大学集中了国内研究印尼华侨华人的主要力量。早在1985年，中山大学的温广益教授就与厦门大学的蔡仁龙教授等人合作出版了《印度尼西亚华侨史》（海洋出版社1985年）一书。南方从事印尼华侨华人研究的杰出代表是黄昆章教授（1937-2013年）。黄昆章教授是印尼归侨，早年从印尼回国学习，1966年南开大学研究生毕业后到暨南大学工作，长期从事印尼华人问题研究。黄昆章教授先是与李学民教授合作撰写了《印尼华侨史（古代至1949年）》一书（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后又单独撰写了《印尼华侨华人史（1950至2004年）》（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等著作，在海内外享有重大影响，黄教授先后在国内外期刊发表中文、印尼文



论文150余篇。与印尼华人相关的著作还有《从落叶归根到落地生根——世界华人研究文集》、《风雨沧桑五十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印尼华侨华人社会的变化》、《印度尼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等。

关于印尼民主改革时期华人社会的发展变化，中国学者也有一定的关注，多散见于一些论文，系统的研究成果却比较少。温北炎与郑一省合作撰写的著作《后苏哈托时代的印度尼西亚》（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是对民主改革初期印尼华人社会发展变化进行研究的有益尝试，在该书的第五章，专门对民主改革初期印尼各届政府的华人政策、华文教育、华人政治、华人经济、华人与当地民族的关系等进行阐述。曹云华、邓仕超和许梅合著的《东南亚华人的政治参与》（中国华侨出版社2004年）有专门一章研究印尼民主改革时期的华人参政的情况，该书出版时间较早，只是研究了民主改革初期华人参政的情况。

近年来比较系统和全面研究民主改革时代印尼华人的著作有曹云华、李皖南等人合著的《民主改革时代的印度尼西亚华人》（暨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出版），郑一省教授主编的《美达村华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出版）。这两本著作是国内研究民主改革时期印尼华人的代表作品。厦门大学的吴崇伯教授对印尼民主改革时期华人经济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他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有：“东南亚金融改革与政策效果评价”（《经济学动态》2002年10期）；“苏西诺政府的经济政策及制约因素”（《当代亚太》2006年12期）。

印尼本土的华人学者、企业家和许多有识之士对印尼华人社会在民主改革时期的发展变化也给予了高度的关注，他们纷纷撰写文章、编辑著作、发表演说，通过各种方式陈述他们对印尼华人社会的看法和反思。代表人物首推李卓辉先生。李先生1938年出生于印尼，祖籍福建南安，早年曾在华文学校担任过初中和高中教师，后来担任几家华文报纸的主笔，上世纪70年代还从事过企业管理，2001年开始担任印尼目前最大的华文报纸《国际日报》总编辑兼主笔。李先生长期热心研究印尼华人社会，研究成果丰硕，著作等身，在印尼华人社会有极大的影响。他先后出版了《坚强奋起 百年复兴》（印尼华文教育



史话系列）、《赤道火花 自强不息》、《民主改革时代政治风云》、《印华参选与国家建设》、《改革激流 迂回迈进》等著作，内容涉及民主改革时期的印尼华人政治、华文教育、华人社团、华社领袖等方方面面。此外，李先生还经常给新加坡《联合早报》和马来西亚《星洲日报》撰稿，发表针对印尼华人社会的评论文章。2014年，他在《联合早报》发表一篇题为《印尼华裔精英参政走向精明成熟道路》的文章，对民主改革以来印尼华人参政的情况进行了总结，他在文章中指出，民主改革时期印尼华人参政经历了从早期的恐怖、疏远发展到最近的参与和积极投身其中几个阶段，经过10多年的学习与锻炼，华人对政治事务越来越感兴趣，越来越熟悉，且“日趋成熟”。²

许天堂先生是印尼本土华人学者的杰出代表。许天堂1943年出生于西爪哇省库宁岸县，后移居雅加达，祖父为华商，父亲是作家，是第八代侨生（即土生华人）。许先生早年经商，1999年参与创办印尼华裔总会，担任中央理事会主席兼任雅加达分会主席。2002创立民族问题研究学会，任副主席。许先生的代表作是《政治漩涡中的华人》一书，原作为印尼文，后由周南京先生翻译成中文在香港出版（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该书主要研究印尼华人的历史，包括从早期华侨到印尼落脚一直到新秩序时期结束，是研究和了解印尼华人历史的一部不可多得的参考书。近10多年来，许先生经常受邀到海内外各类会议和研究机构演讲，还经常给各报刊撰写时政和华人的文章，许先生对民主改革时期印尼华人的观点散见于一些报刊和演讲稿。

新加坡是海外开展印尼华人研究的一个重镇，因其邻近印尼加上良好的研究环境，这里聚集了一批从事印尼华侨华人研究的专家学者，其代表人物首推廖建裕先生。廖建裕，1941出生于印尼，后到新加坡定居，先后在新加坡南洋大学、印度尼西亚大学读书，又到澳大利亚留学，后在美国华盛顿美利坚大学获博士学位，曾经在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新加坡国立大学、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任教和从事研究工作，曾任新加坡华裔馆馆长，长期从事印

² 李卓辉：《印尼华裔精英参政走向精明成熟道路》，（新加坡）《联合早报》2014年04月14日。



尼华人、族群、东南亚政治等方面的研究。其著作有中文、英文和印尼文等作品数十种，主要代表作有：《现阶段的印尼华人族群》（中文版、2004年）、《印尼原住民：华人与中国》（中文版、2007年）、《东南亚与华人族群研究》（中文版、2008年）、《印尼孔教初探》（中文版、2010年）、《理解东南亚华人》（英文版、2007年）、《当代印尼华族》（英文版、2008年）。近年来，廖先生还经常应邀到印尼一些大学和重要的会议发表演讲，这些演讲对我们了解和研究近10多年印尼华人的情况有极大的帮助。

总而言之，在本世纪初期以前，中国的印尼华人研究形成了南黄（即南方以黄昆章教授为代表）北周（即北方以周南京教授为代表）的基本格局，随着黄、周两位教授先后去世，这个格局被打破，第一个世代的学者大部分都还健在，但已经很少从事研究工作。现在从事印尼华人研究的主要力量由第二世代和第三世代的学者组成，再过若干年，就要由第三世代的中青年学者挑起大梁，引领中国的印尼华人研究走向新的时代。

二、印尼华族形成发展的几个阶段

印尼华族经历了从华侨到华人到再到今日华族的漫长而曲折的历史，大体可以分为如下三个阶段：华侨阶段（1953年以前）；华人阶段（1953年—1998年）；华族阶段（1998年之后）。1953年中国宣布放弃双重国籍政策，动员各国华侨加入住在国国籍，成为住在国公民，这是华侨过渡到华人或华族的分水岭。然而，绝大部分印尼华人虽然已经加入印尼国籍，成为印尼公民，但其政治忠诚仍然受到质疑，无法与印尼其他民族一样享受到公民的各种权利。印尼华人真正成为一个民族，那是在1998年之后，主要标志是印尼进入民主改革阶段，针对印尼华人的各种歧视政策与法律逐渐被废除，作为印尼公民的华族开始与印尼当地民族一道真正分享政治权利，印尼华族成为印尼民族大家庭的正式成员。印尼华族是一个非常复杂多元的群体，无论是从政治态度、经济收入、职业、文化教育、乃至生活方式等方面均是如此。我们在了解和研



究印尼华族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印尼华族的共性和个性、整体性和局部性的关系，既要看到他们的共性和整体性，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关注他们的个性和差异性。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家庭，不同的居住环境，不同的职业，不同的文化教育，不同的社会环境，塑造了多元化的印尼华族社会。

（一）第一阶段，华侨（1953年以前）

中国早在汉代就与印尼古代的一些王国有了交往，华侨华人的出现可追溯至这个时期。荷兰考古学家德·弗里斯研究印尼出土的中国陶器得出结论说，远在2000年前中国人已经漂洋过海踏上印尼国土。³ 隋唐时期，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官方和民间的交往逐渐增多，到了宋代，随着航海技术的提高，中国与东南亚海岛国家的贸易往来更加频繁，其中以印尼的一些古代国家为最，包括室利佛逝、三佛齐。明代航海家马欢的《瀛涯胜览》（爪哇国条）记载了许多中国人前往印尼的事迹。从中国古籍的记载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印尼古代已经有不少华侨华人居住，因为时间长了，慢慢就与当地入同化，他们信奉伊斯兰教，说本地人的语言，穿着本地人的衣饰。⁴

土生华侨社会的形成和发展。

在荷属东印度公司阶段（1602-1798年），华人较多地来到印尼的爪哇地区经商和贸易，许多人时间长了之后慢慢就定居下来，逐步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社群，这就是被廖建裕等学者称为土生华人的社群，即土生华人社会。土生华人社会形成的主要标志是：人口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的规模，足于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在土生华人内部形成了一种通用的公共语言，即峇峇马来语；土生华人一般实行内部通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各种原因，印尼的土生华人社会逐渐走向衰落。

³ 朱杰勤：《东南亚华侨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1版，第8页。

⁴ 冯承钧校注：《瀛涯胜览》，爪哇国条，中华书局1955年版。



新客华侨社会的形成和发展。

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量中国人移民到印度尼西亚各地，由于到达的时间较晚，华侨妇女也随着大批到来，华人族内通婚已经成为可能，与上述的土生华侨不同，这些新来者仍然较多地保留了中国故乡的生活方式与习惯，包括方言、宗教信仰、族内通婚等。这就是后来被学者们定义为“新客”的华侨社群。

外岛华侨社会的形成和发展。

上述把印尼华侨分为土生华侨和新客华侨两大类，主要适用于西方殖民统治时期到印尼独立以前的爪哇地区，而在印尼大量的外岛地区，生活着许多的华侨，他们与爪哇地区的华侨有着显著的差别。印尼号称千岛之国，各个岛屿之间的政治、经济、民族和文化的状况千差万别，正是这种差异加上外岛地区华侨来源地的差别等原因，造成了外岛华侨与爪哇华侨极大的差异性，他们在文化适应、文化认同等方面均具有自己的特点。

（二）第二阶段，华人（1953—1998年）

1953年4月19日，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国政府在万隆会议上宣布放弃双重国籍政策，同年4月22日，我国与印尼政府签订了《关于解决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随后，中国政府在与东南亚各国政府接触时，一再表示不再奉行双重国籍的政策。东南亚各国政府的国籍政策对华族的最后形成起到了直接的作用。战后初期，比较早允许华人加入当地国籍的是马来亚政府。于1957年成立的马来亚联合邦政府放宽了公民条例，使大部分华人有资格成为该国的公民。在短短的一年内，有一百多万人申请与被批准为马来亚联合邦公民。新加坡华人占该国人口的大多数，新加坡独立后，华人自动成为该国的合法公民。一些东南亚国家的政府出于各种考虑，迟迟不解决华人加入当地国籍的问题。在菲律宾，马科斯以前的几届政府均担心让华人取得公民权会使当地人无法与华人竞争，因此，给华人加入菲律宾国籍设置了种种障碍。直到1975年才欢



迎华人集体归化，让大部分华人取得菲律宾国籍。印度尼西亚政府对华人加入国籍的政策曾经出现多次反复，直到80年代初，才基本解决华人入籍问题。

印尼华人政治认同的转变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印尼当局最终全部解决华人的入籍问题，才最终完成这种转变的过程。温广益认为，到1979年，苏哈托政府加快了解决华人入籍问题的步伐，“到这年的4月底为止，印尼全国有820433名华侨申请加入了印尼国籍。由是华侨（包括无国籍者）只剩下30万左右，仅占华侨华人总数的5%。至此，在印尼的中国血统居民基本上完成了从华侨向华人的国籍身份的转变，亦即绝大部分华人在政治认同上已从中国转为印尼。”⁵

根据廖建裕的研究，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印尼华人的政治认同的转变是比较彻底的，目前，绝大多数已经在政治上认同印尼，而不再认同中国。廖建裕在1990年中国-印尼关系正常化之前曾经对129位印尼华人进行问卷调查，以了解他们对中国和印尼的看法。在这129位被调查者中，只有14.72%的人把中国当作是他们的祖国，他们想经常去访问中国并且希望继续保持华人的风俗习惯，另外41.86%的人视中国为他们的祖先的土地，他们并不感到有必要去访问中国，还有43.41%的人视中国为外国。在问到对印尼的态度时，93.79%的被调查者认为印尼是他们的真正的祖国，2.32%的人回答印尼是他们的第二祖国，1.55%的人认为印尼是一个做生意的地方，还有2.32%的人的回答比较含糊。当问到他们如何看待中国与印尼关系正常化的问题时，44.96%的人回答有利于商业和贸易，6.20%的人回答有利于他们去中国访问他们的亲戚，另外有24.8%的人认为，两国关系正常化为研究他们的祖先文化提供了一个好机会，24.03%的人回答，它不会对他们的生活产生什么影响。问卷调查还发现：

⁵ 温广益：“近二三十年来印度尼西亚华人政治认同的变化及其所带来的影响”，载于洪玉华、吴文焕主编：《华人：东南亚变化中的认同和关系国际会议论文集》，菲律宾华裔青年联合会出版，1994年，第181页。



只有5.42%被调查者仍然能够说和写中文，35.65%的人懂一些中文，其余的人则完全不懂中文。⁶

虽然到了上世纪80年代之后，绝大部分印尼华人已经加入印尼国籍，成为印尼的公民，但是，他们作为一个族群的身份却迟迟得不到承认，印尼当局也不愿意把他们当作一个少数民族看待，而是把他们打入另册，叫“非原住民”。“在苏哈托时代的印度尼西亚，对华人的歧视是公开的、合法的和赤裸裸的。最明显的是把人民分成两类——原住民和非原住民，华人及其他移民被归类为非原住民，甚至在他们的身份证上做上记号，实际上是把华人列入另册。苏哈托在1966年上台伊始，便下令将“支那”一词取代“中华”，这是对华人具有明显歧视的称呼。苏哈托政府对华人实行种族歧视的另一个最重要表现，是职业方面的歧视，即不让华人进入工商业活动以外的领域”。⁷

（三）第三阶段，华族（1998年—）

一般而言，大部分东南亚国家华族形成的最重要标志，是一国大多数华人放弃双重国籍而加入当地国籍，当大多数华人加入所在国的国籍，成为所在国的正式公民之后，则意味着该国华人已经从华侨演变成为华族。与其他东南亚国家相比，印尼华人成为一个被承认的少数民族的地位要晚一些时候，印尼华人真正成为一个族群，应该是从1998年印尼实行民主改革之后。印尼华族形成的标志——政治参与，即印尼华族享有与印尼其他民族同等的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权利。

民主改革给印尼华族社会带来的最重要变化之一，就是他们作为一个族群，拥有了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权利，这是作为一个国家的公民最起码的权利，最近20多年来，印尼华族积极参与国家政治生活，为印尼政治的现代化

⁶ Leo Suryadinata, "Ethnic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Overseas Chinese, Chinese Overseas or Southeast Asians?", from Edited by Leo Suryadinata, "Ethnic Chinese as Southeast Asians", Published by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Singapore, 1997, PP17-18.

⁷ 曹云华、李皖南等著《民主改革时代的印度尼西亚华人》，2014年，暨南大学出版社，第30页。



和民主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与此同时，印尼华族通过积极参与国家政治生活，也使整个族群得到了改造和提升，印尼华族在国家政治现代化和民主化的进程中努力学习民主，努力学习与其他兄弟民族和睦相处之道，印尼华族既是民主大学校的学生，又是民主的积极参与者和推动者。

印尼独立至苏哈托执政时期，从整体来看，华族对国家的政治生活几乎没有任何参与，当然也不乏一些优秀的华族被吸收作为政府的成员，参与政府事务的管理，但是，从华族作为一个少数民族整体来看，他们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没有应有的地位，也没有自己的代表，他们完全处在一种任人摆布，听天由命的境地。1954年3月13日，由各派别华社领袖组成国籍协商会，选举萧玉灿为主席，该协会的初衷是争取华族的公民权益，成立之后便积极参与了政治活动。1955年印尼举行独立之后的第一次民主选举（国会选举和制宪会议），国籍协商会参与了选举，一些大政党也派出华族代表参选。国籍协商会赢得一席（萧玉灿），政府另外委任7位华族议员。这个时期，虽然有不少优秀的华族进入内阁担任部长等职务，但囿于当时各种原因，他们基本上无法发挥作用。“独立后印尼政府内阁有如走马灯，部长座位不稳常被调动，从1945年到1966年，总共换了24届内阁。虽然有多位华族出任部长，如陈宝源、王永利、萧玉灿等被委任部长或国务部长，但为时不长，没有能发挥应有的作用与才华。”⁸

在苏哈托执政时期，华族的生命安全与财产安全都处在没有任何保障的恶劣环境下，他们无权参与国家的任何政治生活，在这个时期，在全国各地，各种大大小小的排华反华事件层出不穷，华族生活在极端恐惧之中。1998年发生的大规模排华事件，是苏哈托政权长期对华族实行种族歧视和压迫政策的总爆发。印尼华族学者许天堂先生对这个时期的印尼华族状况做出如下非常精辟的描述：“1998年5月悲剧非常刺痛全印尼华族的心，并且使他们意识到被边缘化和被变得无能为力。他们作为公民的权利大部分被阉割了，并且与印尼共产

⁸ （印尼）李卓辉：《印华参政与国家建设》，联通书局（印尼雅加达）2007年版，第171页。



党一起总是被当作替罪羊和掌权者压榨的对象。作为民族和种族，甚至作为人类的地位被鄙视。新秩序掌权者给予他们唯一的自由，是在企业领域，但是，没有政治自由，这种经济活动便变得毫无意义。”⁹

1998年开始至今，印尼推行了一系列的政治改革，印尼的学者称之为民主改革。民主改革中实行的各级各类选举和地方自治为印尼华族参与政治生活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从过去20多年的实践看，印尼华族可能而且应该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扮演积极角色，尤其是在地方自治中可以大有作为。实行地方自治，由人民直接选举地方各级行政首长，这是印尼民主改革和政治现代化、民主化进程中的重要一环，同时也赋予了华族参与地方自治的权利，为印尼各地区的华族积极参与地区政治生活提供了机遇。与总统选举和国会选举相比，华族参与地方政治事务的机会更多一些，门坎也低一些。据统计，自2005年实行地方直接选举各级行政首长以来，已经有一些华族精英当选为地方行政首长，他们是：西加里曼丹省上候县县长张锦坤、邦加和勿里洞省东勿里洞县县长钟万学¹⁰、西加里曼丹省山口洋市市长黄少凡、西加曼丹省副省长黄汉山、邦加和勿里洞省东勿里洞县县长钟万友、东努沙登加拉省副省长李振光、东爪哇省玛琅市市长魏延安等。

以山口洋市为例，该市是西加里曼丹省下属的一个城市。西加里曼丹省是印尼华族占比例最高的一个省份，全省约500万人口，华族约占20%，主要集中在坤甸、山口洋一带。在首府坤甸，约有60万人口，华族约占30%，以潮州人为主。在山口洋市，约有20万人口，华族约占62%，以客家人为主，有一部分潮州人，但都讲客家话。该市除华族之外，当地民族主要有达雅族、马来

⁹ （印尼）许天堂：《政治漩涡中的华人》，周南京译，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63页。

¹⁰ 钟万学在2012年与现任总统佐科维搭档竞选雅加达首都特区首长，并成功当选副省长。佐科维2014年10月成为总统后，钟万学随即升任为雅加达省长。2017年5月因亵渎宗教被判刑2年，后获减刑，2019年1月24日获释。



族和爪哇族。就山口洋市华族从政的基本情况来看，黄少凡曾在2007至2012年期间出任市长，而现任市长蔡翠媚也是华族。¹¹

华族之所以能够在上述地方取得成功，有几个共同的特点：一是华族占当地人口比例较高；二是华族与当地民族关系较为融洽；三是华族社会较为团结；四是这些县市均处在印尼的外岛地区，与当地其他少数民族群相比，华族文化较为强势。事实上，从印尼华族参政取得成功的实例来看，纵使是在华族人口占较大比例的城市，华族要取得竞选成功，也必须与当地民族打成一片，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代表他们的利益。印尼首位华族县长——张锦坤就是这方面的典范。张锦坤于2003年被西加里曼丹省上候县议会选举为县长（2004年之前印尼还没有实行直接选举）。他出生于当地一个客家农民家庭，是第二代华族，其父亲张建仁在30岁时由中国南来该县根巴岩村定居，并与当地主要民族达雅族人通婚。所以，张锦坤从小就能说熟练的达雅族语，还会说流利的客家话与潮州话。许多研究表明，民族通婚是促进民族融合的重要途径，张锦坤通过与当地民族通婚，与当地族群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也是他当选县长的关键因素。

因此，作为一个族群，印尼华族真正参与印尼的国家政治生活是从印尼实行民主改革以来至今20年的时间，它也成为印尼华族真正成为一个民族的标志。从1998年苏哈托下台到今天20多年的时间里，印尼华族经历了民主的洗礼，印尼华族与当地民族一道，共同推动印尼的政治改革与经济社会发展，他们既是这场改革的亲身经历者、参与者，也是受益者，他们与当地民族一道，共同促进了改革，同时也分享了改革的成果，在促进印尼社会进步的同时，也享受到了印尼社会进步的果实。华族是印尼民族大家庭的一个重要成员，印尼华族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印尼华族参政是代表全体印尼人民的利益，而不是一个少数民族群的私利。华族积极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不仅改变了华族自身，还促进了华族与当地民族的融合，从而极大地提升了整个印尼人民的素质。

¹¹（印尼）刘议华：《当选山口洋市长蔡翠媚》，（印尼）《国际日报》2017年2月25日。



三、谁是印度尼西亚华族

所谓印尼华族，是指祖先来自中国大陆，已经加入印尼国籍，成为印尼公民的华人或者华裔，是印尼100多个民族中的一个少数民族。本文把印尼华族看作是一个整体，这是从方便于进行研究的角度而进行的假设，其实，印尼华族是一个非常多元化的群体，无论是从语言文化、宗教信仰、职业、居住地、阶级与阶层等方面看，印尼华族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相当多元化的族群。印尼华族已经成为印尼民族大家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印尼就是印尼华族的祖国，华族与其他民族一样都是印尼的公民，印尼华族的政治效忠对象早就从祖籍国转移到印尼。

美国学者G. 威廉·史金纳认为，应该通过社会认同来确认印度尼西亚华族的身份。“印度尼西亚华人（即“华族”，下同——作者注）事实上指的是出生在中国的移民以及早期移民通过父系传下来的后裔。尽管如此，由于全国许多地方通婚和同化现象相当可观，人们按照简单的种族特征不能确定谁是华人，谁不是华人。……这样，华人的确切含义首先取决于其社会认同，而不是该种族在法律上或者文化上的特征。在印度尼西亚，倘若一个人自我认同为华人，他本人以华人社会的一员行事，接受华人的社会认同，那末，他就是华人。这种自我认同为华人以及加入华人社会体制的唯一可靠的文化特征是他们——至少在某种形式以及在某种情况下一都使用中国的姓。”¹²

廖建裕也同意上述观点，他认为，印度尼西亚华族是复杂的群体，其文化背景和生活条件都有差异。如果单纯从语言、名字、脸型和宗教来辨别印度尼西亚华族是很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因为许多华族已经不会讲华语，也使用了印度尼西亚名字，许多华族已经与印度尼西亚人通婚，在宗教方面，也有许多华族放弃了华族的传统宗教，改信伊斯兰教或西方的基督教。甚至有

¹² G. 威廉·史金纳：“华人少数民族”，转载于周南京等编《印度尼西亚华人同化问题资料汇编》，北京大学亚太研究中心出版，1996年，第589页。



许多人的脸型也变得越来越像印度尼西亚人。那么，应该怎样辨别印度尼西亚的华族呢？可以采取史金纳所说的社会认同的办法。因为，即使华族已经更换他们的名字，但是，印度尼西亚原住民或印度尼西亚华族还是能从这些人的言行举止中辨认出谁是华族。¹³

从目前的情况看，按照社会学的分层理论对现阶段的印尼华族进行分类也许是最为合适的一种分类方法。¹⁴ 从社会分层理论看，当前印尼华族是一个相当复杂和多元的群体，可以划分为上层华族社会集团、中层华族社会集团和下层华族社会集团。上层华族社会集团主要是指大企业、商人、政治家、教师、医生、律师等专业工作者、高级管理人员，他们应该在华族社会中居少数，约占5%左右，是华族社会的精英，属于上层社会集团，他们对华族社会的未来发展具有领导与导向的作用；中层华族社会集团，一般是指华族中产阶级，即拥有稳定的经济收入，从事白领等管理工作，小商人，中小企业家，这部分中层集团约占整个华族的25%左右；下层华族社会集团，一般是指生活在底层的华族，从事非熟练劳动，与大多数印尼人没有多少差别，有许多还从事农业、林业、矿业和渔业等方面的工作，收入较低且不稳定，没有什么技能。这部分下层集团占了华族的大部分，约占70%左右。¹⁵

¹³ Leo Suryadinata: "Government Policies Towards the Ethnic Chinese in the Asean States: Comparative Analysis", From "The Ethnic Chinese —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hanging Identities and Relations in Southeast Asia". Edited by Teresita Ang See and Yo Bon Juan. Manila 1994. P73.

¹⁴ 社会学理论认为，社会分层，是指根据一定标准对社会群体进行阶级、职业、收入、权力、地位、心理等方面的高低有序的等级层次的排列。阶层是指社会中处于某种特殊地位的社会集团。它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之外，处于相同地位的人们组成的社会集团。阶级划分的依据是经济，阶层划分的依据不完全是经济，职业、权力、受教育程度、社会声望等因素，都可以成为分层的标准。

¹⁵ 笔者根据多年来到印尼实地调研，与当地华族人士访谈等，得出的估计数字。以上比例在各个不同的地区也有较大差别，爪哇地区可能比较接近以上比例，而在大部分外岛地区，上层集团和中层集团所占比例较少，下层集团所占比例较高，例如在西加里曼丹省，下层集团的华族比例甚至超过90%。



表1：印尼华族数量的估计

学者/研究成果	估算值	估算年份
《华人经济年鉴1995》①	约600万	1994
《海外华人经济研究》②	600余万	1999
《华人经济年鉴（2000–2001）》③	1100万	2000
《全球化时代的华人经济》④	800多万	2003
“Space, Place, and Transnationalism in the Chinese Diaspora.”⑤	700多万	2003
《东南亚华侨华人数量的新估算》⑥	大约1000万	2009
“Chinese Indonesians: how many, who and where?”⑦	300万左右	2010
李卓辉（印尼）⑧	1300多万	2010
《当代印度尼西亚经济研究》⑨	800多万	2013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以下来源进行综合整理：

- ①华人经济年鉴编辑委员会：《华人经济年鉴199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 ②单纯：《海外华人经济研究》，海天出版社1999年版。
- ③华人经济年鉴编委会编著：《华人经济年鉴（2000–2001）》，朝华出版社2001年版。
- ④廖小健、刘权等：《全球化时代的华人经济》，中国华侨出版社2003年版。
- ⑤Laurence Ma, “Space, Place, and Transnationalism in the Chinese Diaspora.” *The Chinese Diaspora. Space, Place, Mobility, and Identity*, New York: Rowan & Littlefield, 2003.
- ⑥庄国土：《东南亚华侨华人数量的新估算》，《厦门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
- ⑦Evi Nurvidya Arifin, M. Sairi Hasbullah & Agus Pramono, “Chinese Indonesians: how many, who and where?” *Asian Ethnicity*, Vol.18, No.3, 2017.
- ⑧李卓辉先生根据2010年印尼全国人口调查的相关数据，对印尼华族的人数进行了重新估算，据他的新估计，到2010年止，印尼全国的华侨和华族总人数约为1300多万（详见李卓辉：《印尼华人的现状与展望》，（香港）《印尼焦点》2012年6月30日号，总第34期）。
- ⑨吴崇伯：《当代印度尼西亚经济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10页。

表2：印尼人口数量变化

年份	2000	2010	2021
人口数量（百万）	211.51	241.83	276.36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https://data.worldbank.org/cn/country/indonesia?view=chart>）。

印尼华族究竟有多少人？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从表1可以看到，学界对印尼华族数量的估算有很大的差别。需要注意的是，西方学者在2010年的估算，是在印尼官方人口普查的数据基础上，通过调查问卷的形式得出的，鉴



于部分华族可能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华族属性，因此，西方学者的估计数据是偏低的。比较多的学者倾向于把印尼华族占印尼人口总数的比例界定在4%—5%之间，而根据表2，可以看出印尼人口的阶段性变化。因此，我们可以简单地推测目前印尼华族的总人数在1000万到1300万左右。如果按照李卓辉先生的估算方法，则比这个数字要略多一些。李先生按照同化的程度和是否懂华文作为根据，把当前印尼华侨华族划分成如下三大类：

第一类，懂华语，了解中华文化的华族，他们均为印尼公民，全国约有300多万人。

第二类，土生华族，即在印尼土生土长，有些已经是第四代、第五代甚至是第六代以上的华族。总数在1000万以上，“大多不懂华文华语和传统中华文化。爪哇外岛有些会讲华语，但不能读不能写，这些土生华族很多自称是‘印尼公民’，不自称为华族，目前爪哇各地约90%以上归属这一类。”李指出，为什么印尼政府的人口统计中只显示全国仅有300多万华族，主要原因，就在于这1000多万土生华族的族群认同出现问题，“目前印尼1000万土生华族，正出现比当年林文庆所指出的更为恶化现象，因此，他们大部分民不承认是‘华族’，而只填写‘印尼人’，人口统计中‘华族’大幅度下降的原因即在于此。”

第三类，新移民，即华侨。这部分人目前可能在50万人左右，主要来自约1000多家进入印尼的大陆国有中资企业，还有2000—3000家来自大陆的私营企业，加上台资企业500多家的员工、管理人员、技术人员、从事经贸活动的商人等。其中台资企业员工约5万人以上，还有一小部分留学生及一些流动性很强的新移民（包括港澳地区和新马等国的华族）。这部分人分布极广，主要在爪哇地区，但在一些偏远地区，如巴布亚、加里曼丹等地也有中国的新移民。¹⁶

¹⁶（印尼）李卓辉：《印尼华侨华人现状与展望》，（香港）《印尼焦点》2012年6月30日号，总第34期，第45页。



按照李先生以上的估算方法，印尼华族（包括新华侨华人）占印尼人口的比例约为6%，他在2010年估算印尼华族约为1300多万，按照印尼现在的总人口2亿7636万人口（2021年）计算，目前印尼华族约为1600多万人。

民主改革和政治现代化、民主化的进程，给印尼社会带来了深刻的变化，毫无疑问，也使印尼华族社会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为印尼华族社会的发展带来了空前的机遇，同时也带来了许多新的挑战。华族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焕然一新，取得了与主流社会平起平坐的位置，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开始扮演十分活跃的角色。民主改革20多年来，印尼华族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具体表现在如下五个方面：

1. 华族的公民权利逐步正常化。在苏哈托执政时期，华族的公民权利受到严重的践踏，华族的生命安全得不到应有的保障，更谈不上其他经济、社会和政治权利。进入民主改革时期之后，随着印尼民主和法制逐步迈入正轨，各种歧视华族的法律、法规和政令被废除，华族作为国家公民的地位得到确认和应有的尊重。实际上，民主改革时期的每一位领导人都在努力促进华族公民权利的恢复和正常化，是积小步为大步，积小胜为大胜，经过前后几任总统的努力，印尼华族的公民权利出现了从量变到质变的转化过程，最终完全正常化。

2. 华族社团迅速壮大发展。海外华侨华人都喜欢组织自己的社团，印尼华族也没有例外，但是，在苏哈托执政时期，印尼人民不允许自由结社，同样，印尼华族也被剥夺了这个权利。在民主改革时期，华族组织社团的禁令被解除，华族组织社团的积极性空前高涨。民主改革让华族在各个领域里都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各种以同行、同乡、同窗、同宗为类别的乡亲会、宗亲会、校友会，像雨后春笋般相继成立；有些华社会团体之间内部有矛盾，但能通过和平协商得到解决；各种团体经常举办时事论坛、健康讲座或专题座谈会等。

3. 华文教育空前繁荣。在苏哈托执政时期，华文学校和教育被严厉禁止，华族连讲华语都受到严密控制。苏哈托下台之后，关于华文教育的各种禁令被取消，各类华文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华族学习华语的热情空前高涨，华文教育出现一片繁荣的景象。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印尼全国有较大



规模的“三语学校”50多家（所谓“三语学校”，是指同时教授三种语文，即印尼文、中文和英文的学校），印尼华族的办学热情持续高涨，他们不仅兴办幼儿园、小学和中学，近年来还积极兴办大学。例如，位于苏北省棉兰市的亚洲国际友好学院，该学院除了设立有英文、印尼文等专业之外，中文系是最重要的系，吸引了当地大量的华族子弟前来学习华文。

4. 华文媒体迅速扩张。与华文学校和华文教育一样，华文传媒在民主改革时期也得到了迅速扩张，全国各地出现数十家华文报纸和刊物，同时出现了华语广播电台和雅加达华语电视《美都新闻》节目。全国性华文报纸有《国际日报》、《印尼星洲日报》、《商报》和《千岛日报》，地方性的华文报纸有《坤甸日报》、《泗水晨报》、《棉兰日报》、《讯报》（棉兰）和《印广日报》（棉兰）。此外，还出现一些不定期出版的华文刊物，如《呼声》等。

5. 华族经济社会生活日益多元化。印尼民主改革的一个重要成就，是整个社会变得更加开放，华族从事工商业以外的工作机会变得越来越多，换一句话说，是指印尼政治现代化和民主化，导致经济社会开放度的增加，给华族从事工商业以外的职业提供了机会和打开了大门。长期以来，印尼与其他东南亚国家一样，华族精英一直被限制在工商业领域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很少有人从事工商业以外的各种工作，如政府公务员、警察、军人等职业。进入民主改革时代，越来越多华族精英从传统的工商业领域走出来，开始从事各种专业工作。东南亚各国华族经济社会发展历史表明，从事工商业之外的各种专业工作，有利于华族与当地人的融合和理解，也有利于华族以更加宽阔的视野参与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真正发挥公民的作用。

四、同化还是融合

这里说的同化还是融合，指的是印尼华族与当地民族的关系，主要是探讨印尼独立建国至今，印尼华族与当地民族关系的历史演变与发展趋势。从印尼独立建国至今，印尼华族与当地民族的关系经历了如下三个发展阶段：两种民族主义对立的阶段，歧视型同化阶段，融合阶段。在经历这三个阶段的发展演



变之后，印尼华族社会终于为自身和子孙后代在印尼长期生存与发展确定了一条正确的道路，那就是与当地民族和睦相处，融入当地主流社会，与当地民族一道共同努力，建设共同的祖国和共同的家园——印度尼西亚。

（一）第一阶段，两种民族主义对立的阶段（1945—1964年）

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印尼出现一连串的反对和排斥华侨华族的事件的原因，学者们有各种各样的解释，经过几十年之后，再回过头去作冷静的思考，我们不难发现，它实际上是两种民族主义激烈冲撞的结果。印尼华侨华人的民族主义与东道国的民族主义到了战后初期均达到了顶峰，在一个民族国家内，两种极端的民族主义是不大可能长期并存且相安无事的，它们必然发生矛盾和冲突，在冷战这一国际环境因素的刺激下，这对矛盾更是显得不可调和。

印尼当地的民族主义发轫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到了顶峰。印尼当地民族的民族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分可分为如下两个时期：

第一时期，从19世纪末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主要表现为反对西方殖民统治和压迫，争取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在这个时期，华侨华人与当地民族一样，是受压迫者和受剥削者，因此，他们与当地民族一起，积极参与了反对荷兰殖民统治的斗争，为印尼的民族独立和解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印尼当地民族的民族主义尚处于萌芽状态，而且其主要矛头是针对西方殖民者，因此，华侨华人的民族主义还没有与当地的民族主义发生正面的冲突。

第二时期，印尼获得独立后。印尼独立国家建立之后，面临的主要任务，是维护国家的独立、统一和发展，当荷兰殖民者被赶走之后，印尼的民族主义者便把主要矛头转向华侨华人，当地民族中的政治精英把华侨华人看作是实现他们的政治经济领导权的主要障碍。他们制定和实施一系列极端的华侨华人政策，旨在改变华侨华人的政治认同和削弱华侨华人的经济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至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冷战格局，对印尼当地民族的极端民族主义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们视华侨华人为中国的“第五纵队”。



印尼华侨华人的民族主义（视中国为自己的祖国）产生于19世纪末，到了辛亥革命前后达到了第一次高峰，主要表现为印尼华侨华人对孙中山发动的反清革命的支持。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达到了第二次高峰，它以印尼华侨华人对祖国抗日战争提供的各种支援为重要标志。第三次高峰则出现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新中国的成立再一次激发了印尼华侨华人的民族主义情绪，许多华侨华人对新中国的热爱和向往达到了如痴如醉的地步。他们在当地唱新中国的国歌，悬挂新中国的国旗，阅读来自中国的各种报刊，甚至上街游行，表现出非常激烈的爱国主义热情。许多华文学校使用从新中国输入的教材，教导孩子们唱中国国歌，每天在学校升起新中国的国旗。

在战后初期，华侨华人的民族主义与印尼当地民族的民族主义都发展到了顶峰，从而直接引发了许多冲突。战后初期印尼华侨华人过分膨胀的民族主义显然不利于华侨华人在住在国的生存和发展，它所带来的许多消极后果极为严重和深远。由于实现了国家的独立，西方殖民者已经离开，而此时华侨华人的民族主义却日益高涨，于是，印尼民族主义与华侨华人的民族主义展开了正面冲突。印尼当地民族的民族主义具有如下三个方面典型的特征：1）明显的极端狭隘的种族主义；2）把改变华侨华人的政治效忠对象作为重要的政策目标；3）奉行经济民族主义，对华侨华人经济实行本土化政策。

（二）第二阶段，歧视型同化阶段（1965–1998年）

同化有两种，一种叫平等型同化，所谓平等型同化，是指结果而言，就是说，一旦华族被同化和融合进当地主流社会之后，他就拥有了与当地民族同样的各种权利与自由，不管是在政治方面，还是在经济方面或文化教育方面。在泰国和菲律宾，在政府和军警等历来被当地民族垄断的领域担任高层领导职务的华裔比比皆是，在其他行业和领域，华裔也受到与当地民族一样的同等对待。在泰国和菲律宾，正是这种平等的同化政策，才加速了华族社会的当地化——泰国化和菲律宾化，有些学者把这几个国家华族的同化过程归结为自然同化。



另一种是歧视型同化，也有些学者称为强迫型同化，当年的印度尼西亚和越南属于这种类型，尤其以印度尼西亚为典型。种族歧视通常是指具体的行动或行为，其目的是要阻止某个民族集团的成员获得与其他民族同等的权利与利益。通常是占统治地位的民族集团的成员或者是其代表采取各种行动或实践，严重伤害处于从属地位的民族集团的成员的利益和权利。严重的种族歧视使一些少数民族集团处于被孤立的状态，无法真正融入主流社会，长期处于社会的边缘，从而导致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分裂与对立。

与平等型同化政策相比，歧视型同化政策的最大特征，是对被同化的华族继续实行歧视性的政策。在漫长的岁月里，华族与印尼当地民族长期共同生活，除了在皮肤、眼睛等外型方面外，已经与当地民族没有任何差别，他们在语言、宗教、价值观、生活方式等方面完全与当地民族打成了一片，尽管如此，华族仍然被当作是异类，仍然受到不平等的待遇甚至受到歧视，他们对印度尼西亚的忠心仍然受到怀疑，他们仍然被看作是一个与当地民族不同的“排他性集团”。

在这个阶段，虽然大多数华侨华族已经加入印尼国籍，成为印尼公民，然而，他们却被排除在印尼民族大家庭之外，印尼当地民族的一些精英仍然认为，华族不能算是一个少数民族，而只是一个还没有被完全同化的排他性集团，解决华族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采取一切手段将他们完全同化，使他们完全失去自己的种族特性，真正融合到印度尼西亚社会中去，成为印度尼西亚民族大家庭的一个成员。¹⁷ 前总统苏加诺认为，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不承认有“少数民族集团”。“在印度尼西亚没有少数民族集团，自然也就没有多数民族集团。印度尼西亚人民或印度尼西亚公民只由一个民族即印度尼西亚民族组成。”¹⁸ 苏哈托时期的专业集团的观点更有代表性且更为露骨，“到

¹⁷ 曹云华著：《变异与保持—东南亚华人的文化适应》，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10年，第119页。

¹⁸ 周南京等人编：《印度尼西亚华人同化问题资料汇编》，北京大学亚太研究中心出版，1996年，第565页。



底何谓少数民族问题呢？如果我们仔细地研究一下，那么，少数民族问题实际上是尚未实行同化的问题。直到目前，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还可以遇到这样的情况：社会公众仍然把外裔印度尼西亚公民看作是无法同多数民族集团共生死同命运的外来因素，因此，外裔公民的许多利益也就不同，也正是因为如此，从而认为对他们的活动范围、权利和义务加以限制是非常适当的。正当的同化过程会培养人们的‘印度尼西亚民族感’。同化意味着外裔集团成员以个人的方式加入或被吸收到如此巨大的印度尼西亚民族整体中去的一个结合过程，从而使那些特殊集团最终不再存在。我们目前所进行的努力应该包括：消灭一切阻碍同化过程的因素，包括消灭生活上各个方面的排外主义在内；发展一切能够加速同化过程的因素。”¹⁹

（三）第三阶段，融合阶段（1998年— ）

1998年苏哈托政权垮台，印尼进入民主改革时期，民主改革时期的历届印尼政府，逐步放弃了苏哈托长期一直推行的对华族歧视同化政策，转而实现民主平等的融合政策。何为融合政策，就是各民族不分大小一律平等，各民族和睦相处，享有同样的公民权利，允许弱小民族和少数民族保留自己的文化，享有各种自由，从此，印尼华族才成为真正意义的一个少数民族，真正完成了身份的转变——从华侨、华人到华族。

在东南亚国家，菲律宾华族最早提出融合理论并且最早付诸实施。菲律宾华族知识分子把这种模式叫做“融合”、“非中国化”或叫“菲律宾化”。菲律宾的融合模式既不同于印度尼西亚，也有别于泰国，是菲律宾华族根据菲律宾的国情而选择的一条独特的道路。菲律宾华族问题研究工作者德里西塔·昂·西认为，菲律宾华族的这种“非中国化”不论对华族本身还是对东道国菲律宾，或是对菲律宾华族的母国中国，都是有益无害的。融合理论的

¹⁹ 周南京等人编：《印度尼西亚华人同化问题资料汇编》，北京大学亚太研究中心出版，1996年，第559-560页。



实质，是鼓励菲律宾华族正视现实，不要再固守在新的历史时期已经无法坚持的阵地，全副身心投入到菲律宾当地社会，成为菲律宾的公民，为菲律宾的国家建设作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其实，印尼华族中也有许多有识之士提出融合理论，他们中首推印度尼西亚中华党的创始人林群贤，他认为，当新的印度尼西亚建立时，华族应该成为印度尼西亚人，²⁰ 印尼独立建国之后，萧玉灿也主张华族要融合进印尼民族大家庭，华族要爱印度尼西亚这个国家，但是，必须保留自己的文化特征。²¹ 一般认为，华族能否融入主流社会还取决于内外部条件以及自身的立场与态度等，需要具备如下三个因素：1) 住在国“主流社会”能提供华族融入的外部环境；2) 华族自身要有融入的条件，包括要有一定的教育背景、文化素质（尤以语言为主）与经济基础；3) 融合不但不会给当地社会增加压力与产业竞争，而且还可以让政府与当地民族明显的感觉到会对他们有利。1998年民主改革之后的印尼显然具备了上述三个条件，印尼华族身份认同也就顺利完成了艰难的转变。

五、小结

华侨—华人—华族，只有一字之差，但却反映了印尼政治经济和社会各个领域巨大而且深刻的变化，笔者把这个转变概括为“嬗变”，也就是说，这种变化不是一般的量变，而是质变，是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这种从量变到质变的漫长过程和最后出现质的飞跃，也不是只发生在华族身份认同的变化方面，还包括印尼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的深刻变革，以及印尼华族与当地民族关系的兑变。事实上，只有后两个方面发生了变化，才能有印尼华族的诞生，印尼华族的梦想才能真正实现。这种巨大而且深刻的变化具体表现为如下三个方面：

²⁰ 周南京等编：《印度尼西亚华人同化问题资料汇编》，北京大学亚太研究中心编辑1996年版，第41—42页。

²¹ 周南京等编：《印度尼西亚华人同化问题资料汇编》，北京大学亚太研究中心编辑1996年版，第76页。



（一）反映了印尼从独立建国至今成为一个现代国家所经历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的改革与发展进程

印尼学者一般把印尼独立建国之后至今的历史分为如下几个发展时期：革命时期（1945–1950年），议会民主时期（1950–1959年），有领导的民主时期（1959–1965年），新秩序时期（1966–1998年），民主改革时期（1998–）。²²所谓民主改革时期，是指1998年苏哈托政权垮台之后至今20多年的时间里，印尼国内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改革，包括实行普选制和地方自治等。在这20多年的时间里，印尼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各个领域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最深刻的变化，就是印尼华族作为一个少数民族得到了国家和制度层面的认可，印尼华族作为一个少数民族的权利得到了国家的承认和尊重。

进入民主改革时期之后，随着印尼民主和法制逐步迈入正常轨道，各种歧视华族的法律、法规和政令被废除，华族作为国家公民的地位被重新确认。实际上，民主改革时期的每一位领导人都在努力促进华族公民权利的恢复和正常化，是积小步为大步，积小胜为大胜，经过前后几任总统的努力，印尼华族的公民权利得到了国家的承认和法律的保障，最终完全正常化。印尼华族社会普遍认为，进入民主改革以来的历任总统均在促进印尼华族与当地民族的关系正常化方面有所作为，为印尼华族顺利融合到印尼民族大家庭做出了积极贡献。

²² 1997年下半年在泰国金融危机的引发下，印尼出现金融危机，政局严重动荡。1998年3月苏哈托第七次蝉连总统，哈比比为副总统。1998年5月13、14日，印尼雅加达等地发生几十年来最严重的攻击华人的骚乱事件，给华人的生命财产造成极为严重的损失，印尼出现了政局的全面动荡和政治、经济、社会的空前危机。5月20日苏哈托在人民示威和众叛亲离中被迫交权给哈比比副总统，哈比比出任印尼共和国第三任总统。印尼开始进入民主改革的时期。1999年6月印尼举行三十多年来第一次自由、民主的全国大选，共有48个政党参加，苏加诺女儿梅加瓦蒂领导的民主斗争党获33.76%的选票成为议会第一大党。1999年10月人协大会投票选举伊斯兰教士联合会主席瓦希德为印尼共和国第四任总统、梅加瓦蒂为副总统。2001年7月23日，印尼人协特别会议通过了罢免总统瓦希德的决议，同时任命梅加瓦蒂为印尼第五任总统，任期至2004年。2004年10月，苏西洛·班邦·尤多约诺就任印尼总统；2009年7月，苏西洛竞选连任，担任第二个任期总统至2014年。2014–2019年，佐科·维多多担任印尼第八任总统；2019–2024年，佐科·维多多连任第二个任期的印度尼西亚总统，任期至2024年结束。



（二）反映了印尼当地民族对华族认识的变化过程

进入民主改革之后，印尼已经从政治制度和国家的层面排除了各种不利于华族甚至是排斥华族的政策、法律和法令，逐步实现了华族与印尼各民族平等。然而，在个人认知层面和思想意识层面，印尼当地主流民族对华族的一些偏见和歧视仍然是存在的，甚至是根深蒂固的，有学者把这种对华族的歧视和偏见概括为“厌华”情绪。所谓“厌华”，是指讨厌或不喜歡华族的情绪或是心理。泰国法政大学张锡镇教授以泰国为例，分析近年来泰国民众对中国及新华侨华人移民的不满情绪和负面观感，他把这种不满和负面观感概括为“厌华情绪”，并且指出其三个特点：一是媒体对中国的负面报道增多；二是知识界对华反感情绪尤甚；三是在民众中波及范围广，影响大。²³ 其实，张锡镇教授这里说的“厌华情绪”，不仅在泰国社会存在，在印尼也不同程度地存在，只是表现形式和发展的趋势不同罢了。在当前印尼当地民族中，“厌华情绪”主要表现为：印尼当地媒体经常会借题发挥，发表一些对华族不太友好的言论；当地民族一些精英人物时常会把华族某些个别人的一些不良行为夸大为整个华族的表现，借以给整个华族抹黑；在全国大选和地方选举时期，一些政党和政治人物为捞取选票，时常利用一些事件，散布一些不利于华族的言论，挑动当地民族对华族的不满；一些精英人物任意夸大华商和华族企业在印尼经济生活中的比重，把印尼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如贫富悬殊等，嫁祸于华商；等等。

（三）反映了印尼华族形成和发展的艰难历程

这是一个充满艰难困苦和荆棘丛生的历史过程，也是印尼华族不断学习和适应的过程，在这个漫长的历程中，印尼华族付出了沉重的甚至是血的代价，终于适应和融合进了印尼民族的大家庭，成为印尼民族大家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成员。对于印尼当地民族而言，他们在长期与华族相处的过程中，也逐

²³ 张锡镇：《中泰关系近况与泰国社会中的厌华情绪》，《东南亚研究》2016年第3期。



渐从反感、排斥、不适应到接受和认可。前几年去世的华族企业家潘仲元先生关于印尼华族与当地民族的融合理论颇具代表性，潘先生把美国与印尼的华族社会进行比较，他认为，无论是从过程还是目的看，印尼华族真正融入当地主流社会的路程还相当长，任务仍然很艰巨：1）印度尼西亚主体民族对外来民族的包容性较低，仍与美国相距太远，不像美国具有国际上最好的，足以提供华族融入主流社会的外部环境和融入美国主流社会内在的充裕条件。2）美国的华族、华商、华裔正在快速而健康的融入到美国主流社会之中。虽然还有相当漫长的路要走，远未达到可以得意与自豪的境地，但不管怎么说，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的华族、华商、华裔，将有力的提升华族全球化的国际形象，这不但能对中美经贸关系起推动作用，进而在改善中美政治关系方面也将起到积极作用。在印度尼西亚，华族、华裔们所憧憬和期待的，也正是这种景象。3）国内外——尤以印尼为主的华文媒体、华族、华裔社团，应认真探讨、努力引导海外华族以主动、正确的态度和方式，融入当地主流社会。过分传播、宣扬与夸大海外华族的财富以及在当地政治上的影响力，会诱发当地其他族裔的不平衡心态，引起和造成人们的敏感与反感，这是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倾向，实际上是在对海外华族帮倒忙，更不利于印度尼西亚“和谐社会”的建立。²⁴

印尼华族经过漫长的艰难摸索，他们逐步明白了这样一个真理，那就是印尼华族的前途与命运和国家的前途与命运是紧紧地扭在一起的，只有国家发展了，全印尼人民过上了好日子，华族才能有一个真正稳定、幸福的家园。正如印尼华族著名学者许天堂先生所说：“为实现公正和繁荣、民主，没有贪污受贿、相互勾结、裙带关系，没有形形色色歧视，并且没有各种形式的暴力以及始终尊崇法律和基本人权的新印度尼西亚，显然还需要做出牺牲和经历漫长的时间。正是为此，华族作为印度尼西亚民族不可分割的部分，必须积极地参加，与其他民族携手合作，肩并肩地为实现上述理想而共同斗争。

²⁴（印尼）潘仲元（H. Max Mulyadi Supangkat）：《浅谈华人、华裔融入主流社会——印尼的华裔们都已融入主流社会了吗？》，2008年5月，由香港印尼研究学社陈平先生（已去世）提供中文稿，中文没有公开发表。



因为一切形式的歧视问题，包括‘华族问题’，是整个印度尼西亚民族的问题，华族不可能单独解决这个问题，只有实现我们所追求的新印度尼西亚，才能解决这个问题。”²⁵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Lee Kuan Yew, 1923–2015年）曾经论述过关于东南亚华族的心路历程，对我们今天理解印尼华族的嬗变过程也许会有很大的帮助，他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在香港举行的华人企业家大会上指出“我们是华族。但我们必须实事求是的承认，归根到底，我们是效忠于自己居住的国家而不是中国。……我们离开中国已有两三代人，现在我们扎根于我们自己的出生地。与我们利害攸关的是自己所居住的国家而不是我们先辈移居来此之前所在的中国。泰国华人是泰国人，归根到底，他们希望泰国繁荣起来以使他们在泰国的财富会有所增加，他们在泰国的子女的前途能得到保障。新加坡籍华人、印度尼西亚籍华人、马来西亚籍华人以及菲律宾籍华人的情况也大致如此。他们可以频繁去访问中国和在那里投资，但很少有人会把中国看成是自己的国家”。李还告诫说“如果不是这样考虑问题而是认为比起与我们各自居住国的同胞，我们彼此之间以及我们与我们祖辈的国家有着更多的共同之处，这是不切合实际的。当我们的利益无法一致时，我们就会感到悲伤。这还会引起我们那些不是华族的同胞的误解和摩擦，即使在像新加坡这样华族居多数地位的国家情况也是如此”。²⁶

²⁵ [印尼]许天堂：《政治漩涡中的华人》，周南京译，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76页。

²⁶ （澳）乔治·希克斯、丁麦基著，伟特译：《海外华人认同问题》，《南洋问题译丛》1994年第2期，第58页。



参考文献

一、中文著作

- [1] 曹云华、许梅、邓仕超著：《东南亚华人的政治参与》，中国华侨出版社2004年版。
- [2] 曹云华、李皖南等著：《民主改革时期的印度尼西亚华人》，暨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 [3] 郭梁：《东南亚华侨华人经济简史》，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 [4] 李卓辉编著《坚强奋起 百年复兴—印尼华人文化教育史话之四》，印尼联通书局出版社2009年版。
- [5] 廖建裕：《现阶段的印尼华族研究》，教育出版社1978年版。

二、中文论文

- [1] 李卓辉：《印尼华侨华人现状与展望》，（香港）《印尼焦点》2012年6月30日，第34期。
- [2] 江振鹏、丁丽兴：《印度尼西亚民主化改革以来华人经济的新发展及其启示》，《当代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6期。
- [3] 廖小健：《印尼“排华暴动”的深刻原因——兼论印马两国不同民族关系的历史背景》，《史学集刊》2002年第2期。
- [4] 庄国土：《东南亚华侨华人数量的新估算》，《厦门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

三、英文著作

- [1] Jamie Mackie, "Business Success among Southeast Asian Chinese: the Role of Culture, Values and Social Structures," *Market Cultures. Society and Morality in the New Asian Capitalisms*,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1998.
- [2] Negara S.D., Suryadinata L, "China's Maritime Silk Road Initiative and Indonesia" *China's Maritime Silk Road Initiative and Southeast Asia*, Palgrave Studies in Asia-Pacific Political Economy, 2019.
- [3] Robert Hefner, "Introduction: Society and Morality in the New Asian Capitalisms," *Market Cultures. Society and Morality in the New Asian Capitalisms*,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1998.
- [4] Tabah Maryanah, "Citizenship in Everyday Life: Exclusion of the Chinese Indonesians By Non-Chinese Indonesians in Bandar Lampung - Indonesia" in *The 1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outh East Asia Studies*, KnE Social Sciences, 2016.



- [5] Tong C.K, “Between a Rock and a Hard Place: The Chinese in Indonesia” *Identity and Ethnic Relations in Southeast Asia*. Springer, Dordrecht, 2011.
- [6] Laurence Ma, “Space, Place, and Transnationalism in the Chinese Diaspora.” *The Chinese Diaspora. Space, Place, Mobility, and Identity*, New York: Rowan & Littlefield, 2003.

四、英文论文

- [1] Anggraeni, Dewi, “Chinese Indonesians after May 1998: How they fit in the big picture”, *Wacana*, Vol.18, No.1, 2017.
- [2] A. Safril Mubah and Sarah Anabarja, “Globalization, National Identity and Citizenship: Dilemma of Chinese Indonesians in Indonesian Nation-Building”, *Tamkang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23, No.3, 2020.
- [3] Chong Wu Ling, “Democratisation and Ethnic Minorities: Chinese Indonesians in Post-Suharto Indonesia”,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July 2014.
- [4] Dewi Fortuna Anwar, “Indonesia-China Relations: Coming Full Circle?”, *Southeast Asian Affairs 2019*, Singapore: ISEAS-Yusof Ishak Institute, 2019.
- [5] Evi Nurvidya Arifin, M. Sairi Hasbullah & Agus Pramono, “Chinese Indonesians: how many, who and where?” *Asian Ethnicity*, Vol.18, No.3, 2017.
- [6] Enny Ingketría, “Cultural Pride in the Era of Pluralism: A Closer Look to Chinese Indonesians’ Ethnic Identity under the Reign of Jokowi”,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and Management Studies*, Vol.5, No.3, 2018.

印尼华文小说的族群创伤叙事

马峰*

摘要: 印尼的族群与政治议题比较敏感, 华人对此有诸多顾虑。在族群文学中, 虽然印尼华文作家多表现族群间的和谐场景, 但是并没有一味地回避华人族群的创伤历史。他们借由小说重述排华暴乱所带来的族群创伤, 在主观的情绪渲染中也揉进客观公正的理性审视。他们目睹并还原暴力现场, 在剥离民间暴力的表层现象之外, 进而探测种族暴力与政治暴力的深层本质。印尼华文小说的创伤叙事, 既是对族群历史的反思, 也为华族未来的发展提供建言。

关键词: 印尼、华文小说、华人族群、创伤叙事

前言

在多元族群国家, 民族融合是一条必然之路。在东南亚地区, 由于殖民需要曾大量引入华人作为廉价劳工, 而各国独立建国后, 如何处理族群关系成为摆在执政者面前的棘手问题。如果采取铁腕政治的威权同化, 往往会激化族群矛盾, 而彼此的信任度削弱也将不断拉大族群隔阂。事实上,

* 马峰, 云南大学文学院讲师, 研究方向为东南亚华文文学。本论文为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东南亚华文女作家的中国叙事研究”(YB2022082)、“兴滇英才支持计划”项目经费支持、教育部首批新文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南亚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与国际化人才培养”(2021130019)的阶段性成果。

威权政治的暴力式操作往往是滋生民间暴力的温床，一旦当权者的政治方向有失偏颇，社会民众走向狂热偏执的几率就会激增。政治权力机制不及时为民众的骚乱情绪降温，那么失控的民间暴力就要寻找宣泄出口，它不是指向政治决策者，就是导向弱势群体。东南亚华人融入当地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然而印尼却一度走向另一个极端，无论是官方强制性的威权同化，还是来自民间的间歇性排华暴行，华族对当地的政治认同并未赢得主流社会的应有尊重。对于印尼华族来说，排华暴乱无疑是最为惨痛的集体记忆，这些创伤记忆也成为他者的集体孤立与自我的集体认同的双重标签。伯恩哈德·吉森（Bernhard Giesen）谈到“神圣的想象”，他认为是集体记忆建构了英雄和受害者，集体记忆把他们铭记为集体认同的胜利或创伤的化身，集体创伤是今天国际政治的主要驱动力之一。¹ 虽然，“五月暴乱”的集体创伤过后，印尼在国际观瞻中也做了相应的政治调整，然而华族为此所付出的受害者代价却显得过于沉重。因此，印尼华文作家进行族群创伤叙事尤显必要，如果不对排华暴乱进行深层审视，如果没有拒绝遗忘的历史姿态，那么就不能保证族群悲剧不再重演，而反思历史恰是为了保驾护航当下难得的族群和谐局面。

一、纪实与舆论

1965年，“九卅事件”爆发，苏哈托领导的军人趁机掌权，并开始全面清剿印尼共产党，而华人在白色恐怖下也遭受诸多牵连、打压甚或迫害。对此，阿德里安·维克尔斯（Adrian Vickers）认为，“印尼共”成了包括每一位左派人士的笼统标签，“在一些地区，反对华人的种族主义情绪开始抬头，一些地方的华人被杀；反华的理由是印尼共产党主席艾地领导下的印尼共与中国走得过于亲近。”² 在一定程度上，这已然拆穿了将政治问题与种族问题相混淆的愚民企图。

¹ Bernhard Giesen. *Triumph and Trauma*, Boulder: Paradigm Publisher, 2004, p.10.

² [澳] 阿德里安·维克尔斯《现代印度尼西亚史》，何美兰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7），页173-174。

新秩序时期对华族的威权同化为民间排华埋下诸多隐患，一旦当权者的统治根基受到冲击，运用政治手腕挑起种族冲突就成为转移公众视线的重要途径。于是，在苏哈托政权摇摇欲坠的末期，借种族问题掩盖政经乱局也就难以避免。仅就1996年至1999年间，据统计排华事件达四十七次之多，其中爪哇岛的排华次数最多，而苏门答腊、加里曼丹、苏拉威西等地也受波及。³ 1998年，印尼陷入严重的金融危机，由此也激发了苏哈托政府的政治危机。面对混乱时局，为转嫁日趋激化的社会矛盾，图谋不轨者又一次将矛头指向华人群体，于是酿成震惊世人的“五月暴乱”。

当时，排华暴乱遍及印尼各地，雅加达、梭罗、棉兰、泗水、巨港等城市的华人都遭到严重迫害。暴徒似有组织、有阴谋的骚乱，他们进行肆无忌惮的烧杀抢掠。在暴乱中华人损失惨重，生命财产毫无保障。华人店铺、家园、汽车被烧毁，货物、财产被掠夺一空，很多妇女被强奸、杀害。在人道主义斗士的努力下，华人妇女遭暴的惨剧大白天下，才有联合国人权组织的谴责及哈比比总统公开为五月动乱严正谴责，指为野蛮行为。⁴ 虽然印尼政府未能严惩暴徒，还暴乱受害者以真相与公允，但民间团体及学术研究者并没有遗忘这一严重损害国家形象的耻辱事件。对此，2008年5月印尼大学华人研究中心曾主办研讨会，其主题为“我们的泪水已干：1998年5月悲剧过后十年”。艾米·戴维斯（Aimee Dawis）指出，依据各种个人及社会的特征，这个国家的每个人，包括华族，拥有自由来决定，他们想获得更多这样的（重新）学习华文和中华文化的机会。⁵ 这些民间声音正是对官方不作为的有力回击。

印尼自建国后多次发生排华暴乱，尤以“五月暴乱”最为严重。暴乱期间，不少华文作家辗转逃亡至新加坡，新华作家寒川曾予以热情帮助。目睹

³ Jemma Purdey, *Anti-Chinese Violence in Indonesia, 1996–1999*,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219–220.

⁴ 郑通力主编《五月暴乱图册：印尼华裔的悲情》，（香港：中国和世界杂志社、印尼与东协联合出版，1998），页208。

⁵ Aimee Dawis, *Orang Indonesia Tionghoa Mencari Identitas*, Jakarta: PT Gramedia Pustaka Utama, 2010, pp. 207–212.

华人所遭受的迫害，他倾吐出心中的悲愤，“印华作家和其他印尼华裔一样，他们视印尼为祖国，他们热爱这一块生长、生活的地方。然而，尽管他们入了印尼籍，起了印尼名字，还是受到不公平的对待，没有被视为组成印尼的一分子，华裔每次都成为政治斗争中的牺牲品。”⁶ 有些控诉言辞更是来自暴乱地的第一手资料，“印尼雅加达华裔受难族群”曾通过香港在第一时间以集体名义发表《告全世界同胞书》：“五月十三日至十四日印尼首都雅加达大暴乱，是印尼有组织反华集团，针对华裔籍民抢劫、屠杀、纵火焚烧房屋、商店、当街示众强奸华裔女性，连最小十岁和五十五岁的老妇都不放过，被这些人兽心野蛮无人道的暴徒集体轮奸，裸体绑着殴打，惨无人性地摧残身心。”⁷ 排华暴乱给华人造成巨大的集体创伤，印尼华文作家纷纷撰文祭奠“黑色五月”，这是最为残酷的族群创伤叙事。不管如何认同且忠于印尼，由于华族固有的身份标记，华人屡次成为政治权术与民间盲从的牺牲品。

二、记忆与再现

对于华族的集体认同而言，一再出现的排华暴乱已然造成极大的政治困惑。不得不说，这些负面因素对华族所苦心经营的国家信念将是一种严峻挑战。杰拉德·切特霍夫（Gerald Echterhoff）指出，集体记忆是表现在集体成员头脑中的有助于集体认同感的过去，它依赖于群体认同并且基于共有的经验。⁸ 在华族认同的集体层面，排华暴乱显然处于记忆的最阴暗角落，而这些创伤经验已经深深烙印出种族排外的族群疤痕。华人作为受害者群体，由于无法及时获取外在的社会安全保障，并且事后也无相应的法制反馈，其自我保护的反作用力便不可避免地趋向内在的族群认同。这种集体认同由集体

⁶ 寒川〈淌血的五月〉，《亚洲华文作家》1998年第52期，页73。

⁷ 中国和世界杂志社编辑部《华裔的悲情：印尼暴徒践踏人权实录》，（香港：中国和世界杂志社，1998），页6。

⁸ David Manier and William Hirst. “A Cognitive Taxonomy of Collective Memories”, in *A companion to Cultural Memory Studies*, edited by Astrid Erll & Ansgar Nünning, Berlin/New York: De Gruyter, 2010, p. 253.

的负面记忆所催生，有别于源自群体的正向的历史文化记忆，而负向生成的创伤经历不单难以打击削弱族群认同，反而吊诡地激发并强化了自卫式的族群认同。一般而言，创伤经历常被隐蔽封存于记忆深处，这是最为安全的规避法则，而对创伤经历的重述则可能导致二度创伤或创伤治愈两种趋向。在印尼华人的创伤记忆中，比起华文学校被强制封闭所带来的文化创伤，排华暴行所造成的肉体与精神的双重创伤更为严重。

（一）暴乱现场的还原

1998年，苏哈托政府已经无力掌控国内的政经局势。在天灾人祸与金融危机的双重打击下，印尼的商业普遍走向萧条，这不仅让很多华商陷入困境，也连带冲击到原住民中下层群体的日常生活。于是，“五月暴乱”一经蓄谋挑起便成为原住民烧杀抢掠的“狂欢节”，从而演化为行径残暴的排华事件，它不仅在印尼全国迅速蔓延，在世界范围内也影响恶劣。有些华文作家亲历事件，他们对暴乱现场的还原具有相当的真实性与可信度。以受害程度的深浅来划分，大体可以分为如下几类：一是侥幸脱险者，松华的《幸而还有它》写到五月十三日的雅加达暴乱现场，志强骑着老爷摩托车穿街走巷才逃过一劫。“当天，雅加达发生了空前的大暴乱，暴徒四处劫掠财物，大肆焚烧商店和车辆。”⁹在财产损失之外，华人的人身安全也毫无保障。在暴民眼中，华人俨然成了任人喊打喊杀的“过街老鼠”，只要躲避不及就会遭到迫害。二是经济破产者，金梅子在《创凿声中》勾勒出华商受害者的典型个案，在T埠数一数二的殷商元祥叔在暴乱中被洗劫一空。¹⁰由于暴乱者的有意针对，华商的经济受到不同程度地损害，元祥叔的落魄正是暴乱破坏力的现实写照。三是家破人亡者，吴秀吟的《谁言寸草心 报得三春晖》主线是赞扬父爱的伟大，辅线则是对“黑五月”的谴责。在椰城暴乱中，阿玲落得家破人亡，她的女儿

⁹ 松华、雯飞《晨间一瞬雨》，（雅加达：印华作协，2006），页106。

¹⁰ 金梅子《第六胎女婴》，（香港：获益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4），页94。

遭暴徒强奸而自杀，丈夫因商店被烧劫一空而忧愤去世。¹¹ 上述三类都是华族受害者，第四类则是原住民“受害者”，白羽的《爱心 孝心》便是暴民自伤的恶果。在五月暴乱中，依凡的父母因掠夺财物而被大火围困烧死，在他半工半读帮助祖母的背后，其实隐含了暴民群体对社会及家庭的责任感缺失。

在印华作家中，晓星的五月风暴系列数量可观，可以说最具代表性与批判性。这类小说虽然彼此并无内在关联，但是却立体化呈现了排华暴乱现场的多维层面。其一，《腐心难恕》展现了华商在暴乱中的无助，只能眼睁睁看着养虾场被暴徒围攻洗劫。“闯入养虾场的好多辆大卡车上，跳下了无数棕黑的身影，像一群疯狗，像一群饿狼，扑向养虾场。”¹² “棕黑”喻指原住民身份，而用“大卡车”装载明显是有备而来。他们不仅抢光虾，抢夺财物，还砸坏工具、纵火烧场。其破坏力与执行力都非同一般，敏捷身姿更像是一群训练有素的“军人”。其二，《背水一战》道尽了华人家庭反抗的决绝与无奈，为了三代传承的家园，崇华决定誓死守卫家人的安危，他拿起大刀准备与暴徒以命相搏。面对欲破门而入行凶劫财的暴徒，他对犯罪与造孽的自我质问实质上是向社会不公的政治问责。其三，在《野火烧不尽》里，华人以德报怨的友善模式并未获得原住民的相应回馈。在早先的排华事件中，父母被迫逃离亚齐的祖屋，舍弃家产住进难民营。后来，荣奎主动捐米粮给原住民，然而在五月暴乱中依然难以摆脱被再次洗劫的厄运。在暴民中，哈山对自己的华人老板尚有感念之情，他不抢老板的东西，还邀他们到家里避难，但对其他华商却毫不留情的洗劫。人道在暴乱面前已荡然无存，暴民任意洗劫，军人还出手相助，警察则毫无作为。当国家机器失去惩恶扬善的公信力，华人只能破财自保。无可否认，在可恨、可恶、可咒的暴乱背后，华人对排华事件存有难以排解的“宿命式”隐忧。经历过多次排华事件的华人，虽然有

¹¹ 吴秀吟编著《走不尽的路（三集）》，（香港：世界华文文学家协会，2012），页85。

¹² 晓星《星光灿烂》，（新加坡：岛屿文化社，2002），页184。

了自我反省意识，并主动表达对原住民的关怀，但是排华历史一再重演却无情击碎了华族苦心经营的族群和谐信念。

（二）创伤后遗症

对于暴乱受害者群体来说，族群创伤将是难以抹除的集体记忆，其影响余波让创伤后的社会生态异常敏感。晓星的《原来如此》写于1996年，却像是1998年五月暴乱的预演，这在在说明排华事件的常态化。由于工潮演变成骚乱，一名华商被打死，工厂、商店被砸抢。此时，一个“神经汉”追逐小孩的闹剧便导致全城华人纷纷关店，在排华阴影的高压笼罩下，华人的集体恐慌一触即发。在多次的排华事件过后，华人心态已如惊弓之鸟，始终无法稀释“抢砸烧”的恐惧感。他的另一篇小说《百密一疏》更显出华人心态的封闭与畸形，郑启苗采用“防范三招”将住家装修成“铜墙铁壁”，要防盗、防示威、防骚乱，不料却为自家火灾所困。这种华人过分敏感的自保心理，反衬了社会的安全隐患以及华族的弱势处境。

对于受害者当事人个体来说，五月暴乱对华族女性肉体与心灵的双重伤害尤为触目惊心。张汉英的《妈妈，你在哪里》是女性受害者及其后裔的悲情写照，华族少女被（原住民）暴徒强奸致孕，她难以接受施暴者的孩子，却又不忍心扼杀无辜的生命。她把初生的女儿放到“慈爱孤儿院”，从此便消逝无踪（或许已选择自杀雪耻）。

原来我的妈妈是现代蛮荒时期的牺牲品！我不是正常父母爱情的结晶，我是暴徒强奸妈妈的孽种！我情愿被碎尸万段，让它腐烂，化成土，化成灰！我是禽兽不如的畜生的孽种！禽兽是不会强奸的！我立誓今生不嫁，不愿为人间流传畜生的后代！¹³

女儿的控诉表露排华暴乱受害者的锥心痛楚，自我“孽种”化也是对父系暴民的强烈谴责，而华族妈妈的悲剧让人扼腕同情。对于“无父无母”的暴乱

¹³ 张汉英《岁月带不走记忆》，（雅加达：印华作协，2006），页7。

产物，自我物化与自我厌弃更是对“现代蛮荒时期”的有力回击，这也探触到历史遗留问题有待解决的迫切性。印尼想要进入真正的现代文明时期，那么由种族歧视引发的社会问题显然需要正视与补救。

更有甚者，有些作家采用祭奠亡灵式的创伤叙事，而阴魂不散则隐喻受害者对创伤现实的无法接受。换言之，死亡是无以复加的个体创伤，而死者现身的灵异空间则趋向幸存者的精神创伤极致。侯斐珍的《魅影》以梦幻手法再现亡灵，梦境勾起了五月暴乱的伤痕与记忆，描绘出创伤留在人们心中抹不去的阴影。

眼前的这些魅影竟是罹难的故旧与乡亲，而魅影的背后模糊的幻景，正是那黑色的“五月风暴”。秦柯激动得想拥抱他们，却扑了个空。幽幽的声音变得凄（惨）：“冤……冤哪！乱世之中我们已经成了冤魂，清平之世你们还要自相残害？……”¹⁴

作者不仅假借梦境为受害者鸣冤，还借冤魂之口向幸存者发出居安思危的警示。另外，杨叶青的《怨女幽魂》则以聊斋笔法进行灵异再现，揭开了排华暴乱的深层创伤。“当年，由于经危冲击，工作的鞋厂关闭，他离开新婚的妻子，偷偷潜入邻国沙捞越当工地员工。同年，家乡发生种族歧视事件，杀伤了不少人；据说居民纷纷逃亡，乡镇一片荒凉。”¹⁵在家乡的种族暴乱中，妻子早已被乱箭杀害。当丈夫回到家乡，她却变为痴情女鬼守候着幻化的温情家园。在这段离奇的人鬼恋幕后，死亡创伤已难以补救，而遗属创伤则近乎精神分裂者的臆想。退一步来讲，经济危机与种族歧视导致乡镇荒凉，这不仅伤及无辜的华族居民，也让国家前景蒙上阴霾戾气。

五月暴乱不仅让华人付出血的惨重代价，还对华人造成精神创伤与身份困扰。张逸的《天空》充斥着低气压的冷凝郁结，华人的肉身扎根印尼，然而精

¹⁴ 印华作协、获益编辑部编《印华微型小说选二集》，（香港：获益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4），页131。

¹⁵ 杨叶青《黑暗中的一盏灯》，（雅加达：印华作协，2015），页10。

神却无所凭依，始终有种格格不入的被排斥感。“我们根本就没有根！活在这里，根本就身不由己！……我们得看着人家的脸色办事，我们是人家的傀儡，我们根本就身不由己！”¹⁶ 在竞选人的“不排斥、不歧视”的团结演说里，在华人舞龙、舞狮的助选活动里，曾经的排华受害者却难以从悲观中全然解脱。每当政治变革，华族往往身不由己，当少数族群成为当权者的“政治傀儡”，那么真正的族群团结就要打上问号。在“我们”与“人家”的互称对视中，族群之间已有明显的界线切割，而边缘与主流的情势也强弱立判，这就决定了华族身份在国家定位中的焦虑与不自信。就像阴晴无常的天空，华人堕入担忧与恐惧的轮回，而政治认同的身份尴尬也不言自明。

三、反思与疗愈

对于源自排华暴乱的肉体或精神创伤，受害者及其代言人不应只是沉湎于个体创伤的回忆再现，更重要的应是以唤起群体、民族、社会、国家乃至世界的反思，并寻求对集体创伤的补救与疗愈的可能。二十世纪下半叶，印尼排华暴乱频仍，而在民主改革时期这一种族歧视行为得到有效遏制。不过，华族的集体创伤并不会一朝一夕便得以痊愈，因此对暴乱真相的追问与反思也就永远都不会过时。印尼华人在记忆、重述中反思集体创伤，进而为华族寻求族群交往的合理路径，这势在必行。只有族群认同与政治认同形成对话互动，才能更好地规避针对华族集体的政治暴力与民间暴力。

（一）反思路径

就民间暴力的创伤经验而言，阿蕉的《火鸟大侠》给我们提供了一种个体创伤的极端隐喻范式。生活拮据的“沙特里”捡到一个火鸟大侠塑像，本打算送给孩子做玩具却被误认为强盗，随后满腔义愤的人群开始公然施暴，最后竟把他活活烧死。小说通过亦真亦幻的场景深刻展露出民众盲从的可怕，

¹⁶ 张逸《烟花》，（雅加达：印华作协，2010），页67-68。

他们在“正义”的幌子下变成邪恶的暴民。借此参照，如果公众的盲从指向某一弱势族群，那么疯狂施暴的后果将不堪设想，而印尼屡次出现的纵火行凶的排华事件就是明证。

如果说阿蕉披露了民间暴力的疯狂可怖，那么张汉英则以反讽效力揭开民间暴力泛滥的社会根源。在《法庭里的小插曲》中，“傻里傻气的”（Syahri Syahjid）因为偷人衣服被判一年六个月徒刑，然而在1998年5月14日的社会暴乱中，他公然抢劫却长期逍遥法外。“我很奇怪当时大规模抢拿东西，没有被阻止或逮捕。现在，我只拿走一件背心衣就被众人追捕，而且被揍到遍体鳞伤，甚至被拖上法庭审判。我真的朦查查了。”¹⁷ 因此，他死不承认偷东西，而一直说“拿”，他还决定出狱后不再单独行动，要聚众抢劫来摆脱牢狱之灾，曾经的问责不清可谓吊诡重重。其实，在当时的排华暴乱中，就有一种原住民要“拿回华人剥削所得”的脱罪说辞。“傻”的译名正是对政治愚民的无厘头调侃，与当下地方法院的公正判罚相比照，五月暴乱时的法制失序才是症结所在，而民间暴力的社会根源便在于当权者的管理失当与政治失信。正如红燕的《小巷》所述，“五月事件时，网上盛传印尼烧、杀、抢、奸，其中一些惨不忍睹的画面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据说很多歹徒是无业青年。他们在丑恶政治的愚弄下，借机发泄对生活富足的华人的嫉妒。”¹⁸ 因此，尚且不论当权者是否存有转嫁社会矛盾的不良政治居心，但是国家机器对滋事暴民的无原则放纵却绝对撇不清干系。

那么，当暴乱发生时，华人究竟应该如何应对呢？逃离险境，屈服认命，以暴制暴，抑或团结防御？朱世延的《蜜月风云》是林冲式的逼上梁山，退避忍让而不得才快意恩仇。小说1998年写于雅加达，虽然作者只是以模糊的“大骚乱”为背景，其确指当是“五月暴乱”。¹⁹ 骚乱发生三天后，风先生、云小姐决定去澳洲逃难，却在机场半路被歹徒拦截。风先生愿意舍财保命，但是歹

¹⁷ 张汉英《岁月带不走记忆》，页24。

¹⁸ 印华作协、获益编辑部编《印华微型小说选二集》，页122。

¹⁹ 立锋主编《印华诗文选》，（香港：新绿图书社，1999），页153-157。

徒却要奸污其妻。他迫于无奈才反抗，显出武林高人的真面，轻松解决了五名歹徒。华人在排华暴乱面前，大都被压制的无力反抗，这种“武侠高手”的震慑出场显然有些理想化色彩。另一方面，当破财消灾的惯常理念无法自保，对待失去人性的暴徒，华人采取“以暴制暴”的方式也不失为有效的绝地反击。不过，贿赂行为确实难以填平暴民欲壑，即使在稳定时期也不值得提倡，这只会助长变本加厉的敲诈勒索或公务腐败。对于疯狂的群氓，单打独斗式的反抗策略也不具备普遍的可行性，最多只能是同归于尽。

华人要想在暴乱中避免受害，只能集体团结去共同防卫，这在暴乱发生时已得到切实验证。晓星的《时过境迁》就写到暴乱时刻的华族团结，“民礼在九八年五月的血腥暴乱中奇迹般的分毫无损。全城华人的团结一致、同舟共济发挥的威慑作用，使暴民们不敢轻举妄动。”²⁰ 与之相比，老兵的《生日颂歌》表现出暴乱时的跨族群感人事迹，在危急时刻，回教徒青年冒险留宿华人阿雄。在暴徒横行的疯狂世界，“没有战争，却有枪声！没有敌人，却有仇杀和奸杀！……在这无助的夜晚，他呼唤黎明，呼唤和平！他呼唤族群之间的相爱与温馨，呼唤国家民族的强大与兴旺！”²¹ 后来，阿雄移民澳洲（异国），但他仍然心系祖国故土（印尼），而雅加达唐人街的“兄弟情谊纪念碑”显然是一种族群互助的理想图腾。瞻仰“纪念碑”，既是对历史伤痛的铭刻抚慰，也是对未来和平的顶礼膜拜。然而，友族个体的见义勇为毕竟力有不逮，抵御暴乱显然需要更广泛的跨族群协作。以此来看，松华在《斜雨寒风》中所张扬的族群团结主题更为鲜明，民众在暴乱后及时自发地组织起“民防站”。

自从五月暴乱以来，为了响应政府的号召，民众自发地动员、组织起来，守卫各自的住区，共同防御暴徒的卷土重来。

守夜纵然消耗了人们的精力，可是却加深了邻组街坊间居民的交往，促进了华族与原住民的沟通，进一步发扬了“同舟共济”的精神。²²

²⁰ 莎萍主编《第九届亚细安华文文艺营文集》，（雅加达：印华作协，2004），页420。

²¹ 莎萍主编《第九届亚细安华文文艺营文集》，页450-451。

²² 松华、雯飞《晨间一瞬雨》，页60。

面对社会不安定因素，跨族群团结无疑是最具成效的防御举措，毕竟愚昧盲从或为利所诱的暴民只是极少数。况且，暴民大多出自社会底层的闲散游民，他们不过是一群有恃无恐的“鼠辈”，捞得些微好处便沾沾自喜，遭遇决然抵抗便作鸟兽散，故而全民防御才是社会稳定与国家安全的最可靠保障。

当下，印尼社会正处于稳定发展时期，华族除了要与原住民友族同胞在交往中加深理解，增强族群内部的凝聚力也有防患于未然的必要性。余长凯的《好了伤疤忘了痛》对华人在“黑五月”举办乐龄合唱节是否适合表示质疑，代表了华族对排华暴乱的自我反省与批判意识。同时，对于暴乱事件的纪念活动，友族知识分子的奔走呐喊与华族上流社会的“历史遗忘症”形成截然反差，而华族的奢靡生活与享乐作风也着实令人担忧警醒。²³值得深思的是，在危急关头华人往往可以搁置矛盾全力防御，在和平时期反而纠葛丛生，而遗忘创伤的现实迷醉更反衬出逐渐隐退的危机意识。

（二）疗愈机制

若论创伤疗愈的可能及其可行的机制，无非要兼顾到施暴者与受害者双方。首先，原住民需要摒弃种族歧视成分，不为别有居心的政客所蒙蔽，这样才能避免暴乱失控。作为施暴者的原住民，其真诚忏悔可以直接抚慰华族受害者的创伤。在排华暴乱中，有些人带着病态的仇富心理，尤其是出自原住民下层社会的无知无畏者，他们抢掠华商财物毫无羞耻感，甚至大施淫威、大开杀戒。与暴民的猥琐形象相比，有些原住民或洁身自爱或施以援手或幡然醒悟，他们持有清醒的善恶观。金梅子的《伯拉曼的悔改：五月风暴故事》从原住民立场抒发忏悔之情，这种换位反省体现了华族的美好想望。伯拉曼

²³ 关于五月暴乱，作者在批判华族的同时也对当下的友族大学生及本土学者的仗义执言表示赞赏，并列举艾丝德尔女士等合编的《一九九八年五月暴乱的资料、真相与剖析》（2007）为了揭露“黑五月”的真相所表现出的不惧高压、百折不挠的牺牲精神。参见林义彪编《风景这边独好》，（雅加达：印华作协，2010），页163-166。

夫妇为抢得不义之财沾沾自喜，他们为了小利而抛弃回教戒律，还鼓励尚未成年的孩子加入暴民行列。

苏基曼是个虔诚的回教徒。一向慎守清规戒律，听了伯拉曼的话，眉头皱了皱，叹口气道：“伯拉曼，听我说，不义之财莫贪求，有损名节，有污教义呀，赶快向上帝忏悔吧，请上帝饶恕你，我们修行不容易呀！”²⁴

在这里，苏基曼代表了原住民的正派力量，而宗教的劝人向善也得以彰显。然而，迷失的羔羊却不为所动，最终走向多行不义必自毙的毁灭歧途。当超级市场被“训练有素的暴民”（暗指军人及其帮凶）纵火焚烧，一些“疯狂从众的暴民”（实指趁火打劫的普通民众）就从施暴者变为受害者。伯拉曼的两个儿女被烈火吞噬，他无尽的伤悲与悔疚都已失去依托。两相对照，原住民在暴乱面前应该何去何从也就不言而喻。另一篇小说《回家乡走一趟：五月劫后见闻》，作者给予原住民的反省更为深刻，不再局囿于个体的得失利弊，而是延伸到国家层面。对于排华暴乱，在小舅店前摆饭摊的乌斯曼表达了忧愤与不平。原本彼此关照、相得益彰的华人店铺与原住民饭摊，在暴乱后却都变得门可罗雀。乌斯曼从国民与国家立场出发，他同情“华族兄弟”的被抢，也反省遭殃的原住民，其言辞应代表了大多数国民的正义感，而参与烧杀抢劫的暴民不过是一小撮被利欲误导的自私自利之徒。当然，这里的“国家”与政府当权者绝不能混为一谈，发声者有意弱化对政府的批评，其弱势心态更像是华族的替身，而国家立场反而表征并再次强化了华人的国家认同感。不论如何，在暴乱创伤过后，原住民的换位反省都可以说是一种止痛良剂。

在创伤止痛之余，如何才能祛除排华暴乱的病根？或者说，如何才能釜底抽薪，让暴乱免疫机制良性运转？归根结蒂，暴乱之所以发生，就在于一点即爆的“种族底牌”。因此，不同族群之间需要深入的沟通与理解，只有真正的

²⁴ 金梅子《第六胎女婴》，（香港：获益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4），页25。

族群融合才能避免种族暴乱被再次挑起。晓星的《“顽固”本色》凸显了华人对排华事件的宽容，这种真诚举动也让原住民司机深深佩服。在亚齐发生海啸后，古老总不记恨当年从亚齐被驱赶，反而慷慨捐款赈灾。“记恨？那怎么会呢！我们华人信奉佛教，遵循儒学，慈悲为怀。能够以德报怨，感化众生，功德无量啊！”²⁵ 同样，张汉英的《逃出死网》写到华哥、华嫂对原住民的无私相助，安梭利的孩子因而得以从重病中脱险。对于“五月骚乱”，安梭利将其视为印尼民族的耻辱，他具有民族忏悔意识，而华哥的谅解则导向两族和谐。

更进一步，黄裕荣的《风雨之后》通过原住民施暴者的忏悔与华族受害者的谅解，最后在族群沟通中达致族群和谐。古尔新曾参加排斥华人的事件，他为被人利用而内疚忏悔。然而，他身为原住民大学生却轻易被种族歧视的恶行所蒙蔽，在一定程度上也剖解出主流知识群体中的种族主义隐患，这不能不说是印尼国民高等教育的一种失败。从邻里好友的同情者到恶意纵火的破坏者，再到主动弥补族群裂痕的忏悔者，在暴民庸从的反省意识中也表证着种族歧视的不可为。“他是大学生，捣乱分子中，正是有很多的大学生参加，他们是被人利用怂恿而来的，我，我，我怪不得他……”²⁶ 在“我”的吞吐言辞中，先是对古尔新的捣乱“突变”有种不理解，进而在转换思维中选择了谅解。在更高层面上，“我”是华族移民的一员，对印尼故乡有着浓重的依恋，对原住民及国家领导人也持有理解与宽容的姿态，其本土的认同感已与母亲的唐人立场判然有别。在华人店铺被毁的同时，附近的原住民家庭同样遭难。就经济层面而言，这是“唇亡齿寒”的连锁反应，华族经济受挫，必然导致原住民乃至整个国家经济的萎靡。因此，作者一再弘扬本土的族群和谐，而和谐程度的深浅将与创伤疗愈的可能息息相关。

²⁵ 晓星《竹竿里的秘密》，（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3），页28。

²⁶ 潘亚墩编《轮椅上的战歌：印尼华文作家黄裕荣文集》，（广州：暨南大学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心出版，1995），页133。

结语

时至今日，五月暴乱的真相依旧不清不白，烧毁华人店铺、洗劫华人财产、强奸华人妇女、杀戮华人民众的真凶仍然逍遥法外。在排华暴乱的潜层，滋生着畸形的极端民族主义思想，华族被一些原住民视为“异族压迫者”，而族群仇恨也由此恶性膨胀。在“法不责众”的从众心理下，当政者的应对滞后实同“放任自流”。无政府状态导致国家法制形同虚设，而法律权威的丧失反衬出国家体制的混乱无序。实际上，政治暴力与民间暴力的混生注定了种族立场的落败僵局。金融风暴、经济危机、种族骚乱给华人带来多重创伤，而人们的清醒与努力则孕育着“新生”的希望。民间暴乱由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层面的社会矛盾激化所引起，华人成为转化矛盾的“替罪羊”。这在华人心中留下永远无法抹除的创伤和阴影，其肆意践踏人权的行径为人神所共愤。华人在印尼虽然经营有成，但是却经常在社会动荡中遭殃，因此也滋生朝不保夕的危机感。长远来说，这对国家经济的稳固发展也十分不利。五月暴乱是带有种族歧视性质的重大排华事件，惨痛的集体创伤也让华人逐渐觉醒。当下，印尼华人除了经济贡献，也热心从事民间公益，并积极争取政治权益。印尼华族的国家认同立场已毋庸置疑，如何更好地融入主流社会，并与主导族群建立良性互动，这才是破除族群芥蒂的关键。华族只有扮演好多领域的社会角色，才能赢得真正的社会公平。



移民生意经：鸦片战争后厦门的发展 (1842-1938)

王纯强*

摘要：本文探讨后鸦片战争时期作为条约口岸的厦门的发展情况。1842年后，虽然英国人希望以厦门作为开拓中国市场的立足点之一，但厦门的对外贸易并未因为开港而如愿起飞，工业化也停滞不前。尽管如此，到了1930年代，厦门亦能跻身中国最繁华及现代化的城市之一；而推动其发展的是厦门成为闽南最主要移民枢纽的转变。本文强调，移民过程中的每一步都是有利可图的。个体和企业于是聚集在厦门从事与移民相关的事业，不仅从中获利还反过来改变了厦门的商业环境。此外，许多移民归国后决定在厦门居留和投资；他们的商业决策也进一步推进了厦门的市区建设和现代化。

关键词：厦门、条约口岸、华人移民史、海外华人、归国华人

*王纯强，南洋理工大学助理教授，ongsk@ntu.edu.sg

前言

历史学者高家龙 (Sherman Cochran) 和史谦德 (David Strand) 在为《运动中的城市：跨境中国的内陆、海岸和散居地》一书所撰写的绪论中认为，既然商品、信息和人员的流动是中国城市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我们便不应该将它们视为“单独的存在，而是拥有能够超越城墙、城市界限、以及区域与国家边界的资源和动力的场所”。¹ 本论文借鉴两位学者强调中国城市是长处于“运动中” (in motion) 的构想来重新审视厦门在后鸦片战争时期的发展，特别关注它是如何嵌入跨洋的劳工市场，以及流动的移民如何影响其城市转型。

厦门是1842年《南京条约》签署后对外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根据学者费正清 (John King Fairbank) 的说法，这批最早开放的通商口岸既不是随意挑选出来的，也不是为了欧洲贸易而建立的新城市；反之，它们原本就是畅旺的贸易港口，欧洲商人因此设想通过它们直达广大的中国市场。² 以厦门为例，英国人便看中它优越的港口，水深适宜，方便外国船舶进港靠泊；同时，厦门也是闽南最重要的商业贸易中心。无怪乎英国人在厦门开港后对其寄予了厚望。遗憾的是，厦门的对外贸易在开港后虽然短暂上扬，随即大幅减少，到了20世纪初更是微不足道。此外，厦门也没有因为对西方的开放而得以大规模发展工业。到了1930年代，厦门只有区区80家工厂；反观上海，却有足足6000家。

尽管厦门的对外贸易有限，工业也并不发达，但在民国时期它却常与上海和青岛相提并论，被认为是全中国最繁荣和最具活力的城市之一。在1920年代，厦门的地价和工人薪资几乎都是冠于全国；作家鲁彦在游览厦门后甚

¹ Sherman Cochran and David Strand, eds., *Cities in Motion: Interior, Coast, and Diaspora in Transnational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p. 2.

² John K. Fairbank, *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 The Opening of the Treaty Ports 1842–1854*, Vol. 1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p. 155.



至感叹它是“中国首富的区域”。³可以肯定的是，厦门的成功与发达不是建立在对外贸易和工业上，而是在于它成为福建最主要的移民枢纽的发展转变。从1866年至第二次中日战争爆发，每年至少有10万名以上的人通过厦门迁出或返回中国。这些移民从何来，而厦门又是如何协调这么大量的人员流动的？作为“运动中的城市”，厦门与移民的关系又是何？同时，这些移民又如何影响厦门的工业增长，贸易表现及城市发展？本文通过对厦门条约口岸时期内部运作的研究，旨在说明“移民”就是一项大生意，几乎在移民过程的每一阶段都有利可图。⁴而厦门的商人和企业也因为找到了可以赚钱乃至发达的利基市场，因此对于拓展对外贸易和发展工业就显得淡漠和兴趣缺乏。

一、鸦片战争前的贸易和移民

1822年1月14日，一艘名为“泰星号”（Tek Sing）的中国商船，乘着东北季风离开厦门，航向位于爪哇岛北岸的目的地巴达维亚。“泰星号”是一艘典型的福建三桅远洋帆船；估计其船身长50米，宽10米，负荷量达到一千吨，是当时最大的福建帆船之一。当“泰星号”离开厦门时，它的货舱里已仔细地装载了逾30万件瓷器以及无数的商品，包括茶叶、生丝、漆器、纸张、雨伞和中药材等等。更重要的是，除了200名船员外，甲板上还挤满1600多名年龄介于6至70岁的男女老少移民。⁵

我们今天知道“泰星号”是因为当它向南航行时不慎触礁而沉没了。大部分乘客随着船体沉没，仅有198人被附近的船只救起，从而留下了记录。而“泰星号”的残骸也在深埋海底一百余年以后于1999年被专业打捞人发现，并成功起获大部分装载的瓷器。这起被后人称为“东方铁达尼”的沉船事件无

³ 沈斯亨编《鲁彦散文选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页77-93。

⁴ Ong Soon Keong, *Coming Home to a Foreign Country: Xiamen and Returned Overseas Chinese, 1843-1938*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21).

⁵ Nigel Pickford and Michael Hatcher, *The Legacy of the Tek Sing: China's Titanic; Its Tragedy and Its Treasure* (Cambridge: Granta Editions, 2000).



疑是个悲剧，但它却向我们揭示了十九世纪初厦门海上贸易的规模、中国潜在移民的数量，以及这个闽南港口完全有能力组织和将移民们送出国的现实。

厦门岛位处福建省岸外，远离北方的政治文化中心，因此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处于边缘地位。在明朝后期，由于厦门并非行政中心，只有少数几位官员驻守岛上，因此成了走私犯以及不法分子首选的避风港和集结地。在郑成功将厦门作为抗清的基地后，它迅速成为郑氏集团旗下商船和外国船只的主要停靠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船自1676年便开始航进厦门港，而万隆、暹罗、越南及其他东南亚国家的货物也均可在厦门市面上找到。⁶

1683年郑氏集团投降后，清廷随即下令在厦门开设海关以监督贸易及课税。不消说，清廷此举即是将之前非法的抵抗军基地升级成合法的海上贸易中心，厦门也因而在随后的几十年间蓬勃发展，并向外形成了一个复杂及多层面的沿海贸易网络。这个以厦门为中心的贸易网络向北至满洲、向南抵广东，甚至还延伸至海外。⁷ 如《厦门志》中便记载：

自通洋弛禁，夷夏梯航云屯雾集。鱼盐蜃甲之利，上裕课而下裕民……服贾者以贩海为利藪，视汪洋巨浸如衽席，北至宁波、上海、天津、锦州；南至粤东；对渡台湾。一岁往来数次。外至吕宋、苏禄实力、噶喇巴，冬去夏回，一年一次。初则获利数倍至数十倍不等……

到了十八世纪，厦门商业之繁华、商人之富裕，更为它赢得了“银城”的美誉。⁸

厦门既是福建海上贸易中心，也毫无意外地成为闽南移民的主要出航港，毕竟“人口迁移是沿着贸易路线走”的。⁹ 闽南的移民历史可说是与海外贸易

⁶ 戴一峰《区域性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以近代福建地区为中心》（长沙：岳麓书社，2004），页29。

⁷ Ng Chin Keong, *Trade and Society: The Amoy Network on the China Coast, 1683–1735*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1983).

⁸ 周凯《厦门志》（厦门：鹭江出版社，1996），页508–512。

⁹ Philip Kuhn, *Chinese among Others: Emigration in Modern Times*,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08), p. 8.



同步。有证据显示当福建的海上贸易在南宋时期蓬勃发展时，闽南人民便已在海外旅居。到了十六世纪末，小型的海外福建人社区更是在长崎、马尼拉、万丹、巴达维亚、马六甲等地出现。

到了清朝，尽管清廷明令禁止国人迁移海外，却也未阻止大批的福建民众离开家园。鸦片战争前夕已有数十万福建人民移居至台湾，另有数千人迁至菲律宾。¹⁰ 福建人民之所以能够持续大量地外流是因为商船私带移民以增加收入是个惯常的做法。清初人民偷渡的规模之大，从雍正五年（1727年）闽浙总督高其倬的奏折可知悉：

查从前商船出洋之时，每船所报人数连舵、水、客商总计多者不过七、八十人，少者六、七十人，其实每船私载二、三百人。到彼之后，照外多出之人俱存留不归。更有一种嗜利船户，略载些须货物，竟将游手之人偷载四、五百之多。每人索银八两或十余两，载往彼地，即行留住。此等人大约闽省居十之六七，粤省与江浙等省居十之三四。¹¹

确实，从上面“泰星号”的例子可看出每年准备偷渡的福建民众不在少数，而厦门也为他们提供了登船去国的出口。因此无论是作为贸易港还是移民出口，鸦片战争前的厦门已蓄势待发，具备了在开港后发挥更大作用的条件。¹²

二、开放贸易

1832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代理H. 汉弥尔顿·林赛（H. Hamilton Lindsay）到访厦门后还能报道说他“每天看到10至20艘300到500吨不等并且装载着糖和米的巨大帆船进入港口”。¹³ 英国人因此对厦门的贸易前景充满了期待。

¹⁰ 庄国土〈海贸与移民互动：17-18世纪闽南人移民海外原因分析〉，《华侨华人历史研究》，第1期(2001)，页36。

¹¹ 雍正《雍正朱批谕旨》，第46卷（台北：台北故宫博物院，1980），页27。

¹² Ong, *Coming Home to a Foreign Country*.

¹³ Hugh Hamilton Lindsay, *Letter to the Honorable Viscount Palmerston on British relations with China* (London: Saunders and Otley, Conduit Street, 1836), p.15.



厦门于1843年底正式开港。不到两年的时间，英商德记洋行（Tait & Co.）与祥生船厂（Boyd & Co.）就已经在此设立了分行。随后，二十几家英国公司和美国、德国、西班牙、丹麦等西方国家的公司也都在厦门开设商行。到了1850年，厦门已有30多家外国商行，其中超过三分之二属于英国商人。厦门早期的对外贸易可说是由英国人所主导的。

开港后的最初十年，英国对厦门的贸易增长了六倍，从1843年的38万银元增益至1852年的200多万银元。¹⁴ 这傲人的增长速度在1850年代稍微停滞，但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随着厦门对鸦片、棉制品以及西方舶来品如煤油、面粉、火柴和废铁等的需求增加，对外贸易才缓慢恢复，并获得一定增长。值得注意的是外国商人并没有因为厦门对舶来商品的需求而从中获得收益；反之，他们在厦门的影响日益缩减——到了1880年，外国商行在厦门仅剩24家，远不如岛上183家中国批发商行来得重要。¹⁵

外国商行的减少实际上也反映了外国商家对厦门作为外贸口岸的失望。厦门的腹地既小，福建的物产又不丰富，外国买家可以从厦门大量购得的土产实际上就只有茶叶一项。自1858年至1864年间，厦门每年出口400万至700万磅的茶叶量。1877年厦门茶叶的出口达致高峰，逾1200万磅，但之后即逐年递减，直到1897至1931年间，每年平均仅有80万磅至160万磅的出口量。厦门茶叶贸易的昌盛之所以短暂的主要原因是厦门茶叶的质量不断恶化以及茶叶商以次充好的欺骗行为，导致厦门茶叶在国外买家间名声狼藉。到了十九世纪末，厦门茶叶已经少有人问津，价格跌落至几乎“不及船运成本”的程度，进而迫使不少福建茶农干脆放弃种植茶叶。正如厦门海关税务司包罗（Cecil Bowra）所言，没有茶叶的厦门犹如“昔日的影子”，外贸出口也跌至最低点，再也无法复苏。

¹⁴ 戴一峰《区域性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以近代福建地区为中心》，页178。

¹⁵ Cecil Bowra. "Amoy," in Arnold Wright, ed., *Twentieth Century Impressions of Hong Kong, Shanghai, and Other Treaty Ports of China* (London: Lloyds Greater Britain, 1908), p. 820.



三、促进移民

厦门虽然在1842年后仍然持续进行数量可观的国内沿海贸易，但无可否认的是它并没有因为西方商人到来而取得长足的对外贸易发展。尽管如此，厦门的开港还是令它得以嵌入横跨华南和东南亚的跨洋贸易圈，并趁着全球劳动力短缺之机崛起成为中国最重要的移民中心之一。

众所周知，厦门是中国第一个“苦力”输出中心，但是这项臭名昭著的“卖猪仔”贸易在厦门却只从1845年至1852年间短暂兴盛，并且根据统计，这些契约劳工还不到18,000人。¹⁶ 对厦门影响更深远的移民群体其实是与苦力贸易同时存在但持续时间更长的自由移民。所谓自由移民，即是自主、自愿离开中国的移民。从1845年至1940年间，就有超过460万自由移民经厦门离开中国，其中绝大多数前往东南亚，特别是作为英国殖民地的新加坡（见表1）。

表1：1845–1940年厦门海关出国人数

年份	出境人数(千人)	年份	出境人数(千人)
1845–1875	260	1906–1910	395
1876–1880	121	1911–1915	425
1881–1885	239	1916–1920	339
1886–1890	317	1921–1925	427
1891–1895	407	1926–1927	358
1896–1900	378	1931–1935	290
1901–1905	436	1936–1940	291

资料来源：1845–1875数字见戴一峰，《区域性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页311；1876–1940数字见厦门市志编撰员会：《近代厦门社会经济概况》（厦门：鹭江出版社，1990），页436–47。

东南亚对福建移民而言并不陌生。上文提及，在欧洲人开启大航海时代之前，福建海商就已经在东南亚多个商埠进行贸易。厦门与位于马来半岛南端的新加坡的联系也早于它进入条约港口时代。1821年，在新加坡开埠之后不到

¹⁶ Douglas Fix, “Xiamen: Emigrants’ Portal to a Broader World”, *Chinese Studies Research Center Working Paper*, (2018).



两年的时间，第一艘厦门的“绿头船”便载着货物和移民到来。而随着西方殖民者加大对东南亚资源的榨取，对劳动力的需求也更加迫切，大批的福建男子便经由厦门南下，以新加坡作为中转站再转船到东南亚各地。所以说，厦门在开港之前就与新加坡建立了紧密联系，形成了连锁的中国-东南亚移民通道。

清廷在鸦片战争败北之后，中英的势力均衡便往英方倾斜，大英帝国得以将势力范围延展到南中国海，保证西方的船舶在南中国与东南亚之间畅行无阻。而厦门也趁着越洋流动更为频繁、方便之机，利用与海峡殖民地的长久联系将越来越多的福建人送往东南亚。鸦片战争爆发前夕，福建人口已接近2000万，对这个耕地常年不足的省份造成巨大的土地压力。在1840年，福建的人均耕地仅有0.8亩，远低于“饥寒界限”的4.0亩，更导致许多年轻男子干脆放弃农业生产而转往各大小城市寻找工作机会。¹⁷ 鉴于福建悠长的对外贸易和移民历史，他们当中的不少人便辗转去到海外工作。也正是由于上述内外因素的结合，厦门才得以在开港后扩大其传统功能，成为向东南亚殖民地输出福建劳工的重要移民枢纽。

四、移民机制

自1875年起，每年有7万多名福建人经由厦门离开中国。虽然厦门在开港前已有足够资源每年送出上千名移民南下，但在移民潮开启后要组织、推动这么多大规模地外流，对厦门来说还是需要相当大的转变。而厦门之所以能完成移民枢纽的转型，在于众多与移民相关的专业人士和企业在岛上涌现。譬如，在厦门，移民客栈和船头行安排移民们离开中国；在接收港，客栈和企业主将移民带往种植园、矿山或安排转船至其他工作目的地。而在这起点与终点之间，“客头”起到衔接两端的重要功能。¹⁸

¹⁷ 徐晓望《福建通史》，第4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页546。

¹⁸ Ong, *Coming Home to a Foreign Country*.



(一) 客头

厦门的移民大部分来自福建的农村，其中以泉州、兴化及永春的移民为数最多。对于一个农村的年轻移民来说，他对即将前往的目的地无论在语言、风俗及工作条件上都所知甚少；如果他来自厦门北方的兴化或福州，语言上与闽南有别，那单是到出航港的厦门也是一项挑战。因此，第一次去国的移民（“新客”）一般都不会独自出行，而是需要有移民经验的老手（“老客”）带路，指引门径。正是为了满足这些新客的需求，老客便以专业客头的身份，利用他们已有的知识、人脉及流动性为这些初次移民服务。

从“老客”到“客头”转变的契机在于老客们返乡的时候，时常碰到亲戚朋友要求其再次出国时顺便带上他们。这些老客很快发现这任务有利可图，便放弃他们海外的工作转而成为全职的带路客头。客头的职责相当简单，就是集合有意愿移民的人，帮他们准备所需的文件，将他们带到厦门，伴随他们前往海外并协助他们在海外找到工作。二十世纪初期在厦门活动的客头有1,100名，汕头有800名，香港有200名。

众所周知，大多数中国人是迫于贫困才出国的，因此其中大部分人是支付不起路费的。在这种情况下，客头便会代为垫付，但要收取30%至43%的利息。¹⁹ 抵达目的地后，客头若为移民找到工作便能马上向雇主收取路费及几元的中介费。

一个成功的客头一次可以带领数百人上船，而能力差者最多只能召集五六人。客头的表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社交网络，而他的社交网络则建立在同乡关系的基础上。所以客头一般都只是在自己家乡或附近的城镇寻找客源；另外，由于他们普遍缺乏资金，他们也只能找同乡合作并为他们提供贷款。客头最常见的合作伙伴就是有足够资本经营“移民客栈”的同乡熟人。

¹⁹ 杨建成主编《侨汇流通之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4），页10。



（二）移民客栈

抵达厦门后，客头便会带领新客寄宿到与他有合作关系的移民客栈。在1910年代，厦门的移民客栈就多达184间。同客头一样，移民客栈也是专为服务移民而出现的；它们的关系网络同样是建立在地缘基础上，因此也毫不避忌地将自己的家乡展示在客栈的名字上，如“福清客栈”、“漳州客栈”等。在厦门设立客栈的闽南侨乡至少有11个。²⁰

移民客栈的基本收入来源于它们的旅舍功能。为了增加收入，客栈业主也从事放贷。如上所述，他们贷款给客头作为营运资金，也会以10%至15%的利息借零花钱给个别移民。一些客栈也同时兼做出口商，将福建土产如包种茶及干果等贩运到东南亚给寓居当地的福建人。不过移民客栈最大的收入还是转售船票。由于住客们几乎都会向客栈业主购买船票，因此移民客栈可以很容易将从船头行处取得的船票售出，甚至还可以将票价提高20%至35%。²¹ 因为有多个收入来源，移民客栈的利润非常可观；在1930年代，厦门最大的移民客栈就有高达五万元的营运资本。²²

（三）船头行

船头行即船票经纪。船头行的出现是因为厦门的船运公司一般都不将船票零售，而是让船头行来负责繁琐的售票工作。船头行每售出一张票便会从船运公司那里获得5%的佣金，而且也会在船运公司的要价基础上涨价一至两元。²³ 换句话说，船头行从买卖双方都获利，再加上厦门每年有大批移民离港，因此他们的回报是相当丰厚的。

²⁰ 杨建成主编《侨汇流通之研究》，页35。

²¹ 杨建成主编《侨汇流通之研究》，页33。

²² 周子峰《近代厦门城市发展史研究》（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5），页73。

²³ 杨建成主编《侨汇流通之研究》，页31。



(四) 移民船舶

移民抵达厦门以后，去国的下一步便是登上前往其目的地的船只。福建传统的远洋帆船当然有能力驶往东南亚。但是依靠风力推动的帆船一年只能往返东南亚一次，而且从厦门航抵海峡殖民地须20至30天，还是相当受限制和耗时的。所以自1860年代轮船在厦门港出现以后，福建移民很快便为这种新型交通工具的速度、安全性和舒适性所吸引，更倾向选择乘坐轮船出海。

福建人民对于乘船过海的持续与强烈需求必然吸引更多的轮船公司加入客运行业。在二十世纪之交已有好几家船运公司开通了厦门与东南亚热门目的地之间的航线（见表2）。轮船既不受季候风的限制也能按照固定的时刻表从厦门启航；再加上大多数的船只每次能承载一千名以上的乘客出航，因此在没有意外的情况下，移民在厦门不需等待太久就能出发。

表2：厦门轮船公司

轮船公司或代理	主要航行地	船只数
福昌洋行	汕头，香港，新加坡	3
和源公司	汕头，香港，新加坡，槟城	4
仰和公司	汕头，香港，新加坡，槟城，仰光	3
喳华轮船公司	香港，新加坡，爪哇，日本	5
英商义和洋行	香港，马尼拉	1
太古洋行	香港，马尼拉	3
	汕头，香港，新加坡	19

资料来源：杨建成主编，《侨汇流通之研究》，页25-31。

移民是不准自行登船的，而是必须由客栈提前预约的驳船夫——当地人称“双桨”——带领他们上船。必须说明的是，双桨的行业也是应需求出现的。这是因为厦门开港之后到来的商船骤增，但码头停泊位置有限，使得不少船只不得不在离岸较远的地方停泊，因而需要双桨来帮忙卸货和装货，以及运载乘客上下船。



在厦门垄断双桨行业的是来自同安的陈姓、吴姓和纪姓族人。严格说来，他们也是移民，只是他们的移民历程仅到厦门为止，进而以辅助性的角色参与厦门的移民业务。到了1934年时，厦门有超过两千个双桨，其中将近一半是吴姓族人。²⁴ 客栈业主为了确保住客能够不受干扰顺利登船，便会联系吴姓双桨让他们来带领移民及其财物上船。到了轮船上，双桨还有权利为乘客们分配他们在甲板的位置，并从中收取每人一至二元的服务费用。²⁵ 这个用粉笔在甲板上画出的4英尺乘6英尺半的位置，将是乘客们在旅途中仅有的“私人空间”。

（五）抵达

移民在抵达目的地后就会被带领到客头预先安排好的移民客栈。这些当地客栈是移民过程和移民商业网络的最后一个环节。在1910年，新加坡作为厦门移民首选的抵达港便有29间移民客栈。与中国同行一样，新加坡的客栈也是建立在同乡关系的基础上并且也只为同乡服务，因此新加坡的客栈中就分别有7间福建客栈、5间广东客栈及8间汕头客栈。

除了接收移民以及为他们提供住宿外，移民客栈也是劳务经纪人，是当地雇主寻求中国劳工的第一个联络点。当新加坡或周边殖民地的雇主需要劳工时便会通知客栈他们所需的人数，客栈业主随即电报其在中国合作的客栈，或是指示为其工作的客头前往中国招聘劳工。一旦移民船只抵达港口，客栈便会派遣工作人员迎接客头和移民，为他们提供住宿、在必要时做转船安排或直接将他们送往雇主那里。若是后者客栈就可以直接从雇主那里获得报酬，但要是新客抵达时还没有工作安排，客栈和客头就会帮助他们寻找工作。

从上述讨论可见，厦门能成为移民枢纽不仅仅得利于东南亚殖民地对劳工的需求以及与日俱增的闽南人的去国愿望，更是因为有众多的人员和企业汇聚厦门以参与和移民有关的业务。而厦门成为移民枢纽的转变也间接地拯救了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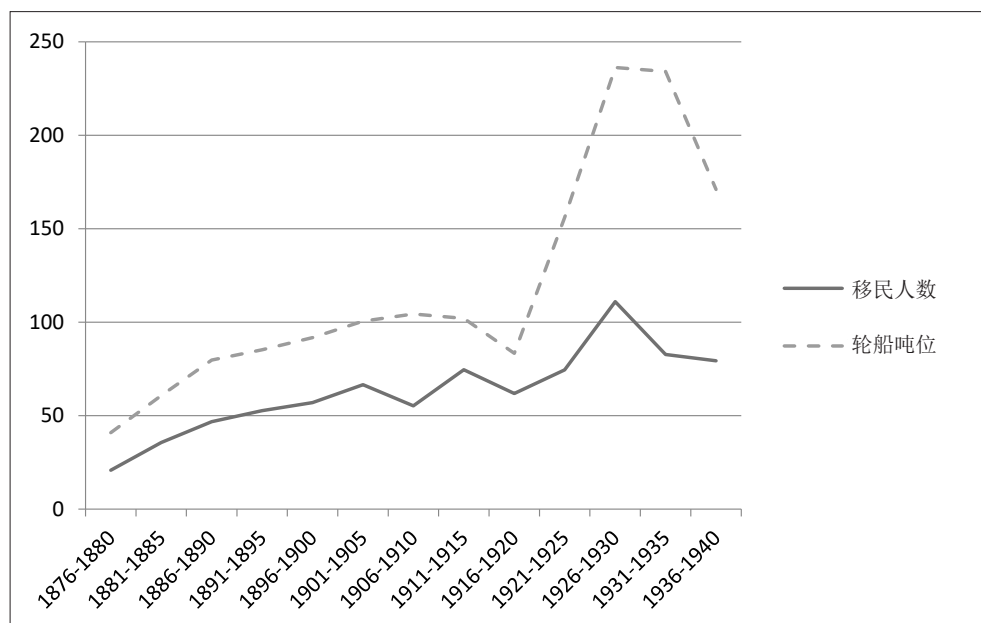
²⁴ 周子峰《近代厦门城市发展史研究》，页254。

²⁵ 周子峰《近代厦门城市发展史研究》，页250。



茶叶外销消亡而逐渐没落的厦门船运业。图1揭示了厦门移民人数与厦门港的船舶吨位之间的密切关系：1910年至1930年间，不间断的流动移民便直接助长了厦门航运业的蓬勃发展。正如海关税务司柏卓安(J McLeavy Brown)所说的，“大量和持续增长的客运业必然会维系厦门成为一个重要的航运港口”。²⁶

图1：移民人数与轮船吨位的关系



资料来源：厦门市志编撰委员会：《近代厦门社会经济概况》（厦门：鹭江出版社，1990），页434-441。

五、服务移民

从移民的角度看，厦门一方面是他们在中国的最后一站，另一方面则是他们海外旅程的起始点。换言之，厦门立足于中国与海外之间，因此它不仅为移民去国提供了资源和途径，也给予身处海外的福建人与家乡维持联系的

²⁶ China Maritime Customs, “Amoy Trade Report for the Year 1885,” in *Returns of Trade and Trade Reports for the Year 1885* (Shanghai: 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 1886), p. 294.



各种方法。首先，厦门利用航运发达之便将福建特产如新鲜水果与干果、咸菜、鱼干、火腿、粉条、烟草、陶器、纸张和包种茶等产品运至海外，间接缩短了海外移民与闽南的距离。对海外福建人来说，家乡的土产可以稍减他们的思乡之情，但对厦门的商人而言，日益壮大的海外福建人社群构成了一个现成的销售市场，他们也因此无需太积极寻找新产品来开拓西方的市场。²⁷ 同样地，岛上为数不多的新兴工厂也只是生产雨伞、草席和鞋子等日常用品以销往海外的华人社区。在二十世纪初期，厦门总出口量的70%–80%都是销售至东南亚的产品；到了1930年代更增长到90%以上。²⁸

除了是移民枢纽城市，厦门也因应移民的需求迅速发展成为闽南重要的通讯和金融中心，一边接收从远方寄来的信息、邮件及汇款等，另一边将它们转送至内地指定的收件、收款人手中。海外移民将部分薪水寄回中国是一种常态，毕竟供养留守家乡的家人是义务也是责任。最原始的汇款方式当然是将钱托付给可信赖的亲戚或同乡，在他们回家时顺带捎回去。但随着移民人数和汇款需求的急速增长，依赖个人关系的寄款方式便不敷使用，专业的侨汇服务也随之应运而生，既满足了移民的需求也从中获得经济利益。

最早从事侨汇服务的是一部分客头和专职的信差。由于他们从所托付的款额中收取10%的费用，利润颇丰，因此有不少人得以累积足够的资金成立专门的汇款机构，即所谓的民信局或批信局。²⁹ 1880年，厦门有8间民信局，汕头有12间，而新加坡则有49间，其中12间是由海外福建人经营的。³⁰ 到了二十世纪初，民信局的数量急速上升，至1935年达到高峰。其时厦门有153间、汕头有66间。³¹

²⁷ Ong, *Coming Home to a Foreign Country*, p.60.

²⁸ 戴一峰〈闽南海外移民与近代厦门兴衰〉，《二十一世纪》，第9期(1996)，页48。

²⁹ Siah U Chin, "Annual Remittances by Chinese Immigrants in Singapore to Their Families in China," *Journal of the Indian Archipelago and Eastern Asia*, (1847), p.35.

³⁰ 戴一峰〈网络化企业与嵌入性：近代侨批局的制度建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第1期(2003)，页72。

³¹ 杨建成主编《侨汇流通之研究》，页81–120。

可以肯定的是厦门民信局的迅速扩张与大量和持续的海外汇款是息息相关的。从表3可见，在二十世纪最初的十五年间，厦门每年的海外汇款介于1700万至2000万元之间。在1916年至1918年由于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影响，汇款额短暂下降，但很快便在战争结束后恢复，并且在接下来的十年中持续增长直到1931年达到最高数额。然而，1932年以后，海外华人社群普遍受到经济大萧条的重击而导致汇款数额再次下降，即便如此，到第二次中日战争爆发之前，他们也能每年汇至中国4000万至5000万元。

表3: 1905-1930年厦门侨汇数额（元）

年份	汇款数额	年份	汇款数额
1905	18,900,000	1922	27,900,000
1906	18,900,000	1923	25,700,000
1907	17,600,000	1924	45,900,000
1908	17,800,000	1925	45,000,000
1909	20,000,000	1926	66,000,000
1910	21,600,000	1927	51,800,000
1911	17,800,000	1928	44,800,000
1912	19,100,000	1929	54,200,000
1913	17,600,000	1930	60,000,000
1914	17,200,000	1931	72,000,000
1915	18,500,000	1932	49,700,000
1916	15,000,000	1933	47,900,000
1917	12,800,000	1934	43,300,000
1918	11,800,000	1935	51,230,760
1919	18,900,000	1936	58,355,000
1920	19,200,000	1937	57,116,510
1921	44,000,000	1938	52,929,211

资料来源：1905-1934年取自吴承禧：〈厦门的华侨汇款与金融组织〉，页202-203；1935-1939年取自郑林宽：《福建华侨汇款》，页32。

大量流动资金涌入厦门后，大大提升了厦门居民的购买能力，成功维系一个相对繁荣的消费市场以及相对较高的生活水平。民国经济学家朱博能便

指出，“大批的移民运动开始”后，“厦门和南洋各埠结了解缘，也就成为‘南洋别墅’，回国华侨的休养所，闽南人的消费中心。”³² 确然，厦门不单是福建移民去国的出口，更是他们回国的第一站。而回国的移民并不在少数：据日本学者杉原熏的估计，1873年至1939年间便有高达80%的移民回返中国。³³

作为入境港口，厦门为那些常年在异国辛勤工作，难得有机会返家的移民提供了暂时喘息的地方，让他们返回家乡前在这里休息一、两天，顺便购买赠送家人亲友的礼物。返乡移民在厦门的大方消费也刺激了市内零售业发展。到了1935年，厦门已有多达5,202间零售商店售卖各类商品，包括衣服、纺织品、鞋子、手表、首饰、自行车、古董、家具和各种食品。除了购物以外，移民们还可以在厦门市内众多的餐厅、咖啡馆或茶馆用餐；到理发厅理发，澡堂洗澡，舞厅跳舞；或是参观著名的中山公园及动物园，以及到影院观看电影。至于那些较为放纵的人，他们还可以到赌场试试运气，去鸦片馆抽鸦片，以及到风月场所寻欢作乐。现代厦门城市在很多方面可以说是迎合移民需求而发展的。

六、厦门投资

作为闽南最繁荣的城市，厦门自然成为移民进行投资的首选。他们投资了各项企业，如成立市内和长途巴士公司；经营绸布零售业；创办多家小型工厂生产水果罐头、蔬菜罐头、烧酒、粉条和酱油等。³⁴ 这些投资当然是以盈利为主要目的，但移民们的投资行为却也间接促进了厦门的现代化，并为市民带来更舒适和便利的生活。譬如在1934年，海外华人入股厦门原有的一家小型电力公司，使其资本增长至140万元，从而有能力添购880 瓦特和500 瓦

³² 朱博能〈厦门商业衰落原因的分析〉，《商业月报》，第8期(1935)，页1。

³³ Kaoru Sugihara, “Patterns of Chinese Emigration to Southeast Asia, 1869–1939,” in Kaoru Sugihara ed., *Japan, China, and the Growth of the Asian International Economy, 1850–1949*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245.

³⁴ 戴一峰《区域性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以近代福建地区为中心》，页337–345。



特的发电机各一台，并且开始为家庭和商业用户供应电力。在家庭用户中，返乡的移民是其最主要的订户。

同样地，厦门的第一家电话公司，厦门德律风公司，本是由当地富商林尔嘉在1907年倡议创办的。启动资金4万元由林氏提供一半，另一半则邀请海外华人投资。1922年，印尼“糖王”黄奕住收购了林尔嘉的公司，并再注资20万元。³⁵到了1930年，电话公司的线路已经直达厦门岛内腹地，甚至还延伸至岛外的邻近城市，包括漳州、石马、海沧等地。在1933年至1934年间，厦门德律风公司已有接近2,400名用户，年利润超过1万元。³⁶

黄奕住对厦门的另一贡献是为市民提供干净的自来水。作为一个没有河流系统的小岛，厦门一直饱受饮用水短缺之苦。在1923年，黄奕住以110万元的初始资金创立了商办厦门自来水股份有限公司。黄氏自己出资40万元，其余的款额则是从东南亚的海外华人中筹集。1927年，在水库以及净水厂建成以后，自来水公司便能以每吨53分的价格向厦门市民供应自来水。到了1934年，该公司不仅为厦门和鼓浪屿的几千户居民提供饮用水，还有多余的水供应给外国船只，每年为公司带来额外30万元的利润。³⁷

七、市区重建

厦门在1920年代顺应现代化热潮也进行市区的重建与翻新工作。岛上的城墙被拆除、旧马路被铺平、新道路重新修建、沼泽地和池塘被填平，新商业区也被规划出来。根据伍连德医生的观察，到了1930年，原本肮脏，杂乱又充满疾病的厦门已经焕然一新，变得“现代化、风景如画及卫生。”³⁸

毫无疑问，厦门的市区重建工作得以成功得益于闽南移民出钱出力支持市政府的各个发展项目。而其中他们尤其钟情相对安全又有着高回报率的房

³⁵ 厦门华侨志编撰委员会《厦门华侨志》（厦门：鹭江出版社，1991），页177。

³⁶ 陈淑熙〈商办厦门电话公司〉，《厦门文史资料》，第9期(1986)。

³⁷ 赵德馨《黄奕住传》（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页209-211。

³⁸ Wu Lien Teh, “A Visit to Modern Amoy”, *China Critic*, 4,5 (1931), pp. 103-104.



地产业。根据学者林金枝的研究,1908年至1938年间共有2668名海外华人在厦门投资,而其中有2145人投资房地产领域。³⁹ 为了快速从厦门的市区重建中获利,这些投资者积极从事房屋的建设,单单自1928年至1930年的三年间,便协助厦门兴建了3585座建筑。今天厦门市内沿着主要干道如中山路、思明路、大同路及厦禾路等两旁的建筑,便有60%至70%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由闽南移民斥资建造的。

在积极投资房地产的同时,闽南移民也将东南亚流行的骑楼型式建筑引进到厦门来。“骑楼”指的是两层至四层、连接成排的商住建筑,底层作商业用途,二楼以上住人。骑楼的独特之处在于一楼会向内缩几英尺形成行人走廊,而二楼因为“骑”在走廊之上就能为底下步行的人遮风挡雨,也为骑楼内店铺提供全天候营业的可能。由于骑楼的功能性和合理性,它很快便成为并排在新铺马路两旁的标准建筑,也是今日厦门的标志性建筑型式。

如果说骑楼代表的是和谐与统一,那富裕的返乡移民在厦门及鼓浪屿上所建筑的别墅就凸显了个人的喜好和品味。厦门本地的移民人数其实并不多,但比起闽南腹地来,厦门相对的安全性及较多的商机便吸引不少闽南移民在此安家落户,并且斥巨资建造豪华别墅。从1920年代开始,这些返乡移民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内便在鼓浪屿建造了一千多所别墅,其中一些甚至比岛上的西方大使馆及教堂还宏伟。正如厦门海关税务司所指出的,“鼓浪屿上最好的建筑都是那些在西贡、海峡殖民地、马尼拉和台湾发家致富的华商子孙所拥有的。”⁴⁰ 同骑楼一样,这些老别墅屹立至今,一同见证了闽南移民对厦门城市发展的贡献。

³⁹ 周子峰《近代厦门城市发展史研究》,页132。

⁴⁰ China Maritime Customs, “Amoy Decennial Report, 1902–1911,” in *Decennial Reports on the Trade, 1902–1911*, vol.2 (Shanghai: 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 1913), p. 115.



结论

历史学者冼玉仪(Elizabeth Sinn)曾明确指出移民研究中的一个盲点,即学者们只钻研移民进程的两端(移出地和移居地),却甚少关注过程中的“中间”地带,如移民枢纽城市。⁴¹但正如本文所揭示,厦门作为闽南最重要的移民枢纽,不仅提供资源与途径令得移民去国成为可能,同时也具备各种便利条件提供服务,让海外的福建移民可与家乡保持联系。因此我们在研究福建移民史时若不将厦门的功能与作用也纳入考量,那研究的成果将是有所缺憾的。

那些经由厦门出国/归国的移民或多或少都受到这个条约口岸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然而,作为一个“运动中的城市”,厦门其实也随着其移民功能的扩大而进化,更因为返乡移民在厦门的投资与作为而转变。如上所述,厦门并不具备成为发达外贸港口的条件,但因为内外因素的汇合而成为闽南最主要的移民枢纽。这一转变所带来的多种商机便吸引了大批与移民相关的从业者(如客头)和商行(即移民客栈和船运公司)聚集到厦门来,不仅进一步改变了岛上的商业环境,也刺激了城市的繁荣。在另一方面,与人们普遍认知相悖的是,许多闽南移民携款归国后并没有直接回到家乡,而是在厦门安家和投资。这些返乡移民利用自己的财力与眼光,与市政府携手推进厦门的城市建设和现代化。到了1930年代,厦门已经是中国最卫生、有序、繁荣和现代化的城市之一。需要强调的是,厦门的现代性并非由西方所主导,而是间接经由东南亚殖民地和闽南移民所引进和界定的。

⁴¹ Elizabeth Sinn, “Moving Bones: Hong Kong’s Role as an ‘In-between Place’ in the Chinese Diaspora,” in Sherman Cochran and David Strand, eds., *Cities in Motion: Interior, Coast, and Diaspora in Transnational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p. 248.





Fostering Trust through Public Communications in Singapore's Handling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Koh Chin Yee¹

When news broke out in December 2019 that a Sars-like outbreak was suspected in Wuhan, nobody expected it would later develop into a prolong pandemic that causes such severe economic and social dislocations worldwide, creates such devastation and pain, and becomes “the crisis of a generation” as described by Singapore Prime Minister Lee Hsien Loong².

After some two and a half years of battling the pandemic, from mid 2022, life in Singapore has gradually resumed to a large extent of normalcy, though at the time of writing,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has not declared the pandemic is over. As of December 11, 2022, Singapore's Covid-19 death rate is 0.079%³, as compared to the global Covid death rate of 1.04%, while her key indicators of economy and livelihood such as GDP growth rate, unemployment rate, external trade, international travel, etc. have mostly improved to pre-Covid levels.

How did Singapore manage the Covid-19 pandemic with relative less costs to lives and livelihoo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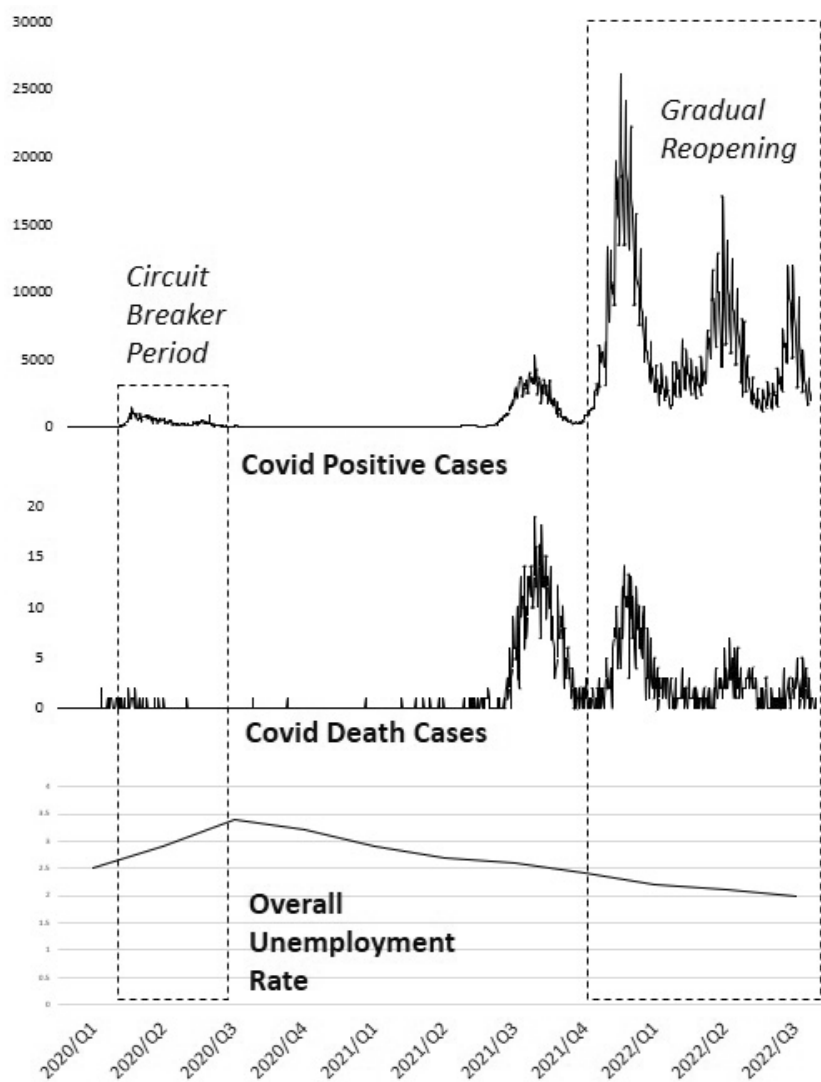
The key word might be “trust”.

In his speech at the Singapore General Hospital's Lecture and Formal Dinner 2022, Lee Hsien Loong said that a high degree of public trust in Singapore's healthcare

¹ Dr Koh Chin Yee is President of South Seas Society (Singapore).

² Lee Hsien Loong “Overcoming the crisis of a generation”, National Broadcast on June 7, 2020.

³ As at November 11, 2022, Singapore has a total of 2,136,658 Covid cases and 1693 deaths.



Singapore's Covid-19 Pandemic Curves and Unemployment Rate (Source: MOH and MOM)

system founded on competency, commitment, and transparency, together with a resilient healthcare system and an effective public health response, had been critical factors in Singapore's pandemic response.⁴

He added that the strong public trust that the Singapore Government enjoys is built up over the decades between Singaporeans and the Government, and in one another, sets Singapore apart from many other countries.

In a media interview, Head of Civil Service Leo Yip opined that "the pandemic is really about the solidarity, cohesiveness of society, and about trust",⁵ while former Head of Civil Service Peter Ho notes: "Particularly in times of crisis... public trust empowers the government to act decisively. Bitter medicine is more easily swallowed when there is public trust."⁶

Trusts in the society are many folds. In Singapore, it is about "trust that the Government has the best interest of Singapore and Singaporeans at heart; trust that the Government is competent and will make the right decisions on behalf of Singaporeans; trust that every citizen will play his or her part, not just for themselves and their loved ones, but also for others, out of respect and regard for fellow citizens, and concern for our collective well being"⁷. When there is trust in institutions, people believe that strategies and measures are effective, thus giving support and compliance more readily, despite inconvenience and losses, and minimising intra-politicking and working against one another.

In this paper, I argue that the presence of such high degree of trust in the Singapore society during the pandemic, built upon a good basis formed many years pre-pandemic, has to do with successful public communications.

Role of Public Communications in A Crisis

Public communication is strategic communication used when a person or group of people muster and share information to a group of people to deliver a message on a specific topic. In a mega crisis such as the Covid-19 pandemic, such information can come from government, professionals, interest groups, businesses, key opinion leaders, individuals and many other stakeholders, including frontline workers in healthcare

⁴ <https://www.pmo.gov.sg/Newsroom/PM-Lee-at-SGH-Lecture-and-Formal-Dinner>.

⁵ Sumiko Tan, ed., *In This Together: Singapore's Covid-19 Story*, (Singapore: Straits Times Press, 2022), p. 81.

⁶ Peter Ho, "When Public Trust Is No Longer Centred on the Government", *Today*, February 8, 2018.

⁷ <https://www.pmo.gov.sg/Newsroom/PM-Lee-at-SGH-Lecture-and-Formal-Dinner>

and other related industries, patients and families, as well as international travellers, directly facing or handling the crisis.

Public communications serve a few purposes:

To inform. To provide accurate, timely and adequate information to allow the public to know current situation, updated scientific findings, and latest strategies and measures to handle the crisis, as well as to correct dis- and mis-information and to bust myths.

To motivate. To move and rally people to accept and support the adopted strategy, to influence behaviour change, and to unite the community towards a common goal.

To gain feedback. Effective public communications is not a one-way traffic. It also endeavours to obtain feedback from a larger and more diversified audiences on the crisis-handling strategy and tactics, and on how to improve and fine-tune these. By communicating relevant information, media, residents and stakeholder groups can scrutinise the actions of the Government, while the Government could respond to public scrutiny, justify its actions or explain how it aims to rectify its approaches to better meet expectations.

Specifically, during Singapore's handling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public communications aim to do the following:

- Provide timely information to cover the entire spectrum of the society
- Gain trust by openly admitting mistakes and acknowledging inadequacies
- Garner support by explaining changes in strategy and manage public expectations
- Mitigate rumours and falsehoods by managing mis-information, dis-information and illegal leakages of information

Provide Timely Information to Cover The Entire Spectrum of Society

In a prolong crisis, especially one where even experts and the authorities do not always have a full picture and are able to provide fool-proof directions, it is important to provide timely information, and to update it as soon as new evidence surface.

In the context of a multi-racial,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e Singapore, such information must be made accessible, using different tools and channels, to cover the entire spectrum of the society.

Soon after the outbreak in Wuhan, Singapore's Ministry of Health (MOH) held regular media briefings on the medical aspects of the virus.

On January 23, 2020, Singapore announced her first Covid-19 confirmed case. This happens two days after Singapore raised its “Disease Outbreak Response System Condition” (Dorscon)⁸ from green to yellow, and a day after the Government forms a multi-ministry task force (MTF)⁹ to provide a whole-of-Government response to the crisis. Both the raise of Dorscon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MTF are communicated immediately to the society.

Since January 27, the MTF holds regular news conferences, providing information on scientific findings, situation updates, new safe management measures and support programmes, etc. In 2020 alone, the MTF held 48 media conferences and issued about 730 releases; while between January to mid December 2021, it held 29 media conferences.

Then Health Minister Gan Kim Yong revealed that from the start, the MTF decided that it should be “as transparent as much as we could, other than on patient sensitivity, commercial concerns or bilateral issues where we ought to be more careful.... Beyond that, whatever we know is whatever you will know, whatever we tell you is whatever we know. We were prepared to be frank and upfront when we answered the questions. If we didn't know, we said we didn't know and we will go and find out.”¹⁰ On the other hand, Prime Minister Lee Hsien Loong personally instructed that the detailed daily report, including spreadsheets, tables and data page, received by the Cabinet be made public on the MOH website.

At the early stage of the crisis, the MTF sends daily situation updates such as Covid-19 statistics and news, community Safe Management Measures (SMM), etc. via means of official website, Gov.sg messaging platform, official social media and messaging accounts on Facebook, Twitter, Instagram, WhatsApp and Telegram. The contents of such daily updates are subsequently expanded to include employment and financial support, emotional and mental well-being, vaccine and medical advices, travel and immigration, etc. As at December 2021, Gov.sg has more than 1.28 million subscribers and had sent out more than 4500 messages.

Such information is crafted in all four official languages, i.e. English, Malay, Chinese and Tamil. As the situation evolve to affect each and every individual in

⁸ The Dorscon is a colour-coded framework that shows the current disease situation in Singapore. It also demonstrates what needs to be done to prevent and reduce the impact of infections.

⁹ The MTF was co-chaired by then Health Minister Gan Kim Yong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 Minister and Second Minister for Finance Lawrence Wong. After Singapore's Cabinet reshuffle in April 2021, newly appointed Health Minister Ong Ye Kung became one of the three co-chairs.

¹⁰ Sumiko Tan, ed., *In This Together: Singapore's Covid-19 Story*, (Singapore: Straits Times Press, 2022), p. 45.

Singapore, the choice of language is later expanded to include various Chinese dialects such as Hokkien, Teochew and Cantonese, and other foreign languages such as Bengali to cater to the needs of the older folks and residents in the foreign work dormitories. This is one of the rare occasions, since the inception of the Speak Mandarin Campaign in 1979, where official communications is made using Chinese dialects as well.

Foreign celebrities were invited to offer supportive words to Singapore's quarantined foreign workers. For instance, in April 2020, superstar Rajinikanth sent a motivating Tamil New Year message¹¹ to Singapore's Tamil diaspora – including tens of thousands of migrant workers from India.

Other than regular media briefings and releases on operational issues that were handled by the MTF, strategic communications by the Prime Minister was carried out at critical junctions to present strategic pictures and big issues and to convey across the most important messages. Seven such live telecast were done in 2020 and two in 2021, across mainstream media, government website and social media accounts, as well as Lee's personal social media accounts. For instance, on April 3, 2020, Lee announced that the "Circuit Breaker" measures would be imposed from April 7 and to last for two months.

Other than Lee, quite a few other ministers including Lawrence Wong, Ong Ye Kung, Chan Chun Sing, Vivian Balakrishnan, Ng Eng Hen, excel in using their personal social media accounts to reach out to segments of the community which are otherwise inaccessible via the mainstream media.

Failing to provide timely information to satisfy the society's informational demands during a major crisis would result in information vacuums. It might exacerbate and increase the severity of a crisis and may induce rumour and gossip.

Sometime from late March 2020, people became increasingly anxious by the rising Covid cases in Singapore. However, the authorities released such numbers only in late nights, sometimes close to or even beyond midnight, thus creating information vacuums. Very soon, information began to leak. Daily number of confirmed Covid-19 cases, though not yet officially released, started circulating on social media and chat groups. It went on for a few days till such abnormality was reported to the police. A MOH deputy lead of the Data Management Unit was arrested and charged for illegally sharing the figures with members of a private chat group of 50 people. She was later jailed for 18 weeks.¹²

¹¹ "For your relatives and family members who live afar, they're only thinking about you," Rajinikanth said in Tamil in a video.

¹² <https://www.channelnewsasia.com/singapore/zhao-zheng-former-deputy-lead-moh-data-unit-jailed-osa-leak-Covid-19-numbers-2512291>

Following the incident, MOH reviewed and tightened its information security protocols and processes, including releasing preliminary Covid statistics in the afternoon, and doing a more detailed release in the night, thus avoiding creating information vacuums.

Through the Ministry of Communications and Information (MCI), the Singapore Government customised communications to engage different audience segments about Covid-19 developments, including messages in multi-languages encouraging good hygiene practices and socially responsible behaviour, vernacular TV programmes featuring home-based activities and exercise segments to encourage seniors to keep active and healthy, creating “Comedians Get Serious” video series featuring four well-known local comedians encouraging the public to practice good personal hygiene in a light-hearted and entertaining way, etc.

Gain Trust by Admitting Mistakes and Acknowledging Inadequacies

In a highly fluid situation like the Covid-19 pandemic, it is imperative that errors and mistakes not be conveniently brushed aside and pretend that they did not exist, for such behaviour would eventually lead to people gradually losing faith in the system and losing trust in the institutions. Problems and setbacks are addressed honestly and transparently.

In his speech at the Singapore General Hospital's Lecture-and-Formal-Dinner on April 24, 2022, Lee Hsien Loong said that “we should always be upfront when we encounter problems and setbacks, and address them honestly and transparently”, it might have been easier to keep things quiet but it would have been very unwise for rumours would spread and people would gradually lose faith in the system, and the society as a whole would eventually pay a high price – the loss of public trust.¹³

Lee concluded that if a mistake was made, own up, take responsibility, and strive to put things right. It requires courage, discipline, and integrity. But it is absolutely essential to strengthening public trust, especially during crises when stakes are high.

There are many examples of errors and mistakes that the Singapore authorities made, including misjudgements, such as the issues at foreign workers' dormitories in mid 2020, but I shall discuss four examples – masking and isolation, TraceTogether, Home Recovery Programme, and errors in vaccination and vaccination injuries.

¹³ <https://www.pmo.gov.sg/Newsroom/PM-Lee-at-SGH-Lecture-and-Formal-Dinner>

Masking and Isolation

On February 11, 2020, this newly discovered virus was named “Sars-CoV-2” and the disease it caused was officially named by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as “Covid-19”. Despite getting an official name, Covid-19 was relatively unknown and unpredictable.

At the start, scientists and authorities assessed that Sars-CoV-2 behaved like Sars-CoV-1 and implemented mitigation measures similar to those adopted in 2003, such as temperature checks at borders, requiring only medical workers and those who showed symptoms to wear a mask, and isolating people who start to show symptoms, etc. However, these measures turned out to be ineffective and inadequate as more was known about the new virus and many prior assumptions were proven to be wrong.

One such realization was that unlike SARS, Covid-19 patients start shedding the virus early, even before showing symptoms, thus disease transmission could occur through asymptomatic or pre-symptomatic persons, requiring a review and revamp of the entire mitigation strategy to instead focus on safe distancing and reducing human interaction until it is safer to do so.

The Singapore Government very quickly acknowledged this. On September 2, 2020, speaking in Parliament on the third day of the debate on the President’s Address, Lee Hsien Loong said “with hindsight, we would certainly have done some things differently”¹⁴, including:

- a. The Government should have quarantined all Singaporeans who arrived from abroad earlier in March and tested them before releasing them from isolation, whether or not they showed any symptoms, instead of assuming that not having symptoms meant they were free from infection.
- b. The Government should also have recommended everyone to wear face masks sooner, rather than changing tack and distributing masks only when scientific advice shifted and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recognised asymptomatic transmission was a serious problem.
- c. The Government should have acted more aggressively and sooner on the migrant worker dormitories, knowing that communal living in any form poses risks. While the authorities had stepped up precautions and those seemed adequate, bigger clusters broke out in the dorms and threatened to overwhelm the entire system.

¹⁴ <https://www.pmo.gov.sg/Newsroom/PM-Lee-Speech-at-the-debate-on-the-motion-of-thanks-to-the-president-Sep-2020>

In a pandemic when the situation is constantly evolving, changes such as “masking policy” have to be communicated clearly, in a manner that builds and reinforces trust.

TraceTogether

Another issue was relating to TraceTogether. Released on March 20, 2020, TraceTogether is a digital system implemented by the Singapore Government to facilitate contact tracing efforts. The main goal is quick identification of persons who may have come into close contact with anyone who has tested positive for Covid-19. The system helps in identifying contacts such as strangers encountered in public one would not otherwise be able to identify or remember. Together with SafeEntry¹⁵, it allows the identification of specific locations where a spread between close contacts may occur.

The MTF explained that for TraceTogether to be effective, at least 75% of the population had to install it, and had to turn on their Bluetooth function to ensure the app was running. Thus, the MTF explained that Singapore could go ahead with further reopening only if three key conditions are met, one of which was the TraceTogether programme must have a participation rate of about 70 per cent.¹⁶

However, TraceTogether has raised significant concerns about the privacy of those who use it. After the announcement of the device on June 5, 2020, a petition called “Singapore says ‘No’ to wearable devices for Covid-19 contact tracing” was started by Wilson Low on that day. Two days later, on June 7, opposition party Singapore People’s Party released a statement by assistant secretary-general Ariffin Sha to express its concerns about data that would be collected by these devices, and called for the Government to “tread with utmost caution and regard for the privacy of Singaporeans”.

On June 8, responding to such concerns, Minister-in-charge of the Smart Nation Initiative Dr Vivian Balakrishnan explained that TraceTogether will not be a tracking device and will not track an individual’s location.

In the same occasion on June 8, MTF co-chair Lawrence Wong said, “There is no intention to use a TraceTogether app, or TraceTogether token, as a means of picking up breaches of existing rules.”

On December 14, 2020, the MTF announced that “Singapore is on track to reaching the target of around 70% by the end-2020..... As Singapore has made

¹⁵ SafeEntry is a national digital check-in system that logs identifying details of individuals (identification details and mobile numbers) visiting public venues such as malls and workplaces, as well as communal activity areas.

¹⁶ This was mentioned at the media conference by MTF on October 20 and November 10, 2020.

good progress to support a further resumption of activities, the MTF will start Phase 3 of re-opening from 28 December 2020”.¹⁷

On December 23, 2020, the TraceTogether adoption rate exceeded 70%¹⁸.

Nonetheless, barely a fortnight later, on January 4, 2021, answering query from a Member of Parliament¹⁹, Minister of State for Home Affairs Desmond Tan told the Parliament that the police can obtain any data under Singapore’s jurisdiction for the purposes of criminal investigations, and this includes TraceTogether data.

He explained that while TraceTogether was conceived and implemented for contact tracing to fight Covid-19, and measures had been put in place to protect the data, such data collected by TraceTogether is treated like any other data under Singapore’s jurisdiction and the police are empowered under the Criminal Procedure Code to obtain the data for criminal investigations.

A day later, on January 5, Dr Vivian Balakrishnan said in an unscheduled statement in Parliament that he had not considered the Criminal Procedure Code when he earlier spoke about TraceTogether’s data privacy safeguards. “Frankly, I had not thought of the CPC when I spoke earlier,” he said.

On January 8, the Smart Nation and Digital Government Office announced that a law will be passed to formalise assurances that data from the TraceTogether app or token can be used to look into only serious offences including murder, terrorism and rape. “We acknowledge our error in not stating that data from TraceTogether is not exempt from the Criminal Procedure Code,” it said.

Following this saga, in January, 350 people wrote in to the authorities to request that their TraceTogether data be deleted. During the same period, 390,000 people came on board the system.

On February 2, the Covid-19 (Temporary Measures) Amendment Bill was passed in Parliament, enshrining in law that personal contact tracing data obtained from the TraceTogether, SafeEntry and BluePass²⁰ systems can be used only in the investigation of serious offences, including murder, terrorism and rape.

During the parliamentary debate on the above bill, Dr Vivian Balakrishnan said he deeply regretted the consternation, the anxiety that was caused and took

¹⁷ <https://www.gov.sg/article/moving-into-phase-3-of-re-opening-on-28-dec-2020>

¹⁸ <https://www.smartnation.gov.sg/media-hub/press-releases/tracetogogether-adoption-surpasses-70>

¹⁹ Mr Christopher de Souza (Holland-Bukit Timah GRC) asked if data collected under the TraceTogether programme would be used for criminal investigations, a concern expressed by some online.

²⁰ BluePass Token is a Covid-19 contact tracing device issued to foreign workers in the construction, marine shipyard or process sectors and who stays in dormitories.

“full responsibility” for the Government’s error in not stating that contact tracing data from TraceTogether is not exempt from the Criminal Procedure Code for criminal investigations. He assured the population that the Government intends to deactivate TraceTogether, along with other digital contact-tracing programmes, once the pandemic ebbs.²¹

Home Recovery Programme

Prior to August 2020, while many countries including US, UK, Germany, France, Japan etc. had been commonly practising home recovery as the default mode of recovery, Singapore opted to be more cautious and admit infected patients to hospital, or to Community Care Facilities.

By end August, Singapore concluded that over 98% of individuals infected with Covid-19 has mild or no symptoms, they could recover at home and free up hospital beds for those who truly require the medical care. From August 30, 2021, the MOH started the Home Recovery pilot scheme with 40 individuals. Director of Medical Services Kenneth Mak said the ministry is adopting a “risk-calibrated and phased” approach for the scheme, and would set aside enough resources to monitor and support such patients, including telemedicine services and hotlines, as well as ensure that they follow the rules and stay home during their home isolation.

The pilot project showed positive outcomes. Gradually, home recovery programme was expanded to cover more segments of the population.

However, Covid-positive patient numbers continued to rise as the more infectious Delta variant hit Singapore. Many anxious people with mild symptoms sought help and made a long queue at public hospitals, straining scarce resources.

The sudden surge in numbers resulted in many people not being able to get through to MOH hotlines for help and instructions. Meanwhile, there were feedback that home recovery protocols were complex, confusing and frustrating. MTF co-chair and Health Minister Ong Ye Kung acknowledged at a media conference on October 9 that “some people tell me that they are more afraid of these rules than Covid-19 itself. This is a sentiment and a problem that needs to be addressed.”²²

The MTF then reset all testing and isolation procedures into a simple set of “1-2-3 protocols”. These protocols or procedures would cater to almost all situations and circumstances henceforth. Ong explained that Covid-19 was no longer such a

²¹ Singapore subsequently stepped down the use of TraceTogether and SafeEntry from April 26, 2022.

²² MOH news highlights on 9 October 2021

scary disease especially after most people had been vaccinated. The reset of protocols addressed the psychological state of the Singapore society. This could lift the fear and confusion surrounding Covid-19, and MOH would then focus its efforts on the two vulnerable groups – those not vaccinated and aged 60 and above, and those aged 80 and above.

Subsequently, Singapore Armed Forces personnel were roped in to help man the MOH hotlines. The MTF brought back some safe management measures from end September to November, including limiting group sizes and forbidding dining-in.

With home recovery program, Singapore managed to avoid straining her healthcare resources while the Delta variant burnt through a significant part of its population. The Delta wave finally subsided by early December 2021, before the Omicron variant invaded Singapore's shores.

Errors in Vaccination and Vaccination Injuries

There have been several cases of errors in vaccination such as a staff member at the Singapore National Eye Centre was given five doses of vaccine in one injection, 117 people at Bukit Merah Polyclinic received the wrong dose, and two people given wrong dose at a clinic in Hougang. All such incidents were reported proactively by MOH.

On October 3, 2022, Senior Minister of State for Health Janil Puthuchearu revealed in Parliament that 130 people in Singapore received a wrong dose of Covid-19 vaccine since the vaccination exercise started in late 2020, with 11 people affected by overdosing and 119 having received a lower dose than the recommended amount of a vaccine. Of these incidents, seven were children between the ages of five and 11, none of whom had any adverse reactions. Puthuchearu added that MOH investigation of the incident was ongoing, and that it would take appropriate enforcement actions if any regulatory breaches are found.

Similarly, incidents on vaccination injuries were readily reported, such as a 16-year-old youth who collapsed following a weightlifting session six days after his first dose of the Pfizer-BioNTech/Comirnaty Covid-19 vaccine. Regular updates on his treatment progress were reported by the MOH²³, and a one-time financial assistance of \$225,000 was extended to the youth and his family under the Vaccine Injury Financial Assistance Programme. The advice for vaccinated persons after any dose of

²³ <https://www.moh.gov.sg/news-highlights/details/positive-progress-for-16-year-old-who-had-an-out-of-hospital-cardiac-arrest-after-Covid-19-vaccination>

the mRNA Covid-19 vaccines, particularly adolescents and those of younger age, to avoid strenuous physical activity was adjusted from one week to two.

From May 2021, the Health Science Authority (HSA) provides a regular safety updates on Covid-19 vaccines. A total of 11 monthly updates were given. Starting from March 2022, when 95% of the eligible population had completed the primary series of vaccination and the incidences of the reported AEs had stabilised, HSA switched the reporting interval to quarterly.

Such updates are comprehensive, providing scientific data including incidences of suspected adverse events (AEs) and serious AEs in different age groups, types of AEs and serious AEs, with breakdown to different types of vaccines, i.e. mRNA and inactivated.

Such transparency reinforces the trust that the public has with the healthcare system, that it is open and honest, even when things fail to go as intended.

Garner Support By Explaining Change of Strategy and Managing Expectations

In this section, I shall argue that a key element in maintaining and building trusts is explaining change of strategies and managing people's expectations, and in so doing, shape their knowledge and attitude, and garner their support. If such an important strategy change is not communicated timely, openly and thoroughly, it is difficult to expect people to be able and willing to embrace it readily.

With rigorous testing, contact tracing, and isolation, from October 2020 to sometime in March/April 2021, Singapore managed to keep its daily cases very low, very often with zero community cases for a long stretch of up to two weeks. Most people were glad that the "zero-Covid" strategy worked well in Singapore.

When Singapore started its national vaccination programme for Covid-19 from end December 2020, scientists and medical professionals worldwide mostly believed that the vaccines could help very much in reducing death and even infections. Early indications showed that vaccines could offer more than 90 per cent protection against symptomatic disease, thus keeping cases low and enabling people to live more normal lives.

By May/June 2021, number of infection in Singapore stabilized. The MTF allowed Singapore to relax her social distancing rules and allowed social gatherings and dining in of up to five persons. On May 28, MTF co-chair Lawrence Wong said "Covid-19 is likely to be around for some time, and we will all have a role to play to develop more resilient strategies to adapt to this new environment", he further

added that “Singapore has started planning for the possibility that Covid-19 may become endemic here”. At a closed door event in the same month, Health Minister Ong Ye Kung spoke about the need to accept Covid-19 as endemic.

On June 24, all three co-chairs of the MTF - Gan Kim Yong, Lawrence Wong and Ong Ye Kung penned an op-ed piece on *The Straits Times*, titled “Living Normally, with Covid-19”. This piece painted a new normal that would include home recovery, self-testing instead of PCR tests, a focus on health outcomes rather than on daily infection numbers, and international travel under the endemic.

Many people had placed high hopes on the vaccines, believing that it would keep infections low, stop the spread of Covid entirely, achieve herd immunity and help societies move to the endemic stage. However, as more variants of Covid-19 emerged, it gradually became clear that breakthrough infections could occur even on people protected with a booster dose, because of waning immunity.

The Delta wave hit Singapore hard. By October 8, 2021, daily new cases in Singapore hit 3590. Many people were very unhappy that a new wave has hit Singapore. Some were questioning why was the Government not declaring another “Circuit Breaker” alike measures, while others questioned the need to tighten up since the Government had talked about “living with Covid”.

A day later, on October 9, Lee Hsien Loong gave a 25-minute live update on the Covid-19 situation in Singapore “to share my thoughts and concerns with you, because unity of purpose and hearts is crucial to get us through the next few months”²⁴. He explained that the Government’s original approach was to do its utmost to prevent Singaporeans from catching the virus so as to minimise serious illness and deaths, especially so when the population was not vaccinated. However, the emergence of the much more transmissible Delta variant changed everything. Isolation would not stop the spread, nor could vaccination, and the country could not stay locked down indefinitely. The Government therefore changed strategy from “Zero-Covid” to “Living with Covid”.

Lee presented a roadmap that Singapore would take to reach a “new normal”, including getting booster vaccination, switching to home recovery programme, building up healthcare facilities, continuing to re-open borders safely, and “updating our mindsets – to respect Covid-19, but not be paralysed by fear”. He concluded by offering a possible timeline – “it would take at least three months, and perhaps as long as six months to get to this new normal”.

²⁴ <https://www.pmo.gov.sg/Newsroom/Update-on-the-COVID-19-Situation-In-Singapore-by-Prime-Minister-Lee-Hsien-Loong-on-9-October>



Mitigate Dis- and Mis-Information and Illegal Leakage of Information

An earlier part of this paper has discussed the problems with information vacuum. In this section, I shall discuss misinformation (i.e. false information but is not deliberate) and disinformation (i.e. false information deliberately spread to deceive people) which could foster confusion, diminish confidence in public institutions, and discourage desired behaviours.

During the pandemic, the Protection from Online Falsehoods and Manipulation Act (POFMA) is a tool the Singapore Government uses to correct falsehoods circulated. Such falsehoods must be corrected in time before they escalate into “infodemic” that causes confusion and could lead to mistrust in health authorities and undermines the public health response.²⁵ The challenge for governments is to strike a balance between deterring misinformation and not being perceived as unduly harsh.

For example, on March 28, 2020, a fake news about virus being spread through postal articles was circulating. An audio recording circulating through Whatsapp, allegedly attributed to a Malaysian infectious diseases specialist, claiming that Covid-19 is being spread through postal articles. The Singapore Government corrected that the infectious diseases specialist has since clarified that he did not make the recording. Relevant Malaysian authorities and SingPost have debunked the claims.

Another example. On April 18, 2020, Singapore States Times (STR) published a Facebook post on the Covid-19 situation in Singapore claiming that the number of new confirmed cases of Covid-19 infection was ordered by Health Minister Gan Kim Yong to be halved to minimise public panic, and that the STR had called out the Government and MOH on the cover up and MOH had to comply with STR's post. The Singapore Government corrected that there was no instruction given by the Minister for Health or the Government to halve or under-report the number of cases, and that MOH does not act and has not acted in compliance with any of STR's posts.²⁶

A peculiar phenomenon surrounding Covid-19 infodemic has to do with the different strategies adopted by different countries in fighting Covid. Societies that adopted “Zero-Covid” strategy put up public communication campaigns, so did those which adopted the “Living with Covid”.

²⁵ https://www.who.int/health-topics/infodemic#tab=tab_1

²⁶ <https://www.gov.sg/article/factually-clarifications-on-falsehoods-posted-by-sst-on-reporting-of-Covid-19-cases-in-singapore>



Interesting, public communication messages advocating “Zero-Covid”, while intended to serve domestic audiences and shape their behaviour, were “imported” by their followers in Singapore and circulated to chat groups and on social media. Some did so innocently, while others were designed to shape local opinions and influence policy changes.

It is observed that public communications in Singapore focusses on explaining the need and rationale for Singapore to take the “Living with Covid” approach, without criticizing nor highlighting negative references on others which had taken the “Zero-Covid” strategy.

Conclusion

Singapore has continued to see high levels of trust in government, as high as 74%²⁷ as captured in the Edelman Trust Barometer 2022 report, while her population’s trust in the national healthcare authorities reach even a higher level, i.e. 80%²⁸.

Such high levels of government and interpersonal trust are associated with greater compliance with Covid-related restrictions and higher vaccination rates. An increase in trust of governments might have reduced global infections by 12.9% (CL: 5.7% to 17.8%) for government trust and 40.3% (CL: 24.3% to 51.4%) for interpersonal trust.²⁹

This hard-earned trust is built during quieter times pre-Covid, and is further strengthened during the pandemic where successful public communications strategy was implemented, with principles such as transparency, timeliness, integrity and inclusiveness religiously upheld.

²⁷ 2022 Edelman Trust Barometer report, page 42

²⁸ 2022 Edelman Trust Barometer report, page 44

²⁹ Joseph L Dieleman, “Pandemic preparedness and COVID-19: an exploratory analysis of infection and fatality rates, and contextual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preparedness in 177 countries, from Jan 1, 2020, to Sept 30, 2021”, *Lancet* 2022; Vol 399: pp. 1489–1512

以复杂小地方写无边大历史

——读陈政欣新作《武吉演义》

曾宇昕*

摘要：马华作家陈政欣对家乡武吉有“生于斯长于斯”的深厚情愫，截止到《武吉演义》他也便实现武吉写作三部曲。作者以“演义”为体，试图以某些重要个体活动去展现广而深的历史画面，写出历史而无失文学关怀。此地历史画面是由复杂的民族对立交织而成，而作者又恰好找到一个能传达这份复杂性的优秀媒介——语言去表现与推动历史发展进程。作者也对“演义”之体作了引申，创造自己的特殊体式，协同特殊的叙事处理，将武吉短短三年的历史时期演绎出更广阔的历史画面，笔触更长远的过往与未来，拉长所叙历史线，总的使此演义更显广远深厚。

关键词：“演义”人物、社会复杂性、演绎历史

* 曾宇昕，浙江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生。

陈政欣¹的文学创作植根马来西亚，武吉镇是作者“生于斯长于斯”的家乡，承载作者最熟悉的故事与人生，也寄托他最深厚的乡土情怀。

武吉镇是历史上的军事要塞，这个世界聚集了各种不同种族，他们在这从事政治活动与维持生计，被历史浪潮莫名卷入——英国的殖民、日本的入侵、小镇内部各民族的争端都在这里纷繁上演，从《文学的武吉》²、《小说的武吉》³到《武吉演义》⁴，陈政欣完成武吉写作三部曲，这是他对个人文学事业的不断展开，是对这片乡土情结的表达，也是对世界性战争历史的反思。

《武吉演义》关乎武吉的历史浪潮，故事跨度从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颁布无条件投降后开始，结束于1948年6月18日英殖民政府宣布所有马来殖民地全国进入“紧急状态”，落脚在武吉镇——各种民族、势力复杂的聚集地，这一地又牵扯到许多其他地区，如武吉后的大山、英国殖民政府所在的槟榔屿等。故事貌似纷繁复杂，但是亦可寻出线索，作者依据史实，按照时间顺序别出心裁地以武吉几大权力的对峙与试探去展现这一历史变化，以小生活表现大历史，将大历史作文学地展现，如作者所说的，本书的“人物与事件是一步一脚印地随着这3年的岁月在这小镇里或踌躇或蹉跎或蹒跚走过的事迹。”无怪乎作家选择了“演义”这一体式去创作。虽说是写3年的故事，但是在书写形式上作了特殊处理而打开了格局。全书正文共12章，不少章节都有“前言”与“后话”，分别追溯当下故事的成因与将来的发展，让事件与人

¹ 陈政欣，祖籍广东省普宁县，1948年出生于马来西亚槟城州。新加坡义安工艺学院机械工程系毕业，后从商多年，现专心创作。曾任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理事、副会长，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前理事，马来西亚作协北马联委会前主席。曾于2007年获得第九届花踪文学奖小说组推荐奖。2008年获得第一届海鸥年度文学奖小说组特优奖。2014年小说集《荡漾水乡》获得中国首届国际潮人文学奖小说组特优奖。2014年散文集《文学的武吉》获得金帆图书奖文学类大奖。2014年获得第13届马来西亚马华文学奖。2017年小说集《小说的武吉》获得第14届花踪文学奖之马华文学大奖。2018年获得新加坡第5届南洋华文文学奖。长篇小说《武吉演义》获得2021年台湾第十一届全球华文文学星云奖创作奖之“长篇历史小说评审推荐佳作奖”。

² （马来西亚）陈政欣著，文学的武吉[M].马来西亚：有人出版社，2014。

³ （马来西亚）陈政欣著，小说的武吉[M].马来西亚：有人出版社，2015。

⁴ 陈政欣最新长篇小说，将于2023年，由马来西亚有人出版社出版，文中引用原文暂不注页码。

物不止在3年中滞留，而真正地涉足历史洪流不断向前，让人读出所以然，也收获何所往。故事最后以张英杰奉林特雄之命，面对“紧急状态”，只得去上伯公香再去探探印度人鲁姆地底细的情节结束，暗示又一段历史政治拉扯阶段的开始。这种似完未完的故事结尾，让人不觉想起鲁迅常以“走”为小说结尾的创作艺术，同样的，在这未知的混乱与和平交织的社会形势中，平凡的人们，谋求自己的生活，只能以“走”面对。在这“走”中，那脚步声伴着历史洪流，不绝于耳。

一、演义“人物”：表现局势的个体

陈政欣是个能写大历史的作家，从短篇小说开始，他便具有以普通个体写马来大历史的艺术特征，体裁体量所限，人物都不丰满，相对扁形，主要表现为以个体对话为主呈现故事，进而表现大历史，但是这种运用在某些时候存在小人物说“大”话的矛盾之处，小说的艺术真实受到一定影响⁵。而在《武吉演义》这个具有集成性质的作品中，他选择“演义”之体，则延续之前“以小写大”的写法，且通过“演义”体完善了某些缺陷。取“演义”之名是作者的中国文化情怀表达，作为一种体裁，也表现作者对取这一段历史素材创作的态度——以历史书写为目的，用人物演义历史。这样的体裁会影响故事内容、人物塑造，如三国演义讲故事，突出的都是历史上的大人物，人物主要作用在串联历史故事，个体的形象并不饱满而呈类型化，出场与经过到结尾形象变化不大。陈政欣的武吉演义亦是如此，讲武吉的历史，涉及

⁵ 《山的阴影》系列小说中，正是通过烈叔所生活的小镇诸事写出大的时代话题（（马来西亚）陈政欣著，山的阴影[M].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1993）；至于一些独立的微型，如《特殊比赛大会》以各党元老较量“腹量”讽刺社会政治现实；《送山上去》追写日本侵略时期的个人家庭悲剧；《有原则的人》、《还是回家睡觉去》、《二舅母的伤》、《困境》等都令个人讨论华语教育及华人在马来社会中的团结问题。但是如在后两者中，都是以亚才这样普通的小人物去谈论大事，有这样的评论：“如果不从根本的教育制度寻求统一的基础，如何用共同的语言共同的价值观去争取共同的利益呢？即使一时能同心协力，那也是在厉害权益受到蚀食时所调整的步伐，但是基本的价值观还是迥然相异，这又如何去寻找永恒的团结？”（179-180）就显得不够合理。（云里风主编，陈政欣文集[M].厦门：鹭江出版社，1995）

到的人物大都是镇上的各种势力的代表，没有一点权力与影响局势发展的人物他涉笔相当少。人物的身份与能力出场即被确立，主要塑造方式是语言描写，人物的个体特性并没有得到具体展现使得他们的形象并不丰满，这点可能会招徕不少诟病。想到“演义”的文体，我便觉得这一切就能被理解了，这是作者对自己的创作特征的准确运用与定位的表现。

这场历史演义的鲜明特征是作者以个人写局势，在作者笔下，一般人的悲欢与大局势紧密相关。不同人的身份随着统治力量的变化而变化，是一个重要方面。印裔警长玛目在日据前是英殖民政府的警长，日据后成为军部任命的保安警长，当日本撤退后则只能消失在人们视野中以自保；重要的类似线索的人物陈厚昌从英军情报部的联络员到政治部副部长再到槟州政府教育局总监，他见证这段历史，并为历史左右。另一重要方面，是人物受局势影响做出选择与他们的命运发展。花豹与黄喜良的绝交背后是走上抗日与汉奸的两条道路的选择，陈厚昌与远房亲戚陈怀德虽同为国民党员却各自效忠不同对象，让人看到各种势力内部的分裂；黄喜良一开始无效传信而最后回到城市工作远走北海镇，许队长两年为大山上的兄弟与山下联系的各种辗转经历，则是侧面展现抗日部队人们在特殊时期的茫然与探寻；刘四福日据时期送子抗日被用刑致残，于是期待英殖民政府的归来，了解日本投降新闻都会感动得流泪，拉克夫集团胶园旧经理亚当斯的人间蒸发与后来归来，和印度人拉笛汉在日据期间临危受命管理胶园，却备受日军伤害最后又被迫接受橡胶钞票，是在书写侵略战争中的民间艰难；杜文章、林特雄等进入稳定期寻找英政府的政策优势想发土地财，陈怀德终于放弃所谓“落叶归根”的执念，买了杜文章的土地，这件小事由县长苏巴马廉的见证为“意味着武吉镇对英政府的信心。这也是太平洋战争以来，武吉镇上第一宗土地合法交易，也佐证了，英政府在这块土地上主权的合法性。”也是作者在用重要人物的战后焦虑行为去展现战后武吉镇不稳定的局势。陈政欣正是如此试图通过写类型化的人物所经历的局面与做出的选择，展现武吉镇这段时期暗潮汹涌的平静与波折交错的社会形势，写历史是写人物的目的。

这不意味着作者把人物都刻画得单调，我以为陈厚昌是作者塑造最充分的角色。如果说其他人尚且更像是作者表现历史的工具，我以为陈厚昌是真正生活在历史中的人。他特殊的身份虽与政治现实相关，行为发生也带政治动机，但是他的行为与视角都是以个人的生活形式呈现，他不是一味投身在政局当中，成为政局的注解，而是作为个人，政局是他的一部分。提到他，读者脑中就会浮现出一位沿着海岸踩着脚踏车奔波于群众、行政机关与各种领袖代表之间进行磋商的工作者形象。他作为各种势力之间的联系能宏观格局，作为生动智慧的个体又不失感情判断。正如他最后代替各方向乡亲报告时，他说他“只是以个人的情怀、观察和期待，向大家做个报告和建议”，于是他越是能相对客观地展现所面临的复杂情形，就越能展现出一个特殊人物的丰富个性特征，于是作者在历史书写完成之外又让人感受到文学的“人”之光彩。作为“局外人”，他对整个社会的群体认识更为客观：在第三次到武吉，他向陈怀德通报马来亚的政治构架形势的深层动机被揭开——“武吉镇上的社会领袖们一直以来，都只是在关注着自己的日常生活状态，对国家政治发展与走向都是漠不关心……陈厚昌对整个华族的政治意识的缺乏认知与麻木，深感沮丧与失望。”这种客观不是以理性分析为基础，而是以情感判断为前提。作为个人他还有其他特殊情感体验。他与玛目警长的再见让人感动，长期合作者之共尝时代给的辛酸感涌出，“我明白和了解”，言简意赅是他作为政治家的特质，同时也在表现一类“中间人”的共鸣。与山姆都、黑狗林的重逢，与黄喜良的战后再见亦是如此。第三次到武吉，他还感到前所未有的对危机的警觉，他住在警署一晚无眠“通宵达旦，他直视着眼前的黑暗，是另一种他不曾想象过，并已存在着的黑暗。”“而这黑暗，正从武吉镇后的大山倾淹侵蚀而下。”这样深刻的心境描写是全书对其他人前所未有的，他被历史浪潮无端席卷的无力与他的重要而尴尬身份之间既是对应也能产生艺术张力。这种尴尬的身份让他客观又使他只得面临他人所未有的危机，担任这“吃力不讨好”的工作，于是“深切地感觉到时代剧变和个人的无力感”。直到第四次来武吉，听到“走狗”的嫌恶话语，他意识到“他已不是武吉镇上被人

欢迎的人物了。”被几个年轻人在火车站暴力砍伤，成为“他这一人生中的痛楚。”可以说，陈厚昌不是这场演义中的悲剧英雄也不是胜利者。“是非成败转头空”，这场历史演义没有赢家，而我们所需要看到的也不是胜利，要看到的是这里面的历史曲折与曲折中的生存，英雄在其中浴血，凶徒在其中经营，群众在其中浑浑噩噩，能够演义出曲折与生存实在不容易，但是我以为陈政欣是做到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陈厚昌这个角色。

不过我以为作者没利用好一个人物——半瞎李，他的出场是“上天他眼瞳的视框缩小了，不要让污秽的人世间，沾染他天赐的视觉观局，让他能有对能参透天书的天眼，看透人世间的生前后世”，这是一个相当好的人物设定，但是作者却随后只让他成为传话人；在第十二章中作了类似描写，他发挥一定作用，保持了神秘感，但是他在李记兴的劝说后相信小镇的平和安定，决定“不开摊替人算命测世评局了。”作者再度结束了瞎子李身上能发挥的特殊艺术色彩。在大变局中，还是在“演义”中，如果能添加一点说不清道不明的类似命运的因素，文学性、艺术性是能有一定提高的。陈怀德的侄子“大种”也集中一定特质：智障之无畏、潮州人，这种特殊人物可以有许多发展空间，但是作者做的处理很平凡，这也是个小遗憾。

二、社会复杂性：以语言复杂展现的民族、局势复杂

《武吉演义》人物复杂却不散乱，因专注展现历史画面，由此作者展现的社会复杂性成为全书的重要魅力来源。这种复杂源于民族复杂，表现为语言复杂，目的在呈现时势复杂。

首先是民族复杂。作者展现小镇中民族的混杂，设置了大量各民族的个人：华人、印度人、英国人、马来人乃至爪哇人，他们各自占据不同地位，以自身存在展现民族环境的复杂。民族之间对立不必举例赘述，同一群体内部的复杂性呈现为作者所特别突出有必要一说。同一群体代际之间的复杂如林特雄所反思的“我这出生在马来亚的人，没有我祖父或父亲那年代人的故

土家乡情绪。都第三代了。武吉镇上的乡亲们不同，都是三四十年前才过番渡海在这里安家的，故国情愫还很浓郁凝固，就没考虑到扎根本土和未来的事。”华人在马来亚土地上何去何从是一个重要问题。随着时局发展，陈怀德也逐渐放弃父亲所叮嘱的落叶归根，走向选择落地生根，买了榴梿径的园地。这不仅是华人的问题，也是印度人、英国人乃至日本人所要面临的问题，在这里，外来者到底能否扎根，身体上的迁移后，心灵上的归宿在何方，民族间的对立受局势的影响此起彼伏，不安定的历史中人们如何完成自己的民族身份认同，这种关乎心灵之深的问题，需在代际之间对民族的感受中考量，是文学关注的问题，是优秀作者关注的原因与必然。

在武吉小镇的实际中如此复杂的民族状态是很难展现的，于是陈政欣选用了一种直观且具有意味的媒介——语言，复杂的历史画面在很多时候被作者由语言质料建构起来。语言本身在人们的交流中，词句的所指与能指及语用时的言外之意又会在讲故事的同时诉说文化。武吉镇的乡亲父老的语言包括福建话、海南话、广东话如潮州话、客家话、普通话、英语、马来语等，要将这些融贯一起实在不易，但是在许多语言细节上作者会有意突出，在形式上也会作明显备注：或是字面书写上展现，以华文写作为基础，间杂其他语言文字；或使用一些方言词汇如“kunning”这样的马来名号、“大种仔”这样的潮州人称谓；或在行文中有所提示，在页脚作特别的注释。第四章可以说是作者把语言混杂性表现得最充分的一章，前言引入以多种语言为交流媒介的两大家庭，将语言混杂这条线索贯穿在局势变化与人们生活经营中，出现以作者直接备注多种语言的形式，最后在后话中出现多种语言的使用与表达。其中写刘俊华、李子平、许崇明几人在独立大会外的对话就很有意思，李子平、许崇明用潮州话、英语发问，而刘俊华则“以这两个人都能听得懂的武吉镇方言潮州话回答”，在谈话间自然呈现语言乃至民族文化混杂状态。各种语言容易成为各种人物的标志，不少人物会几样语言也对应地让他的复杂身份更鲜明起来，助力于对历史局势复杂的呈现。如刘四福貌似是普通人，但是因会多门语言被新殖民政府看作是“在政府事务上、在人际脉络上、在

天主教会事务的、在地方区域上的琐碎联系上”“最佳的助手”，新县长苏巴马廉“在读英文书和读华文书的华人群里寻觅到制高点”“与宗教、回教堂、长老、宗教司建起互信与尊重的机制”问题都会向他咨询。第四章后刘四福几度作为翻译出现在几种势力对峙的场合，也就很自然地呈现出此冲突下的文化对立。张英杰被称为“吃红毛粪读红毛书”，是峇峇与娘惹家庭的长子，全家以英语和马来语掺杂武吉镇上众多华族方言为媒介，娶了林特雄女儿，正因为具有生长于多种民族文化交织的环境的特质，所以进而设定他在校舍重建中联络各种势力上发挥重要作用。

以语言之复杂写民族之混杂，作者最终要追求的是写出历史局势的复杂。最基本的表现为日本势力、英国势力、抗日队伍、华人领袖与马来民族几方的拉扯，如陈厚昌与苏巴马廉的掣肘就是槟城殖民地政府与英国皇家军部在行政职权上的制衡布置；而在这混乱权力格局中又有许多责任推诿，像苏巴马廉作为殖民地政府则直言“山上抗日军的事务是归盟军或英军的情报部管辖，他是民事政务的县长，犯不着浑上那锅浊水。”单股势力内部又有所分化，山上的抗日军也有留下的与国民党部分，他们的前路各不相同，后者因战争告一段落的回程引发黑狗林的叹息“真是中国人的苦难”。同一势力在不同时段也会有不同影响，像山上的军队在不同时期会有不同动向，日本投降后他们逐渐转向城市活动，并不团结。日本投降后，英国殖民政府貌似权力过渡顺利，准备回归掌权，但是也有许多局部动乱问题难以解决，如学校的复建，林特雄等人与英国胶园经理之交涉谋取新的生意市场，胶园中印度工人发起动乱。用林特雄等人会谈对局势的考量来说即日本投降三年后，武吉镇人在享受“诡异的和平”。又正如陈厚昌最后一次与林队长会谈后所洞见的对方面临的悲剧“他们都很被动，可能还会面对一场真枪实弹战争和围剿。”动乱在这个地方不会平息，民族的复杂性引申为势力的复杂，让这个世界只能像件五花十色的衣服，在千疮百孔后又要被定上各色的补丁那样参差。但是作者也能看到诸多民族得以共存的原因，所以在大会的末尾也让华



人领袖们达到了某种共识，为今后的和平与自主权利作探索与努力。我想这也是作者在隐隐地做出自己对武吉历史走向的判断，对各民族的交织及一定程度上由此引申的势力复杂等种种问题作思考，确保这场演义是文学的历史。

三、演绎历史：历史线的拉长与历史面的展开

如果陈政欣只停留在演义，那这部小说的价值量就不够了。重要的是作者一直没忘记将它以当代小说去对待与创作，于是演义的内容与体式都有不少别出心裁之处，创造出“有意义的形式”，将历史书写的时间线拉长，将历史画面展开。

与典型的“演义”对比，小说具有一些特殊的艺术要素。在本书中所明显表现的是环境。环境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实体，一种是虚体。本书突出表现社会景观与氛围。一些建筑的描绘与展开，宛如线索的设计是很有味道的，它们与历史相关，又在展现这个世界中有着超出客观历史之外的特殊艺术味道与精神内涵。小镇中心伯公埕在全书开端就成为首领们的会议场所，具有一定马来文化色彩，而后陈厚昌二次来武吉在黄昏中散步至此，明确这“是武吉镇上最聚集人气的地方”，为小说更添当地社会、民族的文化特色。小镇被日军侵占作办公室的三层楼学校，是小镇被侵略的历史伤痕标志，重建它的信念则是人们共同保卫家园争取独立与和平的精神表现。社会景观与人相关，许多环境则指向社会状态。大山后的“金狮洞”，日本一入侵就成为荒地，再成为抗日据点，暗示信仰在动乱时期的失效，而残酷现实所急需的反抗行动成为社会要义。拉克夫种植集团的“红毛楼”，是小镇橡胶业重镇标志建筑，是各族民众谋生之地，于是也是人口管制相对简化之地，总的展现地方经济特色，在日本侵略中见证英国人的逃散、印度人的勉强支撑与诸多小人物生活的受侵略者压迫的历史画面，也见证战后的小镇种植资源的恢复与分割，各方势力的回归与合作。作者正是通过“演义”在历史中绘制出丰富的社会景观，让读者感受到所谓“历史”之丰厚。



实体环境丰富重要，与人相关，社会氛围更具有生命充斥人们生活。陈政欣首先写出在这一时期武吉刚从混乱势力拉扯出，脆弱感与虚无感的和平环境。“整个镇子，就像是没有灵魂的干尸，没有个主人似地飘荡惶惑，一片虚无缥缈，让人感受不到沉稳，无从定心。”这是作者第一次从对大历史的社会乱局的叙写中回过头来看社会平常面，这样的氛围描写比其他种种历史客观存在的呈现更使读者感同身受。此后作者便以氛围去联系这段历史的各个小阶段。作者常用陈厚昌的视角感受武吉镇氛围，他第二次到武吉时，觉得此地“就像一潭淤泥死水，没有丝毫波纹，沉淀寂寥得让人晃悠晃荡没有个着落的感觉。”第三次到武吉时，再以他的眼看到街道的熙熙攘攘，“这些日子以来充塞和笼罩着的武吉镇街道上诡谲和压抑般的晦气，都被这中午灼热的阳光驱逐散了”。而在下一个政府安定之前，武吉镇“大家都蒙蔽在暗黑里，大家都在等，却又不知道在等什么。大家都局促不安，却也安稳地过着日子。日子像是很平静，深底下，确实夜狼虎豹的眼睛在盯着。”在英政府宣布“紧急状态”后，又借陈喜南之眼看到车站里，街道上，武吉镇民照常地生活着。用氛围补充历史客观局势，就好像给作者创造的人物们加上一个连续的舞台背景，这背景既平常而真实又立体地充斥在他们之间，时紧时疏，带动故事节奏，又让历史书写的画面得到更好的展开。

如果说小说的环境是展开历史书写画面的重要要素，那么作者的结构安排与叙事者的叙事方式，则拉长历史线以让历史叙事显深远。小说特地布置的前言与后话以及附录等部分是作者的特殊安排，具有深远意味。第四章有前言、后话、附录，是作者特殊体式使用最为典型的一章。前言回到王仕利与刘俊华在日本入侵前后的时段，回忆二人的家庭、社会经历，拉长时间线至从英殖民到日占据，展现涉及年轻人的学习与事业发展问题的社会面，补充受到时局影响的一类年轻人代表：他们为安全在日据时上山抗日，而在这个不绝对和平前夕陷入道路选择迷茫。后话不是每一章都有，但是第四章特设后话就很有意味，第四章全章都以语言的复杂与应用为线索，展现日据时期结束前后人们寻求后路的努力与经营，后话中这些青年的退出选择是抗日



队伍衰落的表现，前后形成对比，交代结果，将历史时间线向后延伸。第四章出现附录“武吉镇上的英校”亦是承接全章“语言——民族——局势”这样的隐喻关系，同时也以英校为关联将故事线拉长到1927年，以这一年为结尾又将中国的历史大事引入，故事面也被展开。前言和后话都是一种插叙，只是前言插入过去补充情节原因，后话插入故事发展出的结果。但是前言与后话和正文的联系又并不如一般的插叙之于正文那样紧密，中间的时间距离可能较长，如此一来，前言与后话会把时间效果拉得很长，历史感更重，前言成为诸如传说的往事，而后话也成为尘埃落定的终局。而附录则像局外人（作者）的补充，让整个艺术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关联又在某种程度上紧凑起来。所以说这种体式艺术在把历史演义得相当深刻、丰富、有张力。

抛开作者制作的结构，叙事者的叙事也充分展现作者的小说艺术。全文采取全知视角，只是作个别的视角转化。作为政治演义，其中有不少叙述者自己的直接评价，如此一来会相对生硬，但是也确实让读者能更明确形势发展。不过作者为了不那么生硬也有其他形式的探索，最常用的便是以人物之口说局势，大有诸葛亮隆中对策说天下之感，如旧县长惹拉的局势分析，新县长苏巴马廉提到其后对印度、马来半岛等地的战争与政治形式的分析，塑造人物形象之余，也侧面暗示作者对局势的评价与思考。又如陈厚昌受攻击事件的背后是什么，未能得到直接解释，而是借林特雄等人的会谈转述，让攻击事件得以保留足够的突发性；并以此引发了陈厚昌与林特雄对接下来马来亚社会发展的预判，王成就转述中的陈厚昌与现场的林特雄建立了一种对话共鸣，判断马来亚会走向独立的共同思考让局势的确定性得到加强，让读者更能体会时局的发展程度，与这些人物审时度势的眼光与能力。无论是叙事者自己的评论还是文中人物的评论，实际都是在建立一个评论者的精神世界，这个世界会追溯当下事件的前因后果，实际上也是在借叙事艺术拉长历史线与扩大历史面。借智者之口说事实是在论势，如若让民间群众讲神秘偶遇则成了流言或传说，在话语之间作者就借机加入了一定的玄幻因素，玄幻因素又在历史事实外，制造玄幻的历史世界，但是不完全脱离历史现实，而是借过去现实某



个契机展开，故也产生了历史面展开与历史线的拉长的效果。第五章展开从序言就带入的“山”，在本书前半段尚且是人们谈论的抗日队的安身处，但是当视角转向黑狗林，当他为前途感到迷茫而在脑中闪现“这山有神”的念头时，山的形象开始丰满起来。山中的老杨向他说“在这山间晃荡行走，心要有诚挚的敬畏与空灵的心怀，专心致志与不存杂念。那你走到哪里，你都会清楚地知晓你是身处在这山的那处，也知道你从哪里来要到那里去……”山神之说让战争局势与人的遭际蒙上一层梦幻的命运感：被社会隔离的抗日队，却能与山神相依，在动乱中迷茫的人们也能得到山神的指引，时间沧桑巨变，山神不老。还有一纵即逝的拿督公、百年的榴槤树等玄幻意象，以及抗日队人以之为信仰与日军队伍不敢侵犯大山的历史往事的呈现，也就是在书写历史现实之余展开了地方文化特色的那一面，这一面不以当下为原由，而有源远流长的沉淀过程，所以可以说在这历史面的展开之余，历史线索也无形地被延长到很久很久以前，于是总的产出一一种韵味悠长而丰富的历史书写。

结语

面对陈政欣的历史演义，阅读的个人会尤其感受到自己的渺小，他虽写一镇一山，但是从一个人、一片土地、一座建筑他就能挥笔触及辽远的异地与前尘、世俗百态与战乱和平；他虽写短暂几年，却也能在对小说之要素的把握——特殊环境的留意与艺术形式的创制中，将几年变得绵长而广远，历史线被拉长，历史面被展开，使读者只能被席卷其中，体味那历史洪流冲击下的异域里滋味万千的人生。不能说此作已完美没有不足，但是《武吉演义》可以说足以证明作者已将自身的艺术个性与赤子情怀充分交融发挥，发挥到一个成熟的不负自己与读者、不负家乡与传统的高度。

VUCA 环境下的生存法则： 做时代的价值型企业

——《用户价值变革三部曲》序

孙静若*

一

80多年后的2100年，当你在不经意间回想起21世纪初期那些已经模糊破碎的往事时，一丝悲悯之情将会在你心里一闪而过。那时的地球是一个220多个国家的世界，河流山川把70多亿人彼此区隔，工厂、交通工具和通讯网络繁忙地工作着，驱动这巨量的肉体凡胎紧张而又缓慢地工作和生活。一个新的世界刚刚开始，人们狂热地追求着快速涌现的新生事物，以为那样就抓住了未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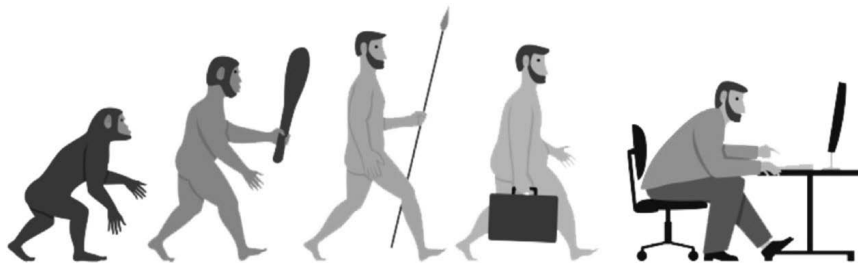
每天，睡眠惺忪的人们乘坐着烧油的汽车在拥挤的路面上挪动，来到钢筋水泥的写字楼里，坐在屏幕前做着单调的工作。时不时掏出手机，沟通、联系、娱乐，或者解决吃饭、交通、购物等问题。人们偶尔会争论人工智能会不会毁灭人类，幻想人类何时才会不死，讨论人和组织将如何定义、进化。这些记忆对你来说可能会有些太遥远了，你可能连你上一任妻子、很久之前

* 孙静若，南洋学会会员，《用户价值变革三部曲》由清华大学出版社2021年11月1日出版。

朋友们的样子都记不太清了。你曾经以为这个年纪的你早已行将就木，无奈地在病床上痛苦等待死神的到来，但现在却依然活得很好。你的人生已经有了太多太多故事，但你却知道还有很多很多故事要继续发生。没有人督促你去干什么，但你的生活依然如几十年前般忙碌。你还年轻，不需要太多愁善感，执着于过去。过去、现在和将来都被包含进同一个超文本时间序列里，你很容易产生似曾相识燕归来的既视感。

信息通讯技术把时间的长度无限压缩，只不过才短短一个世纪，工业时代却似乎变得遥不可及，就像在100年前回顾农耕时代。

人类掌握的自然力量越来越多，人类社会的进化也越来越快，在过去几千年的文明历程中，人们逐渐掌握了火、蒸汽、电、波、光、基因的力量，而社会也由原始社会进化到了农耕社会、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人类自身的属性和角色也发生了巨变，逐渐发生了从自然人到经济人、社会人、智人、自由人等属性的转变，从自然的服从者到征服者到改造者甚至创造者的角色转变。人类不再是宗教里所说的被造者，而是通过自身的努力成为了造物者，成为了神话中的半人半神，成为了《未来简史》里面所说的神人。



人类从自然手中夺取了决定自我命运的权力，并反客为主。利用这来之不易的权力，人类一步步建立了石器文明、农业文明和商业文明。而以手工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为代表的商业文明，在经历了信息技术的洗礼之后，又步入了以知识经济和超文本组织形态为特征、后工业时代的新商业文明。每当新事物出现，人们习惯于在旧的名称前面加一个新字，来暂时表示这个还未

展开的事物。在21世纪初期人们所说的新商业文明，必然在下一个拐点来临之后被赋予确定的含义。

二

世事无恒常。放在大的时空背景下，世间万物都是流动的。从混沌初开到开天辟地，无中生有，有无互生，事物就在这种动态变化当中蛇行。在对自然夺权的过程中，每个个体都付出了努力，而最终对于资源、财富进行获取和利用的权力都要在群体内部通过契约的订立来进行重新分配。随着群体规模由洞穴到部落、国家和全球系统的演变，社会分工、组织体系、契约关系、组织及其个体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复杂，这就意味着权力的分配体系也越来越复杂。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由城邦到国家，由国家到区域联盟、经济同盟，实际上，分分合合只是政治博弈形式和组织形式的变化，在通讯技术和科技的推动下，人类越来越趋向于形成一个全球化的整体系统。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和公司这种形式可能消亡，但政治和组织却会永存。权力的分配体系将不受既有形式的束缚。

哈耶克早在1949年就指出，现代经济不断增长的科技复杂性需要更高层次的权力下放。知识经济时代已经到来。通信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全球最远两点距离的通讯时间仅有1/8秒，时空被高度压缩，借助数字化，知识的传播是零距离的。人的知识化增强了组织和个体的力量，权力也由政治组织不断分散给个体以及个体组成的各类组织。其实，权力本来就属于个体，因为每个个体都是权力的贡献者。与其说是分权与放权，不如说是还权。但因为个体对权力的不自觉容易导致分配的争议和争斗，所以才有了集权和分权的过程。这也就使权力在人类文明的大部分时间里集中在了占有资源和财富更多的少数人手中，而少数人对权力分配的态度和方式形成了不同体制，也导致了不同阶层的产生。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人的自觉使他们能够合理地认识和使用权力去创造价值，权力的分配更大程度上不是按照对资源和财富的占有，而是按照个体的知识和能力。人们不再去为资源和财富而争斗，而

是通过自身的知识富集水平、价值转化能力的提升来自我获得、自我满足、自我实现。这样，组织就形成了一种高级的混沌状态，决定世界的力量更多的向组织和个体倾斜。

在21世纪初期，国家还没有消亡，世界还没有进入由知识人构成的高级混沌状态。但改变已经发生。

三

政府的角色发生了根本转变。马克思主义认为政府有两种基本职能，一是社会政治统治职能，一种是公共职能。传统上认为政府首先应该是政治统治的工具和机器，更多强调管控。民主政府的职能源自社会的需求，但职能的实施往往滞后于社会需求。这是管控型政府给人们的一贯印象。而随着生产力和科技的进步，职能与需求的矛盾愈演愈烈，政府的角色必然要从消极、强制的管控者向积极、人性的服务者转变，原本僵硬的管理也必然向柔性管理转变。政府内部也需要在管理、组织、领导力、服务等方面做出系统变革。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深刻地影响了世界经济格局。日本通产省神话的破灭使日本经济进入了“消失的20年”。政府对市场的长期过度干预抑制了市场发展的活力，而放任市场行为则容易导致市场经济秩序混乱并孕育经济危机。美国政府放任持续膨胀的金融产品以及无孔不入的金融投机活动，政府监管责任的缺失最终导致2008年次贷危机的爆发。在互联网经济从诞生到快速崛起的这二十多年时间里，政府对市场给予了更多的开放和包容，宏观调控、监管也更快、更及时。正是凭借良好的政府-市场关系，金砖国家及许多新兴市场得以快速发展并逐渐掌握全球市场话语权。

接受了日本通产省的教训，人们把目光聚焦在了硅谷。从日本投降之后的十几天到20世纪80年代，通产省作为一个万能导师，通过选择主导产业，促进和扶持主导产业迅速成长，推进了汽车、家电、装备、消费电子等产业的快速发展，甚至引导了工业设计的发展，彻底改变了日本产品在国际市场

上粗制滥造和模仿抄袭的形象。而进入信息时代，通产省选择了几个技术前沿领域。这一次，通产省与硅谷的发展走向渐行渐远。日本电子企业、IT 企业迷失了方向，也错过了信息技术革命浪潮大发展的绝佳时机。而硅谷作为产学研集成的产业集群，基于全球最强大的研发体系和最大资本市场的二元架构，成为推动科技创新和商业化的巨型孵化器。虽然硅谷的创业失败率高达 90%，但以苹果、谷歌、Facebook、Uber 等为代表的公司却掀起了一轮又一轮信息技术革命浪潮。

四

科技的复杂性使世界由有序变得混沌。知识水平、价值转化能力的竞争愈演愈烈，个体、组织间的协作与同盟也越来越广泛。全球数字经济已经到了成熟阶段，数字经济由梅特卡夫定律、摩尔定律和达维多定律决定了其快速、跨界、边际效益递增、可持续和去中介化等基本特征。在数字环境下，科技的发展呈指数增长，任何组织和个体都必须经过一次又一次科技浪潮的洗礼。巴菲特说，当大潮退去，才知道谁在裸泳。在一次次科技浪潮之后，人们意识到，适者生存的达尔文主义在数字经济下依然存在。科技的复杂性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工业时代人们苦心构建的稳定系统被打破、重构，人们忐忑而又惊喜地迎接着熊彼特所说的“创造性毁灭”。

硅谷的创业生态体系成为了各国政府应对不确定性、构建创新体系的范本，政府给了个体和组织以更大的空间来进行创业创新。日本经济已经消失了 20 年，而欧洲经济也已经停滞了 10 年。目前全球 90% 的创新在欧洲之外产生，欧洲地缘政治的分散导致欧洲至今没有形成与硅谷媲美的联合创新体系。以色列虽然是创业圣地，但更多停留在创新孵化，而疏于经营管理，始终没有大公司出现。互联网的发展似乎使各国站在了同一起跑线，这也使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有了充足的自信。2017 年，中国的各类创业平台近 8000 家，其中孵化器数量和规模跃居世界首位。创业经济似乎重新发挥了中国的人口红

利。虽然面临同质化、盈利模式单一等问题，但在政策、资本、全球技术资源的推动下，中国不止成为全球第一大互联网市场，互联网经济的发展也已经在世界领先。中国的互联网巨头正在加速走向国际市场。

硅谷不只为政府带来了启示，苹果、谷歌等创业公司的巨大成功也成了企业争相模仿的典范。丹尼尔·贝尔早在1973年就指出，后工业社会以理论知识为中轴，意图是人与人之间知识的竞争，经济结构从商品生产经济转向服务型经济。苹果的iPod与索尼的随身听已经成为典型的企业经营逻辑转换的案例。

五

在扎根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商品主导逻辑下，商品处于中心位置，而服务被认为是“次优”产出。企业作为价值创造者成为主角，而顾客是价值的消费者和毁灭者。后工业社会，商品主导逻辑失效，服务主导逻辑下，服务是一切经济交换的根本性基础，顾客不再是价值的毁灭者，而成为价值的共创者，所有参与者都是资源整合者，共同组成服务生态系统。企业经营的目的价值创造，而随着经营逻辑的转换，对于价值的讨论也应该由以柏拉图为代表的原子论价值和以亚里士多德、亚当·斯密为代表的经济学价值回归到海德格尔的现象论价值。

海德格尔认为，只有被人从精神上体验之后，事物的价值才能体现出来。进入数字经济时代，尤其是在共享经济下，人们不再需要所有权，而仅仅需要使用权背后的体验。这种价值取向和服务主导逻辑下，用户成为企业经营的核心，为用户创造价值成为企业的终极使命。与国家系统一样，商业系统的权力也需要进行分布式重构，商业文明进入了一个用户主权的时代，企业必须要从经营产品转而经营用户。

科技带来了知识的爆炸式增长，在强大的知识背景下，个体获取信息、商品的能力极大增强，用户所掌握的信息甚至超过了企业，用户对企业的产业链、产品成本有了深入的了解，工业时代的信息不对等和不透明都消失了。



用户掌握了更大的主动权，而不像此前一样需要被动的选择。对人的重新认识成为企业经营管理的核心基本命题。

在后工业时代，人获得更大的个体性的同时，也具有了更广的群体性。每个人可以独立创造更大的价值，但由于个体知识的局限，人们必须相互服务、互相依存。

互联网赋予了个体以多重角色。用户不仅可以是消费者，也是生产者、使用者、社交参与者甚至投资者、创业者。而对于企业内部来说，员工不仅是执行者、更是管理参与者、服务者、决策者、创业者。而管理者则转变为主持者、服务者、领导者等角色。企业内的每个人都将作为事业的合作伙伴，成为独立思考的经营者。

实际上，价值互联网羽化甚至消弭了企业、员工与用户之间的边界，人们彼此之间零距离，而价值互联网平台能够使所有人都能够零摩擦参与，深入的参与和交互则使平台链接的资源更加广泛，边际效益递增，甚至产生换边效应。这颠覆了科斯对于企业内部市场增加交易成本的定律，平台内部形成了多边市场，也正是在这种开放式参与当中，平台的边界不断延伸，最终将形成像硅谷一样热带雨林般的生态系统。

六

知识背景不仅使人的角色和属性发生改变，也重构了企业的形态以及企业与人的关系。企业的形态更趋向于灵活的、敏捷的、无边界的、平台化的、智能的、自组织的形态，而企业与人的关系更趋向于一种伙伴的、友好的、柔性的、直接的、可持续的、交互的关系。在21世纪初期，人们快速移动着脚步，想要一下子从工业时代的窠臼中挣脱出来，容不得多想就从悬崖上跳下，要么快速组装出一架飞机，要么粉身碎骨。

1980年，亨利·明茨伯格在《管理科学》期刊上描述了五个截然不同的企业模式：简单结构、机械官僚制度、专业化官僚制度、分部化形式、灵活



企业结构。他认为官僚制度是过去式，而灵活企业机构是未来式。硅谷的科技初创企业所表现出来的创新性和灵活性被认为是灵活企业机构的典型代表。而硅谷更像是一个放大的初创企业。

科技初创企业能够基于敏捷高效的小团队，迅速找准用户需求和痛点，结合新颖的科技手段，快速开发设计出小而美的产品和服务，充分利用大数据工具，小步快跑、不断迭代，并利用互联网进行黑客式营销，给用户以良好的体验并实现爆炸式增长。其灵活的组织、宽松的管理、自由协作的文化、令人瞠目的激励措施给传统的企业和商学院造成巨大的冲击。独角兽借助无处不在的智能手机而不断涌现，时刻告诫人们要回归创业的初心，未来是初创企业的天下。

然而，加里·哈默和他的搭档贾尼尼的调查给独角兽们泼了一盆冷水。截至2016年11月，全球179家独角兽的市值估计为6460亿美元。虽然数字很大，但这些公司的市值在标普500指数的占比不到2%。独角兽的新生和估值都在减少。金融资本主义和分析至上是传统美国企业的两大要素。初创企业在发展壮大之后，反而不再那么灵活，组织形式抑制了创新创业精神和创新创业能力的发挥，又成了管理上的旧企业，陷入传统的窠臼当中，这就是所谓的硅谷悖论。而大公司则意识到了创业的重要性，通过不断定义自己，已经不再是深陷官僚体系而积重难返的大象，反而努力成为阵型多变、战术灵活的联合舰队。

七

21世纪初期的商业变革和探索给之后几十年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这一时期的商业理论和最新实践层出不穷：

价值代替了利润，参与代替了官僚，激励代替了绩效，量子思维代替了牛顿思维，价值分享代替了股东价值，长期价值创造代替了短期利益追求，创客代替了员工，工匠精神代替了低质低价，智慧增长代替了盲目增长，东方管理智慧代替了西方传统管理学；



人类的基础设施步入智能时代，物与物、物与人之间都能互联，物理设施的数字化使其能够被高效管理，快速分配，按使用付费；

范围经济取代了规模经济，大规模生产改为柔性定制化生产，所有权改为使用权，从价值主张改为价值对话，单边市场改为多边市场；

组织结构从金字塔向扁平化、网络化转变，企业关系由零和博弈向合作共赢、生态协作转变，企业形态向平台和自组织转变，自上而下的管控向全员经营转变……

而反观这一时期中国的企业实践，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些商业理论的落地实践以及转型变革的挣扎与坚持：

传统制造业正在被剧烈颠覆。工业化时代，在以大规模生产、销售、传播为特征的规模经济下，中国处于微笑曲线的底端，被挤压在产业链低利润区的制造环节。缺少核心技术、产品低端、利润少、供需错配一直是中国制造业的痼疾。随着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进程的加快，社会生活日益多元化，消费意识也更加个性化，越来越多的企业意识到，无论是研发与设计、生产与制造，还是营销与服务都必须以满足消费者需求作为出发点和归宿点。消费者成为产销者，并参与颠覆了传统生产的垂直分工体系。借助互联网平台，企业、用户及利益攸关方均参与到价值创造、传递及实现的环节，借助大数据及柔性制造体系，通过众筹、预售等创新商业模式，工厂直接面向消费者，用户可以满足个性化定制，而企业也可以获得超额利润。红领率先实现了个性化定制生产，海尔也探索出了基于大规模定制的智能化生产体系，格力、美的、三一重工、尚品宅配……中国企业用创新的方法和实践走出了一条不同于德国工业4.0和美国工业互联网的智能制造路径；

传统零售业也在被快速重构。互联网与通信技术突破了价值传递环节的时间和空间限制，物理世界被数字化，人、信息、物流、资金实现了无缝对接，减少甚至消灭了中间环节。传统零售渠道被电商颠覆，O2O又将电商颠覆，而O+O的新零售浪潮必将把人们带入一个后电商时代。社交网络、VR、AR、移动设备、物联网、人工智能不断改变着顾客的互动方式和场景体验。零售的核



心从交易变为互动和场景体验。企业与顾客的关系从交易变为交互，单边市场变为多边市场，顾客的需求得以快速交互，体验得以快速优化，产品得以快速迭代。在这一次次变革与重构的浪潮中，我们见证了沃尔玛、家乐福等传统商超的没落与挣扎，见证了京东、阿里等电商巨头的崛起与转型，见证了苏宁、国美等传统卖场的新零售尝试和多元化布局，也见证了盒马鲜生、智慧便利店等零售“新物种”的尝试与探索，以及娃哈哈等制造巨头传统渠道失效而面临的危机。中国的零售业探索出了互联网时代新的商业方法论，享受着新的人口红利；

所有传统产业，都在互联网工具和新的商业方法的催化下进行着重混。房地产业由原来的钢筋水泥建筑的建造、售卖转向智慧、绿色建筑及教育、金融、社区服务一体的商业模式；平台化的互联网家装正在挑战并吞噬着传统家装公司；共享经济模式下，使用权代替了所有权，汽车、房产、自行车、充电宝、消费电子产业都被赋予新的生命力，重新激活；物理世界正在知化，物联网重新改造着基础设施，智慧城市、智慧家居、智慧交通、智慧农业、车联网、能源互联网……雄安新区的形态如何，有太多的想象空间；互联网金融、移动支付重构了金融市场格局，挑战了传统银行的权威；区块链将从底层对经济、社会、产业进行重新架构；机器人、人工智能的普及与应用掀开了服务业、制造业、文化产业等各个领域的新篇章……

八

站在2100年或者在21世纪的中叶，回望21世纪初期的人类社会，你将清晰地定义这个时代、这个时代的人和这个时代的企业：

后工业时代、量子时代、数字化时代、信息时代、大数据时代、共享经济时代、社群经济时代、同理心时代、后管理时代、用户价值时代……

数字人、自由人、使用者、股东、利益相关者、合伙人、创客、知识工作者、自由工作者、服务者、合作伙伴、产销者、自媒体……



知识密集型企业、创新驱动型企业、数字化平台、生态系统、互联网企业、无边界企业、物联网企业、虚拟企业、社区型企业、社会企业、B型企业、智能企业、价值型企业……

而俯瞰这这一时期的商业文明，会清晰地看到它的发展脉络，就像一个罗盘：

用户价值成为商业的核心命题；

科技、数据和设计是用户价值时代的三种动能，推动着企业的经营管理的转变。设计将科技变得更让人感动，科技推动设计传递更丰富情感。数据羽化了边界，把人与人、人与物、生活与工作、生产与消费的界限逐渐消融，离线的世界即将消逝，一个在线的时代正在到来；

不确定的世界需要重新认识，企业也需要用经营、管理对用户、员工重新赋能。而赋能的目标和结果，就是形成深具人性关怀的盈利性关系。围绕用户价值，赋能员工、赋能用户，实现深具人性关怀的盈利，成为互联网时代企业经营、管理的必经之路。

当然，在这短暂而又充满着无数变化的几十年里，也必然会有太多的理论和实践被证伪，因为企业不是新理论的试验场。新的经营、管理理念与实践也不是对传统的彻底抛弃和背离，而是在其基础上进行颠覆和升级。无论是对待理论还是实践，更要像摄影一样，将之置于历史、文化、全球的坐标当中，从不同视角，去解构、批判和总结。新模式不能匹配旧做法，新做法也不能套用旧模式。孰新孰旧，孰真孰假，交给时间去验证。

这本《用户价值变革》共分为《创变》《创生》《创造》三部曲，从三个层面对如何实现用户价值创造的变革做出了论述：

《创变》概述了未来学视角下的经济、社会、产业、组织趋势与企业实践，从大量的未来学研究当中，我们发现并分析了在这几个方面的主要趋势，当然，这一切的努力都是在结合企业实践的前提下的，如果泛泛而谈天下大势，而脱离企业经营管理，那也就失去了本书的意义。



《创生》试图在风云骤变的商业环境中理清用户、价值、需求、消费、原点这些基本概念，并在后消费社会的语境下对这些基本概念进行重新定义。这些基本概念都是人们嘴里经常提到的，为什么还要不厌其烦地唠叨这些？越是面对复杂局面，越是要回归基本层面。这是我们始终坚持的一点。我们知道，哲学的思考总是在人生、存在等基本问题上不断做出深刻辨析，这推动着人类对自身和世界的理解。基本概念就像手里的刀，需要经常打磨，常用常新。

《创造》在“用户价值罗盘”模型的基础上对企业的经营管理做出了系统的重构，在罗盘这个大的理论框架下，试图找出每个经营管理的要点在新时代下的关键制胜要素。静若通过访谈和调研得到的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总结了最具有代表性的企业案例，并努力对这些案例做出独到的解读。如果读者朋友们能够从这些案例及解读中得到哪怕一点裨益，对企业的经营管理有一丝的触动，那就是静若莫大的荣幸了，我坚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近三年的案例研究和这本书的写作也得到了陈春花老师、刘东华老师、三十多位百亿量级正和岛内外企业家、数百位正和岛岛邻企业家以及我的先生 Derek 的指导和鼎力支持，他们热情参与到《用户价值罗盘》模型的创造和本书的写作指导当中，与我共创。在此，静若无比感谢您们的抬爱和支持，静若将受此砥砺，奋发前行，陆续完成静若“价值罗盘”系列之《组织价值罗盘》和《企业培训价值罗盘》这两本基于企业内部用户——员工视角下的组织发展以及企业学习发展价值罗盘的案例研究和图书写作。

80多年前的2019年，你是否做好了迎接未来几十年巨变的准备？

稿约简则

《南洋学报》为南洋学会出版的中英双语国际性学术刊物。欢迎学术界及各方独立研究学者踊跃惠赐有关东南亚经济、政治、历史、地理、文化、社会、民俗等方面的研究文章。本学报实行审稿制，对来稿有删节处理权，文责则由作者自负。谢绝一稿两投和已发表的稿件。本学报的“文稿体例”请参阅南洋学会网站 <http://www.southseassociety.sg>。来稿请用Microsoft Word格式的电子文档，并通过电邮发至：

《南洋学报》编辑部
southseassociety@gmail.com

Notes of Contributors

The *Journal of South Seas Society* is a Chinese and English bilingual international refereed journal. We welcome academics and independent researchers to contribute articles on the subject of economics, politics, history, geography, culture, society and folklore of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Individual writers are responsible for facts and opinions expressed in their articles. Their interpretations do not necessarily reflect the views and opinions of the Editorial Board or the South Seas Society. Only original monograph is acceptable. The Journal's style sheet is available on the website of the South Seas Society (<http://www.southseassociety.sg>). Monograph must be submitted in microsoft word file and sent via email to:

Journal of South Seas Society
southseassociety@gmail.com

邮购单 ORDER FORM

传真 / 邮寄至:

世界科技出版公司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 Pte. Ltd.

新加坡 (SINGAPORE)

5 Toh Tuck Link
Singapore 596224
Tel: 65-6466 5775
Fax: 65-6467 7667
Email: sales@wspc.com.sg

北京 (BEIJING)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路18号
财智国际大厦B1505
邮编 100083
直线 / 传真: +86 10 62765875
电邮: wspbj@wspc.com

上海 (SHANGHAI)

中国上海滩国际大厦
黄浦路99号2003室
邮编 200080
电话: 86-21-6325 4982
传真: 86-21-6325 4985
电邮: shanghai@worldscientific.com.cn

香港 (HONG KONG)

九龙中央邮箱 72482
电话: 852-2771 8791
传真: 852-2771 8155
电邮: hongkong@worldscientific.com.hk
(总代理: 香港联合书刊物流有限公司)

台北 (TAIPEI)

台湾台北市10091
罗斯福路四段162号8楼
电话: 886-2-2369 1366
传真: 886-2-2366 0460
电邮: wsptw@ms13.hinet.net

新泽西 (NEW JERSEY)

27 Warren Street, Suite 401-402,
Hackensack, NJ 07601, USA
Toll-free Tel: 1-800-227-7562
Toll-free Fax: 1-888-977-2665
Email: sales@wspc.com

欢迎光临本公司网上中文书店 www.globalpublishing.com.sg 询问电邮 chpub@wspc.com

《南洋学报》第七十五卷 ISSN: 0081-2889

期号

数量

金额

订购优待 (一年一期)

单价 S\$20 • US\$20 • GBP20 • RMB95 • HK\$100 • NT\$450

邮费空运: S\$8, US\$8 (只收新币和美金)

* 订价如有调整, 恕不另行通知。

个人资料 (如有英文地址, 请用英文书写)

姓名: _____ 机构: _____

地址: _____

电话/传真: _____ 电邮: _____

付款方式

- 1) 支票 / 汇票 (若金额不超过S\$20, 请选用支票, 并附上此邮购单复印件。)

金额: _____

(收款人请写明: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 Pte. Ltd.**)

- 2) 信用卡 (请在相应的方框内打✓)

☐ VISA ☐ Master Card ☐ AmEx

信用卡号码: _____

有效期限: _____ 持卡人签名: _____

- 3) 机构订购

机构名称: _____ 订单号码: _____

注: 大量订购可享有特别优惠。



“即刻订阅”

中国大陆, 请传真
21 6325 4985

香港, 请传真
2771 8155

台湾, 请传真
2366 0460

美国、加拿大
请拨免费电话
1800 227 7562

其他地区, 请传真
65-6467 7667

南洋學報

第七十六卷 2022年12月

出版 *Published by*
南洋学会
South Seas Society
Robinson Road Post Office
P. O. Box 709
Singapore 901409
www.southseassociety.sg

国际刊号 **ISSN: 0081-2889**
MCI(P) 048/11/2022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封面题字：饶宗颐

制作/发行 *Produced/Distributed by*
八方文化创作室
(世界科技出版公司之附属机构)
Global Publishing
An Imprint of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 Pte Ltd
5 Toh Tuck Link
Singapore 596224
www.globalpublishing.com.sg